

绝版晚清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in Overseas Records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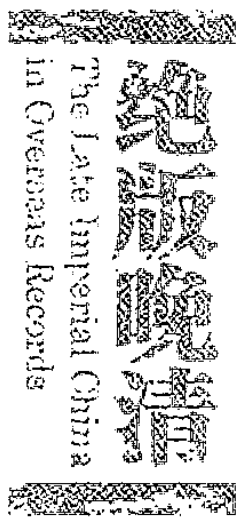
水隐醉月

绝版

张社生
著


袁世凯





绝版袁世凯

张社生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版袁世凯 / 张社生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741-887-0

I. ①绝… II. ①张… III. ①袁世凯 (1859-1916)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3885号

绝版袁世凯

策 划 / 么志龙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装帧设计 / 九章文化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出 版 人 / 桂国强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20×1000 1/16

字 数 / 120千字 250幅图

印 张 / 17.5

书 号 / ISBN 978-7-80741-887-0

定 价 / 39.80元

前 言

革命啦，运动啦！

每次来时都是轰轰烈烈，

每次都以 12 级以上的破坏力横扫千军如卷席。

而且每次鼓吹者都向国人保证，这次将彻底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总是一次次相信，

一次次地凑热闹，

一次次地赔上老命。

谁叫我们这个民族就好一惊一乍的热闹。谁叫我们相信不需要长期努力，罗马可以在一天之内建造成功的神话。

这不？突一日，有人登高一呼：革命啦！马上汉口街头风起云涌。热闹过后，只是没了辫子。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赵庄还是那个赵庄。

查“革命”二字，老祖宗的字典里没有，据说是东洋货。但是“革命”二字一经传入，立刻成了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也难怪，中国以前虽没有这个词，但是这些个事儿已经干了三五十回了。

“革命”是什么，其本意是有话不好好说，“我手拿钢鞭将你打”。

可是中国人后来所说的革命，已经和刚传入的本意大不一样，从一个中性偏贬

的词变成了褒义词。政客往往用之标榜自己，给政敌于“革命”二字前再赠送一个“反”字。我纳闷了，不是都说咱们是浸泡在儒教文化中的“化民”？曾几何时，“中庸”二字被走极端的“革命”二字给换了？

多想想就能想通：中国人多，挤得很。特别自乾隆后，人口上了四亿！一位18世纪在北京工作的传教士明确指出：“人口过多，迫使中国人不养牛羊，因为供养牛羊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

人多地少，慢慢地养成了潜意识里的一种极端的自我保护能力：非排挤打击隔壁的王二，否则不能得那一亩二分地。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劣根性叫做“窝里斗”。

血淋淋的“革命”二字传入中国，于“汉奸”、“卖国贼”外，咱们又多了一种打压别人的手段。

我以前很少看民国历史，大学期间最不喜中国现代文学史。为甚？因为咱们的先人动不动就给人贴标签，戴帽子。

历史，管他好人坏人，把人家干过的那些个事儿原原本本地都端将上来，我等自有评断。不是说：“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吗？到了节骨眼上就不这么想了。

晚清民初，梁启超提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以为坚持这条就能救中国。这百年来的历史多次证明，只问上层建筑不问基层“群体”是最大的书呆子气。曾几何时起，世界上的制度条文或多或少地都被引入中国。热闹后，留下什么？

你不能说引入者动机不纯，只是这些个舶来品实践下来，不是水土不服就是被稀释、被同化，最后被扭曲了。

强势者如我们的伟大领袖，穷晚年精力发动“文革”，还引经据典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最后也不得不对尼克松感叹道：他“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为什么？

这就引出一个中国特有的“群体”现状。

大清国和别的主要大国比，不在经济的高低，人口的多少。最大的不同就是“群

体”没有“被近代”过，整个国家不是人家所说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咱们大清国基本分两块，一个是皇家，一个是“臣民”。用袁世凯的话说：清只是一个朝代，不是一个国家。

清国就像一个大村子，皇家是村中的大东家，皇上是大东家掌柜的。围绕着这家大户，有一批称之为一品、二品……跑腿的和帮闲的，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家都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小散户。

平时大东家居高墙深宅里，吟诗作画，和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只在秋后收租子时才打下照面。

所以咱们这个大清国，和历代王朝一样，历来是“东家的事儿东家管”，“百姓的事儿百姓管”，是个比较极端的二元社会。

因此别指望，有什么事儿老百姓会拿命来捍卫。“群体”没有“国家”概念，不会和你同生死共患难。

用眼下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叫“没有公民意识”。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排他性，让每个个体都将防卫的底线画到自家门口。

这才是问题所在。这些问题百年来也没有彻底解决。

君不见，为了一个公用面积里的酱油瓶位置，筒子楼里的知识分子可以大打出手；打后当事人还能回到斗室，镇定自若地写出一篇“主旋律”的好文。

君不见，走遍中国，公路旁的树上到处挂着丢弃的白塑料袋，在风中哗啦啦作响，不禁使你想到拜伦的诗：“……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招展着，就像雷雨似地迎接狂风。”

可是政客不管这些，人家都喜欢自上而下入手，关起门来定几项制度，容易而且政绩看得见。好样儿的如光绪皇帝，数千年的旧制度，人家103天里发了数十条手谕就想改变，后来一个上午就让人给废了。事后发现除了康有为们愤怒外，国人大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百姓闹不明白“变法”，大伙儿最多把它看成是大东家的老妈和儿子吵嘴。出于数千年顶礼膜拜的“孝”，大伙儿说不定还认为老妈有理呢！

再说，政客也没有这个能耐，他们有的只在位子上三五年，多则十多年，最极端如康熙同志干“革命工作”60年，能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

启超同志，说到底，从来没有“被近代”过的国人是消受不起你这个“政体”、“国

体”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不问政体，不问国体，只问群体”。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别怪东怪西的，问题就出在“群体”自己。

根本的还是要从一个个个体做起，“群体”好才是真的好！

群体是“半野蛮人”状况，制度装扮得再漂亮，标榜得再先进也会露馅儿。

“群体”如果是优秀的，“被近代”过的，不二元社会的，再烂的制度也能发挥到美的极致。

只问“群体”，其实最难！因为要从娃娃抓起，要全民识字；培养公民意识，消除“患不均”之感。

这类事儿听起来语不惊人，做起来没轰动效应，而且十年八年看不出效果来。所以任何政客都喜欢奢谈短平快的“政体”和“国体”，他也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事儿。

不要相信罗马是可以一天建造出来的。

也不要相信民初的悲剧是有一个特别“蠢”的人直接造成的，以为历史上没这个人就一切 OK 了。

袁世凯何人？不过一政客也，最多是伟大的政客（政客称伟大的大有人在）。

政客的专业就是看风使舵，投人所好。如果这手不会就不是专业政客。

试想，如果 20 世纪最初几年，“群体”没有立宪的思潮，袁世凯不会贸然去充当那个“立宪派领袖”。

如果 1911 年，大半个中国的“群体”都不想试试共和，他也不会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

如果 1915 年秋，“群体”没有厌倦了共和的吵吵闹闹，想“老主子”了，袁大总统也不会去打造那把龙椅，“洪宪”一回。

说得明白点儿，民初的那些事儿和任何个人都没多大关系，全在那时的社会。

后人看这段历史，别忙着贴标签。

特别要注意的是，那会儿大伙儿的想法老在变，绝不能拿 1909 年上半年的民意去套下半年的事儿，到了 1911 年更是一天一个“民意”。也难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睡了三千年，一觉醒来，发现乌龟要跑到终点了，这下急啊！正所谓“清朝的突然灭亡，现代的东西被嫁接在了几千年的树上”。（纽约时报语）

了解这些，你再来看袁世凯，就不会说他一会儿忠于大清，一会儿出卖大清了。

所以本书特别在意袁世凯当国那段时期的社会“时文”和同代人、身边人的回忆，在意历史的原汁原味；特别在意国外报纸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的诸多细节。这也算是一绝吧！

为市场计，本想演义一下袁世凯。后来一想，自己从不看武侠，也不翻演义，做不来！所以本书将不会模仿《明朝那些事儿》，以强烈的个人情感，近似武侠的笔调，去“英雄”、“狗熊”主人公。这里没有结论，结论由您自己给。

张社生 于北京朗琴园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目 录

第一章 袁世凯素描

- 作为男人的袁世凯 3
- 袁世凯的那双眼睛 10
- 不明大势 却能办好差 18
- 办事嘎嘣脆，什么人都敢用 28
- 从喜欢侃大山到谨言慎行 32
- 和孙中山比袁世凯的演讲差一个档次 36
- 袁世凯的女人缘 6
- 袁世凯体壮如牛 14
- “视黄金直如土块” 24
- 耐得骂 死猪不怕开水烫 30
- 开会喜欢慷慨陈词 35

第二章 北洋袁世凯

- 小站练兵前的“买办袁世凯” 44
-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世今缘 54
- 山东巡抚任上，义和团发不了功 64
- 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75
- 袁世凯这次真给吓着了 86
- 纽约时报记者访问袁世凯 94
- 军人袁世凯 48
- 袁世凯手下的龙虎豹 57
- 直隶总督袁世凯，全国劳动模范 69
- 袁卷入了后慈禧时代的权力斗争 81
- 袁世凯与摄政王载沣 89

第三章 寻找消失的洹上村

- 洹上村，中国第一村 100
- 洹上村消失算什么？ 102
- 再现洹上村 107
- 住宅院玄机重重 114
- 谁说袁世凯不会写诗 116
- 洹上村循环经济搞得好 124
- 洹上村是怎样消失的 101
- 袁世凯为何对洹上村一见钟情 104
- “城堡”来自于一个一世的恶梦 110
- 外中内西，老袁也时尚 115
- “养寿园”有点中南海 118
- 袁世凯用钱的秘密 126

洹上村其实有点怪 128

袁世凯在洹上村的日子怎么过 136

袁世凯也怕“拆迁钉子户” 144

亲历者揭秘袁家人生活起居 149

自己没墨水，孩子身上补回来 130

潜伏在洹上村里的“电报房” 141

洹上村里住了多少人 145

第四章 袁世凯出山

173

袁世凯出山 177

想当年“窃国大盗”是“救世主” 190

半新半旧最受欢迎 196

倒是袁世凯磨磨蹭蹭 200

袁世凯剪辫子 204

大总统没有安全感 184

媒体恶炒袁世凯 194

袁大总统演的三场“老戏” 199

徐世昌说袁世凯 202

和革命党人短暂的“爱情” 207

第五章 最后的袁世凯

215

袁世凯和日本 217

中南海里的袁世凯 228

败在没做好新老干部交替 239

袁世凯最后的日子 252

一蟹不如一蟹 226

终究想当皇帝 232

帝制输在临门一脚的日本人 246

归去来兮 袁林 258

袁世凯素描



袁世凯其实一身的矛盾：生就一副庄稼汉的面孔却有“国之能人”的肚肠；人不足五尺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职业军人”；倡言改革，却一妻九妾，相信风水和宿命；一生办国事无数，却留下“窃国”之名。（图为当年荷兰画家胡博所绘袁世凯像）

袁世凯大事记 (1859~1893)

1859年		9月16日，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袁寨村。字慰庭（或慰亭、慰廷），别号容庵。
1876年	17岁	应考举人落榜。10月，和陈州的于氏在家乡结婚。
1878年	19岁	在陈州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同时捐“中书科中书”。
1879年	20岁	在陈州结识了来此地当塾师的天津孝廉徐世昌。
1881年	22岁	在上海的妓院结识了妓女沈氏。后去山东登州，投靠吴长庆门下，任帮办文案。
1882年	23岁	袁随吴长庆赴朝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10月，清廷赏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
1883年	24岁	为朝鲜王训练新建亲军。
1885年	26岁	李鸿章奏派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知府分发，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
1891年	32岁	嗣母牛氏病故，袁奉旨在家乡服丧百天。
1893年	34岁	5月，补授袁为浙江温处道员，仍然留在朝鲜署事。

作为男人的袁世凯

作为男人的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读书不多，屡试不中，自难风雅。在女性的眼里，既无“高度”又少“风度”，显然魅力不够。

哪像人家李鸿章，1米83的高度，早年进士出身，翰林院养就的文章气质，外加“洋务运动”历练出来的外交官风度，往哪儿一站都帅气夺人。斯人如此，搁在现代，也称得上是魅力不减的“老师哥”。

1980年代中国女性择偶的流行标准曰：“身体要像运动员，面孔要像演员，风度要像司令员，工资要像国际海员。”人家李鸿章样样具备。

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北洋大臣的政治衣钵，却无法继承李氏的男人风度。

倘若以貌取人，袁世凯的确有点色不如人，至少不养女人的眼：个头不到1米60，身躯臃肿，圆头短颈，在一袭晚清特制“武警”军大衣的衬托下，不免示人粗鄙。三女儿袁静雪说：

“我父亲生就一副五短身材。我们曾看到过他做直隶总督时的一张照片，从照片



1896年，身高1米83的李鸿章正和英国首相走进宴会厅。李鸿章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外表上很有大国宰辅的风范。



青壮年的袁世凯（中），一副庄稼汉面孔，个头不到1米60，跟两个并不高大的下属相比，更显得不起眼，没丝毫气势可言。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他已经比较胖了，到了中南海，比以前更胖了些。”

法国人用恭维代替开涮：他的身材、面部表情、头部的外形、面貌的轮廓以及胡须的式样与他们的老虎总理克莱蒙梭非常相像。

实话实说，克莱蒙梭长得咋地，算是法国人眼中的次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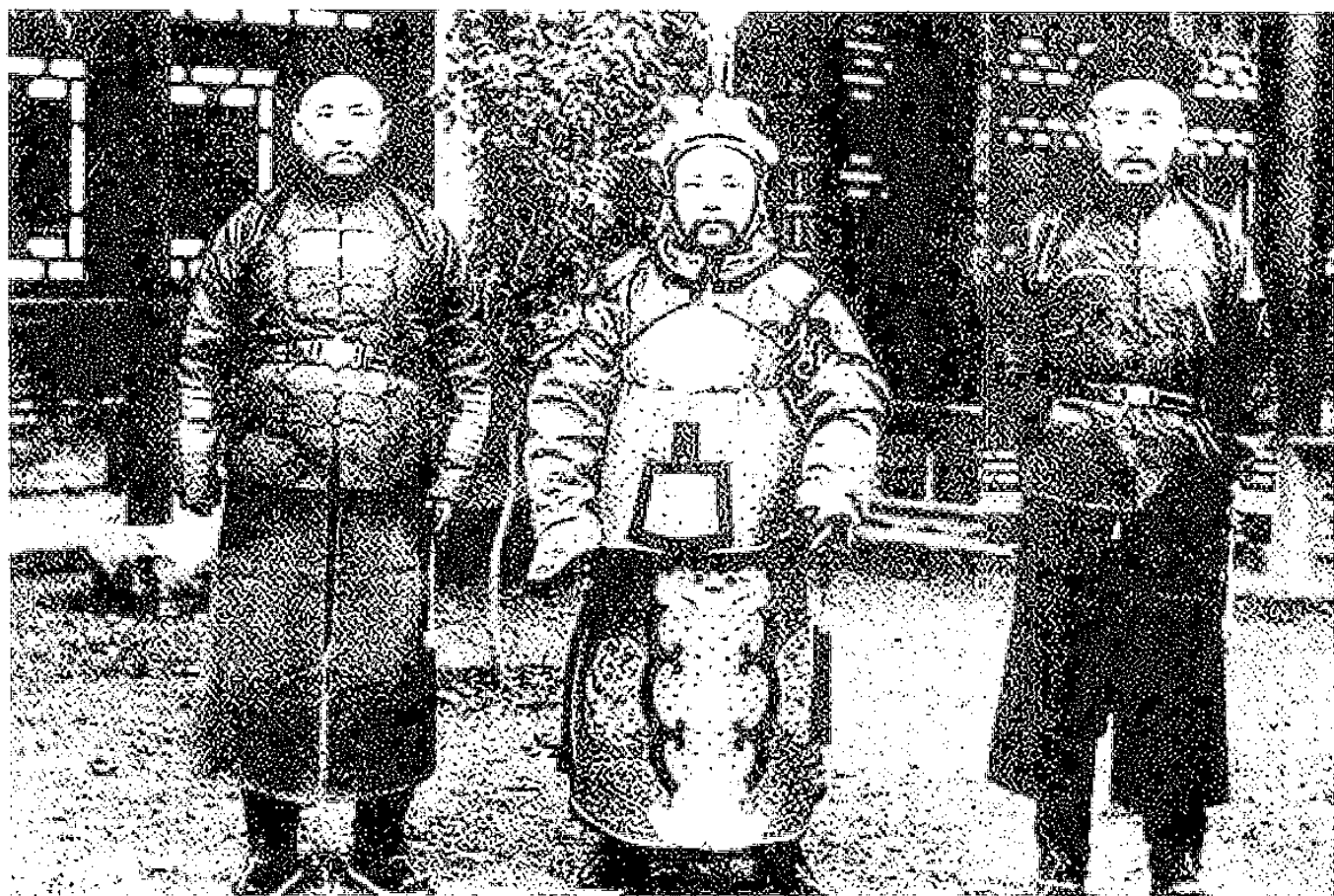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直截了当地说他：“矮小结实，有着粗脖子，身形微胖。”（1915年12月12日）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用外交辞令修饰了一下自己的评语：“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

众口一词，个矮腰圆，体壮脖粗，袁世凯一亮相，在架势上就矮了李鸿章三分。这还是远瞧。走近看，袁世凯皮糙肉厚，面如蒙尘，暗无光亮，比不得人家李鸿章气血充盈，满面红光。得，在肤色上又吃了一亏。

相貌上，袁世凯先天不足。所以老袁一生什么都被人编排，就一点没人诟病，即从未有过桃色绯闻。说来还得归功于长得不帅。

尽管相貌不佳，读书不多，既无高度又逊风度，但袁世凯久处市井，历练江湖，深谙市井风俗，为人处世上，既不违人情，又颇合事理，加之机心绵密，善于权变，所以官场上，巧于应付，拿捏尺度，自显英雄风采；情场上，体贴人意，不乏温度，一点不缺女人缘。



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戎装的袁世凯，简直就是一副盔甲包着个肉团子。



着晚清制式“武警”大衣的袁世凯 这是袁世凯送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照片，莫理循在1912年受聘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还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以嘉奖莫理循为其做出的贡献。

袁世凯的女人缘

袁世凯生命中的女人，明里暗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十多位如夫人，可谓艳福不浅。只是这些女人没有一个是因為袁世凯的帅而对其一见钟情的。

袁世凯的九位小妾中有三位来自妓院（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

对于中国文人、官吏的娶妓为妾，林语堂解释说：“大多数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妾，故堂而皇之，无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有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

袁世凯的妾更多的来源于自家的女婢，是在长期主仆生活中慢慢建立感情的。

从女婢走入老袁个人生活的有五位（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这三位是朝鲜族的。这三位朝鲜姑娘，袁世凯自己说是抗日援朝间，他家的三位女婢。七姨太是大姨太的女婢，九姨太是五姨太的女婢）。

尽管袁世凯长得不帅，这些女人与他结缘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老袁自有老袁的魅力，女人们大都念着他的好而在情感上臣服于他。

查老袁的一妻九妾。四姨太还为他殉节呢（吞金立死），三、七姨太没殉成。（三姨太吞金后，伤身，三个月后死；七姨太因为怀孕，有孕乃大，被劝下，没死成。）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抛弃生命，你能说这里只是金钱的关系？说明老袁在她们心里是有分量的。

老袁管理妻妾队伍是有一套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一碗水端平。不似光绪皇帝那样偏心眼，专宠珍妃一个。到最后怎么着，就那么三个后妃还分成三拨，和载湉哥离心离德。

老袁不，他从不搞满人那套翻牌子勾当，每个女人给一周，七天时间满打满算，朝九晚五，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钱财利益方面，七子袁克齐说：

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



正夫人于氏（中）和几位姨太太在中南海“新华宫”与女儿们合影。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总有一个女人，而一个成功的袁世凯后面有十个女人。此图中八位穿“公主服”的是袁世凯女儿，其他为姨太太们和儿媳孙女们，后排大女伯祯已嫁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儿，故“公主服”两样。

这张照片有三女袁静雪（估计于氏后左那位）。她有一个段子可做此照注解：“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二姐一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七个人，都穿上了新装；惟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

晚清民初，西风吹拂下，女装款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右图中女子的服装与上图袁世凯女儿们穿的“公主服”何其相似。旗袍由宽大改为了小腰身，外加短小的绣花坎肩。女子手中还持有带西式花边的阳伞，愈发显得亭亭玉立。



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付金镯子，父亲说，好！每人一付，一个人买是不行的。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

家中存款摺子向由我母亲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取出后交账房按月钱数自发放。

如果庶母们谁要犯了错误，父亲除当面训斥外，还要看情节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月钱。有一次九庶母与人赌博，就被停发两月月钱。

这就对了，按规则办事，走程序，不偏不倚，这就消除了妻妾队伍中“患不均”、嫉妒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其二是老袁让这些女人有事干。女人没事干，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东家长西家短地整天搬弄是非。

老袁采绵里藏针法，让大姨太场面上出风头，二姨太管钱财（前期）和烧菜。三姨太发扬朝鲜族能歌善舞的特点，弹琴（七弦琴）唱歌，五姨太管队伍建设。

不同于前面几位过了更年期的姨太太，六、七、八、九姨太太此时因为正值“虎狼之期”，故白天让其学文化，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晚上值班伺候，巫山云雨。

大家都在忙。忙就好，闲事儿就少。

袁世凯对待妻妾特别鬼的地方就是投其所好，对症下药。

不知是真是假，据说袁世凯好上了二姨太的熏鱼，二姨太美得什么似的，每天用高粱米和芝麻养蟹，变着法子改善伙食。

五姨太杨氏从小跟爹做小买卖，擅长理财，老袁就让其管钱。还假装糊涂让五姨太每天从预算里扣点儿小钱，自得其乐。

什么都拿不出手的那几位，就让她们学 ENGLISH，学填词，酬酢唱和，吟风弄月。

其实，读懂人心、善解人意的男人，从来都不缺魅力。何况袁世凯并非一般的男人，而是手握重权、足够“伟大”的将相人物。



英俊的袁世凯 这张相片应该是袁最满意的，因为此照将袁世凯拍成了1米80的感觉，威严又不失英俊。袁拿着它到处送人。

袁世凯的那双眼睛

袁世凯读透人心，全靠一双黑如点漆的眼睛。

大双眼皮，属于重叠式太和殿风格的那一种，两个黑乌乌的眸子占掉整个眼帘的百分之八十。如果有人印刷袁世凯标准像，油墨老师傅必须选择纯黑的那种，一点儿杂质都不许有。

更有甚者，这对黑眸子还水汪汪的，带点儿晶莹剔透。

看着这对黑眸子我就纳闷了，袁世凯大半辈子待在降雨量低于 600 毫米的北方干旱地区，怎么就养就他这么对一泓秋水？

袁世凯认为他的这双眼睛不是先天具有的，是其后天练就出来的。他还偷偷地将这技术教给二儿子袁克文：“于薄暮时行之，兼养目力。”

这双乌黑闪亮的眸子，不知镇住多少英雄豪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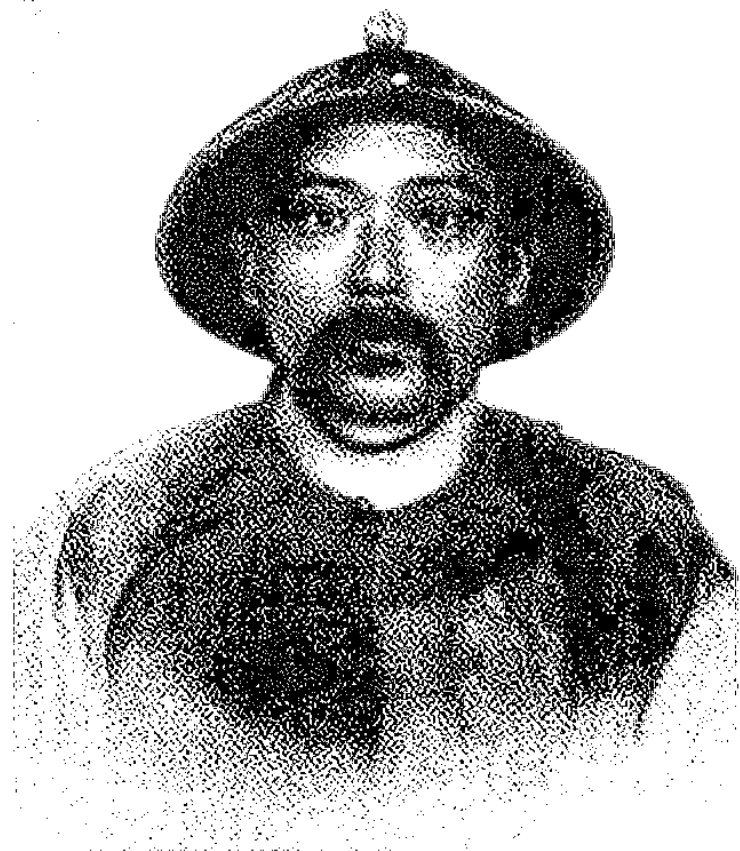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1915 年 4 月间被袁 3 次召见，其中第一次召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为此谈虎色变。他后来回忆道：

我一生见过了多少位咱国家的元首，如孙中山、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甚至张勋、段祺瑞以至蒋介石等，没有哪一个像袁世凯的两道目光那样虎视眈眈地逼人，使人不敢仰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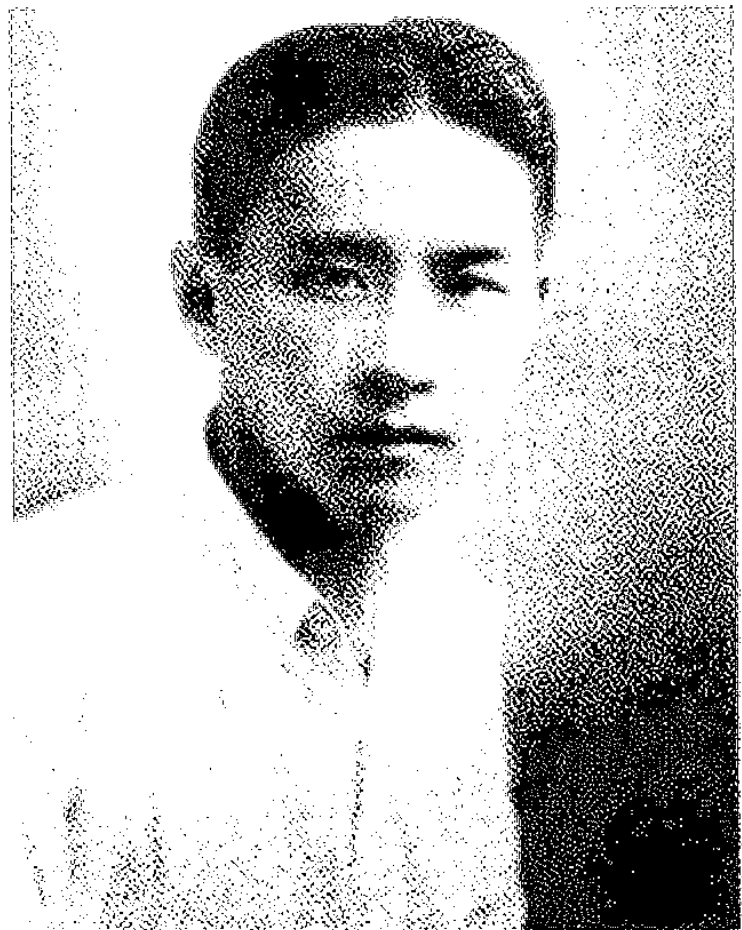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 1913 年第一次向袁世凯递交国书后，回去对袁世凯却做了如下描述：

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捷而灵活，经常带着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并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或者通常是料到）谈话的趋向，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对每一个新的细节都能作出判断。

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老袁知道自己这双眼睛抵得上日本的一个师团，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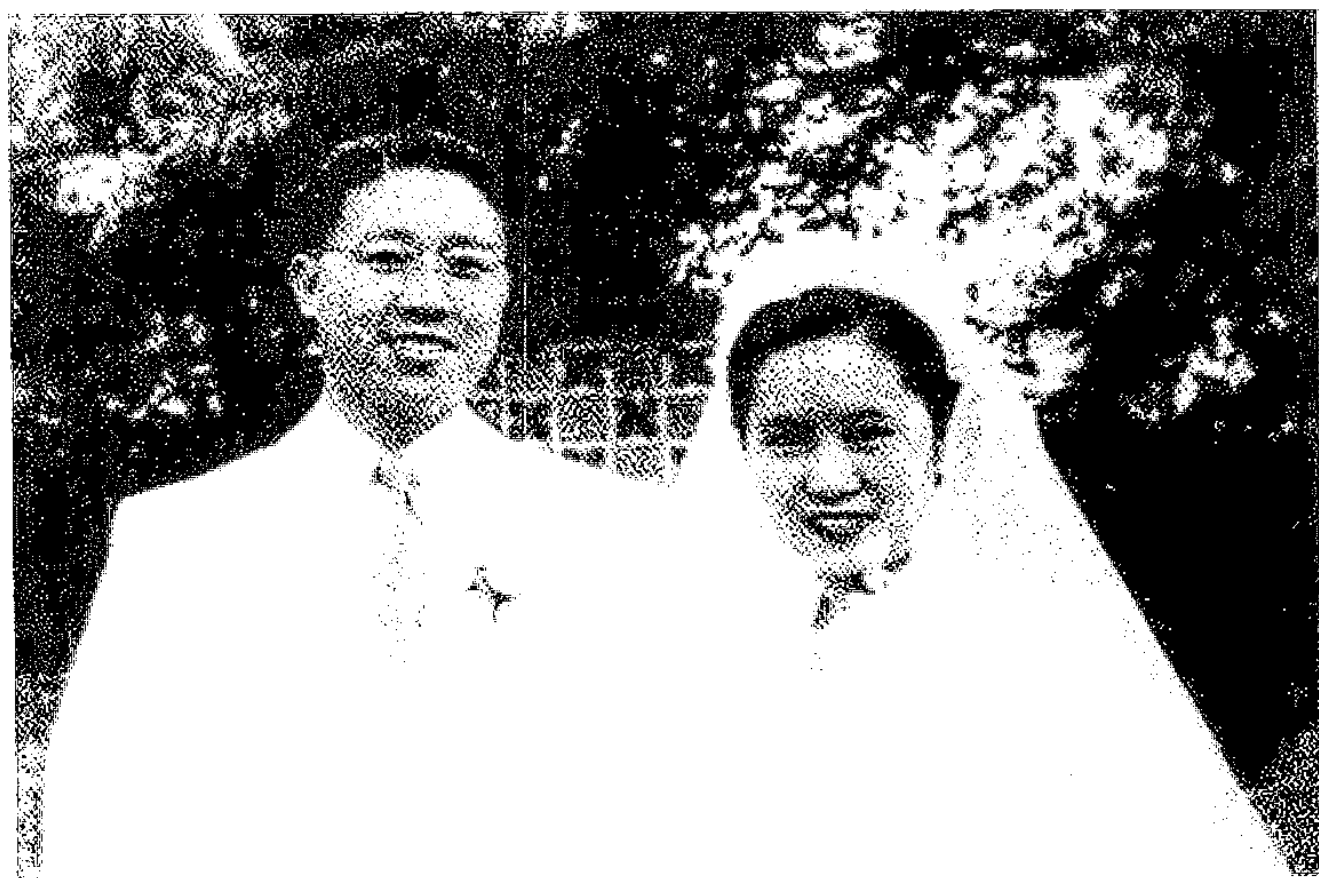
青年时期的袁世凯 两个黑乌乌的眸子占掉整个眼帘的百分之八十，这对黑眸子还水汪汪的，带点儿晶莹剔透。



袁克文（1889—1931），字豹岑，又字抱存、抱公，号寒云。袁世凯次子，由其三姨太金氏（朝鲜人）所生，从小便被过继给大姨太收养。大姨太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他提出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自幼聪明过人，长大后不喜政治，长于诗文，工书法，能演唱昆曲，爱好藏书和古玩，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袁家骝和吴健雄结婚纪念照 袁家骝（1912年生于河南安阳）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三子，妻子吴健雄素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

袁家骝 1942年5月30日与不满30岁的吴健雄小姐结婚。婚礼由加州理工学院院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及其夫人主持，并在院长的花园进行。



在外交场合充分发挥之。

老袁的眼睛赢得了芮恩施的好感，以致到后来，康有为想借美国势力反袁世凯，这位美国当时著名的远东事务权威，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赫赫有名的教授，时任美国驻华公使，以三篇绝密“内参”把康有为的动议给“参”掉了。

第一次见面，连“国父”孙中山也被这双眼睛给蒙了，孙说他的眼神是那种至诚至真的样子，“眼光四射”。所以才有了200天左右的孙袁蜜月期。

袁世凯的三十多位子女对老爸这双眼也印象深刻。

如果（孩子们）得了坏分数，他那种严肃的面孔，不留情的申斥，是谁也受不了的。（袁克齐语）

他的双眼，如果圆睁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杀气”，这大概是人们对他的心怀恐惧的道理吧！（袁静雪语）

袁克齐和袁静雪说的是他们这些做儿女的感觉，其实袁大总统对人的态度是分对象的。

对子女，他摆出严父面孔，是严肃有余、慈爱没有的那一种。“我父亲性情刚烈，态度严肃，寡言笑。有时他叫我们兄弟陪他吃饭，大家都很受拘束。”（袁克齐语）

对洋公使、洋访客是专注倾听，热情洋溢，一口一个中国人民老朋友之类的外交辞令。

至于他的僚属或部下，他对待他们都很客气，很少看到他厉声厉色的神气。但凡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抱着恐惧的心理。可以说，我父亲是有着“不怒而威”的神态的。（袁静雪语）

好个“不怒而威”，天下大权在手的人，都给人以“不怒而威”之感。呜呼，却原来权是力量的源泉。权力，权力，中国人造词真是绝了！

对政敌他是先施诱惑，再施迷惑，如不奏效，话不投机半句多，老袁便闭目养神，绝不睁眼看你一下。回到办公桌前，双眼露出凶光，在判决书上金眼御阅，“金

口御断”。

他手下的大红人唐在礼回忆说：

处理革命党人的案件，向例先由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亲自向袁世凯请示决定发落。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难题，就是袁世凯对这些案件的处理很注意舆论的反应，他有时很用心思，但毕竟还必须随着他个人的旨意作出决定，并且事实上一直是凭他“金口御断”的，话一经说出口来，就几乎没有斟酌的余地。

……袁对这些案件，处理得很严酷，对批文措辞决不随便放过，要求“合法合理”。在这一点上他很用心思，有时还亲找陆建章进去研究。有时也找我进去当面嘱咐，说“再交给周肇祥看看”。就是这样，多少反袁人士就在袁的“合法合理”之下被处决了。

看了这段，明白了，原来那会儿的执法处是摆样子的，生杀大权都在袁大总统一人手里。难怪袁世凯从不对政敌怒目而视，最多只盯着你，不说话。

英文原注“袁世凯总统，1915年12月11日。”（此照国内第一次发表）由此推断，应该是在中南海办公室里办公时拍的照片。手上拿的别又是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送来的处决名单吧。但是英国人显然搞错了时间，这应该是1912年，袁在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办公室里拍的。



袁世凯体壮如牛

眸如点漆，说明袁世凯精力充沛，气血充足。这点纽约时报特派记者托马斯·米勒德看得最清，他在1908年专访袁世凯时说：“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是的，袁世凯壮得像头牛，宽宽的额头油光锃亮。说话大嗓门，声如洪钟，中气十足，给人以身体健硕之感。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特别注意包装自己的军人形象。

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坐。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档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袁静雪语）

为了刻意增加自己的军人威严，袁世凯又在如下四点上做足了工夫：

1. 蓄威廉须。人到中年，特别是小站练兵后，袁世凯留起了德国军人的威廉须。两边翘翘的，似张飞的武将风格，又与时俱进，跟上了欧美潮流。

其实当时的中国，一切唯德日为美。特别是德国，那种说一不二的硬朗作风，专制加民主的政体，对中国政军界，特别是对袁世凯很有吸引力。民国时出版



的《世载堂杂忆》里说：

当时欧洲大战起，德国挟疾风扫落叶之势，……世凯乃一切师承德制。其练兵也，军中步法，令改用德御林军步伐。其训将也，选将皆用留德陆军学生。其选制服也，先由家庭改革，诸子皆着德国亲王陆军制服，照相颁示。其教子也，圈出荫昌为诸子德语教师。其每日呈进居仁日览，亦译奉《德皇威廉本纪》一纸。乃至蓄须，府中文武军官，咸模仿世凯嗜好，蓄威廉二世八字牛角须。

大总统袁世凯留了，北洋系的一大批高级军官就得留。一时间中国军政界威廉须泛滥。

2. 扎一根军用皮带。袁世凯晚年留下的立照，大多扎一根宽宽的军用皮带。这是老袁最失败的形象。

你想，老袁的腰围最起码四尺，属于熊腰族。他不思遮掩，还用一根皮带大咧咧的一箍，把个水桶巨腰明码实价地暴露无遗。

袁世凯着总统服 威廉须两头翘，给人以威严的感觉。瞧袁世凯这水桶腰，和上身快呈金字塔型了。加上腰间一根皮带，更将水桶腰暴露无遗。

◀ 威廉二世 末代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年到1918年在位。



3. 手握一根藤手杖。袁静雪说：

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些左右轻微地摇摆，手里一定拿着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根藤手杖，仿佛不是我父亲借它来支撑自己的身体，而是故意用它来敲地似的，随着他走路的声音，总是另外听得见这根藤手杖梆、梆……敲地的声音。我们知道，我父亲所以要随身带着这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是有防身之意的。

女儿不知道的是，这还是一根权杖，同样是欧洲传来的新玩意。这说明五千年的古老帝国，精神崩溃后，整个社会都以西为美。把自己定位为西式练兵鼻祖的袁世凯，当然需要一根藤手杖来充当一支新式军队的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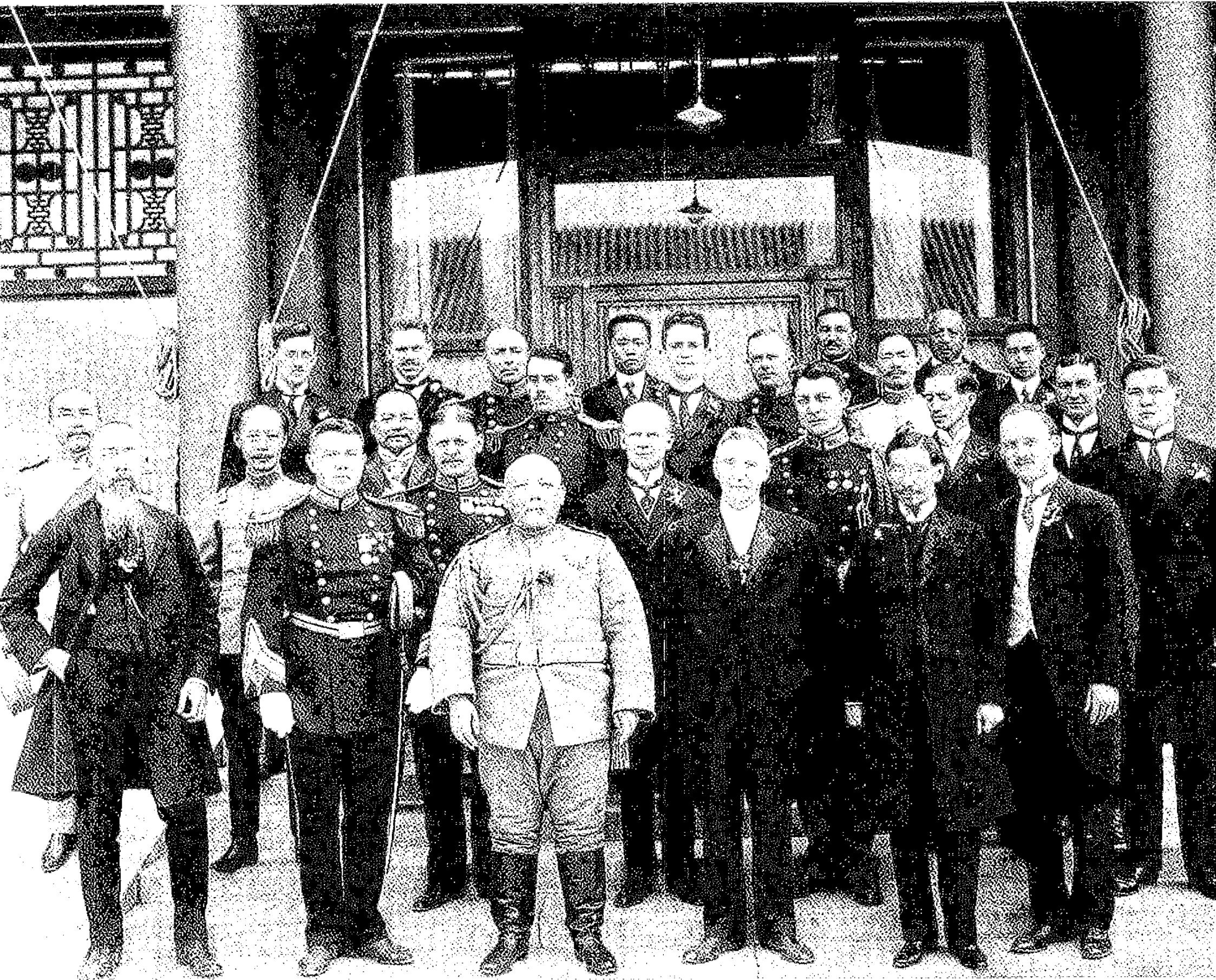
4. 雪茄烟。袁世凯没有烟瘾，深恶痛绝鸦片。为了让人对新军耳目一新，这家伙居然连雪茄烟也用来包装自己。女儿袁静雪说：“他和人交谈的时候，嘴里总离不开雪茄烟，走路的时候也是如此。”

住洋房，抽洋烟，着洋装，夹杂些许洋词儿，1911年，中国精英的这几个画面已经在在告诉我们，清末民初那十多年并不是死水一潭。

这时的老大帝国在每个细节处都发生突变。连废除科举都成了读书人的共识，这在李鸿章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更有甚者，南方数省民意开始求变。变什么？满清贵族知道，所以他们急就了些改革开放的条条纲纲。可是历史吊诡得很，恰恰这些改革动作，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

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



袁世凯和部分政府官员与美国公使嘉乐恒（袁右侧）等合影

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5月2日美国率先承认袁世凯政府，这是袁世凯在总统府与美国公使等合影。他身着的仍为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左前第一人为孙宝琦，孙右后方为荫昌，前右二为陆徵祥，荫昌之右为梁士诒，第三排右一为顾维钧。

武昌起义后，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一直在洋人圈子中为袁世凯重新出山摇旗呐喊，并得到驻京公使团的一致同意，正式建议清政府起用袁世凯。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总统后，嘉乐恒称许袁说：“还没有比袁世凯更强的人出现”，“未来的所有希望都集中于袁世凯一人”。

不明大势 却能办好差

袁世凯一生行事，浑阔机巧有余，明智聪慧不足。

袁氏懒读经书，不识圣贤，却混迹市井，玩弄人情，加之生于富贵豪门，叔祖父袁甲三官居总督，所以弱冠之年，即得机缘，先随堂叔袁保恒、袁保龄赴京办差，后随父辈好友吴长庆历练行伍，经营朝鲜驻军事务，所以“趁时就势、精于世务”的应变能力，远非同时代书生之辈可比。

不读圣贤书有时未尝不是幸事。因为少些道德羁縻，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偶遇机缘，碰上历史紧要关头，沧海横流之际，彼辈才能不管不顾，豁得出去，干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伟业来。刘邦便是先例，袁世凯紧随其后，算是后例。

行走市井、浮沉江湖，而不读圣贤经书，做英雄事业，自不妨展露雄才，巧于应付；但做帝王事业则不免缺乏大略，看不清历史方向。所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袁世凯一生，就是个有雄才无大略的主，因此不难遂青云之志，立身云端，但却昧于大势，无法拨云见日，看清未来的出路，最终跌落在历史的迷雾中。

袁世凯一生，能办好差，却不明大势，所以处事多能，治国无纲，缺乏引领改革、洞见未来的治国方略。

如此说来，叱咤中国政坛 26 年，做过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倒是缺少政治理论的功夫，多少有点不学无术的意味。

说不学无术是过了点儿，其实，清末那几位名人，早就有人评论过：“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郑孝胥语）

“不学”可以理解成没学问，无思想，“有术”就是能力强。这话准！

袁世凯说到底是个官僚体系里的工程师，此公既不风雅，也不著书立说，混迹在官场，练就了十八般武艺。

最让人吃惊的是，刚出茅庐，当了个五品的直隶按察使，便让满朝廷里的文官武将一边骂他小人，一边保荐他。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说：

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



岑春煊不学无术（左上图）岑春煊（1861—1933），壮族，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岑春煊带兵勤王，因护驾有功，升陕西巡抚。后历任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三次）、两广总督（两次）、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邮传部尚书衔等职。

张之洞有学无术（右上图）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直隶南皮人。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后任湖广总督、军机大臣。

端方有学有术（左下图）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托活洛氏。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曾赴欧美考察政治，兴办新政，并为清政府开办警察、新式陆军等事宜，还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宣统三年（1911）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在资州兵变中被杀。

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袁世凯最大的优点就是“肯做事”。

有人说，拿了薪水当然要干事儿。不尽然！

满朝文武不干事儿的多着呢。清贵们大多“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遇事儿喜说：“知道了”或者“照例”，然后交于下属，下属再承包给别人。三包，四包，最后不知道谁拿了这百分之十的回扣，了断了“国家大事”。

袁世凯办事是出了名的顶真，有时顶真到了婆婆妈妈的地步。中国外交之父顾维钧领教过：

每天早晨我们将日文、德文、法文及英文报章择其重要条目译成中文，下午译完，供袁总统次日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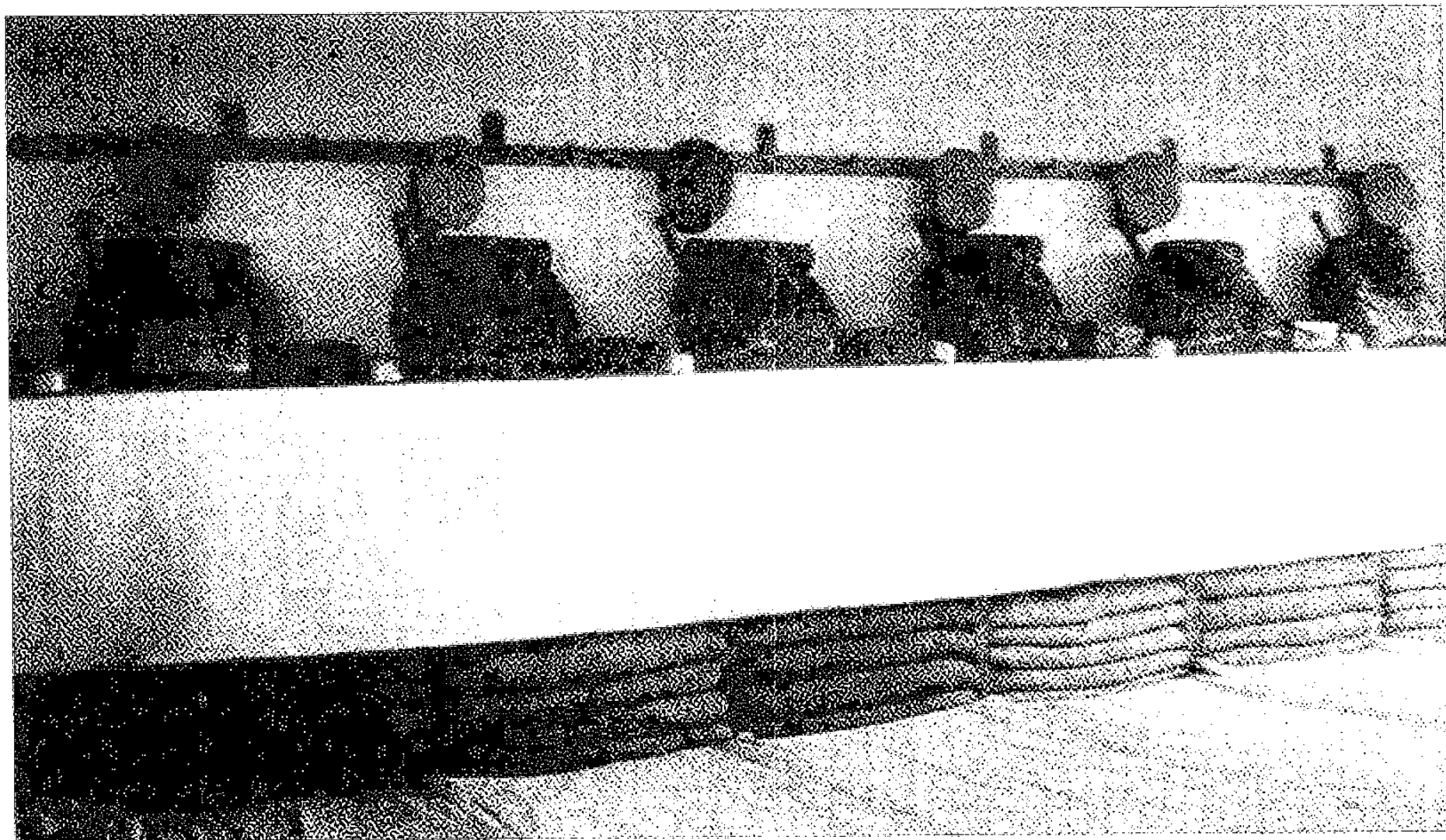
某日晚约九时半，我在外有饭局，总统府来紧急电话找我。我接过电话，原来是总统府一位秘书打听新闻的译稿为何尚未送到。他说打搅我很感抱歉，但总统每天早起穿衣后必要索阅，因此他急于替总统准备好，供他阅读。

此事表明袁总统是如何重视我们的翻译，虽然总统的副官处也在翻译路透社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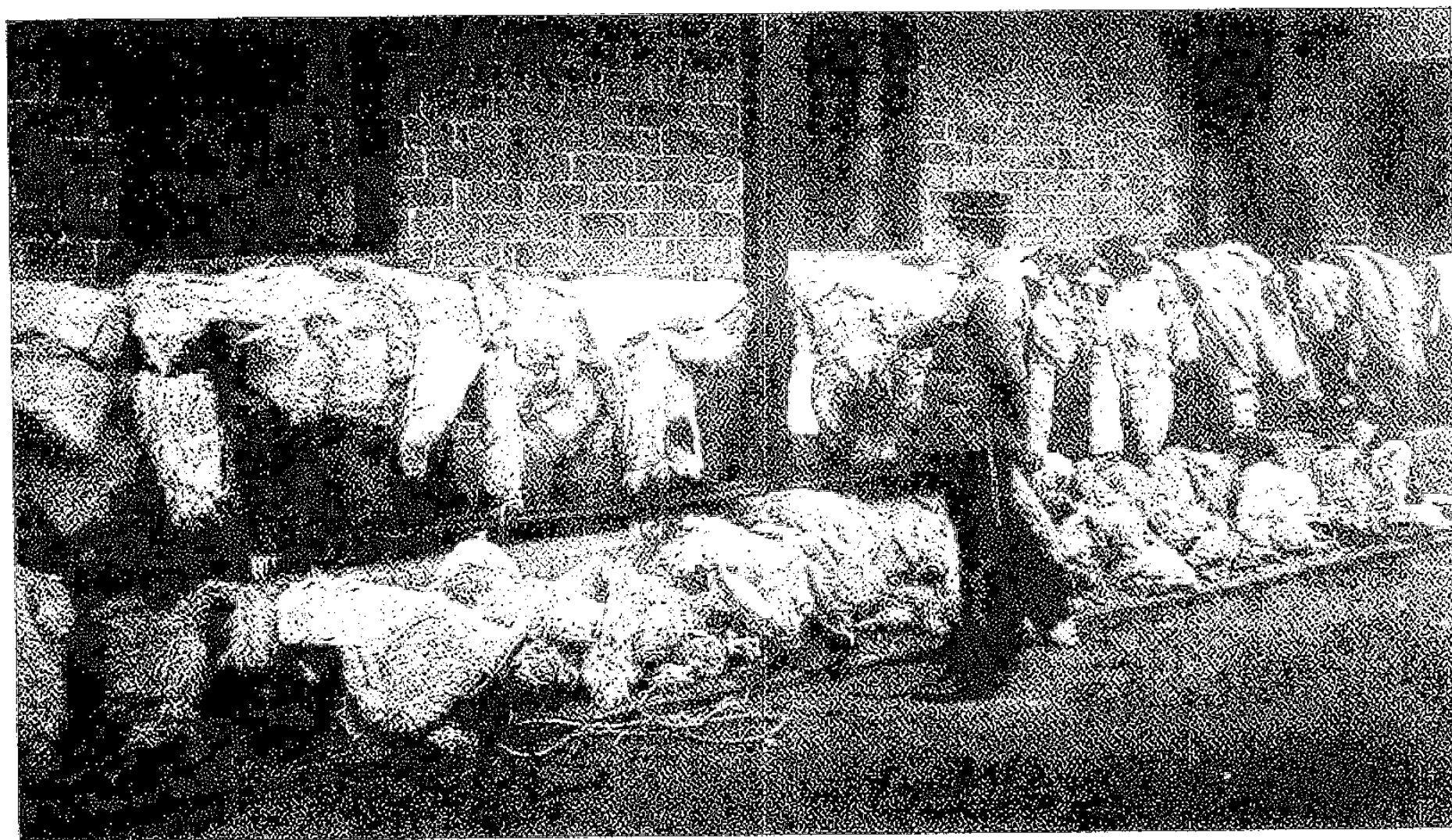
1915年1月该处未能认出一份实系来自日本天皇的贺年电报，总统对其工作失去信心。自此以后即下令不愿再看副官处的翻译文件，而只看外交部的材料，并要外交部送呈每份电报的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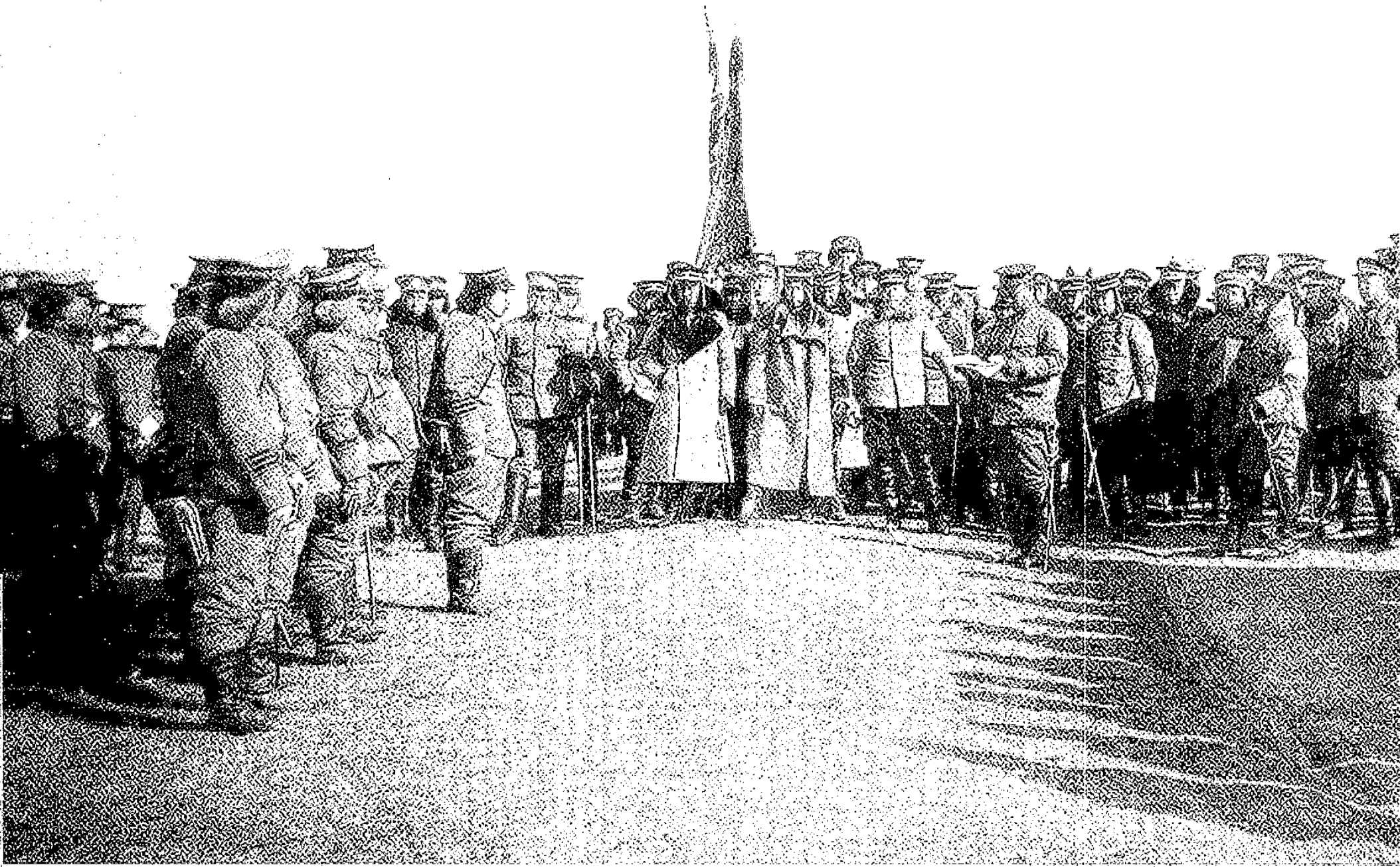
这些情况说明，袁总统是如何地注意国外舆论和外国报纸有关中国的评论，以及各国所推行的对华外交政策。

文字罗嗦，下面我们拿一些袁世凯训练新军的照片来说明袁办事的那股子认真劲儿。



整洁的军营（北洋第三镇）。上图中整齐的被褥我们看着怎么有点似曾相识？下图中的羊毛大衣被清一色地翻晒在外屋，以便于汗水的蒸发。从这两张图可以看到袁管理的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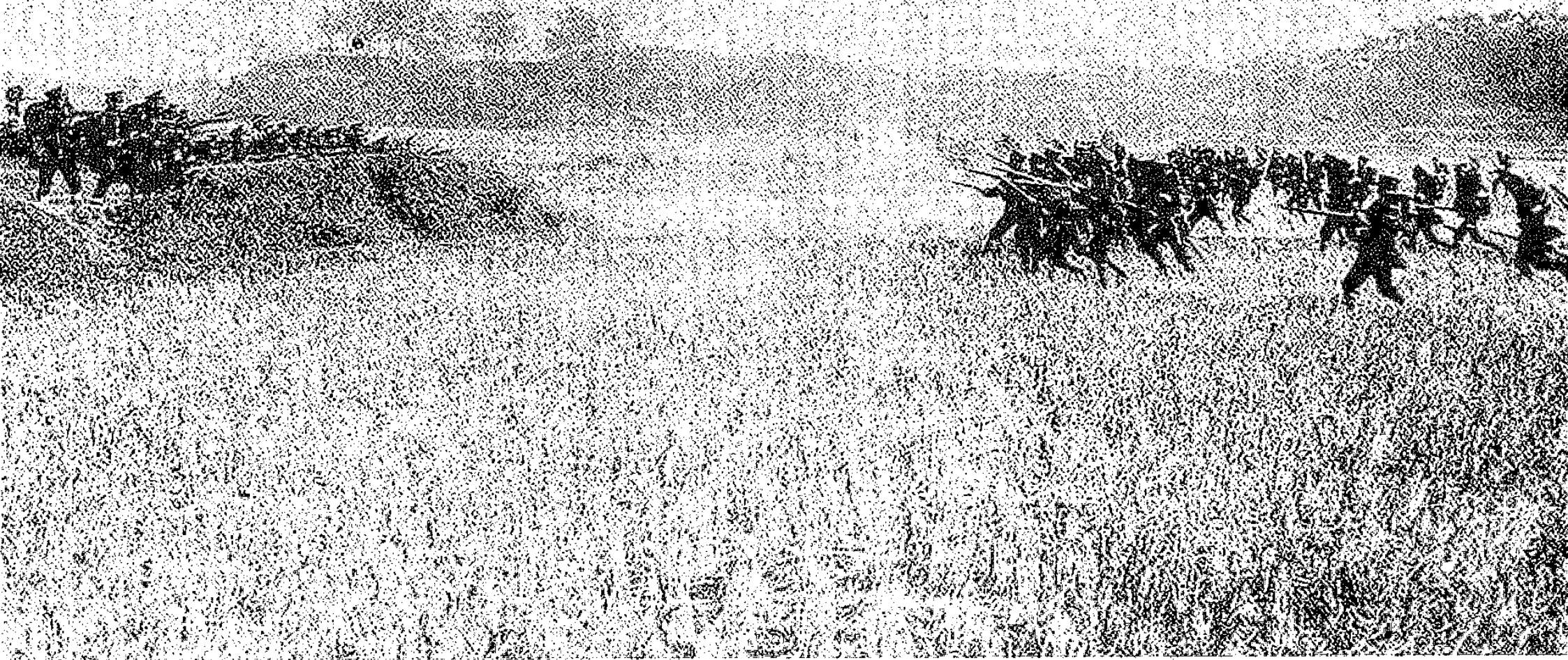




训练后必须开总结评比会（北洋第三镇）这一条被袁世凯坚持下来，没有走过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没有和八国联军正面交手过，为什么？傻瓜才喜欢和这种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交手呢！



新军军营里的步兵刺杀训练 袁世凯规定每次士兵训练，军官都要在现场观看、讲评。当年袁世凯经常下连队，参加此类的讲评。



北洋新军野战演习场景 新编成的北洋新军举行过两次野战演习：第一次于1905年10月在直隶河间举行；第二次于1906年在河南彰德举行。



新军的现代化编制 袁世凯的新军编制其实已与西方军队编制类似。此时新军已配置工兵营，其包括雷电网、测绘队等，而且新军装备也实现了现代化，枪械一律改用奥国装备，大大提高了单兵的作战能力。

“视黄金直如土块”

我一直纳闷，清代总督年薪才一百八十两，雍正朝后总督的养廉银是一年一万八千两。袁世凯兼着八个大臣，最多合法收入是二十万左右。可是袁世凯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

《大盗窃国记》说他“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

这里所说的“视黄金直如土块”不是指的他自己乱花钱，相反，他不太注意自身的生活品质，邋里邋遢，连块像样的手绢都没有，吃完饭用袖管当手绢抹嘴。

他的钱大多到了别人口袋里，上至太后、王公大臣，下至部属、下人。

送长辈，送亲友，送同事，人家宫保不看广告，不送脑白金，不送黄金酒，人家送的是真金白银。

随便找几条宫保干的“好人好事”：

一次见段祺瑞成无房户，袁世凯临回籍前将北京私宅赠与段；

一日为自己的幕僚阮忠枢娶小妾，他全额赞助，全程陪同；

有一回给即将走上军机首辅领导岗位的庆亲王奕劻送去银票10万两。

而他自己的正太太于氏却抱怨他不给家乡的母子定期寄钱。

您可别以为袁世凯纯粹因为性格豪爽，讲义气，重情义，其实他满脑子都是“舍不得三升米，交不到好邻居”的功利主义，算是刘备一类的旧式英雄。

送要送得自然，发自内心的一个情愿，而且要旁敲侧击，于无声处响惊雷。

1962年，北京旗人老大爷察存者给我们说了一个57年前的故事：

新入都的京官照例都有一次普遍拜客的习俗。可能就是袁世凯从直隶总督调京内用为外务部尚书的那一年，有一天，他来拜会我父亲（增崇，字寿臣）。我父亲唤我去见他。我听说是袁世凯，非常高兴。因为我曾西听一言东听一语，在报上也曾见过不少关于袁宫保的故事。今天遇到这样一个机会，我正好看看他是怎样的与众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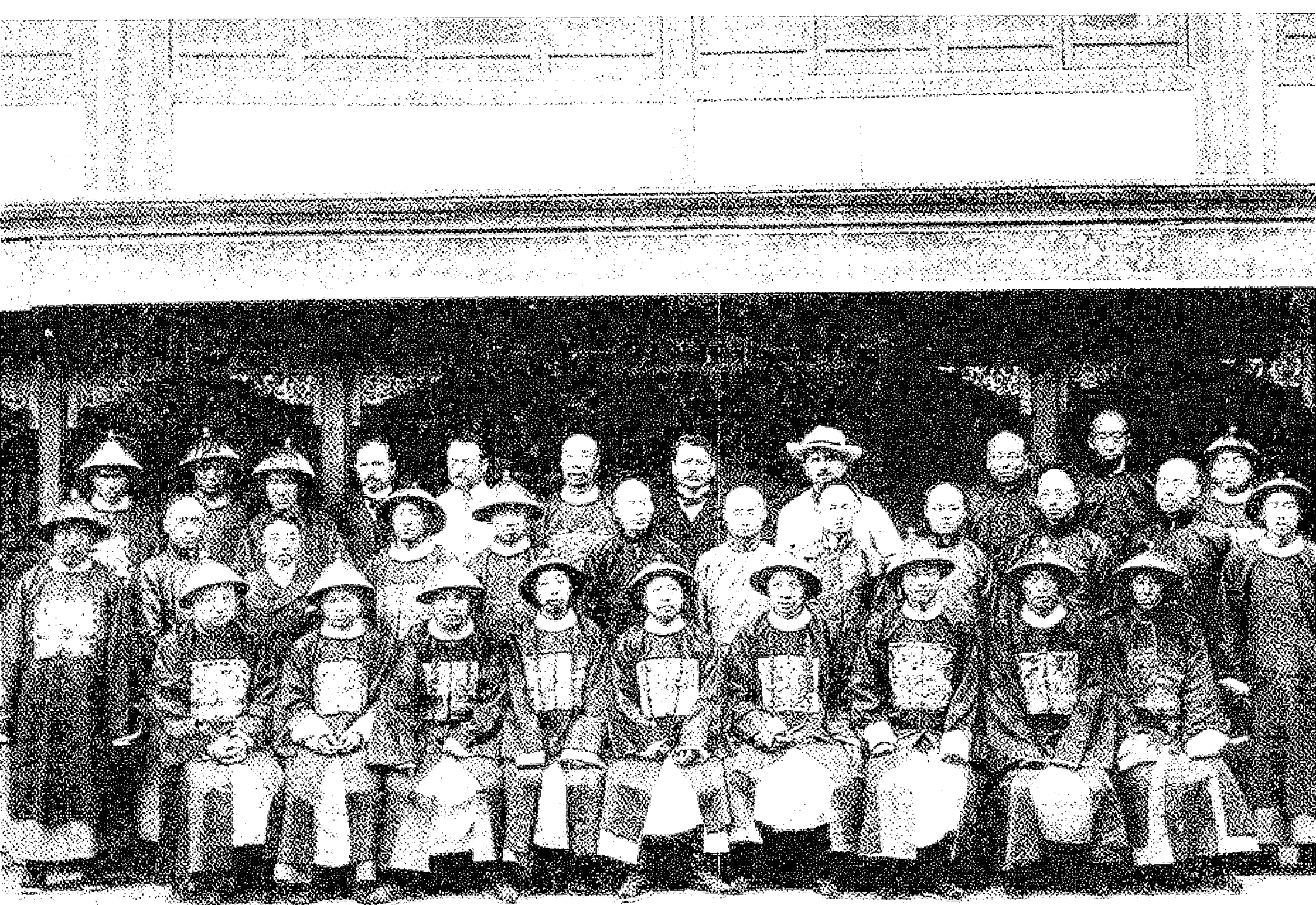
一进门，我走了几步，随即又向前抢行到袁世凯跟前，认认真真地给袁世凯请了一个安，叫了一声“大爷”。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似地离了他的客位，

也照样抢前对我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袁世凯双手紧紧拉着我的双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对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

这时袁世凯便问我：“经书都读过了吧？”我说：“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易经是要慢慢地读的，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

我想，袁世凯张口老弟，闭口老弟，给我还安。这可一点也不像我所见过的那些汉员如王文韶（大学士）、鹿传霖（尚书）那样的神气。我见王文韶时，我给他一揖到地，他连座位都不离，手里的水烟袋也未放下，只是半起半坐、歪歪扭扭地拱一拱手就算还礼。我对王文韶那种倚老卖老的傲慢神气很不高兴。

1903年袁世凯（前排正中）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和张百熙（前排左四）、朱启钤（前排右四）及管理人员、中外教师合影。二排右三为蔡元培，时为译学馆教师。



我对老师陈述了方才见袁世凯的情况。老师是旗人，听了之后，也连说：“瞧瞧人家，这才真正是干才。要是多有几个袁世凯，中国何愁不强！”老师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可是外边都说袁世凯居心叵测，也许和曹操一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也真说不定啊。”

第三天的中午，我刚下早学，就看见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可能即“五车”之意）。门房的人对我说：“袁大人差片给少爷送书。”我一看那张大红名帖上的“袁世凯”三个字上，又加了用墨笔写的“世愚弟”三个小字。打开书箱一看，其中有天文、地理、经济、政治、音乐、教育，以及兵法、军事、哲学、法律、国际公法、伦理等各种东、西洋学说的译本，还有多种教科书，真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而且都是京师大学堂所编辑，直隶或湖北官书局出版的。

察存者哪知道，袁世凯一口一个“老弟”，是因为他爹是内务府大臣，“慈禧办”主任。40出头的袁世凯对他热情，是因为老袁有年龄优势，想更上一层楼。不像王文昭一行将就木的老头，行将退休，老无所求，对他摆架子。

袁世凯知道这世上还没见着送礼让人恨，说好话让人生气的事儿。袁还知道，这不仅是豪爽，更是一种投资，中国官场属它性价比最高。

袁大总统在中南海那会儿，张作霖还是个杂牌的27师师长，由东北来京谒见袁。胡子出身的张师长，毕竟没见过宫里的好东西，和总统大人谈着谈着，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办公室的4块打簧金表。这金表每个边上都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

袁是多么善解人意的上级领导啊！看到这种情况后，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女儿回忆：

我父亲在送走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天下真有这类人，送人东西还哈哈大笑。细细一想，也只有袁世凯有好性情这么送，有实力这么送。

“烟酒不分家”，“朋友是手足，老婆是衣裳”，这套市井吃得开的道理，袁世凯是研究得很透彻的。果然张作霖投桃报李，在袁世凯称帝前信誓旦旦地效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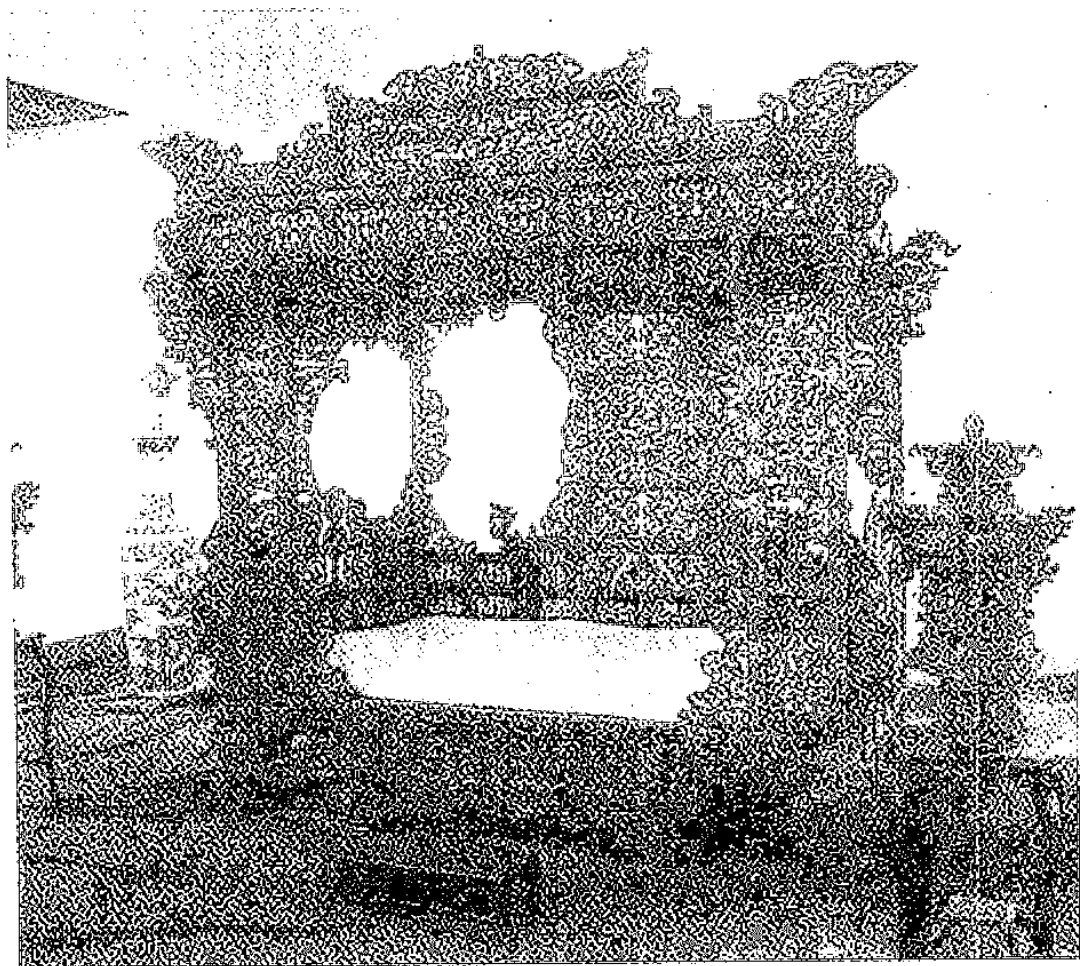
关外有异样，唯我张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关，关内若有人反对，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

张作霖甚至用四吨上等好玉为袁登基赶制了一架龙床。

能从一个浪荡小子摇身一变成一品大员，成总统，成帝王，袁世凯的成功有送的一半。

张作霖送给袁世凯登基称帝的礼物 该玉床净重 1.5 吨，是由碧绿色岫岩玉制成，由二十余件大块玉和数百件小块玉构成，共用玉料 4 吨多。据说由张作霖密友张景惠委托手下刘某人承办。由于工程量太大，还没等到玉床做成，袁世凯便死去了。

年轻时的张作霖 1912 年为第 27 师中将师长，袁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张被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 年 9 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后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号称“东北王”。1928 年 6 月 4 日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死去。



办事嘎嘣脆，什么人都敢用

《战争让女人走开》，好像是个电影的名字。

部队里男人扎堆，男人在一起要的就是一个嘎嘣干脆。直隶省五品按察使袁世凯管部队训练，就必须像个“纯爷们”。

有人说，废话，在部队里，哪个不阳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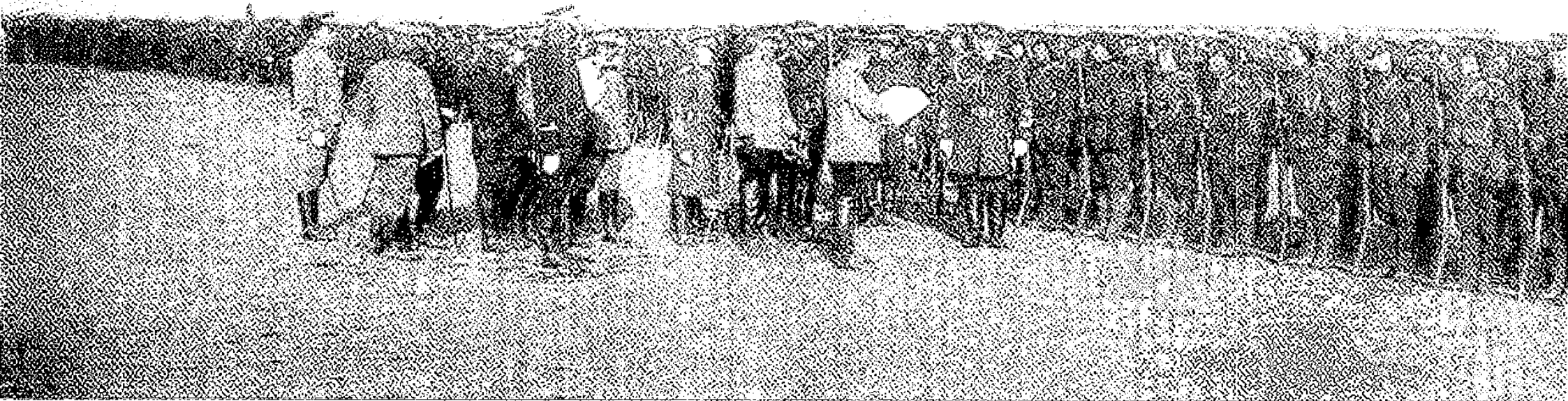
我说有，袁之前管部队的大多都是王伦式的“阴柔”书生。因为中国的皇帝最自私，武将不统兵，由进士出身的翰林去统，怕的是政变。

袁世凯不算真正的武将，但人家那会儿，吃住在部队，就差和战士们睡一条炕了。为了战士的卖命钱，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透明地发到士兵手中。

他经常深入各营，下到小小的棚头，他都能叫出名字，并了解他们的性格和优缺点。

为了刻意强调同甘苦，共命运。下雨了，别人给打伞，他猛的一推说：大伙儿都在淋雨，为什么我不能？问得好，这一问，问得全军将士泪流满面，这一问问出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洋集团”来。

绝版
袁世凯



发饷时袁世凯在现场盯着 袁世凯知道，历代当官的都敢克扣士兵卖命的钱，所以每次他都在现场盯着，让饷金在众目睽睽下阳光发放。

对其军人性格，《纽约时报》是这样评论的：

中国人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第二个康熙。他的智慧和性格上的刚强与他的任务成正比，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将得到力量和独立，这对一个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精神生活同时在价值观上西方化的国家来说是必须的。（1915年5月16日）

袁世凯办事果断，奖罚分明，就是罚也给人留足面子。他从不说过头话。其好友王锡彤说：

其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才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从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份外。一事之成，而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

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麟也说：

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廩，不假事权。属吏苟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

这话似乎有点过誉了，光其身边一大堆姓袁的亲信就无从解释。

但胡思敬所谓“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的评鉴，老袁还是当得起的。

敢于用人，顾维钧一留美海归，他大胆起用，后成了“民国外交第一人”。

不念私仇的优点让袁世凯重新得到了张謇、盛宣怀、梁启超的支持。

不限流品的最好注解是曹锟，原本一个贩布的成了统制，乃至总统。

耐得骂 死猪不怕开水烫

袁世凯精明，办事麻利，“视黄金直如土块”没错。但是此君如果装起糊涂来，死猪不怕开水烫，谁也拿他没辙。

这个受气包被慈禧骂过，被光绪帝训过，被摄政王用枪顶着喉咙说过“为民除害”，被李鸿章说成“小人”，让御史参得不能再参。他都忍了，人家那叫肚大如海。

可民国了，袁成了“兆民所托”的大总统了。这回大家该收口了吧。

才不！还是有人骂他。这里有真骂，假骂，有小骂大帮忙，有装疯卖傻的骂。

对这些人袁大总统一般采取三种对策。

有权的，掌握枪杆子的骂他，他不能含糊。发展成政敌的便交军政执法处“合法合理”地解决，多少反袁人士就在袁的“合法合理”之下被处决。

对报社出版物，只要没被“敌对势力”利用，一般不开杀戒。至于翰林文士，老袁素来格外礼遇，就算骂他，也特别大度。

“辜疯子”鸿铭先生，写文章将袁世凯狂骂了一顿，基本属于无理取闹。但是袁大总统也没把他怎么着。

《倒马桶》

作者：辜鸿铭

丁未年，张文襄（张之洞）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辜鸿铭(1857—1928),学者。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

文人骂袁，非此一例。但老袁概不细究，一来国中文士自古都好这一口，老袁心知肚明，反正权骂不掉，命骂不死，就由着他骂好了，还显得自己特有政治家的风度。至于其中过分者，礼让不行的，老袁也只是软禁其人而已。所谓软禁，其实也不过是好酒好肉的“招待”。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说到的那个章太炎“章疯子”：手摇折扇，扇下缀着大勋章，闯总统府骂袁。就是一例：

话说袁世凯批了巨款，给革命元勋章太炎弄了个考文苑，希望其闭嘴收腔，到书斋做学问，等章去办，款子根本没踪影，事也没人理，章火上来，便去大闹总统府。

据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

野史说门口警卫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没轮到他。一下怒起，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边上财务部长梁士诒来劝，也被他一顿臭骂。

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掀椅子，翻桌子，甚至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掷。结果可知，“章疯子”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袁把章软禁在钱粮胡同一大宅子里，好吃好喝待着，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让他出门。章也真有疯人本色，连骂三年，每日大书“袁贼、袁贼”二字。整日以此为乐。老袁知道了，只说了句：“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袁某，真乃死猪不怕开水烫。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从喜欢侃大山到谨言慎行

众多书谈起袁世凯小时候，大多说他书读得不好。

您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那时候袁老四喜欢侃大山。

您不能让其棋逢对手，如果碰上了，他可以海阔天空地神聊一天一宿不睡觉。这不，七子袁克齐就说过这样的故事：

我听老家人王凤祥说：“总统少年读书的时候，并不十分专心，整天在家与徐世昌（那时徐在我家附学）谈论国事，因此成绩不太好。你二姑母学问很不错，对他考查很严。有一次，你父亲背不下书来，你二姑母就不让吃饭，我偷着把两个热馒头给他送到书房，因为得路过你二姑母窗前，只好把它藏在袖筒里，以致烫起两个泡。”

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朝鲜回来，朝廷对其在朝期间的表现是不满意的。据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

中日和约既定，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遂嘿然而罢。

李鸿章为袁世凯做了档门板，但是心里也有点怪他在朝鲜过分积极，将局面弄成这样。所以有段时间李鸿章对其爱搭不理的。

这样，袁世凯便下岗待业了。

长大了，进了官场，袁世凯才摸到了做官说话的门道。

所以，后来他身边的人回忆袁开口说话的事儿，给人的印象是他话不多，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射向你，专心的很呢，自己却只听不说，城府很深。

其实，他在开口前必做三样功课。

其一：对慈禧太后、荣禄这些上级领导，他大多是少说为妙，不说为好。他教家

袁世凯在朝鲜的峥嵘岁月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国王李熙之父大院君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清廷应邀出兵平乱，袁世凯乃随吴长庆部东渡朝鲜。袁率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袁世凯后受韩王之请，协助朝鲜训练新军。

1884年，朝鲜亲日派朴泳孝等密谋发动政变，事先设鸿门宴，拟将清军高级将领一网打尽。清将吴兆有等洞悉其情不欲前往，袁则裹甲怀械先一小时赴席。稍进酒馔即告辞，牵朴泳孝手至门前，从容返营，使这一暗杀行动胎死腹中。

1884年甲申政变，驻朝日军欲趁机挟制王室，袁世凯勒兵勤王，自行带兵冲进王宫，击退日军，救出韩王。由于韩王在清营中，袁世凯遂代其主持内政、外交、军事，后韩王回宫，亦邀请袁入宫护卫，居住偏殿，和国王仅隔一墙，朝夕晤对。

1885年，李鸿章指派袁世凯为护送大院君回国专使，时朝鲜国内局势复杂，袁从容应对，顺利完成任务。回津复命时，李鸿章对袁的应变之才大为赏识，袁从此成为李对朝鲜问题的王牌。26岁的袁世凯遂以“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

甲午战争前，日本多次派人暗杀袁世凯未果。不久，日军进占汉城，公然派兵架大炮于袁使署前。1894年7月18日，袁世凯被迫下旗归国，离开了曾得意12年的朝鲜。



人的秘诀是，“慎言：言多必败，慎言，即所以免祸。”

其二：私下和妻妾们在一起，思想放松了警惕，粗话连篇，还不时地加上几句黄段子。六子袁克桓的同学关祥凯和刘梦赓回忆：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我们去袁府几回，大多是五姨娘接待。一次碰巧，袁世凯到五姨太房里，看见我们几个青年人，很高兴，问我们学什么。克桓一一回禀介绍。袁世凯脑门亮光光，双眼皮忽闪闪地望着我们，长过嘴角的胡须未言先翘：“学洋玩艺儿应上新学，要不怎么‘日他们先人’！”说完哈哈大笑。

其三：开会时，总是一个个点名让大家都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在众人说完前，自己绝不表态。

顾维钧回忆 1914 年就日本侵占青岛袁大总统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

总统府召集会议，所有内阁部长均出席，参事也被邀与会。

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略）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略）

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

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总统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

总统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略）

总统环顾左右，等待别位总长发表意见。然而大家沉默不语。总统深深叹了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



顾维钧 字少川，1888 年生，上海嘉定人。1904 年，16 岁的顾维钧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 40 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时，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3 年，在唐绍仪亲自撮合下，顾维钧与其女唐宝玥喜结连理。1914 年顾维钧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后在 27 岁担任驻美公使，34 岁出任外交部长，成为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此为顾维钧任驻美公使时期的留影。

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

总统拿着一个准备好的小纸条作为发言的依据。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年至1905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开会喜欢慷慨陈词

开会前袁世凯会做足功夫，特别是他擅长的外交事务。顾维钧回忆道：“每次记录都是一式三份——一份呈总统，一份呈外长，一份归我本人。总统对交给他的一份记录阅读非常仔细，不时用他的红蓝铅笔将需要特别注意之处一一划出，并作批注，指出下次会议应说些什么，有时还和我一起阅读。”

由于功夫做足，到了会场，轮到老袁说时，他便慷慨激昂，俨然一个演说家。1915年7月21日美联社报道过袁世凯的一次中央机关内部讲话：

“满洲南部的宗主权逐渐落入到外国人的手中，”大总统说，“外国侵略者已经来到了门口，但是我们的人民仍然每天处于困境之中。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并且清朝给予了我神圣的信任，所以当我承担了共和国大总统的职责时，我怎么能够让这个国家被毁坏呢？”

“当我们想到我们士兵低下的纪律，行政事务的低效，席卷各个省份的洪水和饥荒，一些官员的自私以及在人民中缺乏公众精神，我们应当责无旁贷地去帮助他们意识到在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已经躺在了稻草堆上，草堆下火焰已经燃起。……”

和孙中山比袁世凯的演讲差一个档次

袁世凯说得再慷慨激昂，他还是属于那种做得多说得少的人。哈佛大学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说：

他天生是一位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他没有构想出改良方案，也没有为这方案制定一系列原则，而只是实践了这一切，并证明它们的可行性。

孙中山是一个职业鼓动家，以说和写起家，一生花费大部分时间于筹集款项，组织暴动起义。所以孙先生演讲的功夫给后生很多教益。

民国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有段孙中山自述练习演说之法：

一、练姿势。身登演说台，其所具风度姿态，即须使全场有肃穆起敬之心；开口讲演，举动格式，又须使听者有安静祥和之气。最忌轻佻作态，处处出于自然，有时词旨严重，唤起听众注意，却不可故作惊人模样。予（先生自称）少时研究演说，对镜练习，至无缺点为止。

二、练语气。演说如作文然，以气为主，气贯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皆宜。说至最重要处，掷地作金石声；至平行时，恐听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说言奇论，一归于正，始终贯串，不得支离，动荡排闥，急徐随事。予少时在美，聆名人演说，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



孙中山在日本演讲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关于“大亚洲主义”问题的演讲。

看看国父孙中山怎么鼓动驱逐“鞑虏”的。孙有一次在广州演讲，说到反清复明，台下老广大多数不解。孙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某某通宝”的铜板视人，问：“你们认识这几个字吗？”曰：“能识。”孙中山又举反面两个满文字示之，大伙儿忙摇头说：“不认识。”孙中山结合这枚铜板例举满人入主中国奴役汉人，辅以上文那些演讲技巧，让大家明白了反清复明之大义。

孙中山的口才，袁世凯是佩服的。两人1912年8月24日第一次见面后，都对对方有好感。台湾出版的《国父年谱》记载说：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

13次密谈后，袁世凯向纽约时报记者说出了两人的一个约定。孙中山将花一大段时间专门去全国各地演讲，启迪人民。

这个约定一看就知道是孙中山主动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人“民主素质”不高，现代意识薄弱，提出中国政治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他干的这是训政。

让孙不掌握实权，去全国布道，正合老袁的意。

后来孙提出要造20万公里大铁路，袁世凯马上投其所好，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

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做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对此唐德刚评论说：

袁氏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显然是，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地干起来。

在袁氏的怂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

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其实他们两位无论从哪看，除了都是中国人外，天南海北。外国人在评价这两人时大多采实用主义立场。《纽约时报》说：

袁是位杰出的“务实型”改革家，在这方面他明显区别于那些煽动家和半吊子的“革命党”，他对清国政体施加影响意味着这个政体能够在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下发展、进步。袁不会进行草率的试验和欠稳妥的冒进，而只会推进理性和必需的改革，大清国能够消化并吸收这些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改革推进的速度就会有多快。

中国人更多加入道德判断。听听唐德刚教授在《袁氏当国》中的分析：

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

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但对袁世凯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

唐德刚“国父”影响根深蒂固。上海师大的萧功秦对孙的评价是这样的：

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在性格上确实就是个楞头青。他头脑单纯，缺乏对人与事的洞察力，却具有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执着而百折不回。电视（《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躺在地上，血流满地，愤而剪掉辫子，极合孙中山的个性气质。虽然并非历史真实，但却不乏逻辑真实。事实上，许多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家气质。民国初年，他曾计划，让各省通过向外国借债，以为如此就可在十年内在中国建立350万里，即绕地球40圈的铁路！这一总长度则是根据中国人口比美国多5倍而推算出来的。他的一位美国



1912年孙中山在张家口车站月台上与欢迎者合影。孙中山带着一众党人同志到处“视察”。其团队的特点是每人一个牛皮仪器包。袁世凯投其所好，还派了自己身边的大红人朱启铃（孙右后）亲自作陪，给足了面子。

朋友说他在中国政治上如此不切实际，以至于“幼稚得不值得重复”，“不适合于担任任何需要常识的工作”。连他的私人秘书李禄超也说他是“孙大炮”。而孙中山身上所有这些对其政治行动产生影响后果的个性特点，很可能迄今为止，百分之九十九的当代中国人毫无所知。因为从童蒙时期开始，我们的教学书中的孙中山，就是类似于样板戏里的李玉和。革命先驱者怎么能是“孙大炮”！

是啊，我也认为孙中山关于修铁路的宏伟规划有点不着边际。瞧瞧咱们建国60年来，到2008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还没有超过八万公里呢。要知道这已经是举全国之力，每年几千亿地花下去，近百万人常年努力的结果。（这还要去掉1949年之前造的2.18万公里铁路。）

大家知道，百多年前美国铁路大王斯坦福一家公司就造出了这个数，还顺带建造出一座斯坦福大学。

北洋袁世凯



袁世凯视“北洋”两字为其军功章，这是他事业的巅峰期。如果说“小站练兵”让袁世凯羽翼丰满，“山东巡抚”便是袁的一鸣惊人，“直隶总督”则向世人证明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

袁世凯大事记（1894~1908）

1894年	35岁	4月，朝鲜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农民大起义，朝鲜请求中国出兵。6月4日，清廷命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并派叶志超、聂士成选淮军1500人驰往朝鲜。同时日军进入汉城，控制了朝鲜王宫并用巨炮监视中国使署时，袁偷乘货轮潜回中国，结束了在朝12年的政治生涯。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以失败告终。
1895年	36岁	在京结交权贵，抢先上书，大讲改革中国军制的必要，并提出练新军的策划。后去小站练兵。
1897年	38岁	7月，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9月，参加了维新团体强学会，以表示他对维新变法的拥护。
1898年	39岁	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赏袁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18日晚，谭嗣同密访袁求率兵“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返回天津向直隶总督告密。21日早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并下令逮捕维新派人物。
1899年	40岁	升为工部右侍郎，仍专管练兵。12月6日，晋升为署隶山东巡抚，率武卫右军往山东任职。
1900年	41岁	袁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还颁布了《严拿拳匪八条》，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军队达19600余人，成为北方最大的一股武装力量。
1901年	42岁	6月，生母刘氏病死济南。10月，慈禧由西安返回北京，袁一直护送到京。清廷加封他太子少保銜，并赏黄马褂，特许紫禁城骑马。此后，人们又叫他袁官保。
1902年	43岁	10月，任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接替了李鸿章的职务。

袁世凯大事记 (1894~1908)

1903 年	44 岁	先后兴办了陆军小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小站电讯学堂、大沽宪兵学堂、保定军官学堂等。
1905 年	46 岁	六镇北洋军训练完成，共 7 万余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1907 年	48 岁	9 月 4 日，袁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
1908 年	49 岁	袁 50 大寿（虚岁）。西太后为其赏赐较多，京内外百官均送贺礼。12 月 2 日，溥仪继承帝位，定次年为“宣统元年”。清廷发旨让袁“回籍养疴”。

小站练兵前的“买办袁世凯”

我们现在都知道袁世凯由天津小站练兵起家，一步步走向“琼楼最高层”（袁克定语）。可是，堂堂大清国，等着补缺的不知其数，为何让这么个在朝鲜犯有冒失错误的愣头小子担当起了中华民族军事振兴的重任？

1909年日人佐藤铁治郎在他写的《袁世凯》一书揭露了个中的秘密。原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随营解散，徘徊于京津之间，无所事事”。这时李鸿章正在马关和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谈判。一次伊藤博文问李：“袁世凯现任何事？”

李鸿章回道：“小差事，无足重轻。”

伊藤曰：“以袁世凯之才，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材也。”

李的文书将此话原原本本地记到了会议记录里。

写在这儿，佐藤铁治郎突然感喟道：“岂知一语闲谈，遂影响于袁世凯者不浅。”

原来那些文秘回国后，其记录稿被京津沪各报转载了。于是“清之朝野上下，睹我伊藤氏答李鸿章之言，皆以袁世凯为一时人杰，于是袁世凯三字，遂振振有声。留心人材者，咸欲一睹其人。”

可见，什么事儿只有出口转了内销，才为众人叫好。此风不独现在流行，袁世凯那时就有！于是，下岗待业反日青年袁世凯，多亏了日相一句闲聊话，在京城声名鹊起。此时，“清方大挫之后，二三老臣为国求贤，于两宫前保荐袁之才略。”慈禧太后立刻命召见袁世凯。

朝堂之上，发宏论说天下事，话到高潮处，哪里快，哪里慢，袁世凯炉火纯青。应答堂对，这是袁世凯的强项。所以当袁世凯奉旨应召时，他慷慨陈词，说得头头是道，“袁奏对多中悬要。”可是小袁的命不好，更年期时的西太后这天不知道怎么了，不是打盹就是心不在焉，总之老太太就是没将咱们小袁的“革命道理”听进半句。

与此相反，光绪帝听了称许不已。众大臣和旁听者也不停地叫好，都认为袁世凯“可得志”。不料召见后，跌破眼镜，西太后最后只给了他个濒临关门的“军务处”小差事。袁大为失望，就此心灰意冷。

袁世凯哪里知道，别说老太太心不在焉，就是人家太后再满意您，也得咨询一下专门管选拔干部的吏部。吏部一打听，袁世凯在朝也不过是个副处级，还老犯些

组织纪律方面的错误,所以“按律”给了个同级的副处差事,您有什么好撕心裂肺的?何况眼下您还在待业中,家有一妻四妾要你养。这说明袁世凯还是历练不够!

袁世凯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怎么说都是一个媒体红人,“感动中国”的人物。于是他到处找人,“日奔走于王公之门”。

找人就得拎东西上门,这就说到了个钱字。“数月来奔走酬应”,袁世凯那点钱早就日见羞涩了,后来干脆“负债累累”。

小袁躺在旅馆里琢磨,这样下去怎一个愁字了得?

脑瓜子比别人转得快的袁世凯,突然想到:时下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做国际贸易,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不了解,“多雇用清人为经理”。受雇的清人“常居间收利,有暴富至数百万者”。袁世凯想,这个副处不要也罢,干脆进外企做“买办”当白领得了。

特别是想到眼下大清国军队新败,“盖知清此次之败,海军战舰,陆军军装器械,全数告尽,势必再置,置则必须仰给外人。”……“清国不能生产。”袁世凯是圈内人,这点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突然他灵机一动,“何不……?”袁世凯越想越来劲,干脆跑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天津,去看个究竟,做一下市场调研。

不到天津不知道,一打听,“适有西人欲开军装洋行于天津,拟聘熟习官场人为买办。故争先恐后,设行以图招揽。”袁世凯激动万分,连考虑都没考虑,就冲上前去说:我要应聘“买办”。洋人打量下这个河南矮小子,说:可以,您先交3万元“保证金”。3万!哪壶不开提哪壶,袁世凯一听两眼发黑,踉踉跄跄走出了办公室。

热血青年袁世凯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古道热肠,喜欢交朋友。“桃园三结义”,对他来说是平常事。结好后,袁世凯嘻嘻哈哈地也就忘了。

非常时刻,袁世凯想到了他先前在“营务处时,与奉天举人王英楷结莫逆交”。王是一个巨富,“其人为野蛮(清国人)中之最开化者,与袁畅谈时,两情相洽,引为同调。”袁世凯途穷路迫,也就写信去求人家,“王得袁书,遂挟重金北上,晤袁于天津。”

到了天津,王进门就责备袁:兄怎么这么没出息?!

袁说:怎么啦,人家欧人国务大臣退位后,不是也下海搞工商业?“君何责我不志也?”

王曰:人家都干的是本国生计,“有独立性质。”买办是什么?就是给老外打工的。

为人家干些走后门，跑关系，批条子之类的勾当，属于蝇头小利，这些都不是兄的强项。何况“君又不通西语”。

袁世凯一腔热血下海经商，被这位王老弟一说，冷了一半。王英楷乘胜追击道：“君盛名倾中外，方王师败绩，正朝廷梦醒之时”，大丈夫不想着干大事业，“乃欲谋此奴隶事！”

袁听了委屈地说：“媒体的那点小名声，顶个球！就是有，奈何朝廷没人理会。”

王叫道：啊呀，我的老兄啊，当今社会，您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能空口白说革命道理啊！兄如果要用钱，尽管吩咐！

袁世凯在金钱和权力面前终于大彻大悟，连连说：“惟命是从。”

这个王英楷是个举人，一个字：能！

两个能人赛过诸葛亮，没几天，他们“侦知袁从人中有河间赵姓者，与阁宦李莲英系属戚谊”。王用金钱搞定赵，授赵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行事。

赵找了李莲英，刚说明来意，没想到人家李莲英一听就说：这事好办，因为早先各大臣早在太后面前保荐过袁世凯，只要等机会“舟行顺水”就行了。叫赵回主子的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静候时机可也。”

“自此以后，宫廷动静，大臣奏对，皆随时密报袁知。数月后，适清两宫命筹饷练新军。”袁得报，大喜说“兵事是我的强项，李公公为我图之”。

慈禧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右）、崔玉贵（左）



“李乘机说西太后。西太后于召见大臣时，遂问袁世凯知兵否？”军机大臣都说：眼下大清国就数他知道练兵。这回西太后算醒着听的，也全听明白了。于是“拟命其与聂士成各练三十营劲旅”。

这么着，袁世凯转了组织关系，去天津小站上班了。

就此，这位年轻人正式走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笔者走笔至此，突然感到我中华真乃“多难之邦”。

呜呼！如果王某人当时借钱给了袁，让其在海河边做个倒卖军服的“黄牛”或“买办”，不啻为中华去一“窃国大盗”，还能为天津增加些税收。

偏偏老天没长眼，让他阴差阳错地“北洋”了一回，以至于后来放出许多“祸国殃民”的大小“北洋军阀”来，平白让后人的教科书增添无数“灾难深重”的慨叹。

甲午战后是谁密保了袁世凯？

过去，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甲午战争之后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保举袁世凯到小站练兵，也有说是督办军务大臣李鸿藻，或者督办军务大臣荣禄保举的。著名历史学家孔祥吉近年根据清史档案找到的奏片，证实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向光绪帝密保的袁世凯。

却说袁世凯于1894年6月，离开汉城回国。当他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报到之后，并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受到重用，北洋许多官僚对袁世凯怀有戒心。比如李鸿章之亲信张佩纶，曾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信中，指责袁世凯乃“小人之有才者”。因此，李鸿章曾经阻止袁世凯赴京活动，而令再回到朝鲜去。袁世凯对李鸿章的态度很有意见。曾托其堂弟袁世勋往翁同龢府上疏通。日军占领朝鲜后，李鸿章派给袁世凯一个新差事，到山海关“总理前敌营运处兼筹转运筹备处事宜”。

1894年12月28日，两江总督、湘军统帅刘坤一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出关督师。袁世凯此时正在关外前敌营务处，故得与刘坤一相交往。在短短几个月交往中，刘坤一发现袁世凯“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调理”，认为他是“方面中出色之员”，遂向光绪皇帝保荐。光绪皇帝于1895年6月12日，正式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在召见时陈述了许多真知灼见，光绪皇帝亦深受启迪，故命袁氏将其未尽之言写成条陈上奏。这就是1895年7月1日光绪皇帝看到的袁世凯新政万言书。光绪皇帝之所以派袁世凯去小站练兵，亦与此条陈有很大关系。



两江总督、湘军统帅刘坤一

军人袁世凯

袁世凯是个如假包换的军人，在袁之前，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职业军人。几千年来都是秀才带兵打仗，明清的总督不单是地方政府行政首脑，还兼任军区司令，公检法一肩挑。

和日本打甲午战争，人家天皇在广岛大本营里与参谋部策划于密室，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据说连被中国人打败后，逃到西伯利亚的退路都设计好了。中国人却只顾满足于口水抗日，让那些“爱国诗人”写些慷慨激昂的对仗诗句，讽刺挖苦日本人。认真的军事准备却一样没有，结果可想而知。

袁世凯没进过军校，但是业余爱好兵事。据说做政府部门文员时，人家吟诗作画，吟风弄月，他却一个人在那里捋飭兵家那些个事儿。同事们笑他，他却死不悔改。

练兵，练新式军队，这在袁世凯去小站前已经有儿人干过了。

袁世凯不是第一个，却是最成功的一个。

袁世凯是在1895年接下不大熟谙军事的文官胡燏棻的练兵摊子，来到小站的。

小站在天津咸水沽南约10公里。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奉旨在此督练“新建陆军”。

刚干了一年，1896年4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用人“论情面大小食鬼遗多寡”等多条罪状。

袁得到被参劾的消息，感到十分懊恼：“两句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

不久兵部尚书荣禄邀其幕僚陈夔龙随行，奉命前往查办。亲历此事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称：

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指荣禄）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



胡燏棻

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荣禄回京后指令陈起草覆奏稿。陈建议拟“请下部议”。荣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

就这样，为袁军军容所动的荣禄以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将袁世凯的各控罪一笔抹掉，而且吹捧袁说：“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荣禄

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清廷的慰勉。这对袁世凯来说是多大的恩情啊！后来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这是他们不了解荣袁之间的这段生死之交。何况，袁一直标榜自己是新派人物中的稳健派，有意和康有为保持一段距离呢！

荣禄没看错人，袁的确是练兵的里手。袁练兵有理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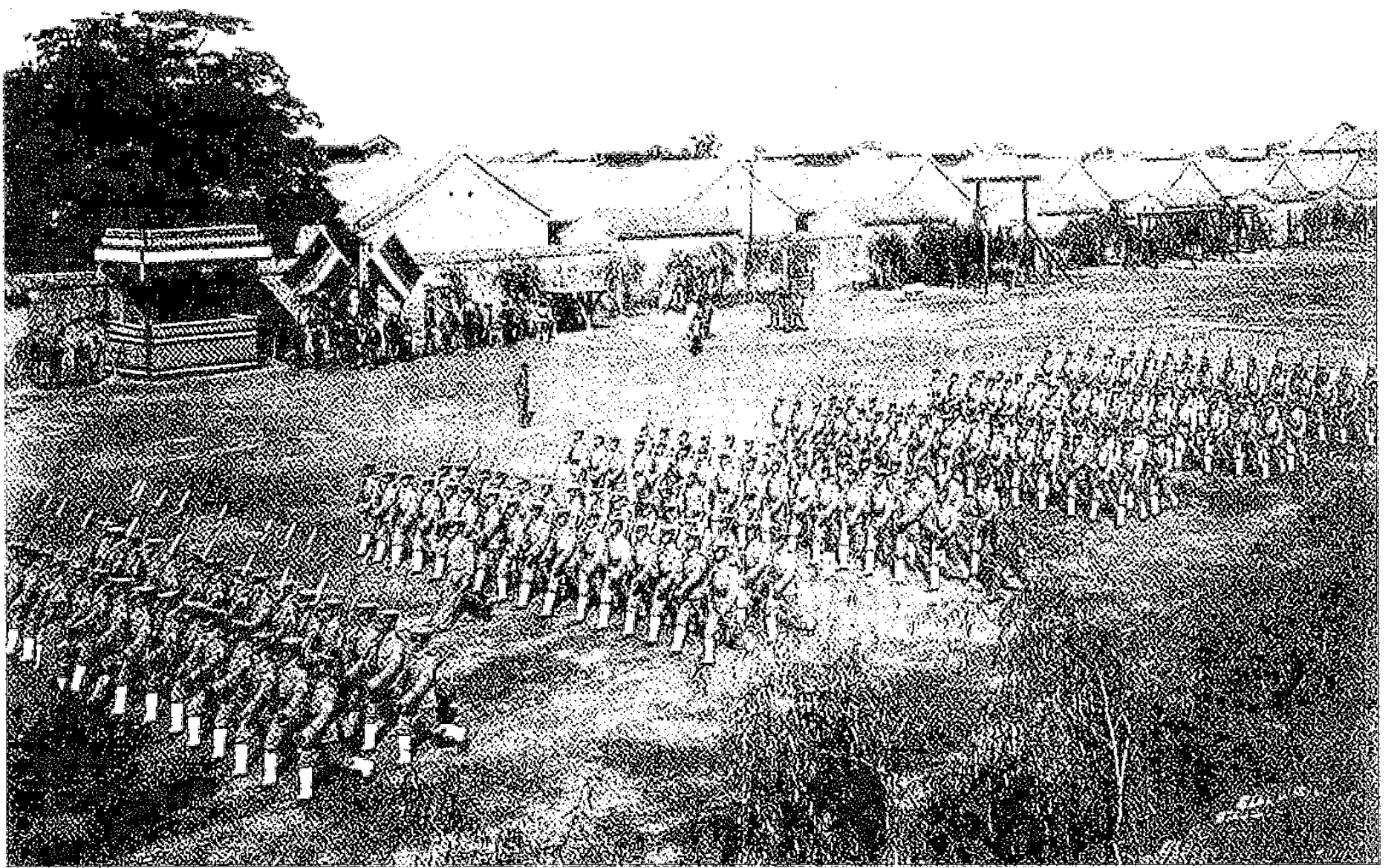
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袁世凯说得轻巧，练兵没这么容易，君不见蒋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要什么没什么，他这个校长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

以上所有各点，都是在就事论事，其实军人袁世凯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谓军人理政。从袁世凯始，职业军人成为主宰中国政治舞台台前幕后的主角。其最响亮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等于间接否定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官体系。费正清对此有专门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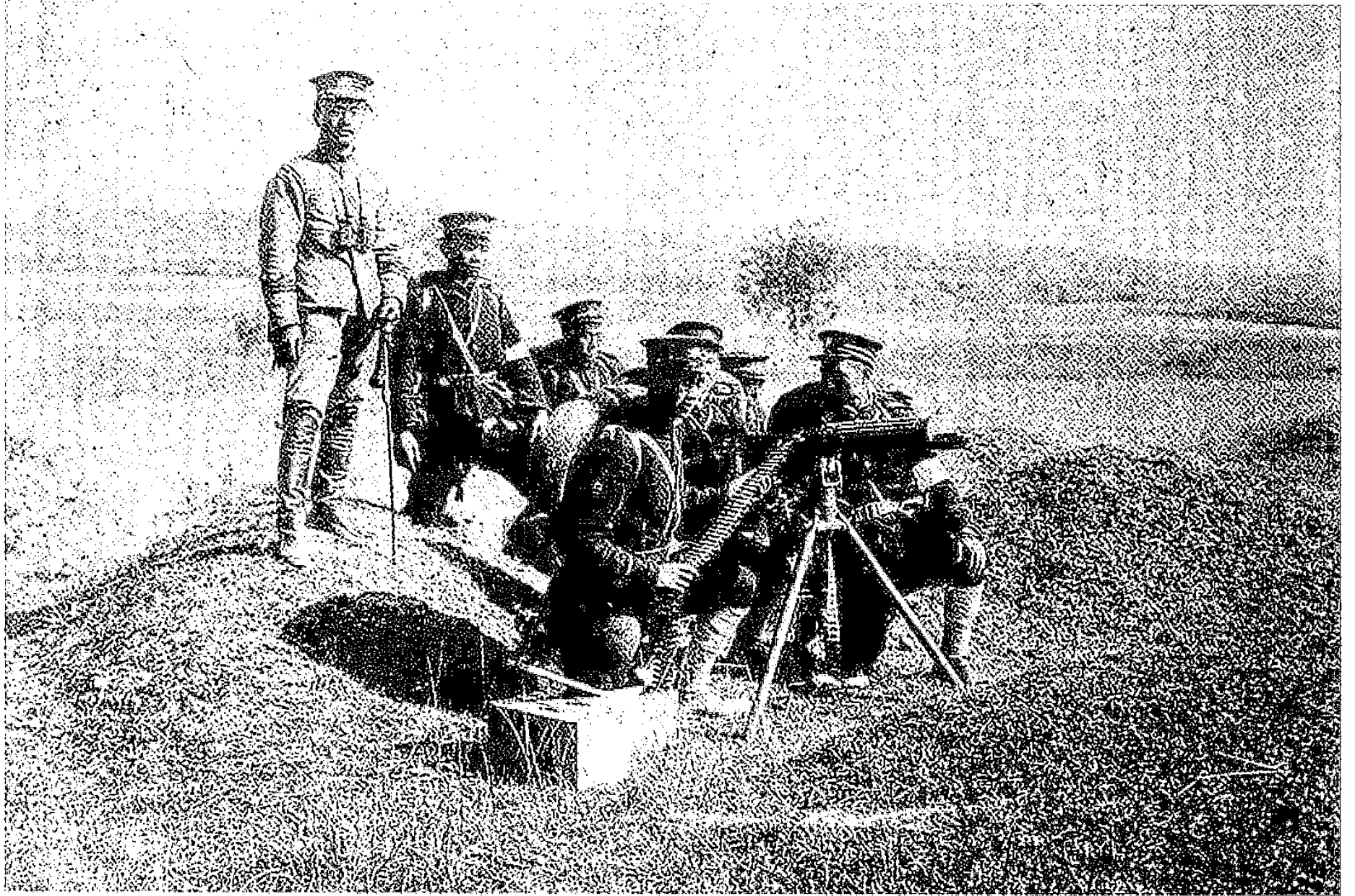
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于原有的儒生—农民—手艺人—商人范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



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 袁世凯小站练兵，师从日、德，造就了一只 20 世纪初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军队，无论武器装备，还是人员素质（在北洋前期和中期，文盲一律不招收）都是史无前例的。

袁世凯与载涛在彰德秋操演习现场 彰德秋操是袁世凯练兵大臣任上举办的三次秋操演习之一，《续安阳县志》记载本次演习“列阵数十里，错综变化，出奇制胜，极战争之能事。外宾作壁上观者，咸称赞不置”。





“马克沁”重机枪 单就装备而言，北洋新军与当时欧美列强军队可以说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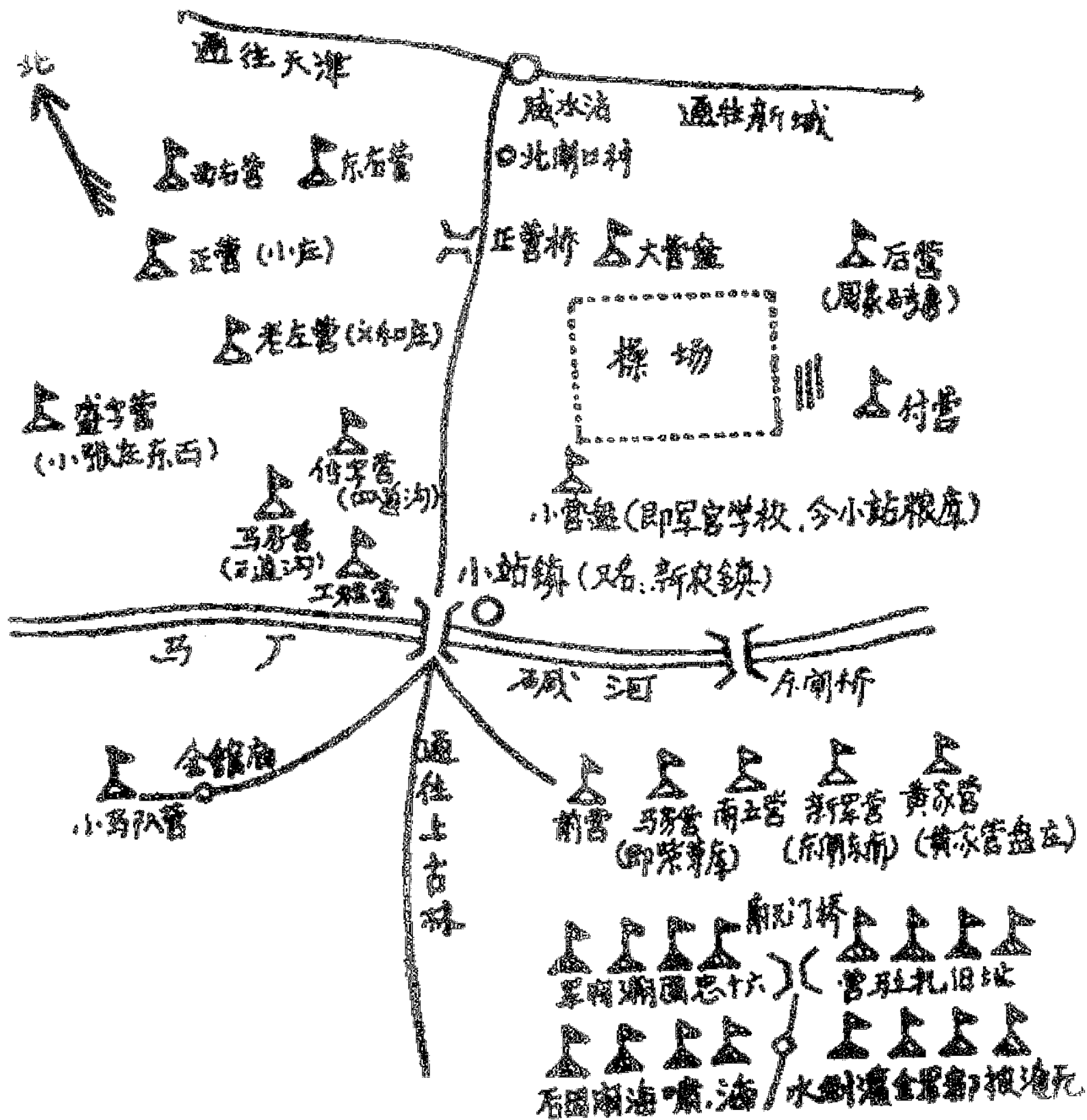
野炮队 演习正式开始后，霎时间，百年不见烽火的中原大地炮声隆隆，枪声不断，人喊马嘶，尘土飞扬。古老的中原大地见惯了冷兵器时代的金戈铁马，还是第一次见到现代武器的厮杀。



绝版
袁世凯



北洋新军军服（刘永华绘） 1898年，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袁世凯上奏朝廷，建议效法外国，统一操法典章，官兵军服也与传统号衣有了不同，仿效外国，军服的袖章上出现了区分官兵阶级的红道。1901年，清政府决定推行常备军制，袁世凯负责编练“北洋常备军”，陆军新式军服开始形成。但高级军官的礼服，为便于朝覲，仍着官帽。下级官兵军服已与现代军服无异。1904年，清政府令全国普练新式陆军，以北洋军营制饷章包括军服统一全国新军。但实际情况并未能一致。



小站练兵营盘示意图

袁世凯上任后，将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扩充到7000人，分步、骑、炮、工、辎重五个兵种，聘用德国人为教官。新建陆军以镇为编制单位，虽然名称与淮军相似，但实际上与西方军队的师、旅、团、营、连、排相吻合。每镇两协（相当于旅），每协两标（相当于团），每标三营，每营四队（相当于连），每队三排，每排三棚（相当于班。镇设统制官，协设统领官，标设统带官，队设队官。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 这时的袁只是个直隶省里的按察使，人们都说他在戊戌变法是没出兵帮光绪。听听袁的话吧：“他们看我在小站练兵，手中有兵权，其实那时的兵权是虚的，小站7000兵只有枪没有子弹，练打靶时由天津弹炮局派专人送到小站，监督打靶，发多少子弹，回收多少弹壳。我驻在小站，聂士成的毅军在滦州，董福祥的甘军在武清，遥遥数百里间，处处牵制，焉能达到，即到亦焉能成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世今缘

据报道，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建议与会者共同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他来亲自领唱。可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领唱的歌曲，却最早来自于袁世凯。

据刘华清将军回忆：这曲子最早是他们从鄂豫皖苏区的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改编而来，但该民歌的曲调来自于冯玉祥的《练兵歌》；冯玉祥五音不全，不通曲律，这《练兵歌》的曲调是照搬张作霖的《大帅练兵歌》；张作霖胡子出身，和音乐八竿子打不着，他也是转抄了张之洞的《大帅练兵歌》；张之洞更不是曲作者，这曲调原来是南北秋操时，从北洋袁世凯的《大帅练兵歌》学来的。

这样毛泽东和袁世凯对上了。其实，政治思想工作不是毛泽东首创的。老袁也做。

袁世凯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委托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做的。这徐世昌就是后来部队政委和美军随军牧师的鼻祖，文宣工作是他的分内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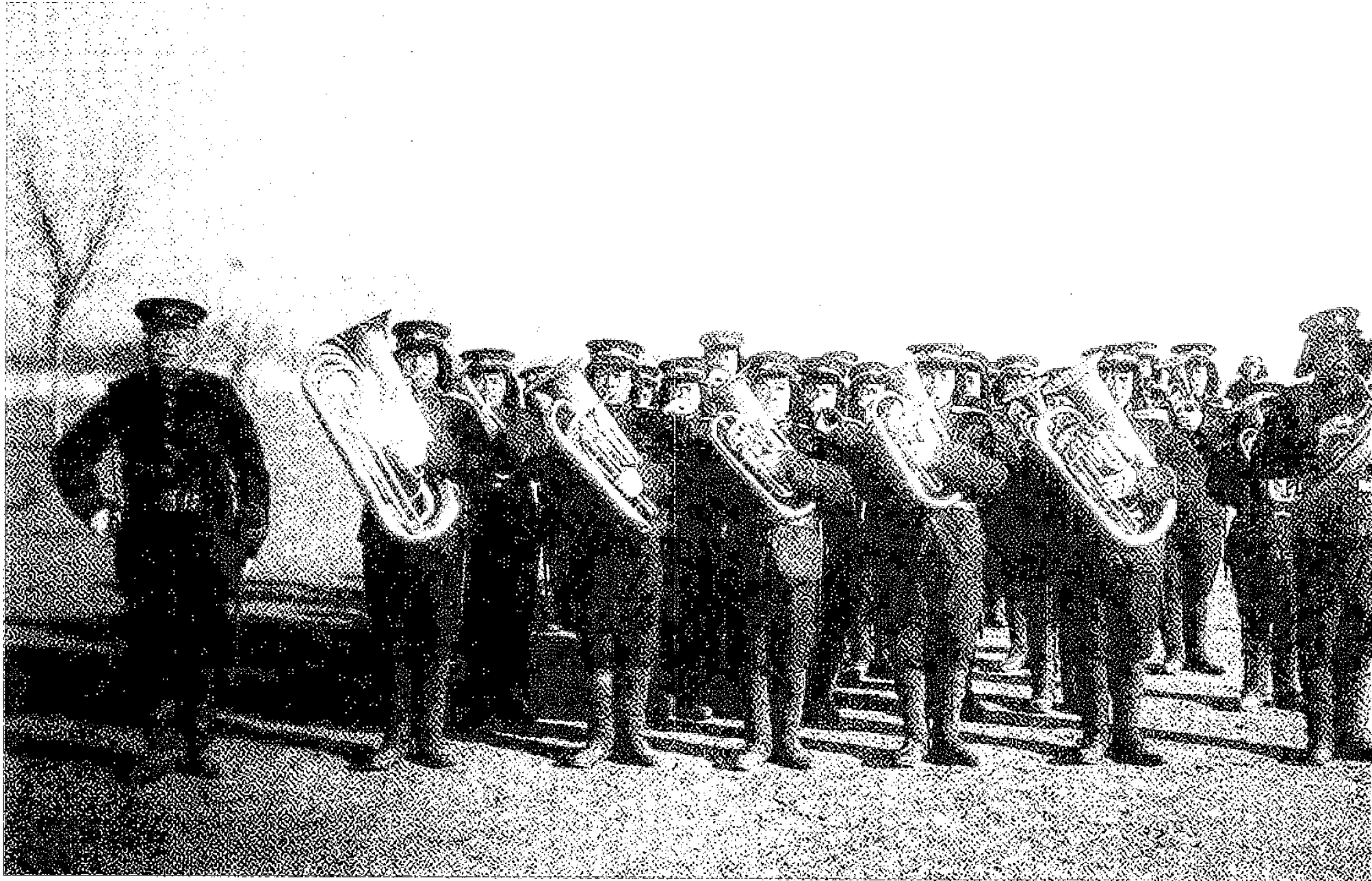
徐翰林果然了得，于诗文书法绘画外，还写得一手好打油诗。经过袁司令的修改和首肯，中国军队最早的政治思想工作歌曲诞生了。

《大帅练兵歌》

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
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
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
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
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
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
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
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

……

徐政委写好歌词，缺少曲子。没办法，中国文人历来是只填词不作曲的。人家



北洋军中的军乐队 这是北洋第三镇的军乐队。中国军队用洋乐队，始于袁世凯。



唱着普鲁士风格的曲调，北洋第三镇二协的士兵迈着我们熟悉的步伐前进。

不屑作曲也不会作曲，更没听说有作曲这一行。

徐天天听兵营里的德国教官依依呀呀地哼着小调，便多了只耳朵。听着听着，感觉有点儿意思，特别是那种进行曲最让老徐提气。

于是老徐做了中国文人中第一个弃《念奴娇》曲牌于不顾的开山祖，选了首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的曲调来为他的《大帅练兵歌》填词。

这下徐世昌牛大了！

他没想到，这首与军区司令袁世凯合作完成的歌曲，不但成了革命和“反革命”军歌的蓝本，还成了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最让人记住的两首歌曲曲调之一。（另外一首是《国际歌》）

而且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袁世凯、徐世昌带入中国的这首普鲁士风格的曲调，被东道主美国的吹鼓手们演奏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场的行进曲！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中华台北队入场时，伴奏的乐曲却还是这首歌的曲调。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河南卫辉人，幼年私塾，成年后在河南当文书和家馆教师。1879年结识袁世凯，由袁世凯资助其北上应试，遂中举人。四年之后，世昌又中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编修。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认为徐“虚矫过人”。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的得力智囊。

袁世凯手下的龙虎豹

袁大将军手下干将千员，精兵十万，然最得力的谓“龙虎豹”三人。龙者王士珍，虎者段祺瑞，豹者（也作狗）冯国璋。

这点，徐世昌看得最清楚。我们从《洪宪遗闻》的转述中听到他这么一段话：“就军人方面言，项城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时称北洋三杰也。”

袁世凯最得心应手的属下当是段祺瑞。这个人意志坚强，文武皆通。但这些品质北洋军人大都具有。

其最为可贵的素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上过硬，有大局意识，有国际视野。在用人制度上搞五湖四海，不搞自己的小圈子。他给自己定下“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规矩，反腐倡廉，一身正气。

至于缺点吗？也有，那就是：说话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

用徐世昌言简意赅的一句评语：“段素性倔强，长陆军有年。”

段是炮兵专家，正宗的“德国造”。这里有他当年在克虏伯射击场上的“飒爽英姿”。

别看段祺瑞是个海归，他和现在的海归一样，回来后各种有利可图的位子都被本土“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伍出身的人占据了。他只好到二线，到有军事培训班性质的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官。

是袁世凯这个另类官员将段祺瑞从不能吃预算的教书匠锻造成我国第一个炮兵司令员。其实直接的原因还得说是



段祺瑞



1890年段祺瑞（右二）
在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埃
森梅喷射击场。

满人荫昌。

话说当时在德国的中国学生装束奇特，尤其是脑后拖着长辫子经常招致德国人的围观与讪笑。一日，段祺瑞在遭受耻笑后回到寓所，怒气冲冲要剪掉那条可耻的辫子。同学立即劝阻，认为剪辫子还是先电告朝廷为好。他们于是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请求剪掉辫子。朝廷回电大加训斥段祺瑞等，坚决不许剪辫子，加之随队“政治指导员”荫昌的劝阻，段祺瑞只得作罢。

过了些年，袁世凯要荫昌推荐人才到小站，荫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剪辫子的段二愣子。

说袁世凯另类就另类在这里，朝廷请“大帅练兵”，他不找根红苗正的苦大仇深者，却找来一批王伦式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还不是一两个，一说不一箩筐：段祺瑞、冯国璋、曹锟、靳云鹏、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李长泰、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田中玉、何宗莲、张怀芝、景启、刘锡钧、唐国治、李得胜、杨汝钦、崔朝俊、韩辉增、赵学治、何兰芬、王凤岗、孙鸿中、丁得胜、徐邦杰、任永清、梁华殿、张锡藩、刘承恩、李天保、吴凤岭、李壬霖、申保亨、汪本崇、劳本泉、傅宪武、张心全、吴佩孚、王者化、张文元、胡思光、吴鼎元、孔庆塘、滕毓藻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清廷不是袁世凯一人在练兵，更不是他一人在带兵，充其量他只是个“按察使”，练了老半天也只在荣禄武卫军中充武卫右军。

为什么以后的几十年就他手下的这些王伦们驰骋中华？

段祺瑞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笔者观察他多年，感觉这个人的一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请看这段：

庚子事变后，两宫从西安回京。沿途各地官吏都行跪拜大礼迎送。1901年11月，两宫銮驾进入直隶辖区，直隶总督袁世凯令多支部队分地段迎驾。开始几支队伍都行跪拜礼，偏偏行至段处时，段祺瑞全副戎装，腰挎军刀，昂首挺胸，率领全军将士持枪列队，整装肃立，按营队在道路两旁排成方阵，以操典式的军人姿势走向御驾：立正！敬礼！

段的迎驾方式，使随驾的载沣等王公大臣既惊讶又气愤，认为此举简直是大逆不道。经过询问知道段是按照德国式操典训练行迎驾之礼的。不管怎样，榆木疙瘩的清贵们对段祺瑞不请示，不汇报，自作主张打破祖宗规矩的行为颇为愤怒。

坐在轿子里的慈禧看到这支部队气势威严，军容尤为雄壮，感到银子没有白花，非但没有怪罪，心中反而一阵暗喜。段祺瑞就这样逃过一劫。

袁世凯对段是一等眼睛相看。因为他除了一个军人脑子外，还生了一个政客的脑袋。

还记得段祺瑞那篇慷慨激昂、临门一脚的军人奏章吗？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仍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威胁，四面楚歌。……事于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兵燹冻馁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輿之危而不救。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



着清朝朝服的段祺瑞 第一军总统官，并署湖广总督，官位正二品的段祺瑞以一纸通电压垮清廷，成就其“三造共和”中的“一造共和”。

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写得多得体，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操，却又刀光剑影地暗示，不退位，就将率北洋军兵临城下。

袁世凯说破了嘴皮子都不能让皇室退位，老段这寥寥数百字便发挥了千军万马的效应。

隆裕太后见已无法再拖时间，而且关于清室的优待条件也基本确定了，就于1912年2月12日发布谕旨，宣布退位。至此，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来年之久的清王朝宣告垮台。

2月14日，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这就是北洋龙虎豹中老虎段祺瑞“三造共和”中最得意的“一造共和”。

北洋三杰龙虎豹中的龙——王士珍也是炮兵科班出身。这人长得不像虎背熊腰的军人，倒像一个白面书生。的确，这个人带兵打仗并不擅长，而是擅长运筹帷幄，为袁世凯出点子。

这个大将军的特点是一个“小”字，怎么说？

他人长得小小的，练兵打仗爱琢磨些小点子，业务上爱搞些小发明，生活上小富即安。

如果光这些个“小”，他最多是条小龙。其实他表面与世无争，骨子里却很有主意。



王士珍（1861—1930），字聘卿，号冠儒，汉族，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他凭借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政绩，得到袁世凯的青睐，先后担任军政要职，直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被誉为北洋“三杰之龙”。

庚子后，袁世凯去山东当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时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王士珍为袁世凯提出了一整套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仍不从，再捕杀首犯，解散胁从。结果大获成功。

1900年6月，端、庄二王派了一个义和团的首领，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凯，说端王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设坛继续操练。袁非常吃惊，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群僚认为：如答应设坛，义和团将兴盛起来，造官府的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端、庄二王的严厉谴责。

这时王士珍站起来说：“请交给我来审问吧！”王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端、庄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斩首。此时袁召集的会议还没有散，袁问王：“审问的怎么样？”王答：“已经处决了，可以把令箭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袁世凯顿时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

王士珍的资历比较完整，当过兵，读过军校，上过前线，死里逃生过。所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王士珍一开始就被任命为讲武堂总教习。他完全按照德国陆军的营制、操典训练士兵。

1898年2月，荣禄来小站检阅，路过海河，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拆卸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冻，会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不用担心，三天后冰冻方解。”后果然如此。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确。

凡是重要军情袁必问王：“聘卿审核否？”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因此当时不少人称王为“龙目”，即袁的“眼睛”。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保奏说：“王士珍多年随臣当差，知之最悉，切实可靠。”王随后被任命为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

办事不含糊的王士珍却在政治上含糊了。辛亥革命后，他跟不上形势，标榜自己忠于清廷，辞官退居家乡正定城内。

所以民国的历史上，这个人的故事不多，只在张勋复辟时，此公命令京城守城部队打开城门，让辫子军像潮水一般涌入城中。后来，又同张勋等把十二岁的溥仪

抬出来宣布清帝复辟。

段祺瑞、王士珍和冯国璋同为袁世凯手下的“北洋三杰”，却各有各的特点：王平时善操权谋于腹中，段常行凶残于形外，冯则以贪婪置他人于不顾。

辛亥革命后，段、冯影响均超出军界，写入政史。故论其在后世的知名度，则龙不如豹，更不如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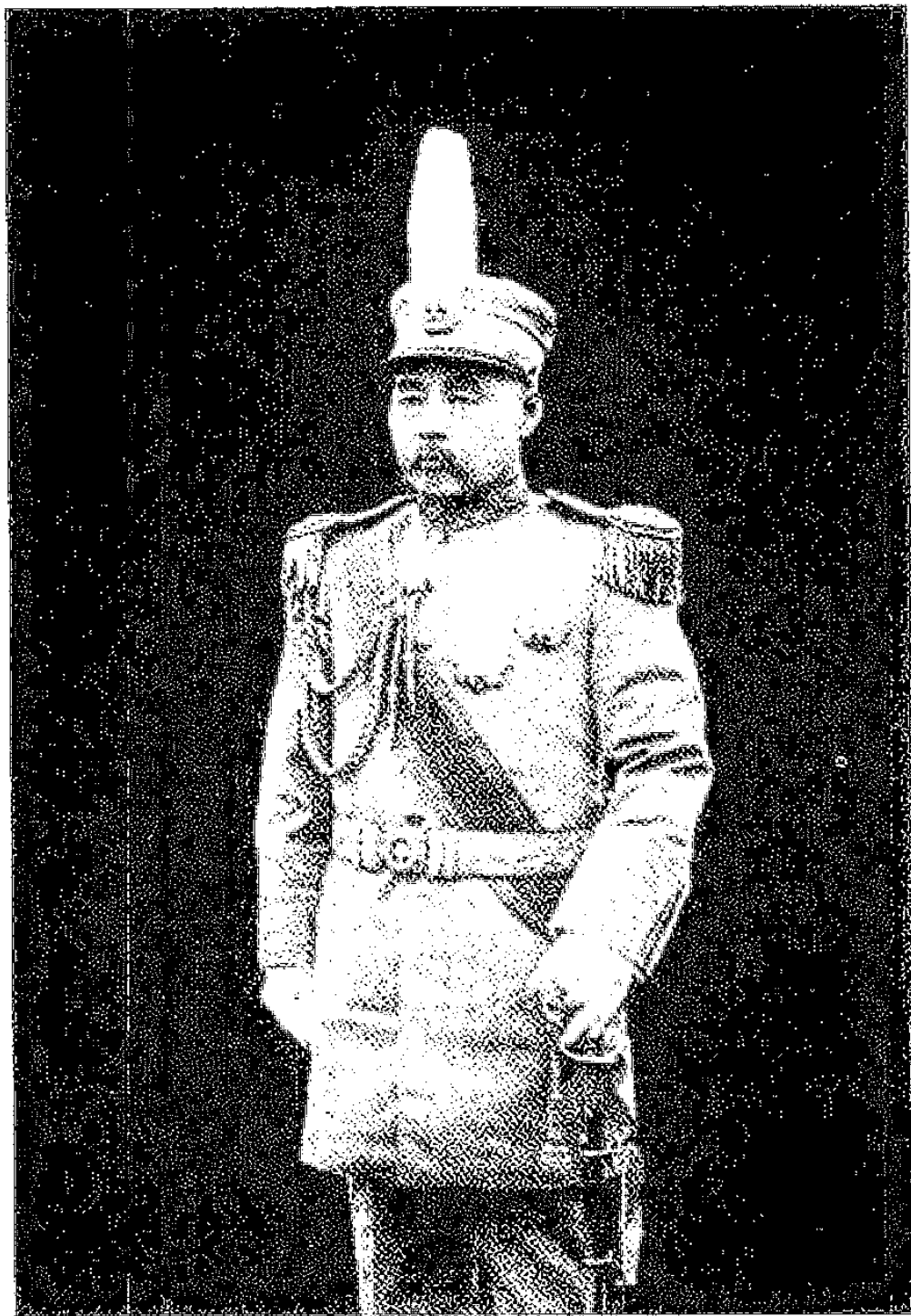
豹是冯国璋。他也是秀才出身，参军打仗之余，喜欢写点心得体会，冯叫这些为“兵书”。

1896年3月袁世凯看了这些“兵书”，视为“鸿宝”，誉冯“军中学子无逾公者”，任用其负责训练新军，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兵学堂监督，旋又升督操营务处总办，兴办军事学堂。

1897年，冯国璋编《新建陆军兵法操典》，又与王士珍、徐世昌、段祺瑞合编《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在袁看来，冯国璋政治上不怎么合格，脑瓜子直了点儿。载沣以“足疾”将袁世凯职权剥夺，冯国璋借口“值西陵与祭，坠马受伤”，和原配吴夫人病丧、母孙太夫人逝世为由，请辞回籍，均未获准，反靠逢恩诏官加一级。所以冯国璋一直对清廷感恩戴德，但仍忠于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冯被任命为第一军总统官，1911年10月29日开始攻打汉口，11月1日攻克汉口，11月27日攻陷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他攻下汉阳后，清廷以战功授予冯二等男爵，冯激动得先大笑然后大哭，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竟然封爵了！一定好好报效朝廷。当他准备乘胜追击时，袁马上派段祺瑞代替了他。调冯北归，



冯国璋 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任北洋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历任统制和第一军总统官，江苏都督。黎元洪辞职后，冯国璋进京任代理总统。

兼任禁卫军一万二千人的武装总统官。

清帝退位后，冯国璋把自己的花翎官帽珍藏在家里，多年后，才剃去一直保留着的小辫子。袁世凯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氏许配给冯国璋，以便监视控制，冯也曾因称帝对袁生出过怨望，但听到袁去世，冯国璋抱头大哭。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中的“豹”，他作战强悍迅速，一贯以清朝旧臣自居。他待人宽厚，八面玲珑，各方讨好。

冯国璋敛财能力特强。曾经将皇宫内明清两代后妃放生的、挂有金银牌没人捕捞过的鱼卖掉，得大洋 8 万。

他的经营活动大多集中在金融和地产上，在老家拥有良田千亩，在江苏南通与人合办盐垦公司，占地 70 万亩，拥有几个钱庄，死后遗产有 2600 多万元；此外，冯国璋还保存一大批旧枪炮，以备将来复起使用，直到死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庞大的军火库。

冯信风水，他相信河间一块黄龙湾地能让他发达，去世后偷偷埋在那儿，并且建了很多地下室，以存放财宝。而将政府给他的国坟墓弄成衣冠冢。

和袁世凯一样，北洋的这拨人，说新不新说旧不旧，半新半旧，亦新亦旧，还可新可旧。

其实，人要在社会上干点儿事，不都这样？由着真性情来，必死无疑！特别是您想玩政治。

山东巡抚任上，义和团发不了功

环渤海湾地区，自古以来，民间大多好习武。义和团、红灯照就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

1899年冬天，袁世凯到义和团的重灾区山东，任山东巡抚。他带来了7000人的新建陆军。一水儿的新式装备，浩浩荡荡，一时间成了济南府的一大风景。

他一到济南就命令地方：传教士外出，要当地官吏派兵护送。还以“充作公所”的名义把各教堂保护起来，如济南天主教堂的大门上就挂出了“官书局”的大牌子。

袁世凯的五姨太那时是袁的新娘，她1930年代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会儿的故事：

庚子年春天的一天，老爷让我跟他去小清河校军场。我坐在士绅、太太堆里，老爷请济南名士及大小文武官员，观看法师神术。

提督程文炳，从小站就跟着老爷，见老爷对义和拳神功犹豫，特推荐一位大师给老爷表演。

老爷请法师上坐，问他：“大师一旦上法，果能避枪弹？”

法师说：“神仙附体，当然！”

老爷一指校场，说：“请！”

程文炳命火枪手30人，持后膛枪向法师开火。一阵轰然声响过，法师原地站立，毫发无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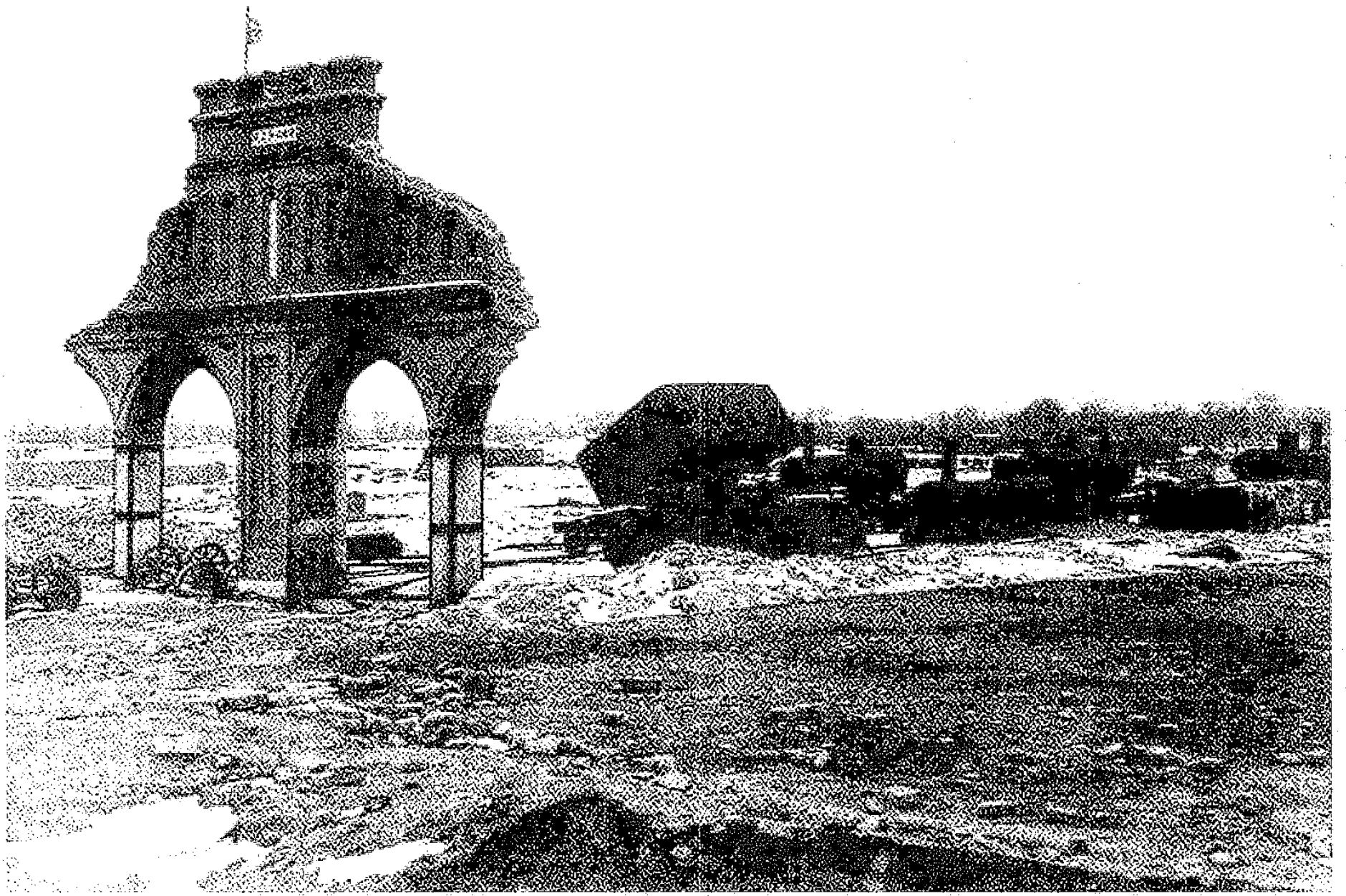
老爷大喜道：“我中华有此神人，何愁洋人不灭！”又说：“取我的洋枪一试。”

这是一把德国教官送他的勃朗宁。老爷对准法师，“叭叭”两枪，只见法师摇晃一下，仰面倒地。

我们都看傻了，军士们也惊慌。唤来马弁去瞧瞧，马弁回来报告：“大帅，法师的眼睛睁着，面带微笑！”老爷远远地喊：“大师请起，袁某服了！”没动静。再呼人视之，回报：“大帅，法师可能……可能升天了。”

老爷急步上前，只见法师胸腹各一洞，血流如注，定死无疑。老爷沉着脸，命赏银500两厚葬，返身离去。

在场所有的人议论纷纷。程文炳紧随老爷身后，一劲儿求告：“大帅……大



庚子事变时被义和团拆毁的火车站与火车头



义和团士兵的着装



永平府（今秦皇岛市卢龙县）义和团团员



山东巡抚时期的袁世凯和其生母刘氏

1902年10月，袁世凯的生母刘氏病逝。慈禧下谕祭奠刘氏，赏正一品诰命。袁世凯带着老佛爷的谕旨和封赏，亲自扶灵回乡安葬母亲。

按照豫东一带的丧葬风俗，继室（袁生母刘氏为继室）死后不能葬入祖坟正穴。以袁世凯当时山东巡抚的身份，加上慈禧刚刚赐给母亲的无上殊荣，不能葬进祖坟的正穴，袁世凯的面子自然挂不住。但袁世敦以自己嫡长子的身份，坚决不肯让步。袁世凯和袁世敦大吵一通，徐世昌和河南巡抚都亲临调劝，非但无效，反而更惹恼了袁世敦。袁世敦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拿出市井草民的泼皮手段，在袁家居丧期间竟然穿上大红袍子闹起丧来。

风光一路的袁世凯在兄长那里颜面丧尽，却又无可奈何。袁世凯只得另选新坟地葬母。至此，袁世凯发誓，今生今世再不回项城，永远与长兄世敦断绝往来。这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后一次回项城老家。

帅……”老爷头也不回地说：“我不怨你。你想让大家信义和拳，要误国呀！”

原来30名火枪手，遵程提督命，提前将弹头卸掉。从此老爷认准义和拳是妖佞之徒，在全山东镇压，好多人都跑到直隶境内。

义和团是慈禧提倡的“爱国主义运动”。等吃足了苦头的慈禧缓过气来，发现整个北方就袁世凯管辖的山东局势相对平静。这才想到袁没有跟着瞎起哄的好处来。

战败后漫长的外交活动期间，慈禧发现，整个北方就山东有完整的电报收发系统。所以朝廷的旨谕都以济南为枢纽，经过袁之手，拍发到全国。北京、天津和直隶境内的电杆、电线、铁路已被义和团全部捣毁。

如果说小站练兵让袁世凯小有名气，山东巡抚任上的700天，则使他亮相国际舞台，走红朝廷。



山东巡抚时期的袁世凯

袁世凯这时年方40岁，正值壮年。过去五年，他吃住在军营，用心血带出一支王牌军队。在经受过八国联军的打击后，清国最精锐的武卫军前、后、左、中四军基本被击溃，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丝毫没有受损。慈禧不得不正视他。

在义和团期间，凭借训练有素的军队，袁世凯几乎是中国唯一能保护外国人安全和财产的总督。在其后任另外一些职位时，他增强了军队力量，计划让中国军队成为能被世界各国承认的军队。（《纽约时报》）

洋人第一次发现，“半野蛮人”中还有如此头脑清醒的官员：礼遇教民，治下军队纪律严明，奉行和洋兵“井水不犯河水”政策，甚至暗地里还帮助临近省份前来避难的中外人士。

外国人的工商活动在山东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袁世凯上任之前，山东的义和团是洋人最难对付的。

鲁人恨教民的欺凌，多同情于拳众的排外思想，见袁氏竭力压迫他们，全都大愤，而以“汉奸”、“二毛子”诟骂袁氏。

街巷间也时有大书咒骂袁的文句的，就像今天的贴标语呼口号一样。等到津京的祸变酿成之后，大众才一下子改变了论调，而歌颂袁抚台不停口了。

京津官绅避难者，麇集济南，全都有到了乐土的感觉。济南城的市面，繁荣气象，倍于平日。说到袁抚台，没有不说他是山东的福星，中国的伟人的。（《凌霄一士随笔》作者：徐凌霄、徐一士）

袁世凯自己也说：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

与此同时，袁世凯着手筹办新政。1901年办官立山东大学堂，是全国各省中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他推动设立了银元局，创办商务总会，并亲莅胶东，力保胶济铁路的顺利修建。

是年1901年，袁世凯42岁。

1901年11月7日，经荣禄、奕劻等推荐，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8日，清廷以其“共保东南疆土”、“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

1902年6月9日，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全国劳动模范”、直隶总督袁世凯

慈禧看到日本成功的例子，也挺想学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隶总督袁世凯来劲了。

40多岁的他样样走在别人前面。方方面面都显得才干突出，咄咄逼人。其成绩单有：

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骨干的现代化陆军；

设立“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

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

兴办新式学堂，据1907

年统计：

专门学堂12所，

实业学堂20所，

优级师范学堂3所，

初级师范学堂90所，

师范传习所5处，

中学堂30所，

小学堂7391所，

女子学堂121所，

蒙养院2所，

……

总计8723所，

学生16.4万多人，人数

位居全国第二；

学务资产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

他提倡办实业，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聘请后



直隶总督袁世凯 40多岁，没有什么背景的袁世凯坐上了“总督中的总督”——直隶总督位子。一坐7年，把直隶省建设成“晚清的大寨”，各项工作都是兄弟省学习的榜样，参观者络绎不绝，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普选也让他试过了。

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斯坦福大学矿业学毕业生胡华（即胡佛）为顾问。

到辛亥革命前夕，直隶省工矿企业达 137 家，资本总额达 2920 万元以上。袁世凯在工商业者心目中地位大大提升。

一个山东巡抚，一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两个差事使他好评如潮，而且是中外闻名。

袁到任，首重练兵，练兵就是练钱。袁世凯一上任就扩军备战，这钱从哪儿来？《纽约时报》给出了答案：

北京，1 月 26 日。中国官员发现，皇室成员在逃出北京之前把价值超过一亿两白银（大约七千万美元）的金银埋藏在皇宫内眷居住的地方。

朝廷已经批准从中每年拨给直隶总督袁世凯五百万两白银，用于在直隶地区维持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袁世凯被授予中国陆军和海军的实际控制权，他建议在陆军聘请日本顾问、在海军聘请英国顾问进行指导。

据说慈禧西狩回銮后，发现临走时埋下的银子没丢，高兴的不得了。

别看慈禧是太上皇，她老爱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死后留给儿媳妇隆裕太后的银子，辛亥革命后给袁世凯以军饷的名义掏空了。且听曹汝霖说法：

袁世凯恐宫中内帑，留为后患，于是以军饷无出，前方军心动摇不能担此重任为词，奏请辞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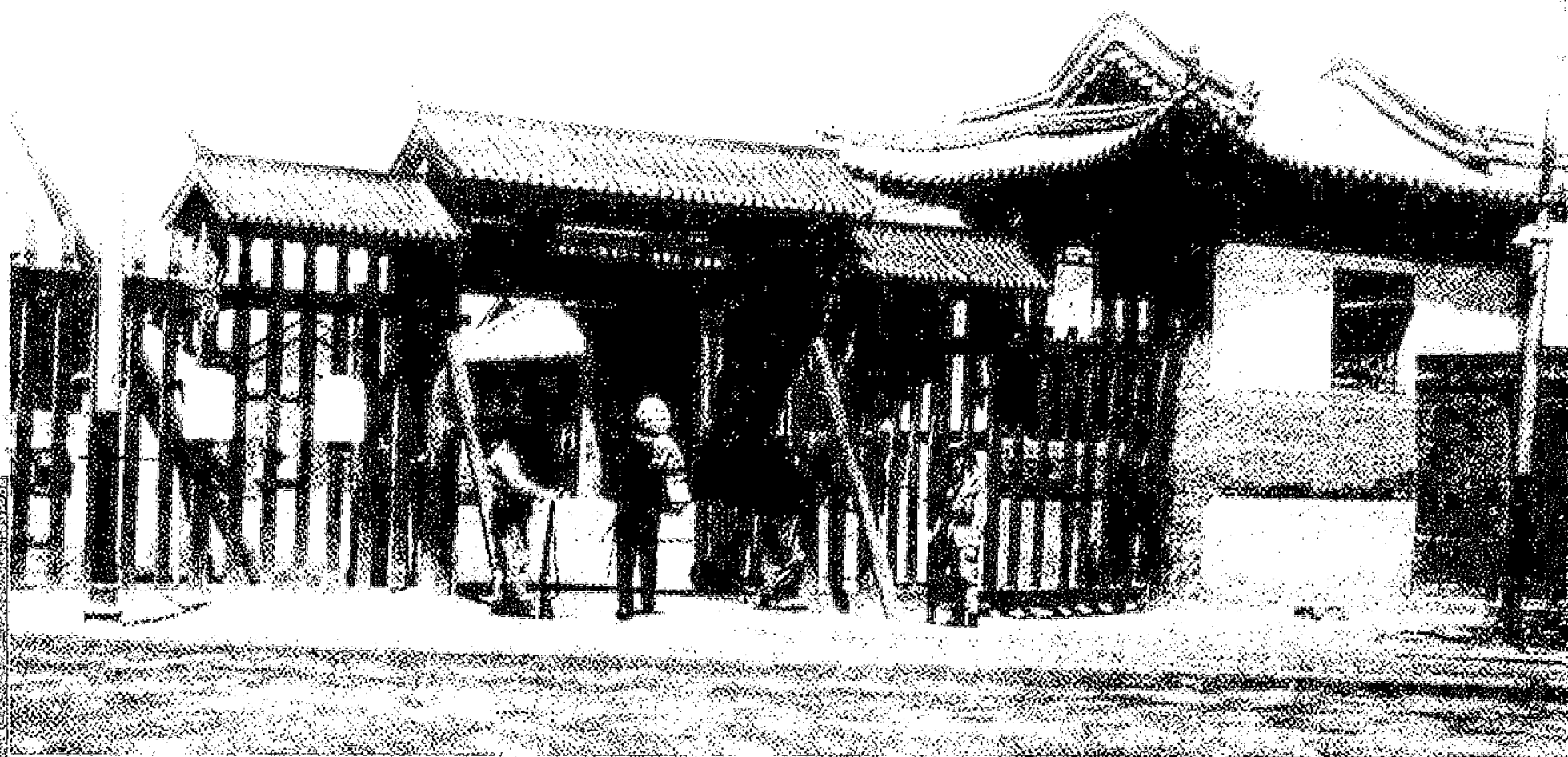
隆裕太后没有阅历，何能洞，总理既以军饷无出为辞，不能空言慰留，又无它法筹措，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之金条尽数交出，共有三十余箱，合银六百万两之谱。

这批金条，都是督抚关道等所进之贿赂，每条都粘有臣某恭呈字样，余曾目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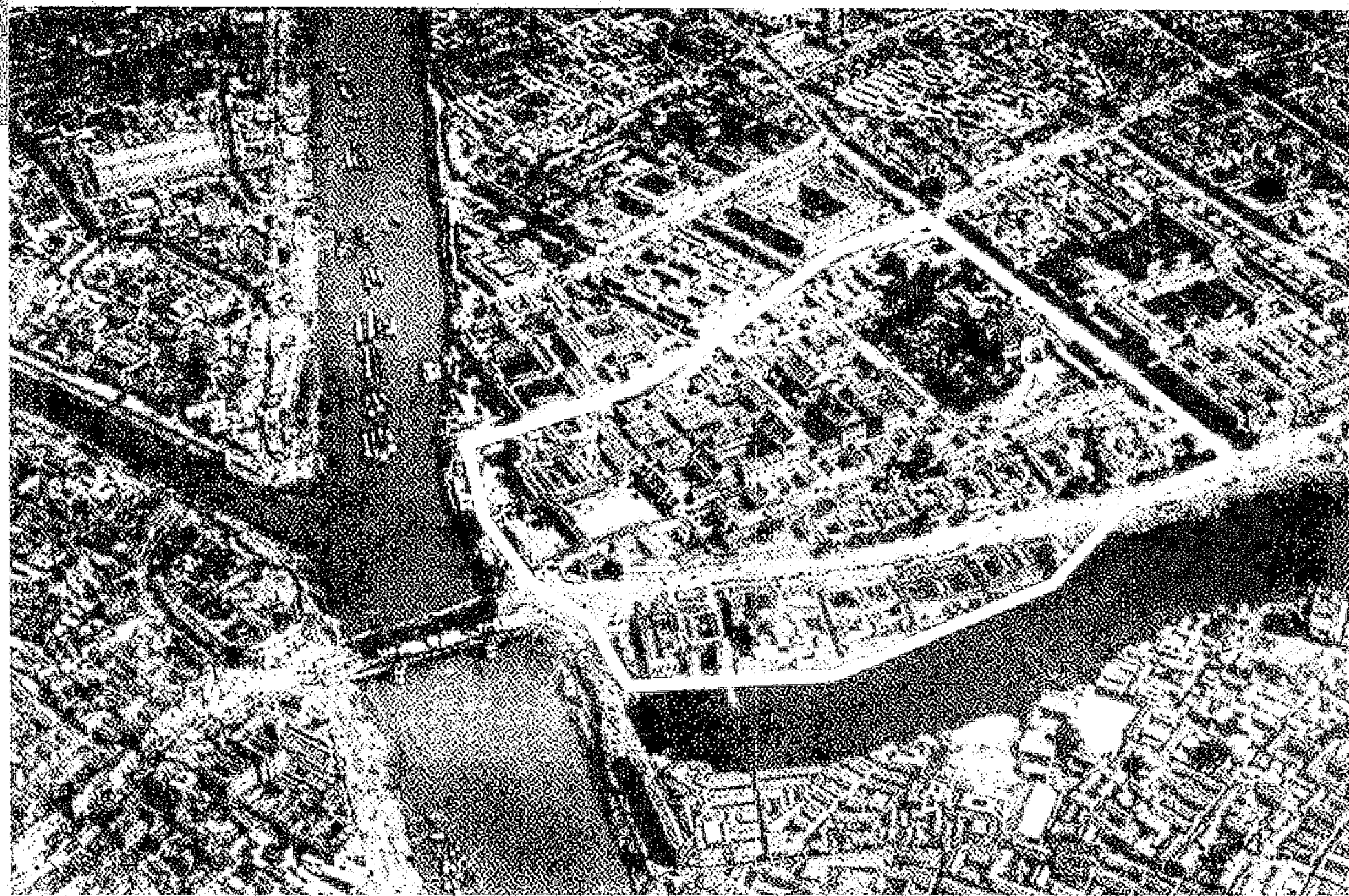
查那会儿封疆大吏，三品以上官，一年半载就挪换位子，原来这是太后敛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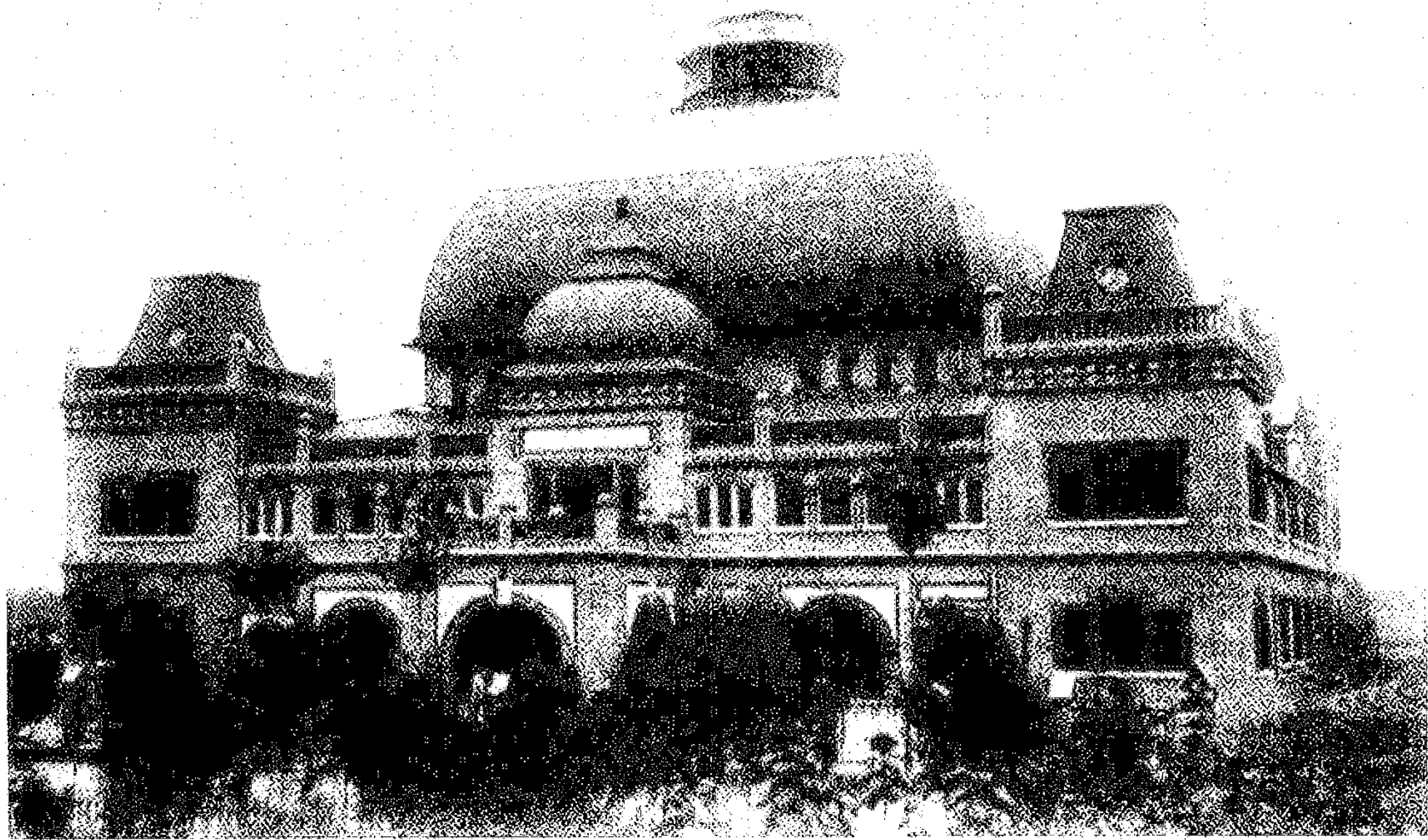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的袁世凯像 李鸿章逝世后，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翌年改为实授）；袁世凯受命进驻天津，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后清政府筹办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袁世凯又兼任参予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



二十世纪初天津的直隶总督府近景



天津直隶总督府鸟瞰（白线内）。同治九年（1870年），清廷将天津、营口和烟台三个口岸的通商事宜，划归直隶总督管理，并将北洋通商大臣一衔授予直隶总督。直隶总督多驻在天津，在冬天外贸淡季，才回到保定。此府1937年遭日军轰炸，成为废墟。



中国第一次地方选举——“天津县议事会”选举



袁世凯与八国联军将领在中国首家“外交饭店”利顺德大饭店合影 1902年8月15日，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管了天津政权。

好机会。

袁世凯得了每年 500 万两银子后，便增募新军，改良武器装备。

1903 年，袁世凯一次就从日本进口步枪、马枪一万四千杆，手枪六百五十支，各种炮六十四尊，以及大批弹药等，共值银一百二十万两。

到 1905 年，袁手上已经有了北洋常备军六镇，精锐兵力八九万人，逐步形成一个个以其为首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治官，袁也有一手。便是没收人家灰色收入和小金库，考核官员，访调官员政绩。

他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命令直隶州县实缺官员必须赴日学习 3 个月，经考察确有所得后才能赴任。

保定府派员访日后，向袁提出：仿照日本税法，改良直隶税法一项。袁世凯批示“大致可采”。

1907 年老袁还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普选制”选举，这就是“天津议事会”的选举。

1907 年，天津《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考察北京的立宪，发现多数报纸内容猥琐，赌场生意兴隆，饭馆藏污纳垢，官员只知吃喝玩乐，处处靡靡之音。这让他大失所望。但他所在的天津，却是一派新气象。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
(《剑桥中华民国史》)

然而，地方上行得通的，京官难啊！

1907 年进入军机处的袁世凯，到了北京才知道，在全中国做点儿改动是多么的难。最严重的时候，据说连慈禧都哭着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

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慈禧的家学底子您是知道的：汉语能说会写，但水平不是很高，常出错别字；满语听力尚可，口语不行，书写更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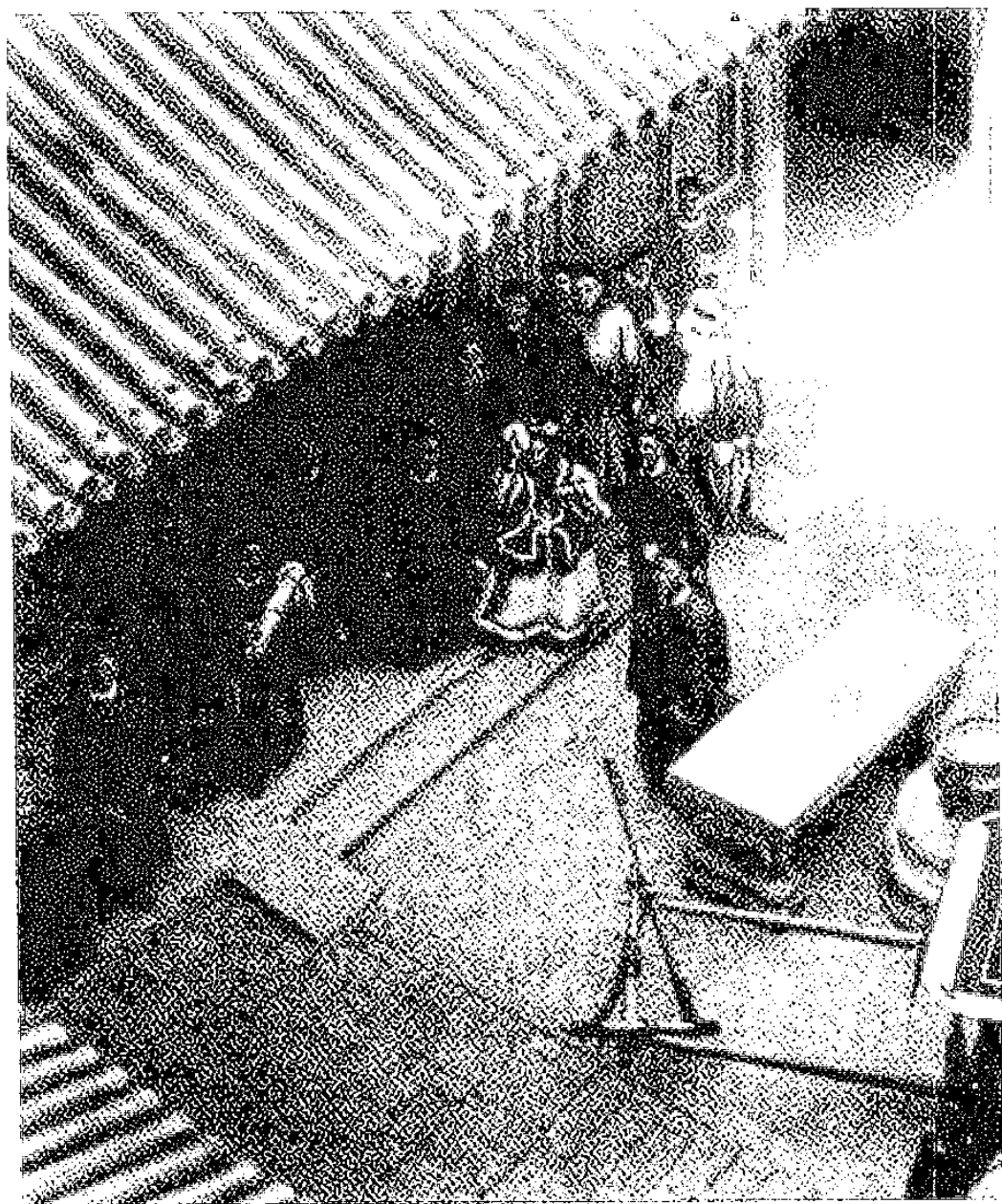
绝不能让肃顺看笑话，这是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小寡妇慈禧的决心。

于是慈禧拼命地学习。为了一本《治平宝鉴》，她放下身段，经常由大臣们隔帘为其讲解，从中学到了很多统治术。

慈禧太后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女人，又处处散发出女人的气息。她有很多古今妇女干部身上的通病：

首先是凭感性和情绪化地管理干部队伍。后宫的太监和她走得近，她就认真听他们的意见，有时军机处拟的旨也让小太监给意见掉了。

其次，知识储备还是不够。太后她的那些治国理念大多来自于《玉堂春》、《秦香莲》，最多是《鸿门宴》。这就不奇怪她骂起儿皇光绪来用的那些反问句，什么：“难道祖宗之法没有他洋夷的那套好？”



众男簇拥下的慈禧（1907年左右）年纪轻轻便守寡的她从不缺各类男士的簇拥和笑脸。这是慈禧唯一一张“不正经”的照片，大概是去看戏。

说句公道话，慈禧为我国的京剧事业确实没少呕心沥血！她一生不知道审查了多少出戏，用高薪养了多少京剧名角，这才有了今人开口闭口的“国粹”。

第三，不务正业。是个女人都爱美，这没错。可您不能什么权都揽，揽下了又没时间管，整天琢磨那些个鸟粪美容法、蛋清刮脸术，误了国家大事。

就这么个山西长治来京的女务工人员管了国家，还管了四十七年，而且是中华民族最紧要处的四十七年。能说咱们不是多难之邦吗！

然而也有一样好，就是无知者勇。慈禧太后圣贤书读得不多，用人胆大且生猛。李鸿章，一身江淮痞子气，她用。

袁世凯，大学文凭都没的河南二愣子，她也用。

可以说，兰贵人用的这些人个个掷地有声，都是晚清的风云人物。脏活、累活和苦活大多由这类汉臣做了。那些琴棋书画俱佳，锦绣文章誉满天下的名士，都让她供在翰林院里当摆设。

奇怪，从曾国藩到袁世凯，慈禧太后大多喜用中部地区的汉人。可能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一个位子十个人争，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加倍努力。

《纽约时报》给她的评价蛮高：

当慈禧太后在世的时候，清国有领袖。那时，人人都很清楚谁是国家之舟的舵手。她统领整个民族，再精明的男人也要按她的吩咐去做。当她一离开人世，尽管是个女性，清国也马上感到自身缺乏强大的领袖。在慈禧太后有生之年，她为女性参政树立了榜样，她创造了全世界女性的巅峰之作。

她受人尊敬，有教养，政府的官员向她俯首称臣。在她之前，在古老的中国，没有任何领袖尝



抽大烟的慈禧 我们应该理解慈禧，20多岁便守寡，接着独生子又夭折，平时还要和人斗。虽说是其乐无穷，可是也累啊！乘着“被画”的空闲，老太太抽袋烟。

试过宪制。在她有生之年，她使君主立宪制在中国成为可能。(1910年10月2日)

不知为什么，慈禧第一眼见到袁世凯就觉得特别顺眼。

本来嘛，一个山西人，一个河南人，搬了太行山就是一家人。

袁世凯对慈禧，那可是功夫用到了家，细微处都事先在脑子里过了遍。所以留在慈禧脑子里的印象都是美好的。

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中有段文字很能说明袁世凯：

两宫召见（我）前一日，袁项城自海淀别业电话招见。

时项城已入军机，春夏之时，两宫在颐和园听政，各军机大臣，都在海淀有别业。

余遂驱车至海淀别业，以为必有事垂询。岂知见后即说，你明日初次召见，故特招你来将应注意的仪注告你，这种过节，不可不知，以免失仪。

遂将怎样进殿，怎样跪对等等应注意的事，一一告知。且谓应备一双护膝盖，琉璃厂有售的，恐跪久即麻，起立不便云。

余深感其关切之意，谢之辞出。

瞧，袁世凯教了多少见太后的招儿，连到琉璃厂买护膝都知道。

想想，那会儿袁世凯已经入军机，理论上就是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啦！

遥想庚子年，袁世凯对慈禧太后是用足了心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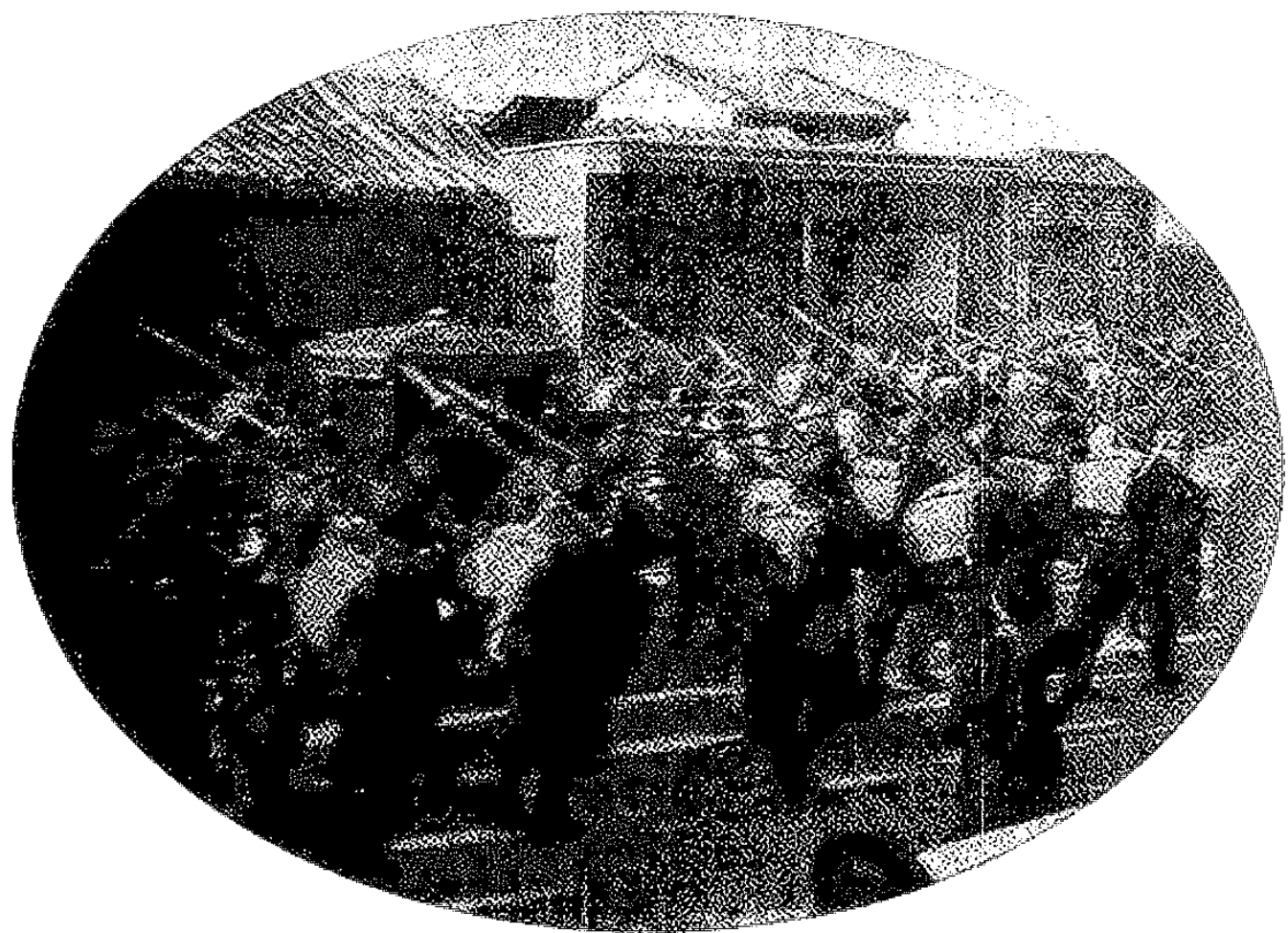
患难见真情，就是在这次慈禧一生中最大的劫数中，袁世凯真正让慈禧感动了一回。

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宫回銮。袁世凯在山东各地急忙采办大宗绸缎、日用品及食物，另备白银20万两，派人专程去太原上贡。

1901年12月15日，袁世凯由济南亲自到直隶省顺德府迎接两宫圣驾。

袁世凯望见太后御辇来到，便匍匐道左、跪请圣安，随即放声大哭。众大臣一看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是一件犯忌的事儿。

按清朝制度，王公大臣除了国丧举哀大哭外，平时绝对禁止对皇上哭泣。



1902年，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护卫两宫回銮

为了控制军队，清政府于1898年将不同形式编练的北洋各军统编为武卫军。在与八国联军交战中，前、后、中、左军全部溃败，只有1899年随袁世凯移防山东的右军得以保存。

随驾官员见袁触犯天条之举，都替袁担心。慈禧太后也觉得很奇怪，便问袁世凯为何要哭。

袁世凯抽泣着回答：“臣见圣容消瘦，痛彻肺肝，不觉失礼，忘却大罪在身。”

慈禧听了袁的回答，反倒安慰说：“瞧你这孩子，咱们今天能够见到面，总算是菩萨保佑，现在你也用不着再伤心难过了。”

慈禧以其“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划”的卓著勋劳，加封他太子少保衔，并赏黄马褂，特许紫禁城骑马。

袁世凯得到了他一生中最爱听的名字“袁宫保”。

从这天起，袁世凯便成了太后面前的红人。太后下一个十年，基本依靠的左右手就是此君。最多时，袁世凯名下顶了十大差事：

直隶总督

北洋大臣

参预政务大臣

会办练兵大臣

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大臣

督办电政大臣

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

津镇铁路大臣

京汉铁路大臣

会议商约大臣

当袁世凯开缺回籍，《纽约时报》回忆其和死去的太后关系时说：

只要著名的慈禧太后活着，她对袁世凯是完全信任的，而且袁世凯在中国对外关系上几乎有着同样的实权。

袁世凯组建中国现代军队，丢弃大刀长矛和粗俗的呐喊口号，取而代之的是经过欧洲将领精心训练，穿着整齐军服的士兵。（1909年1月2日）

这就是老寡妇慈禧太后真正少不了袁世凯的地方。袁能让她憧憬到一支列强式的虎狼之师，而且是自己的，听她慈禧指挥的。

更要紧的是袁世凯“乖”，懂得老妇人的心。

这不，1902年11月，老太太60大寿时，“该员”花了1万两白银，从香港购进了一辆美国产小汽车作为寿礼送给了慈禧。

问：“此乃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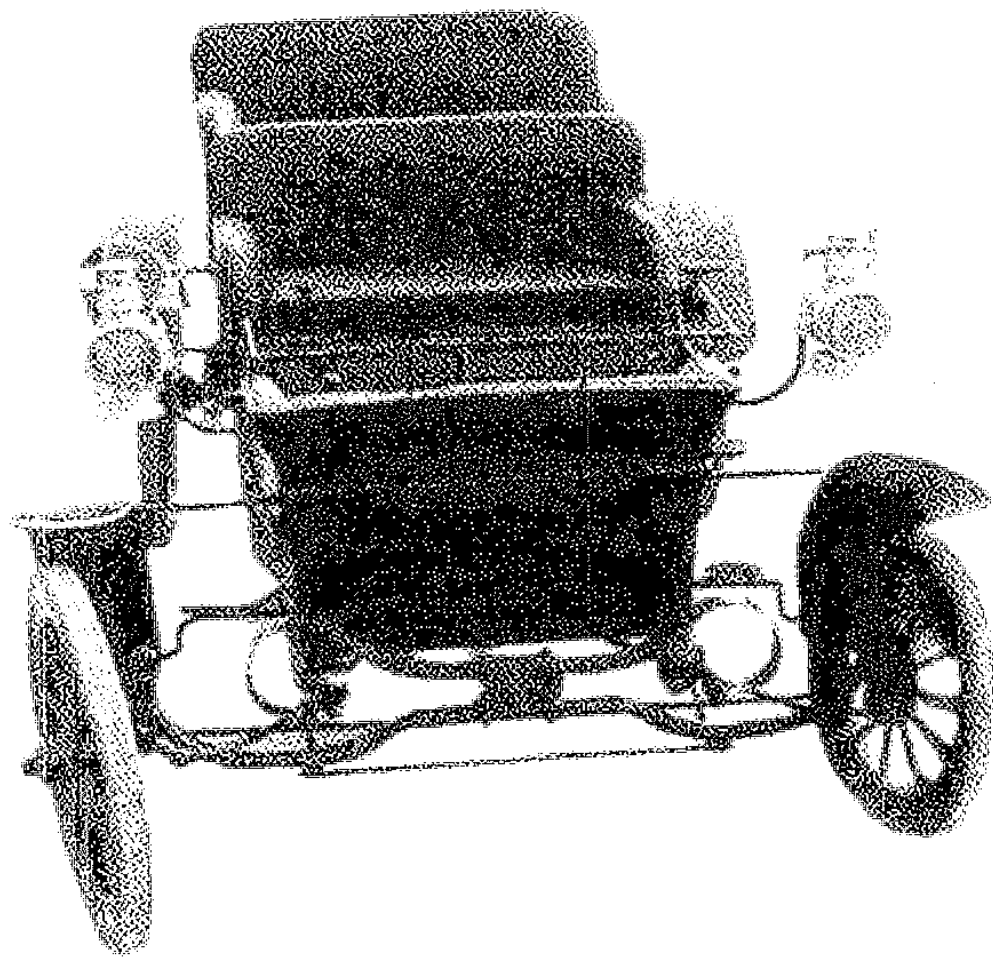
答：“轿子车。”

于是“轿车”一词诞生了。

宫里其实很沉闷，慈禧早就想“与时俱进”一把。于是慈禧兴致勃勃地乘坐汽车去颐和园，随从们则抬着大轿在后边追着跑。

然而，汽车刚刚开出宫，慈禧突然发现担任司机的太监孙富龄不仅与自己一样平起平坐，而且坐在自己前面。

原则问题，慈禧从来不马虎，她顿时大怒，喝令孙富龄跪着开车。被



慈禧太后当年的坐驾

袁卷入了后慈禧时代的权力斗争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载湉因病在北京瀛台涵元殿逝世，享年38岁。

仅仅一天之后，慈禧太后也因病去世。

与此同时，以袁世凯为首的篡国夺权集团加快了他们反清阴谋活动的步伐。

霹雳一声震天响，1909年1月2日，英明的摄政王载沣一举粉碎了袁氏反清集团。

从随后朝廷发布的诏书中得知，袁世凯背着清朝中央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密谋什么“互派大使”的勾当。

为了体现朝廷的“给出路”政策，清廷根据“其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将袁世凯永远开缺回籍。袁世凯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首都北京，溜回了他的河南老家。

似曾相识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从古到今，不管用什么话语，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

伴随一个大人物的消失，一定会有一次剧烈的变动，我们称之为能量释放。就



并非躺在棺木中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成为法国 Le Petit 杂志在 190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那期的“封面人物”。该刊在报道中明确指控这位终年 73 岁的中国太后在临死前毒死了 37 岁的皇帝，并评论道：“当然，至今所有针对慈禧太后的谋杀指控，都是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得到更为直接的证据支持。但一个母亲被公认为杀子凶手，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她的母亲角色无疑是十分失败的了。”

如同地震是地下能量长期积累的瞬间释放一样。

这两个月来朝廷很吊诡。

要么不死，一死就是成双成对。成双就成双，双双死去的却是一对政治上的死对头。更加蹊跷的是两人的死，中间只隔了20小时。（光绪前一天傍晚，慈禧后一天午后1点。）

最不敢相信的是慈禧临死前还从“死对头”的亲弟弟家中又找了个“接班人”。难道慈禧老糊涂了，不知道弟弟会为哥哥报仇，不知道亲弟弟会调查她“毒死”哥哥的事儿？除非“谋杀”一说不虚乌有，否则就是慈禧老糊涂了，杀了人家的哥哥还让人家弟弟当道。

为什么慈禧找载沣当这个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另有一说：

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



爱新觉罗·载沣(1883—1951),封与醇亲王,字“伯涵”(一说“亦云”),号“静云”,晚年自号“书癖”,改名“载静云”;清摄政王,末代皇帝溥仪生父。

▶ 醇亲王和他的两个儿子,右为溥仪。



“谋杀”一说在当时就很喧嚣，以至于引起大洋彼岸《纽约时报》的掺和。1908年11月17日，慈禧死后2天，该报发表评论：

没有证据显示是谋杀

怀疑皇帝和太后死于谋杀的谣言四起，尽管如此，至今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们是非正常死亡的。皇帝已经被病痛折磨了很长时间，在他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身体虚弱的状态。慈禧太后多年以来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最近的几个月中她的健康每况愈下。11月3日太后的生日庆典过后，她的肺充血引起了高烧。

负责诊治皇帝和太后的医生们表示，这两个人的身体都遭到了极端天气的侵害，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用现代的医药进行治疗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慈禧太后在死前颁布诏书追封自己为“伟大的皇太后”，并且指定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成为新太后，由溥仪继承光绪的皇位。

关于有人谋杀光绪帝，康有为最起劲，在东南亚的槟榔屿，他会见记者，说“证明前皇帝的死与袁世凯有关”。

《纽约时报》槟榔屿，1月8日——今天在一次访谈中，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从北京驱逐的著名中国改革家康有为宣布袁世凯已经被结束了高等职位。原因是他在前皇帝的死亡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并且袁世凯可能会因为与此事有关联而被审判。

全世界都闹得沸沸扬扬，载沣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指控”。如果这些“指控”针对的是王世凯或李世凯，这只是每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成千个“指控”之一，本来中国人就不团结，有了利益纠葛更是如此。摄政王载沣会一笑了之。

可是这是袁世凯，一个手上掌握着呼风唤雨能力的人啊！

朱东安教授的这段话很准：

对满洲贵族来说，更为糟糕的是，咸同时期湘淮军虽称盛一时，但湘淮军外尚有八旗、绿营、练军等武装力量。



THE SIX GREAT STATSEMEN OF CHINA.

张之洞阁下

摄政醇亲王殿下

庆亲王殿下

袁世凯阁下

岑春煊阁下

那桐阁下

摄政王及内阁重臣

就湘淮军而言，亦有曾、左、李、刘等诸多派系，相互牵制。而到了北洋军时代，八旗、绿营、湘淮军、练军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新式陆军一统天下。

只是新军的编练，虽然遍地开花，风行一时，清政府也打算在全国建立三十六镇新式陆军，但直到武昌起义爆发也没有完成这个编练计划。其初步成军的部队虽有二十几镇，但真正练成者仅直隶六镇七万人左右，湖北一镇一协一万八千人上下。其他各省皆未练成。

且北洋军全部德国装备，由德国军官训练，精锐冠绝一时，非他省新军所可比。

此时，李鸿章、刘坤一早已去世，张之洞也已年老体衰，致使军界、政坛都一时成为袁世凯一枝独秀的局面。

这样，那拉氏往日对付湘淮将帅的那些法术，也无所施其伎了。

瞧，慈禧太后到了晚年也拿袁世凯没辙。这已经成了一个人数只占整个国家总人数1%左右的满清统治集团的一块心病。

《载沣罢袁》这出戏很中国：

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

然后撕成碎片。

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

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光绪在临终之前一天，嘱托亲弟弟载沣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

呜呼，中国的历史往往和说书、演义、武侠小说纠缠在一起。也难怪，由于诉说对象大多是引车卖浆者流，非用点儿猛料不能震住“看官”。

所以，看历史，必须要用常识判断史实。更何况，浩淼史料前，咱也不能指着老祖宗的那支笔。

都说载沣懦弱，其实他在开缺袁世凯的事儿上做得还是很到位的。26岁的小伙子，一上来就干得这么漂亮，着实难得。

载沣先将袁世凯定性为“擅自与美国谈互派大使事宜”的外交错误。要知道，外交无小事，事事是大事。从外交上下手，可大可小，载沣便有了主动权。另外，朝廷同仁认为外交是老袁的强项，先杀杀他的威风，给他一个下马威，也算给14级，五品以上的干部开一个吹风会，让大家重新站队。

然后交张之洞等军机大臣廷议，民主集中制，这可是咱们中国老祖宗的集体智慧啊，行之有年了。

接着根据清廷的惯例进行处理，体现载沣没有公报私仇，是“按律办事”。

处理时对袁世凯本人“给出路”，并且派员去北洋，充分肯定绝大多数北洋同志是好的，中央充分肯定前段时期的辛勤工作。对冯国璋要求调离领导岗位的请调报告，中央不予考虑，并给予记一等功一次的嘉奖。

事发后，外国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这是第二天《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的标题：

给袁世凯的诏书据信出自满族当权者的阴谋，惧怕革命性的暴乱，放逐袁世凯的理由是“腿患风湿”——其职位由那桐接替。

《纽约时报》一个月内发了十多条袁世凯被开缺的消息和评论。实际上，事发当天就登了长长的文章：《中国一代枭雄，现代军队组织者》。

大清国人有点儿风吹草动，外国人就抽风。

袁世凯这次真给吓着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此时的袁世凯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这回，袁世凯不仅下野开缺回籍，还被奉步军统领衙门之命前来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一步不离地跟上了。但袁得亮此人生性愚蠢，又不通文墨，而且贪财好利。

袁世凯对他周密照顾，与他拉上了宗族关系，大量奉送金银财物投其所好，“将其拉拢下水”。

袁得亮不仅把每月向步军统领的报告交给袁世凯的幕僚捉笔，还把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也如实相告。

袁是个要面子的人，遇到此等不风光的事儿，和众人玩起了“躲猫猫”。谁想到，在去天津避难时，还是给英国人“海鲁君”撞到了：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我找了一处近暖气的地方坐定。

这时上来一人，穿的很朴素，毛发有点儿鬃白。他的随从甚多，坐处与我相对。

我见其仆人给他放下一束新闻类报纸，他立刻拿起来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他阅报已有四十分钟左右，还端坐不动。

这时有仆人又置些酒类于茶几上，车上的仆人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

我用英语询车上的检票人，知道这是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

四点三十分，车到老龙头，袁下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了。（编自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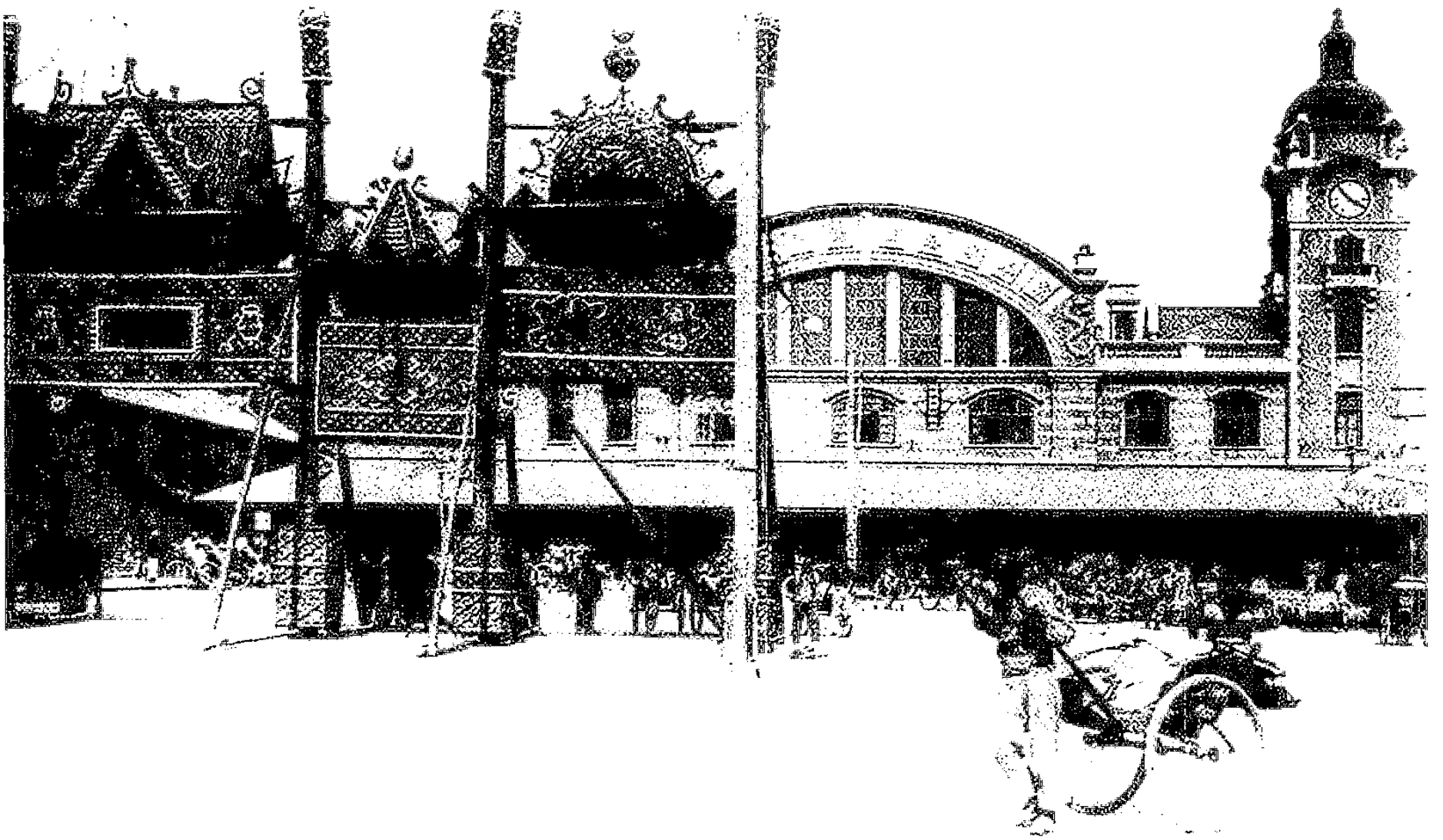
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回放整个事件的过程：

1908年底，慈禧死前问之于军机大臣立储之事。别人一言不发，袁说：“国家多事之秋，宜立长君以主社。但事关重大，应候庆王回京，再行决议。”

光绪、慈禧死后，社会上关于袁世凯弑君之说喧嚣。有一京报说光绪死时留五百字的遗言要杀袁世凯。佐藤铁治郎说：“奈其后谣言纷起，君臣之间势难融洽。”

为此载沣开始解决袁世凯去留问题。

几天后，庆王府告之“将对袁不利”的消息，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时



清末北京火车站 全称为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位于前门大街东侧,始建于1903年,1906年正式启用。上图为北京火车站前的扎彩牌楼。

清末天津火车站 下图为老天津站被八国联军炸毁后,于1901年由英国工程师勘测设计,原址重建,设备更加完善的旅客车站,于1902年竣工。



大有草木皆兵之势”。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往内廷，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地对他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惊慌失措地回了家，然后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

袁到天津，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袁世凯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衙门，住署后花园。杨士骧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

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住德国饭店。

第二天早车，袁世凯复回北京，其眷属乘午车亦回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至。”

同一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钦此。”

后，杨士骧和自己家的所有人打招呼，切不可说袁住署内。哪知道他的仆人还是告诉了外人。

袁回家后，袁世凯幕僚张一麇已经逃避。袁家仆人见张逃，亦皆惶惶。后有问张何故逃避。张谓：袁宅内藏有快枪数百支，如果被缉出，其祸还了得？我等每月只得若干金，都是我们以心血与文字换来，无什么交情可言，怎么能与他共祸？问其知袁宅中藏此利器干什么用？张曰：我怎么知道他的心思！

三天后的清晨，风萧萧，京城寒，袁世凯即携眷属回籍。

送行者寥寥无几，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等数人送至车站而已。袁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

这一次真的把我们的袁大将军吓着了，一夜间将军老了。回到河南后，暂居河南汲县马市街。后来成为袁之亲信的王锡彤，第一次去拜访他，看到“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

自此摄政王完胜，袁世凯尽败。

袁世凯与摄政王载沣

为什么摄政王上台一个月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

说到回籍养痾这事，溥仪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在说这件事前，先必须说一个庆亲王奕劻和慈禧的故事。

宣统溥仪是载沣的长子。一次他在翻阅父亲载沣的日记里无意间看到了一段文字：

“十九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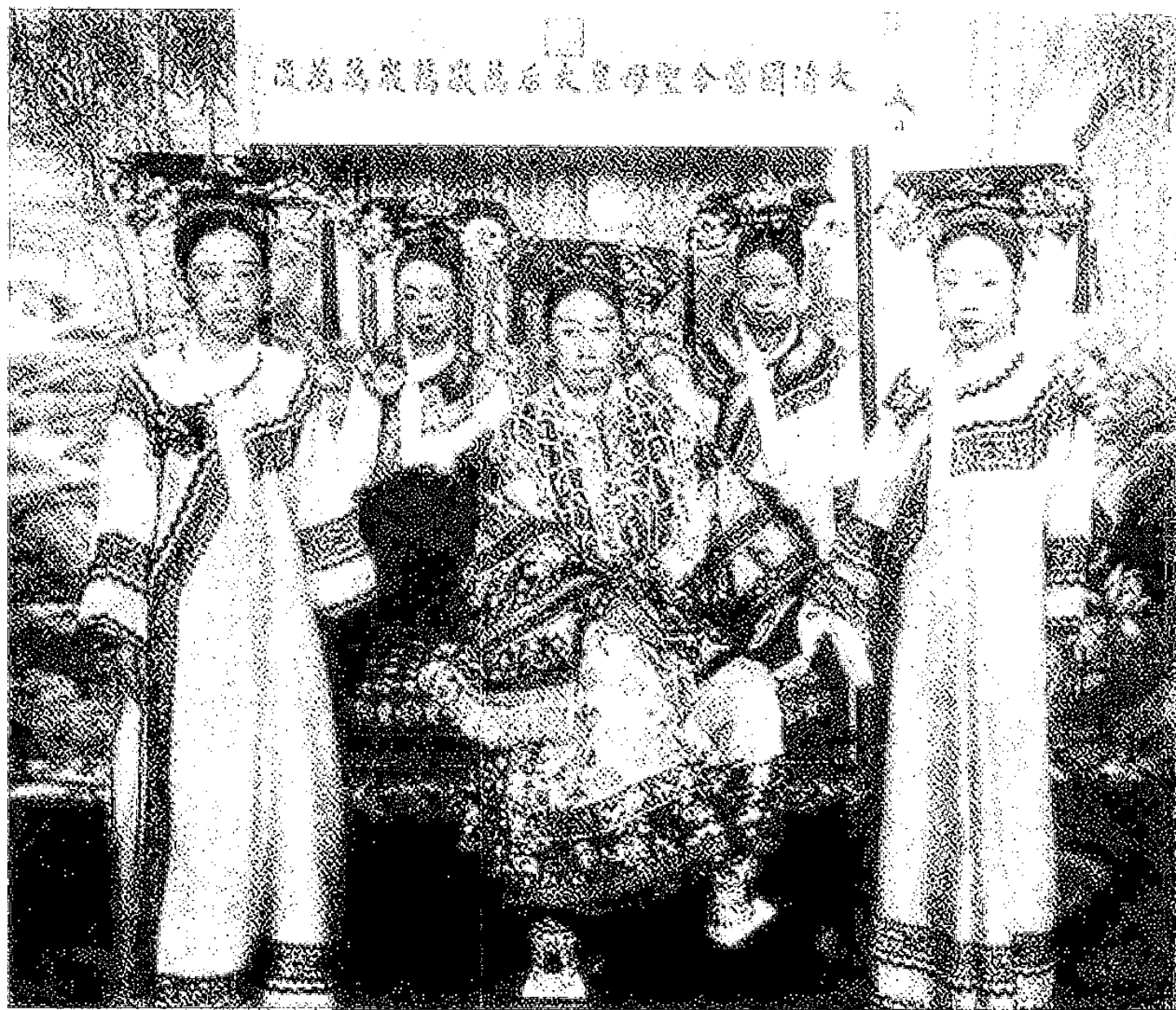
接着又看到了这句：

“二十日，……庆王到京。”

这段时间正是慈禧生命走到尽头的前夕。这里有什么不能言状的地方，欲言而止？

庆亲王奕劻是和李鸿章庚子年办外交出名的。他与 11 国代表经过艰辛的谈判，保住了慈禧的脑袋和位子，让慈禧感谢不尽。

左起：德龄、四格格（庆亲王奕劻的四女）、慈禧、元大奶奶（慈禧内姪媳）、容龄。



这以后庆亲王的四格格经常到老佛爷面前走动，这鬼丫头精着呢。溥仪说：“如果西太后无意中露出了她喜欢什么样的坎肩，或者嵌镶著什么饰品的鞋子，那么不出三天，那个正合心意的坎肩、鞋子之类的玩艺儿就会出现在西太后的面前。”

从此突勋一再加官晋爵，以一个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溥仪接着说：“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多。因此西太后从那以后非常看重他。”

庆亲王和袁世凯可以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据徐世昌透露：“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子，死了人，或是过个生日等等，全由直隶总督衙门代为开销。”

对于袁世凯，《我的前半生》写道：“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对袁世凯一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功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才数得上。另一方面，西太后对这个统率着北洋新军并且善于投机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向贪财如命的庆王那里大量地送银子时，就警惕起来了。”

可是慈禧也不是万能的，当她想开缺庆亲王时，消息辗转传到了外国记者的耳朵里，北京还没有别人知道，伦敦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据此去找外务部，讯问有无此事。西太后不但不敢承认，而且派铁良和鹿传霖追查。此事便见光死了。

溥仪说：“但对于袁世凯，她没有再犹豫。光绪三十三年，内调袁为外务部尚书，参加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袁世凯心里有数，不等招呼，即主动交出了北洋。”

当时在袁身边做谋士的唐在礼透露了袁府的感受：

前后几年的政争暗流，到1906年显出了波澜，清廷排斥汉官的情况就日趋严重了。

袁到此时，觉出情况照此发展下去，对他十分不利，然而要反抗又没有确保胜利的实力。他于是决定在彰德秋操之后，主动向清廷奏请交出第一、三、五、

六四镇，建议改归兵部大臣直辖。”

七十有二的老太后正在筹划着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她自己病倒了。

这时慈禧又忽然探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拥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

溥仪夹叙夹议说：“不管奕劻如何会办外交和会奉承，不管袁世凯过去对她立过多大的功，也不管他们这次动手的目标正是被她痛恨的光绪，这个以袁世凯为主角的阴谋，使慈禧马上意识到了一种可怕的厄运——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她个人的厄运。因此她断然地做出了一项决定。为了实现这个决定，她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深水，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恩荣。”

接着是光绪帝的死。

一天后慈禧死。

老天注定了这个未完成的故事必定要由烂好人的摄政王载沣来完成。

从载沣那只说半句的“庆王回京”里可以看出，他完全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

如果属实，袁世凯便做了件“自绝于人民”的坏事。

让我们重现案件现场调查举证的经过：

慈禧临死前，一定最不放心这件事儿，要继承者好好查查。

载沣查了，没有证据。再查，还是没有。

这时，大嘴巴康有为在国外大声疾呼：是袁世凯杀了我们英明的皇上。

那些吃月银的旗人，又奔走于冷落多时的茶楼，三人成虎地描述了袁世凯谋杀光绪的所有细节。

载沣想：不管这事儿有和无，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袁世凯眼下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也有实力做大逆不道之事的人。如今天下是我们父子的天下，我要为小儿扫雷。

据载沣的亲弟载涛回忆：

正好这时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向载沅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理，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的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再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箝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



载沅

没有政治斗争实际经验的 26 岁的摄政王，当机立断下了搬掉袁世凯这座大山的决心。

以上很多情节来自于比较权威的溥仪。和历史上其他一些说法一样，其实都没说到点子上。

想想，一个持续了四十七年的体系，轰然倒了。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大地震和大动荡。

康熙伟大不，当政六十多年，让后人等待时间太长，一朝机会来了，就是子女的尔虞我诈。

斯大林主政三十多年，死后也是一个“乱”字。

为什么？

政权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做些微调，矛盾才能在变革中化解。慈禧太后一人霸着局面，一当就是四十七年。慑于慈禧之威，皇族亲贵中纵有门户派系也不敢张扬。

四十七年！亲身经历一下才会知道有多漫长，多可怕！

多少欲望还未实现就“自然规律”地消失了；多少错误，被慢慢地化为仇恨；多少误会，被慢慢地酿成了下一场战争的导火线……

公子哥儿一辈子的溥仪，1960 年代通过学习，进步不小，他学着新社会的词儿说：“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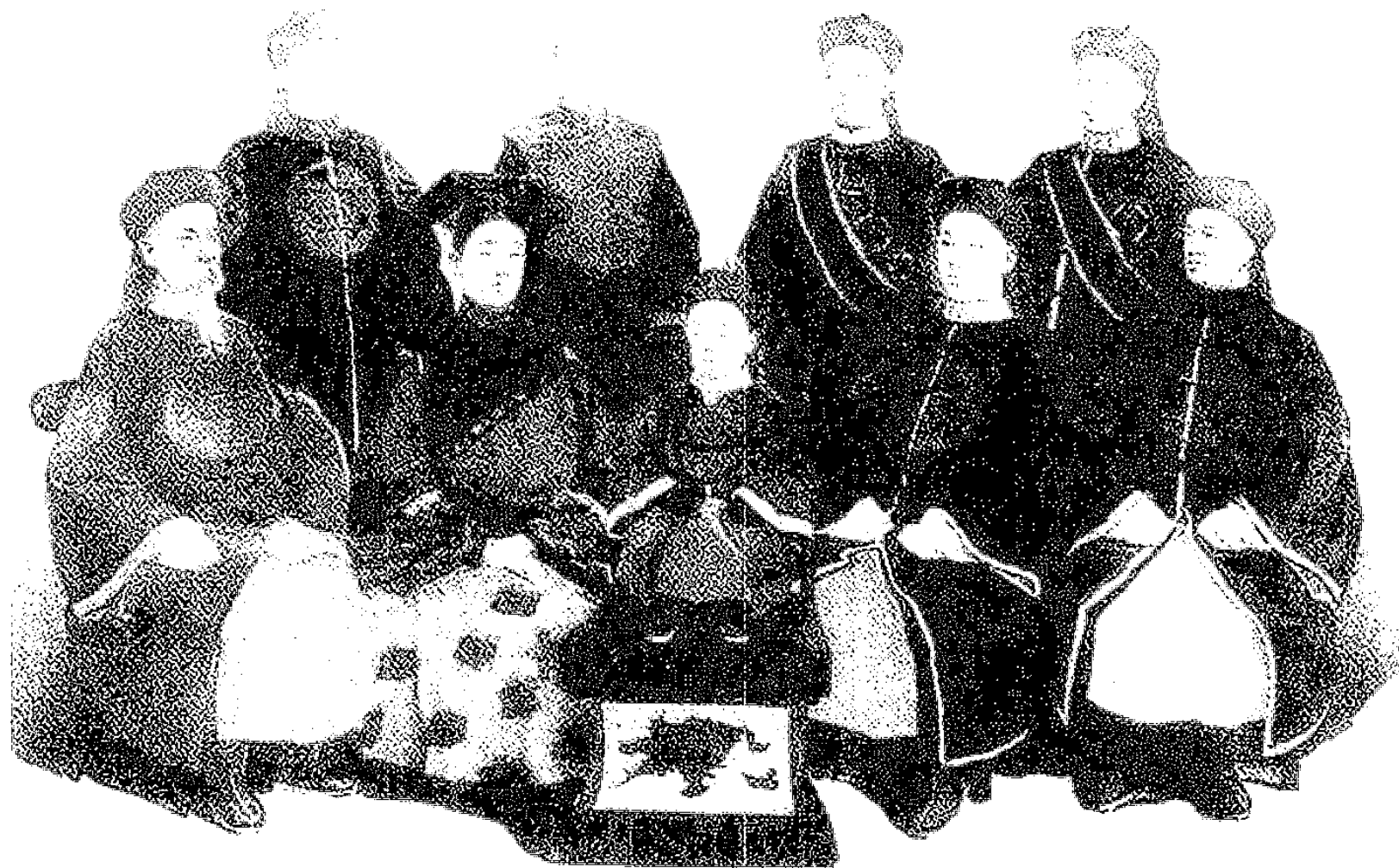
倒袁世凯，载沅没做错，问题恰恰出在后来。将袁世凯扳倒，他一下子进了自家三个兄弟。他拿捏不好，且吃相难看！

载沅监国摄政后，皇族亲贵内部的权力争斗日益激烈，逐渐达到了白热化

的程度：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咨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善耆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一党；溥伦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载泽是隆裕的姻亲，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胡思敬《国闻备乘》）

这帮少壮清贵，大概是干得顺手了，于是将手伸向了地方。从不扎眼的路权开始下手，没想到惹了大祸，乃至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少壮清贵们的败笔，才有了离休老干部袁世凯的东山再起。



顺承郡王殿下
庆亲王殿下

恭亲王殿下
皇太后陛下

宣统皇帝陛下

醇亲王殿下
摄政醇亲王殿下

傅伦贝勒殿下
肃亲王殿下

清朝末代皇室

纽约时报记者访问袁世凯

1908年6月14日

托马斯·F·米拉德

北京，4月20日讯：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



托马斯·F·米拉德画像

改革的事业：李鸿章遗留下的使命

1901年李鸿章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过短暂的谈话，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并且仍然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在生命弥留之际，他把一些年轻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凯），并把改革大清国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中。

人们发现，在大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我就听说过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煽动家等等，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称号，而每种称号后都会跟着一大堆详细的描述。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世凯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清日战争和“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汲取了教训。他认识到，大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

JAPAN HAS NO MORAL SUPERIORITY OVER US OR RIGHT TO DIRECT OUR FUTURE.—YUAN SHIH K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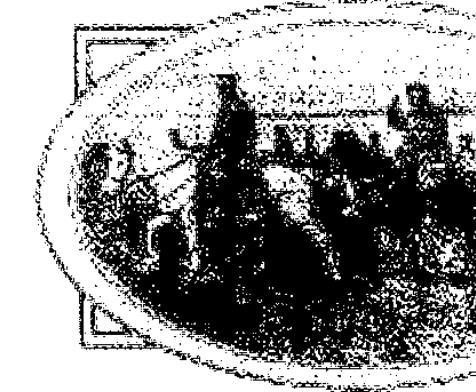
袁世凱贈 密拉君存

Li Hsiang-Chang's Successor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Tells of Kelowna That Ann Needed Before Genuine Autonomy Is Restored to China

By Hsiang-Chang Li

Li Hsiang-Chang, former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in a photograph.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tie.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Li Hsiang-Chang, former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in a photograph.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tie.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Li Hsiang-Chang, former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in a photograph.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tie.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Li Hsiang-Chang, former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in a photograph.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tie.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Li Hsiang-Chang, former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in a photograph.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tie.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Li Hsiang-Chang, former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in a photograph.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tie.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Li Hsiang-Chang, former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in a photograph.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tie.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Li Hsiang-Chang, former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in a photograph.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tie.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Li Hsiang-Chang, former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in a photograph.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tie.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袁世凱答美国记者问

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美国第27任总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

了极深刻的印象。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何处最需要初步的改革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情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袁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他说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对美国总统及美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当然，袁在某些话题上是有所保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在这种环境下无疑也是非常恰当的。毫无疑问，袁对自己目前在大清国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醒，他不但十分明了这些危险的源头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THE LONDON LITHOGRAPHIC PRESS, LTD., LONDON.

FOLLOWER OF A DYNASTY WHICH ENDURED FOR 267 YEARS

1914



COMING TO THE FRONT AGAIN, NOW IN POWER AGAIN, YUAN SHI KAI, PRESIDENT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Yuan Shih Kai, President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is shown in a portrait. He is a middle-aged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cap and a dark jacket with a white collar. The portrait is framed by a decorative border.

Yuan Shih Kai, President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is shown in a portrait. He is a middle-aged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cap and a dark jacket with a white collar. The portrait is framed by a decorative border.

《伦敦新闻画报》上的袁世凱画像

寻找消失的洹上村



袁世凯开缺回籍，隐居洹上，突然从巅峰跌入深渊，让世人惋惜不已。经过三年的潜伏，袁的声望达到了高潮。没有洹上村就没有袁大总统！如今，这个曾经的中国第一村已经消失，但是在这里我们让其复活了。走进洹上村，便走进了袁家的深处。

洹上村，中国第一村

中国曾经有这么一个私家院：它的面积比大观园还大，围墙高度和故宫有的一拼。为它，中国铁路特在此设一小站；当年，半个中国的权贵都要来此“朝拜”。

可是它仅仅在这个世上活了半个世纪，便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如今只留下一块冷冰冰的石条，静静地躲在两里外的墙角旮旯里。

“洹上村”这三字多么诱人啊！一个“洹”字就有近四千年的分量，洹水，那是产生《诗经·国风》的“在水一方”啊！

去岁，我装着满脑子的“意境”去了洹上村，却一下子凉了半截！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洹上换“新”天。仅仅90年，特别是伴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发展，这里已经成了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只见简易房套简易房，筒子楼接筒子楼。公路上弥漫着柴油味，野猫草狗在苗圃稀疏的大树间叫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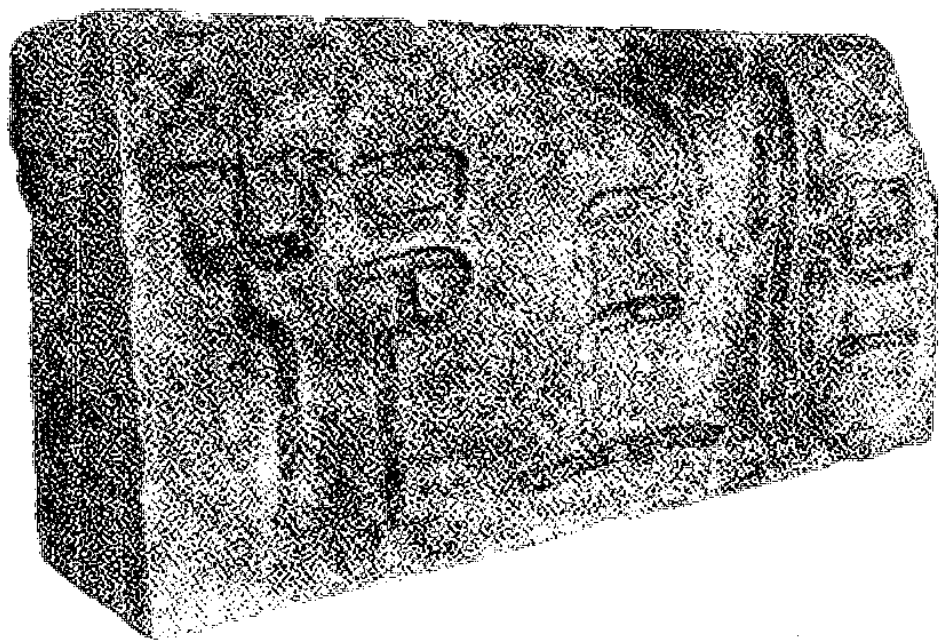
询问当地安阳人，无人能指认洹上村的确切位置。说到袁世凯，洹水边的老者有话要说：你说这老袁也算个“帝王级”的人物，这些年来，就没给咱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瞧人家和珅那个“恭王府”，听说每年能进这个数！（说着伸出五个弯曲的指头）

是啊，这怪谁呢？谁叫你这位河南老乡让一个福建籍的“我党理论家”陈伯达给加了顶《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桂冠？

至于和珅吗，人家如今已经成了喜剧演员，逗了十三亿人乐了五六年，而且好歹还留下个“恭王府花园”。

袁世凯呢？

洹上村呢？



洹上村石条（王鸣铎摄）

洹上村是怎样消失的

河南彰德府城北的洹上村是由袁世凯于1909年花银数十万两，历时2年陆陆续续建成的。可是只风光了三年，便走向了死亡！

经查，洹上村死亡倒计时是这样的：

1927年，冯玉祥出陕入豫，占领豫北。这位“基督将军”使出惯用手法，和他的老上级袁世凯做最后的切割。他将洹上村内之器具、书画、古玩等拿到开封府去兜售，名人书画扇面一元一个，并在洹上村旧宅上开办了“彰德高级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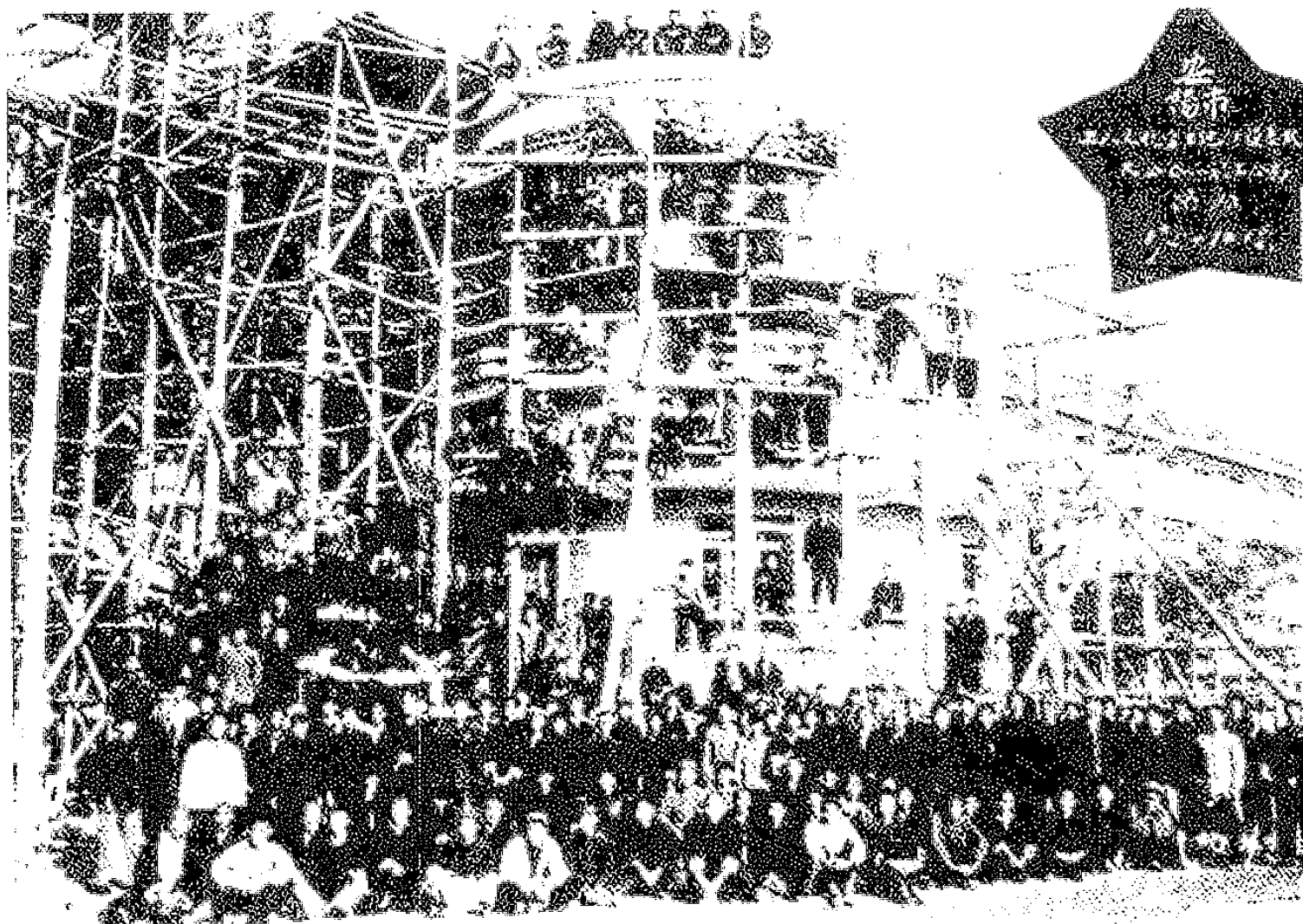
1938年，日本人在洹上村村北修建了一块军用机场，据说弹药库就设在村北的鸡舍鹿苑上。这回日本人总算报了朝鲜的一箭之仇！

1947年至1949年，解放军二野的山炮对盘踞在洹上村一带的国民党40军进行了猛烈的炮击。

安阳解放后，人们发现洹上村已是破败不堪，少数房屋毁于战火，九个四合院的门窗几乎全部被人拆走。

最后一击是1954年。那一年安阳工人文化宫神奇般地屹立起来。它的墙体内有洹上村“寨墙砖半数”。与此同时，洹上村“养寿园”内的珊瑚奇石全部用于安阳市区“三角湖公园”的社会主义建设。据说当时随便一个小小的“股级”干部就可以批个条子，来洹上村就地取材。至此，洹上村彻底消失了，留下的空地迅速地为“人多力量大”所产生的庞大人口解决了容身之地。

安阳市工人文化宫封顶留念 1954年，从洹上村拆来的免费“清”砖“清”瓦和木料盖了这个文化宫。据说盖好后，还有数万块洹上村的砖放在工地上任其自生自灭（反正也不要钱买）。2009年，我听说文化宫拆了，要翻新盖楼，专程从北京赶去，结果，连块像样的砖都没见着。晚了！



涇上村消失算什么？

其实涇上村的消失算个什么？偌大个中国，找不出中国人不敢拆的。圆明园大不，悠久不？当年英法联军一下子消化不了，是谁将这近 2000 亩的一个皇家园子，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拆成了今天这个“帝国主义侵略罪证”？

不信请看右边一组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长春园谐奇趣废墟的图片。

围绕着圆明园，150 年来出现了一个完美的食物链：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帝王、军阀和政客如摄政王载沣之流拆一些大水法、海晏堂、谐奇趣等大型西洋楼构件，运到自个儿家中“装点此关山”；燕赵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京郊大地上的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守园太监也趁火打劫，监守自盗；什么也抢不着的人发扬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尝试筛捞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接着连尊贵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 1952 年改名为北京大学）也加入了这顿免费的午餐，弄来一对华表充“悠悠北大”。

掐指算来，林林总总，前后共有七八拨人吃圆明园。圆明园死得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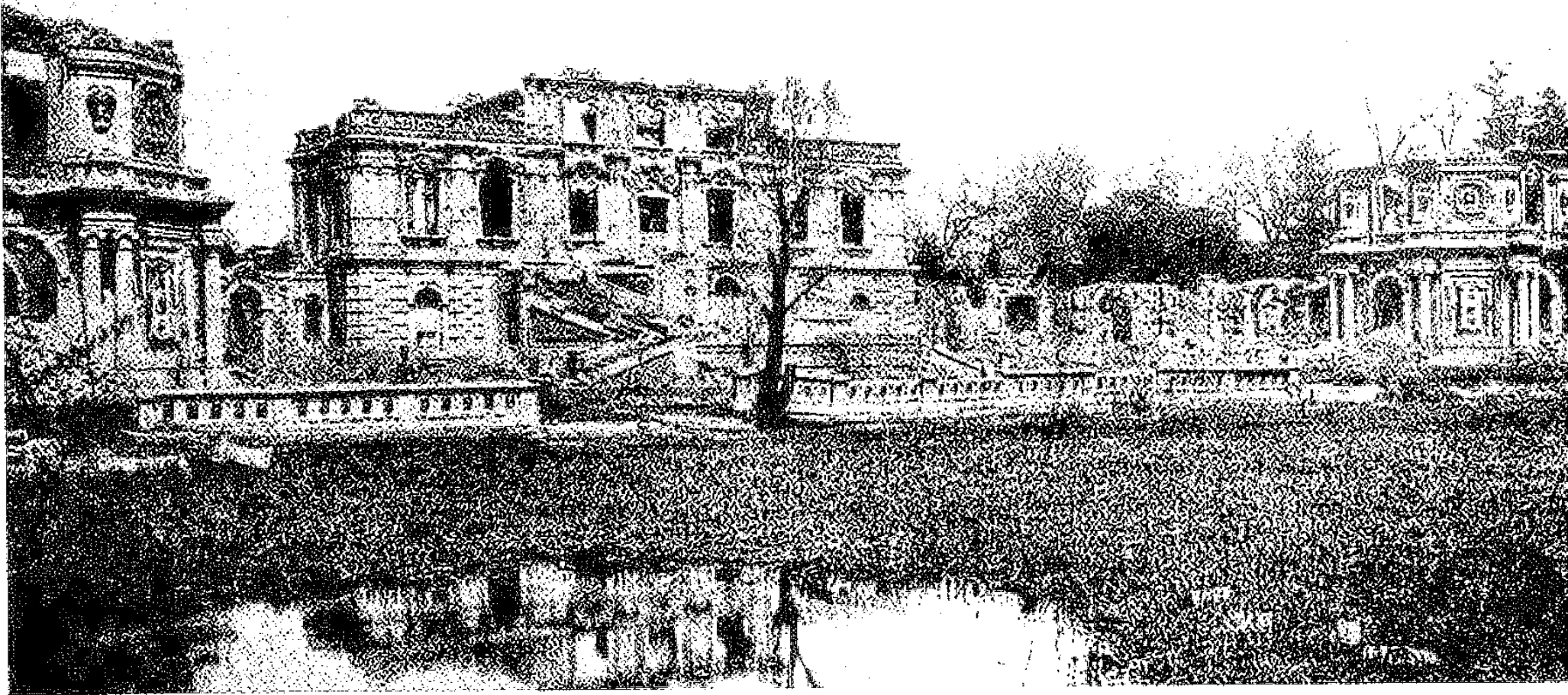
涇上村算什么？用“郭老”郭沫若同志的话说：年代太短，没什么考古价值。再加上干这事儿的人有种“打土豪，分田地”的快感，十个涇上村也拆了。

我们也别心疼，其实自打袁世凯进了北京中南海后，袁的一大家子都拿了“进京指标”。如同阿庆嫂所说：人一走茶就凉。何况这村子本来就此一家，旷野孤院的，夜来周围鬼火时隐时现，甚是阴森。所以那会儿就连留下收租的管家徐静人也吓得偷偷地搬到彰德府闹市中的裴家巷 21 号院“袁氏小宅”去住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转眼到了 21 世纪。如今旅游火了，人家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都辟为“名人故居”、“旅游胜地”。南昌一夜间用 400 号水泥再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哪一朝也沾不上边的上海在淀山湖造了个大观园。硬件有了软件更强，井冈山上出现十个“红军战士”拉一个游客的“动人景象”，湖南一夜间冒出千百家“毛家私房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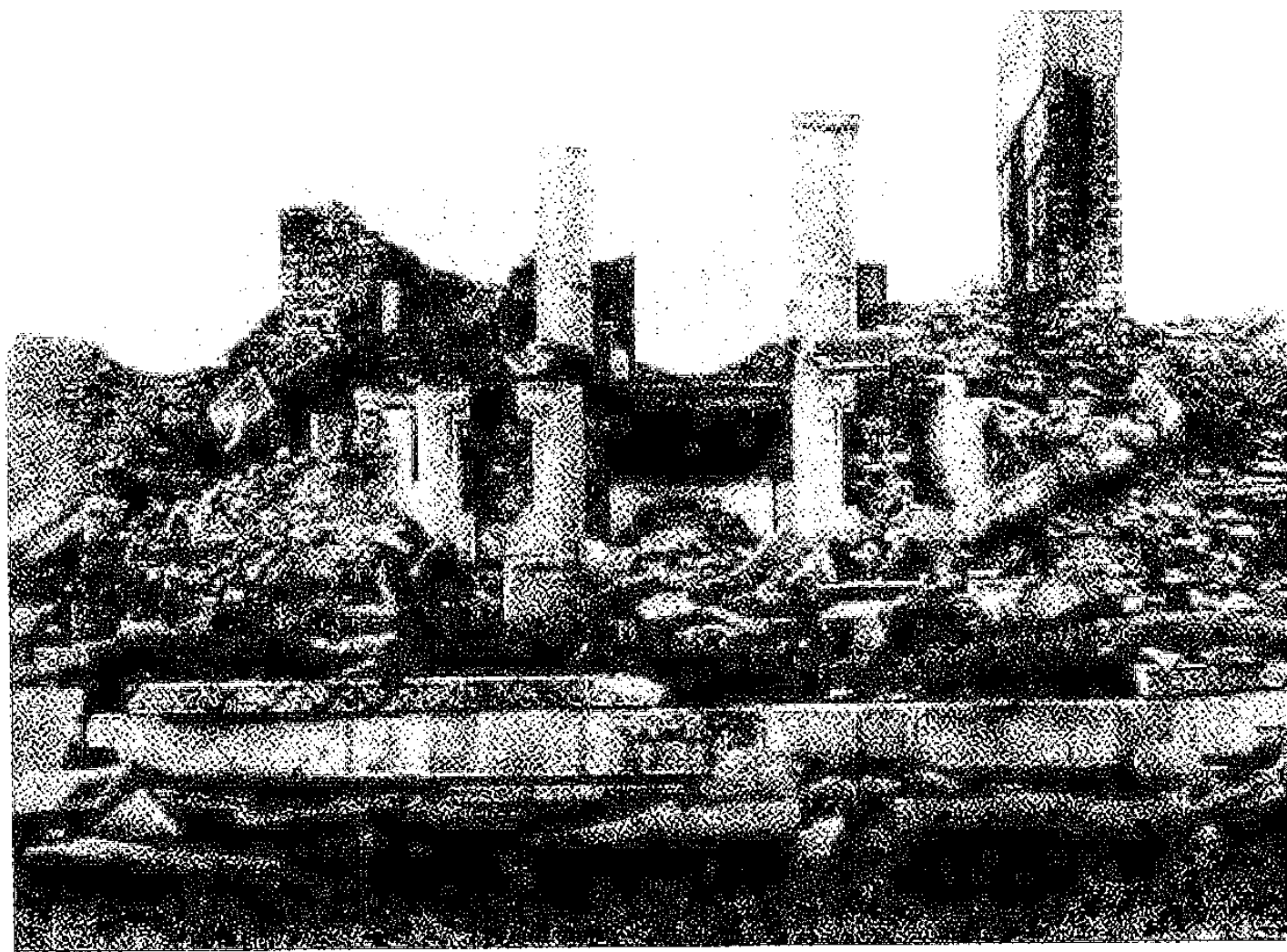
“激情燃烧岁月”的涇上村呢？

于是有人急了，不管袁世凯是何方的神仙，他都得为咱当地的 GDP 做贡献。这才有人呼吁：“再造”一个新涇上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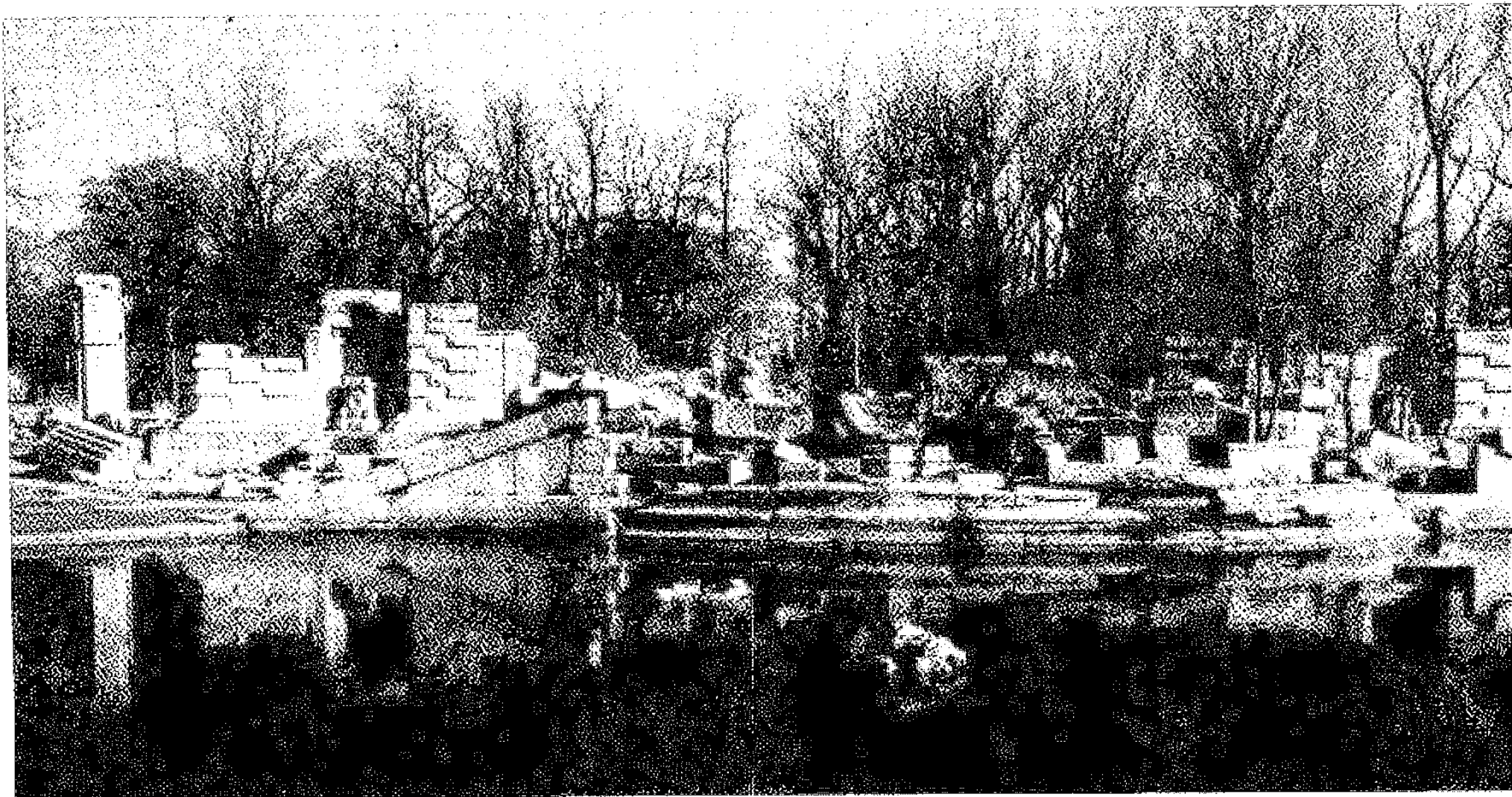


▲长春园谐奇趣远景（1875年拍摄）当年轮廓还在。

▶ 1923年由日本情报人员发表于《亚细亚大观》杂志上。墙基本没了，就剩下了一些柱子在风中矗立。



▼ 现在拍摄的长春园谐奇趣废墟 趴在地上真的成了完全的废墟，比3000年的罗马斗兽场还要废墟。



袁世凯为何对洹上村一见钟情

古风吹皱的一泓洹水，从巍巍太行山脉的某处松林间出发，一路奔腾到安阳（古彰德府）。入平原后，洹水放慢了脚步，轻轻地流过关关雎鸠的在河之洲，它委婉曲折地在 3000 年帝都（殷墟）的安阳北城外画出了一连串弯弯。

在一个叫郭家湾的地方，洹水向南 500 步，然后向东 500 步，接着又向北 500 步，最后缓缓东流，走回自己的老路，一路奔向卫河。

这一弯，弯出一个冠冕状的郭家湾来。这一顶弯弯的冠冕啊，被一位匆匆的过客，一位老军人无意间看到了，发现了……

古来何人戴冠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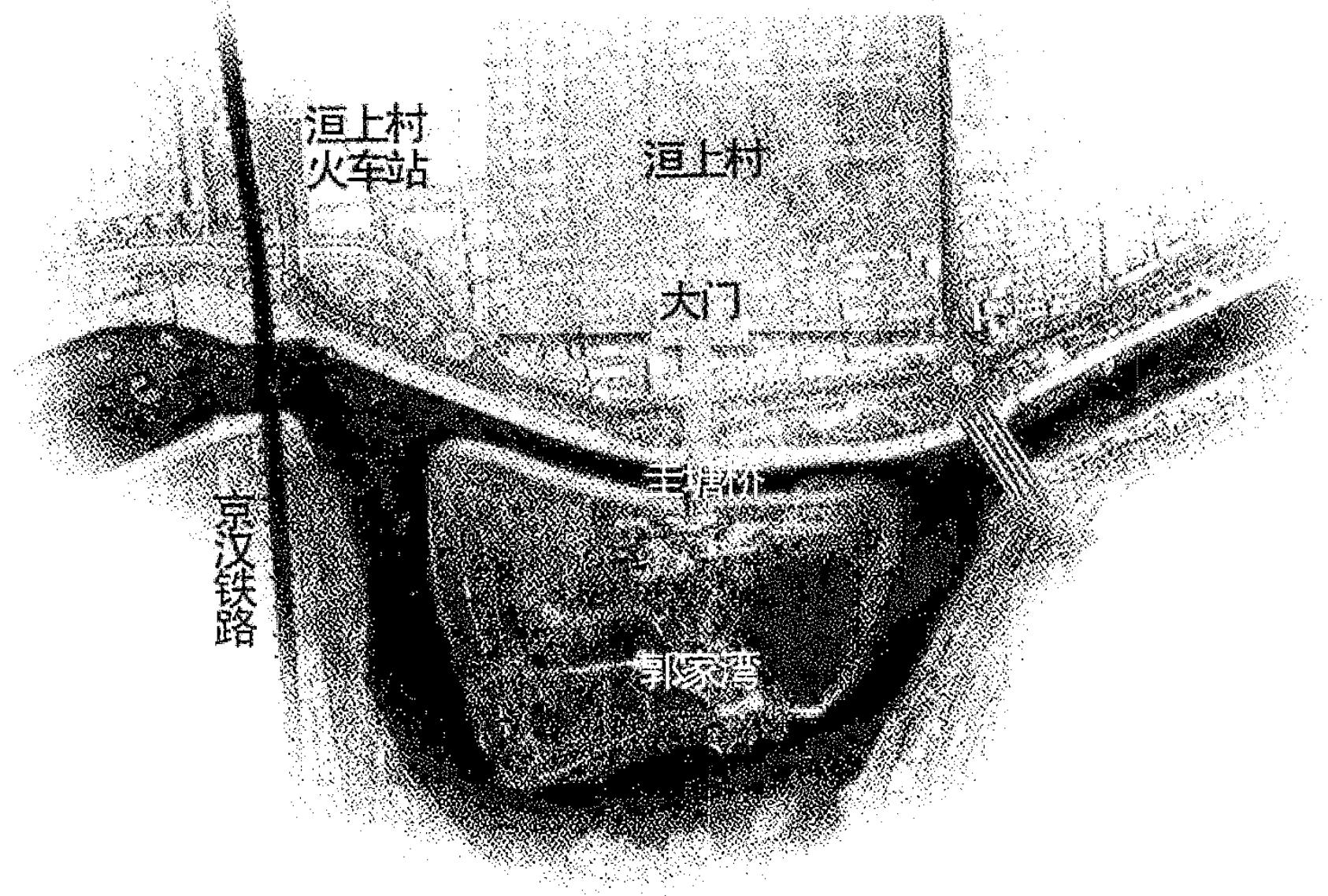
冥冥之中，军人袁世凯似乎有了某种心领神会，某种归属感。这一年是 1906 年！袁世凯正以大清帝国阅兵大臣之尊在“彰德府秋操”上大显身手。

袁世凯选择这个地方真是颇费脑筋。当我走在洹上村遗址时，用脚丈量周围大地，便发现了一个秘密。洹上村的选址几乎将袁世凯心中那些个上下古今读得烂熟的故事全都串在了一起：看！洹上村坐落在享誉华夏的洹水之北，与洹水最近处只有百步之遥。向西看，洹上村离远古都城——殷墟也只有千步之遥。朝东走，离两宫与光

绝版
袁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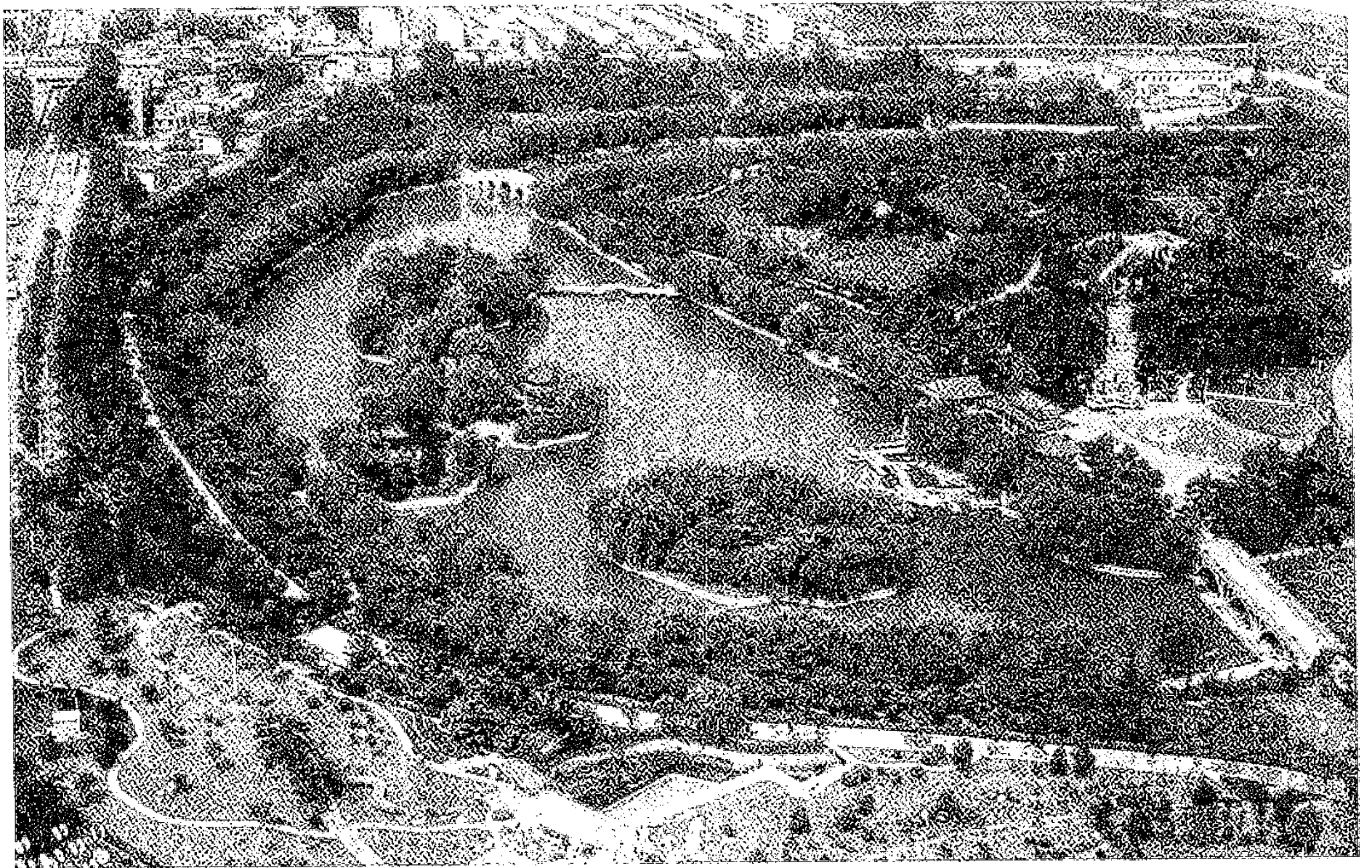


洹水岸边的殷墟 此照拍摄于民国初年，想当年袁世凯来到郭家湾的洹水边，看到的应该就是这样景色。因为这里距离洹上村只有二里地不到。洹水九道弯，弯弯都是景。看到这样的景色，袁世凯能不心旷神怡，一见钟情吗？



洹水边郭家湾和洹上村方位想象图 这是根据现在的卫星地图绘制的洹上村方位俯瞰图。瞧，洹水这一弯不就是一个倒置的官帽吗？

郭家湾原址现在成了洹园 1993年对外开放的洹园是将冠冕状的洹河拉直后产生的一个大公园，总占地面积450余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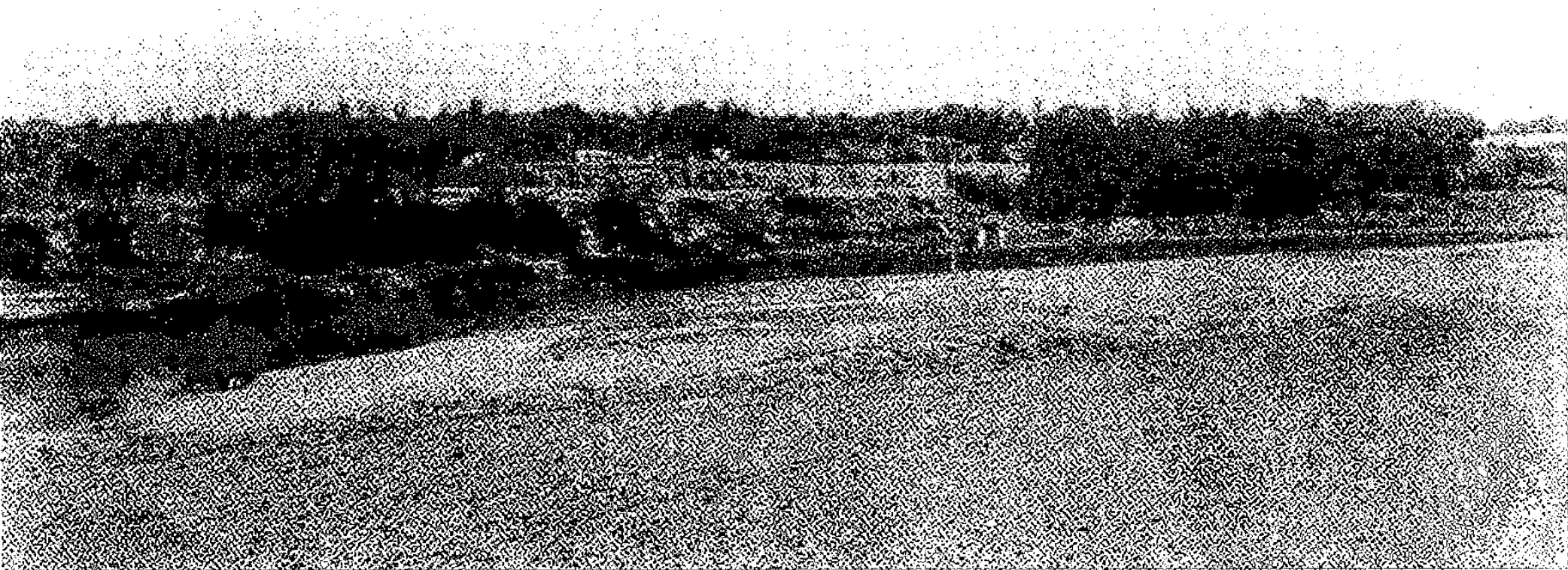
绪帝庚子年间“北狩”回銮之道只有300步远。就在这次护驾中，袁世凯亲率武卫军一部鞍前马后，日夜奔波，给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就了接下来八年的飞黄腾达。

“彰德秋操”后的第三年，袁世凯又回来了，跛着脚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到了彰德府。这一次他不走了，他要生生死死在这片土地上了。

从此，周围的老乡看到了一位身材肥硕，脖子短短，两眼炯炯有神的“一品大员”坐着四人大轿在工地上溜达（“当时我亲自听当地老百姓讲，修建袁宅时很多人见过袁世凯坐着四人肩扛的太师椅在建筑工地视察。”王碧岑：《我记忆中的安阳洹上村》）。长子袁克定负责设计监工，二子袁克文负责亭台楼阁的诗文字画，管家袁乃宽负责建造营运。全家人干得不亦乐乎。五个月后，一个大致正方形，集花园、住宅群、兵营以及小型农场、人工湖为一体的综合性园林院落，便初具规模。

袁世凯大笔一挥，命名为“洹上村”。

洹上村就只袁家一户，别无他人。周围十里八乡的泥腿子叫不顺洹上村这个文绉绉的名字。大嗓门一拉，一口一个“袁宅”、“袁寨”。



从郭家湾看洹水北岸的洹上村（民国初年摄）于一片绿树中，悠然见洹上。此时你竖起耳朵，似乎都能听到村中的鸡鸣狗叫声。难怪平素赋诗填词显得笨手笨脚的袁世凯，在这里竟写出了那么多好诗。原来老袁醉了！

再现洹上村

袁世凯的洹上村到底啥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领略呢。此刻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难忘的1909年3月，让我们跟随袁世凯一行从河南卫辉（原为汲县）的暂住处走进彰德府的洹上村瞧个仔细。

1909年3月，一列装得满满的京汉铁路局专车从河南卫辉开出，经过一个小时的北行，专车缓缓地停在了古城彰德府（今安阳）北郊，洹河铁路桥之北的一个洹

上村专属小站上。袁世凯带着住在卫辉的部分家人浩浩荡荡地下了车，住进了离小站500步远的洹上村。接着，被打散了近半年的其他家人又从天津梁宝生（一个很有钱的商人）的家里和北京锡拉

卫辉袁宅 袁世凯在未罢政前因葬母与项城同族发生龃龉，不愿再回乡，加之卫辉民情淳朴，文气浓厚，交通方便，遂在卫辉购置此院，始称袁宅。袁于1908年10月21日星月兼程来到卫辉（即汲县）。

袁世凯寓居卫辉时，潜心研究经史，与县里名士李敏修、王锡彤等相从甚密，共同讨论古今兴衰之策。袁世凯在卫辉所结识汲县籍人士，大部分效力袁世凯并矢志不移。1909年秋，彰德洹上村袁府筑就，袁世凯携眷移去。不过，袁依然不断往来于卫辉和彰德居住。袁世凯出山回京后，在汲县又招收了一批录书、马弁、童仆、轿夫、警卫、伙夫、奶妈及建筑人员带进京都。



胡同等处陆陆续续地搬到这里。从1909年3月断断续续搬到这一年的5月，前后搬了2个月！

春夏之际的圭塘桥边，洹河春水涨满了两岸。从洹水上的圭塘桥一路延伸到洹上村大门前是一条由成排大树组成的百步林荫大道。

走在这条道上，闻着泥土散发出的香味，听着婆娑暗动、沙沙作响的树叶声，袁世凯有了些许归隐之乐。抬头眺望，远处洹上村的高大围墙屹然耸立，仔细再看，高高的墙头竟遮蔽不住墙内高耸入云的参天杨树，让人有一种海市蜃楼的错觉。这时我们的总督大人一定窃喜自己的高明：于造园之前先差人带着银子去各地买树求花，让院子中所有的植物都早早地接上地气。这就是袁家的家庭教师杨景震所说的：“迁入时已树阴蔽天，不可极望。”

接上了地气也就接上了命门。袁世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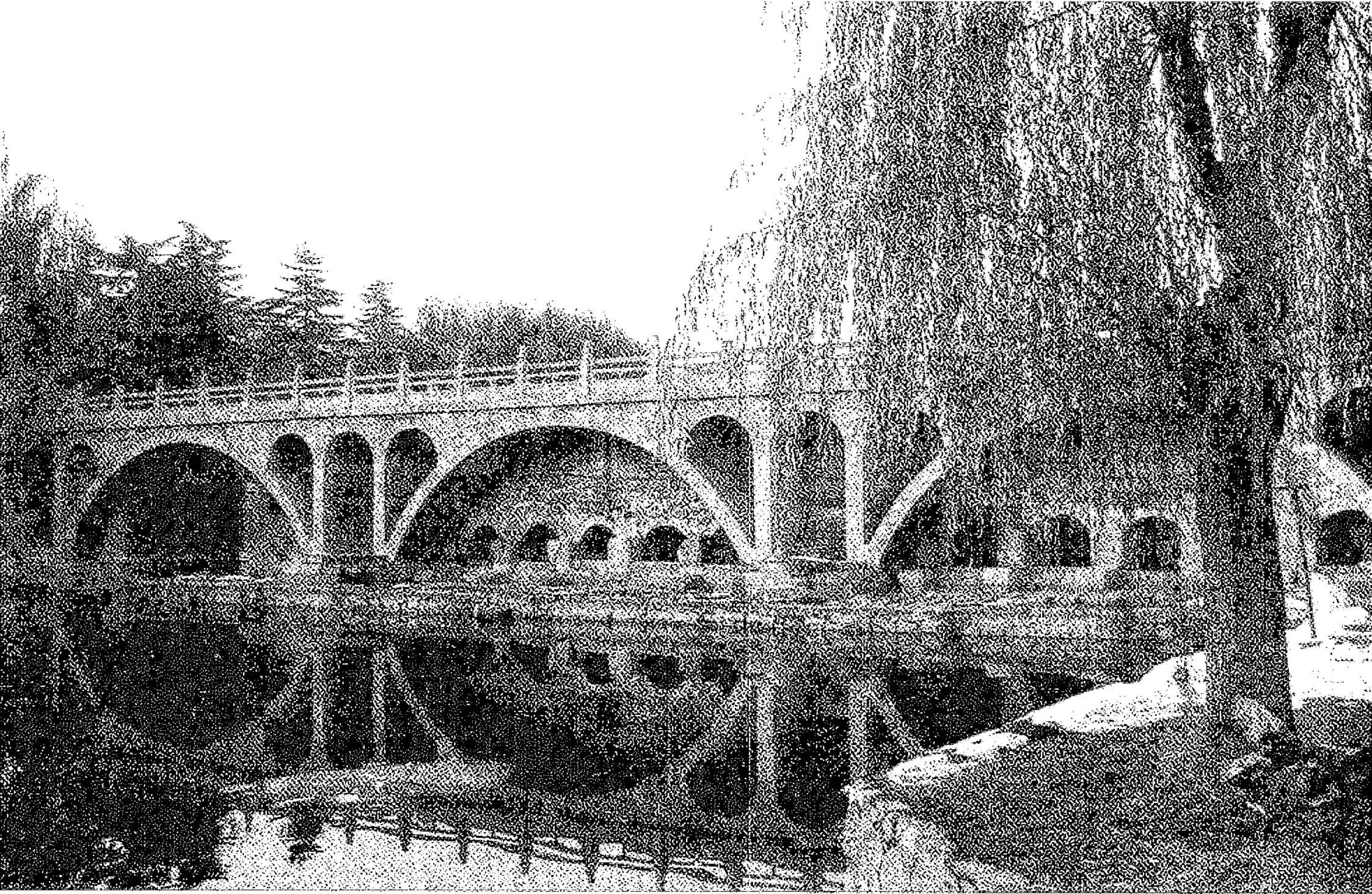
突然轿头高唱：到啦，大门到啦！

五十出头、被强迫“离休”的“老夫”袁世凯从轿子里走出，举头环顾，只见正南的围墙中间开了一个拱券式大门。门上方镶有一块横条石，上刻“洹上村”三个大字，这是老袁自己新学的小篆体手书，写时自觉功力欠缺，当时吩咐石匠不要刻名。

走进大门，袁世凯命家人：“关门！”下人一拥而上。可是两扇千斤重的山木大红门在六个大汉吆喝声中就是纹丝不动。管家袁乃宽轻轻地说了句：这里的门真像一个城堡的门。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闻此言，袁世凯捋了捋日耳曼军人式的牛角须，朗声一笑。这笑声是多么的珍贵啊！官保大人已经五个月没这么笑过啦。

► 洹上村前的大道（民国初年摄）可能离洹上村最盛时期不甚远。大道边遍栽杨树，尽头就是洹上村大门。这是目前唯一一张洹上村门前照，可惜还是看不清大门啥样。当地的张有明老人说，“面南的围墙中间开了一个拱券式大门，门口上方镶有一块横条石，上刻‘洹上村’三个大字，此为袁世凯手书。两扇红漆大门上，各有81个铜制泡钉，一对饕餮门环。门洞深邃，宏伟壮观”。



圭塘桥 春夏之际的圭塘桥边，洹河春水涨满了两岸。从洹水上的圭塘桥一路延伸到洹上村大门前是一条由成排大树组成的百步林荫大道。（孙清海摄）



“城堡”来自于一个一世的恶梦

袁世凯的三女儿袁叔楨（后改名为袁静雪）回忆刚进村时看到的一切：“首先在住宅外面修了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还修筑了几个炮楼。当时的地方当局，还派两营马队（叫做马一营、马二营）驻在那里护卫着，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寨子似的。”

是的，袁世凯应该笑。因为这就是他向往的“小城堡”，一个防御性极强的“寨子”。

看到这个被沉重的大门和高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的“小城堡”，管家袁乃宽和袁世凯彼时肯定心有灵犀：这就是老家项城“袁寨”的彰德府版啊！

项城“袁寨”，那可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真正的城堡！

安全，安全，再安全。稳妥，稳妥，再稳妥！这是袁世凯一生的座右铭。其世交徐世昌说：“项城为人，表面大开大阖，其实际先求千稳百当，方肯做去。”（见张国淦《洪宪遗闻》）

是啊，一个从淮河流域闹“捻子”的地方走出来的人，从小闻到的就是“袁寨”城墙下的血腥味。想当年，“捻子”来去一阵风，马队走过扬起遮天的尘灰。5岁的袁世凯发现，每月总有那么几回，子夜一过，于烨烨油灯下，担惊受怕地听着寨外成百上千的捻子骑着马呼啸而过。抖索了一晚上，第二天便会传来多少多少里地外的某寨某“围子”，由于寨墙不坚，全寨老小多少多少口被“捻贼”杀得一个不留。这时候，西北方向飘来一股带咸味的血气，老母牛氏一定会战战兢兢地念叨：感谢你爹你叔，咱们的寨子没事儿，否则……

否则怎样？

袁世凯呼啦啦地吃着羊肉豆面条，没敢往下想。

自此，“血腥味”，“寨子”，“城墙”，“闹捻子”，这些关键词便融入了5岁“袁老四”（袁世凯排行老四）的血液里，终生不去！

这是一个被吓大的总督大人。童年的血色火光伴随了他一辈子，别指望他在做山东巡抚时善待义和团。他恨他们，他没这个阶级觉悟！用我们教科书里的话，袁世凯三代人的手上都沾满了农民起义者的鲜血。

瞧！如今在远离“捻子”安徽淮北雒河集（今安徽涡阳）大本营千里之外的河南彰德府，他还坚持克隆了这么个曾经让他免于血光之灾的“小城堡”。



袁世凯出生地（王鸣铎摄）据说袁世凯就出生在这间楼房的底层。袁克敏回忆说：“西边前院的北屋比较古老，据老人讲，袁世凯就出生在这座腰屋东间。”

“小城堡”有多坚固？1930年代在这里读书教书的郑州大学老教授王碧岑老人当了回有心人，他观察的数据是：洹上村坐北朝南，基地呈方形，面积据说是300亩。四周筑有上薄下厚的砖砌围墙。墙高约7米，墙基厚约1.5米，很像城墙，但无城堞。墙内四角贴墙建有上下两层的碉楼。

“小城堡”里有多少间房子？1915年后在天津为袁家常年看病的医生徐正伦说：

“河南彰德洹上村有地300顷和大宅院1处，包括花园共200间。”

“小城堡”有多大？1950年代后常年工作在洹上村附近的张有明老人的数字很具体：“此宅，东西长约320米，南北宽约260米，四周有7米高、0.77米宽的砖砌寨墙，四角均有两层楼高的炮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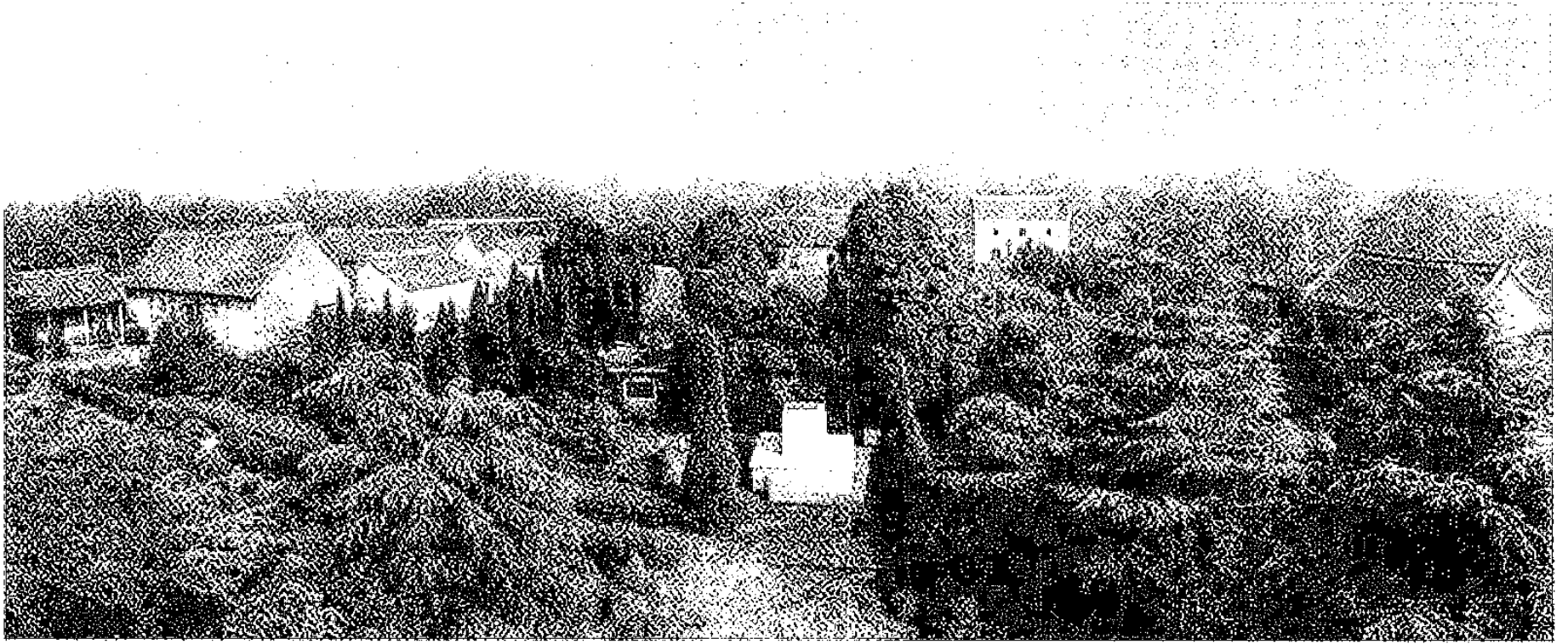
另有一说来自袁世凯的轿夫班头冯培德：“安阳的袁公馆是一排三个宅院，袁住中间宅院，太太们住在他的周围，院后是花园，种有各种奇花异草，供袁观赏。”

走进“寨子”，你会发现，这“小城堡”何止一个离地三丈高的外墙。为了万无一失，洹上村被打成了双保险。

走在院内的林荫大道上，你会发现院内百步远处的路西，有另外一个第二层围墙。和项城“袁寨”一样，袁世凯也在洹上村的大围墙中套建了一圈小围墙。小围墙内才是百十号家人女眷的生活起居核心区域——住宅院。

有两层围墙的护卫，有城墙外的碉楼瞭望，再伴随夜来更夫清脆的打更报平安声，“回籍养病”的袁世凯这才有了点儿安全感。

请记住，终其一生，他袁世凯的所作所为都可以从这个“缺乏安全感”里找到逻辑！笔者将于其他各章慢慢道来。



绝版
袁世凱

項城袁寨复原鳥瞰圖

项城袁寨遗址（左页照片由项城博物馆提供）袁寨先后建房 248 间，袁氏家族后人袁克敏回忆说：童年的记忆，袁寨是座呈正方形的青砖小寨，外观上看，可称小巧玲珑。寨四边长约 300 米左右，寨外有两道护寨河环绕，我们叫它“里外海河”。海河宽约 10 多米，河水长年清澈满漕，河内种有莲藕、蒲草、芦苇等水生植物，水中鱼虾可见，经常有人垂钓或捕捞。寨内有条通往东西寨门的道路，路北即是袁寨的三座大院，分东、中、西三个砖木结构的门楼。记忆中袁寨袁府已经衰落、萧索，仅是一个空架子在支撑着。但船破还有三千钉啊。



“中国唯一的防御性寨堡”——项城袁寨复原鸟瞰图（底图由项城博物馆提供，经作者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用电脑技术描摹而成）为避捻军袭击，项城袁寨被修筑成一个坚实的寨堡。寨堡一丈高，由厚二尺余的寨墙拱卫，寨东、西各有寨门，寨的四角各有一座炮楼，炮楼均有两层。寨墙上每隔丈余有一垛口，用于观察外边的情况或安装武器，平时每座炮楼及东西寨门均有卫兵值班，30 多名卫兵轮流站岗放哨，日夜不断。夜晚，寨墙外侧每间隔两丈远有一盏油灯，由专人负责傍晚点上，黎明收起。每当兵荒马乱之时，方圆十里八村的百姓都“跑反”来到袁寨，以求安宁。

住宅院玄机重重

住宅院的主门通常叫“二门”。“二门悬匾额一方书‘袁官保第’四字。”(杨景震语)

这个住宅院是一个全封闭式的群体建筑，有“三行九宫院”(见袁克文《洹上私乘》)。“二门内修9个院，袁居中院，其余各院为各姨太太和儿女居住。”(杨景震语)

院内由主院、内院和裙房院组成。四面房屋不分高低大小，都是五开间。各间都是黑色落地门扇。如果哪位梁上君子或者漏网刺客闯入这里，不被气氛森严的黑色吓倒，也会自己在“迷宫”里转得晕头转向。如果此君技高一筹，等待他的还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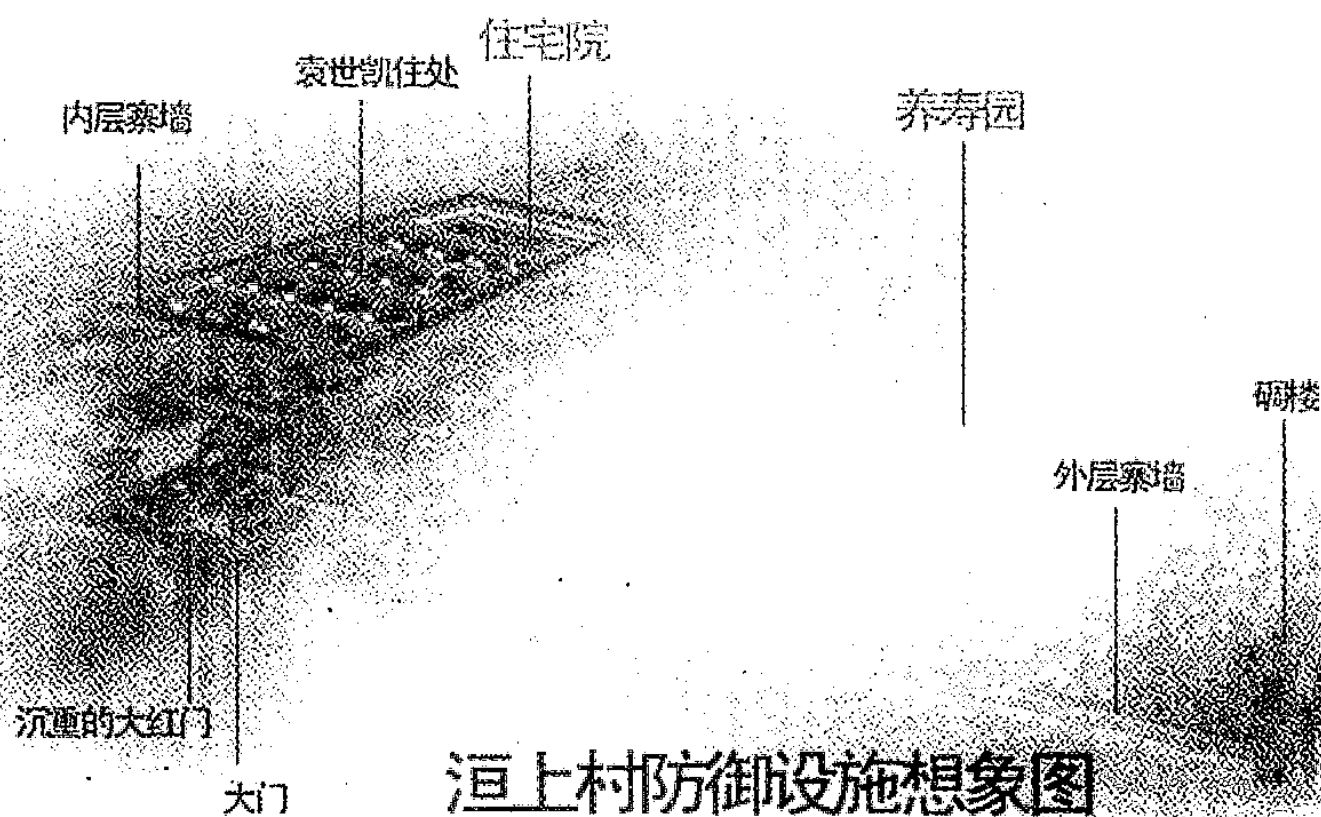
内院由一系列的四合院组成。与天下的四合院不同，院中纵横排列的所有房屋，后墙都开了个门。前后墙门一关，盗贼进得来出不去，被拦在一个个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等待他的一定是束手就擒。

一当警报解除，各院的女眷打开前后墙门又能彼此互通了。

围绕着核心住宅院的是四周一圈的裙房，“系听差等住室；尚有中药房、聘中医数人；二门内东院是家校，西房是西药房，亦聘西医数人在此。”(杨景震语)

平时叫得应，战时作缓冲。袁世凯高！实在是高！袁世凯将一辈子的那些军事上的攻防谋略全用到这里了，这也算是学有所用吧。

绝版袁世凯



洹上村防御设施想象图

外中内西，老袁也时尚

四合院内的廊柱被刷成明快的朱色，这是袁世凯最崇尚的颜色。六年后的“洪宪”登基典礼，他选择的就是这朱红。

走进室内，你会看到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色：但见室内的色调明快如天，天花板是乳白色的，一条电线拖将下来，挂着一个现代化的灯泡；地上铺满了当时日本正时兴的木质地板。《纽约时报》转述去过涇上村住宅院的布洛克博士话说：“这间房外形设计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而房内陈设却又具有欧式风味。整个房子灯火通明。”

推开门窗，外面整个一个小世界！走进天井里，你会发现四角有下水道和约二米高的自来水龙头。杨景震说：“初移迁时，各室晚上均用煤油灯，不久在南院建一电灯房，自行摩电，从此全宅电灯辉煌。又在花园内建一高约两丈压水亭输水各处，从此各院均用自来水。园中修有水井数眼以供灌池及浇花。每日晚间袁偕全家逛花园吃晚餐，每次必请正太太到场。”

电灯、木地板、落地窗、自来水和花园里的野餐，在在显示了主人的“新派”。这里的一切都符合袁世凯的美学，体现袁世凯的风格：凡事都要在悠悠中华的根基上加以实用又时尚的洋点缀。后人说袁世凯像个活泥鳅，“耍反革命的两手”。其实，他倒一直是这么个人：新旧都玩，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也不是“假洋鬼子”。用不用就看“中不中”。这是后话。

谁说袁世凯不会写诗

人说洹上村有诗经古风的韵味，皇家楼宇的气派，苏杭园林的细腻，稻香村的情趣，北国花园的宏阔。这话不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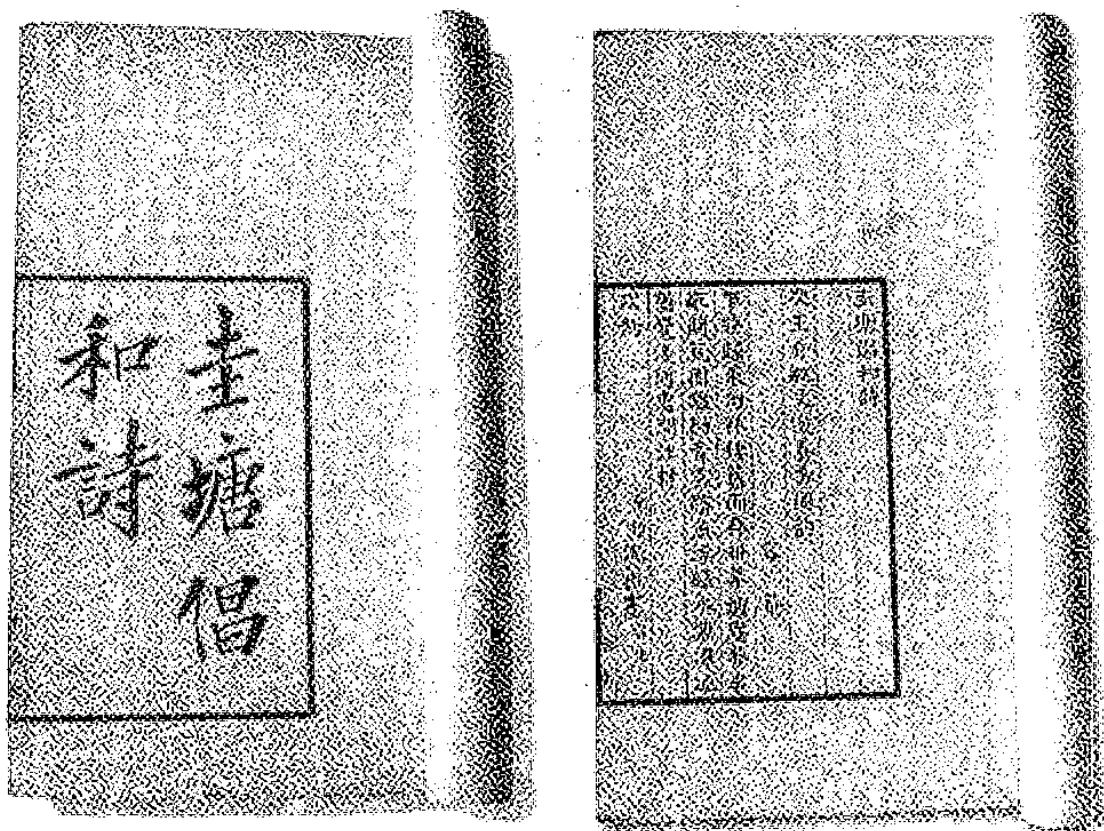
闲来无事，这位曾经权倾一时、半个大清国拴在裤腰袋上的“汉臣”拄着拐杖，在洹上村里这里转转，那里走走。

闷得慌，袁世凯上得碉楼，登临送目。只见太行山若隐若现，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俯瞰墙内，大院中乌黑的瓦片错落有致地排列眼底，白色的山石在一片绿色中偶露峥嵘。这一切的一切给晦气了百多天的袁世凯好一个心旷神怡。这一刻他有了一种累了歇会儿的感觉，有了“不如回家种红薯”的感慨，有了做一回闲云野鹤的意境。

老军头袁世凯戎马一生，和兵马粮草打了半辈子交道，从来没有展示过自己李白的一面。这一刻，他文心大动，不禁聊发少年狂。当年他在项城老家，曾经当过“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诗社的社长。

袁世凯的诗就是袁世凯的诗，没有半点明清文人的吊书袋和脂粉气，倒有三分

绝版
袁世凯



《圭塘倡和诗》中袁世凯以号“容庵”署名，一句“漳洹尤觉浅，何处问江村。”似曾相识，又质朴大气。

負郭關園尚饒佳趣命名曰
養壽策杖弄舟遊觀自得寧
靜曠遠有足樂者辛亥改政
迫於安危暫棄林泉勉膺大
任四年於是日不計暇追懷
洹水時復惘然因檢篋有攝
景十六幀重治一冊偶加披
覽儻國基底定付託碑人或
可躬歷以償優遊之願爾
洹上漁翁跋

袁世凯以“洹上渔翁”之名写的跋。跋中说自己非常怀念这段独钓寒江雪的日子，有朝一日还会重回洹上村。

汉唐遗风。请看这首《落花》：

落花窗外舞，
疑是雪飞时。
刚欲呼童扫，
风来去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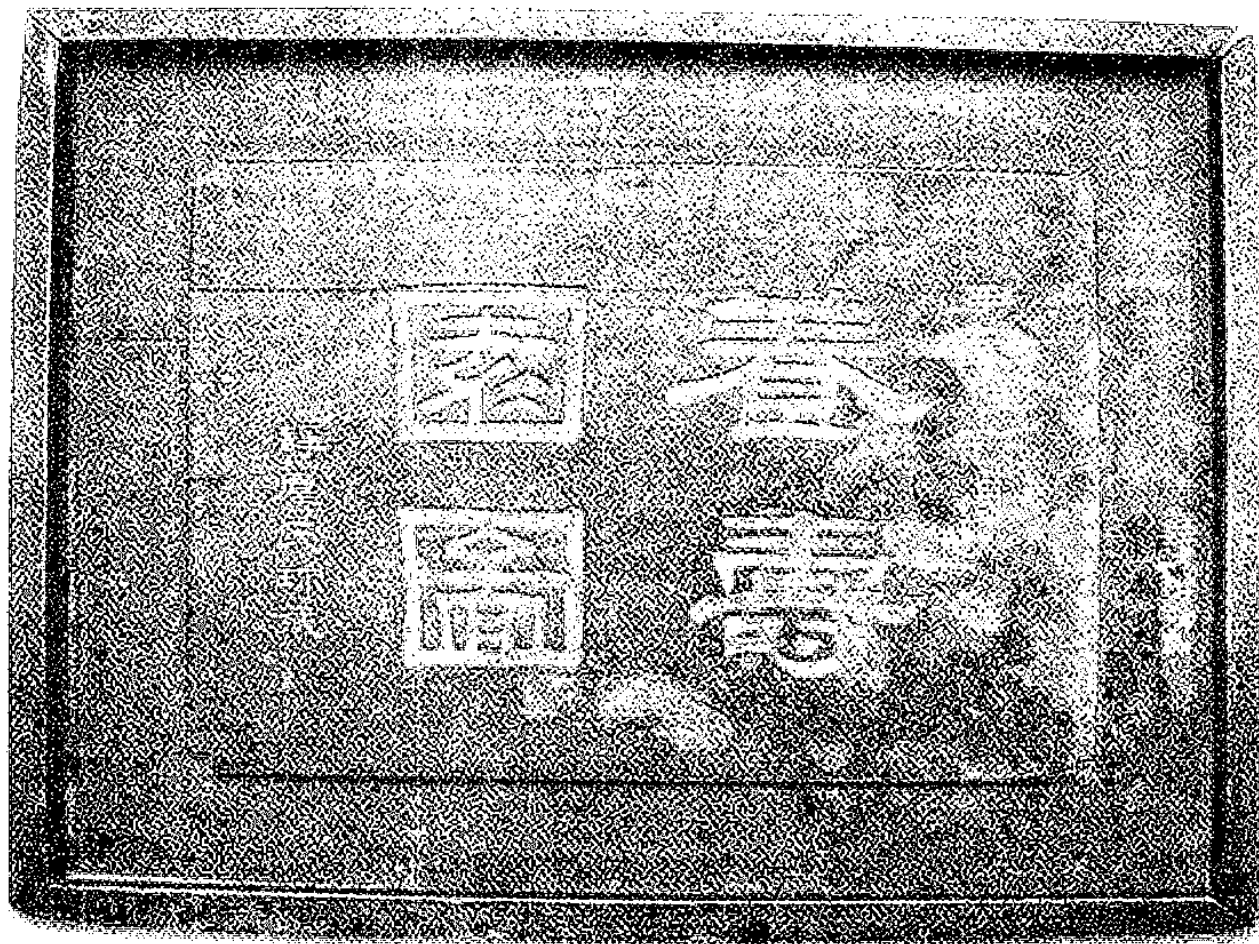
最后一句“风来去不知”，真是空灵过王维，拙朴过曹操。

一年，两年，三年，没几年，袁世凯这类“圭塘”佳句被二子袁克文收了一厚本，后来刻成《圭塘倡和诗》，到处送人。

袁世凯其实十分怀念这段日子，后来贵为大总统，还以笔名“洹上渔翁”编了本《洹上村养寿园图》。

后人还真得感谢这本《洹上村养寿园图》，因了它，我们才能看到 16 张洹上村养寿园的珍贵照片。本书养寿园的景点照片均出于此。

《洹上村养寿园图》



“养寿园”有点中南海

袁世凯晚上睡在洹上村住宅院，白天大部分活动却多在林荫大道东面的“养寿园”中度过。走进林荫大道东门，抬头就见“上悬扁额一方，书‘养寿园’”。此时你已进入洹上村最精彩的一幕！

养寿园，这里俨然一个大观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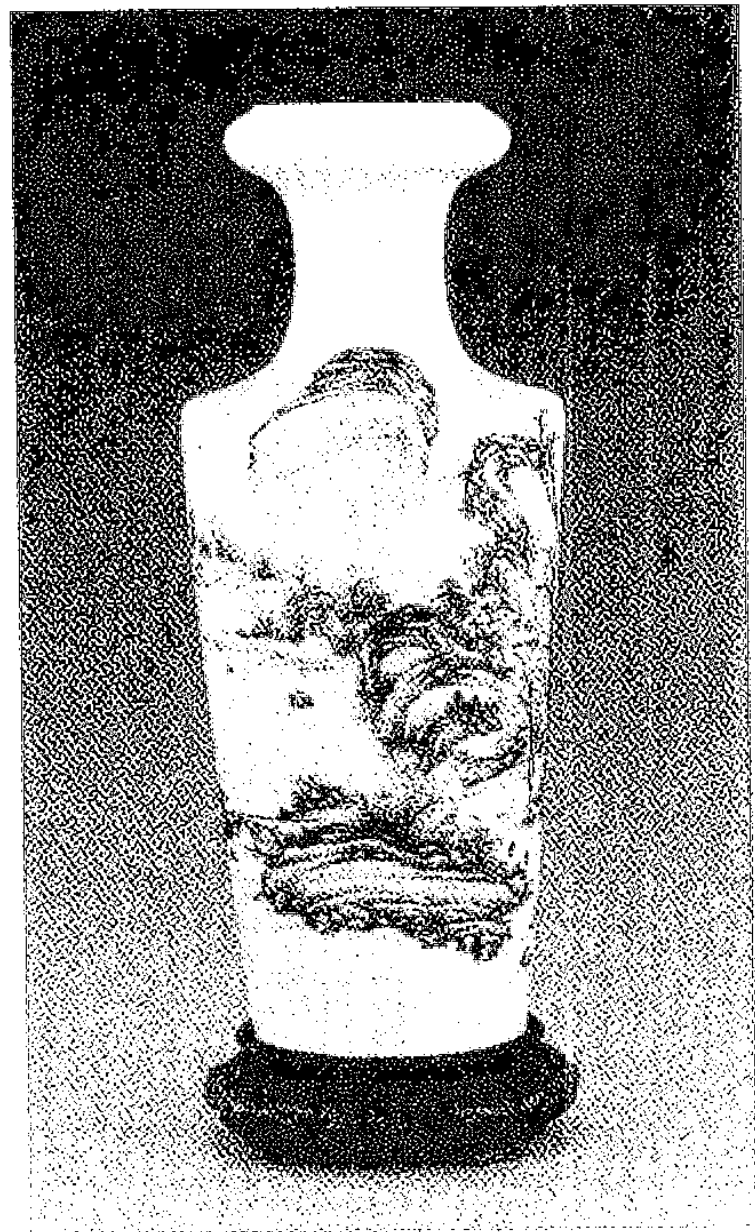
一个小“中南海”！

是的，“养寿园”的确有点北海、中海、南海的“三海”感觉。园北是洹上村的制高点——以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似北海的白塔山）。“起伏的山上建有一个四角攒尖亭，可登临观赏园景。”（王碧岑语）袁世凯引洹水进园，清澈的河水被水泵抽到北山高处，于山上的人工瀑布飞流直下入一小河，河水叮咚，最后缓缓流进园南一个大大的人工湖——汇流池（似南海）。湖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瀛台”——洗心亭。

汇流池面积达十余亩，池中种荷植菱，“设小船以供游荡，建一木桥以供过池”。汇流池水通过平桥与鉴影池相接。鉴影池是汇流池的一个子池。

关于这个池子还要牵出一个收藏界赫赫有名的郭世五来，这人本为古董小商人，由某盐商推荐给袁世凯总督衙门。其人小聪明，善趋承伺意。养寿园汇流池落成后，袁世凯要宴客，一看池子里没有荷花，叹息说：可惜！郭听了立刻从北京丰台买了莲花数百盆，摆满池中。到宴客那天荷花盛开，袁很欣赏，称他能办事。

居仁堂款粉彩山水人物大花瓶。郭世五烧制的高级名贵瓷器都打上“居仁堂制”印。此瓶形制独特，施釉莹润，瓶腹绘山水人物图纹，二三茅舍掩映于俏山、桃树、流水之间，可谓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袁世凯筹备帝制时，任总统府庶务司丞的郭世五建议袁世凯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设御窑烧制瓷器供称帝后宫廷使用。袁世凯任命郭为陶务署监督，赴江西烧造“洪宪”瓷。郭烧制的高级名贵瓷器都打上“居仁堂制”印，成为今天收藏界的极品。这是后话。

围绕着这些水面，养寿园布下了八大景观，大小二十七处建筑。它们是养寿堂、谦益堂、五柳草堂、乐静楼、红叶馆、纳凉厅、澄澹榭、蔡心阁、啸竹精舍、杏花村、临涇台、洗心亭、垂钓亭、盖影亭、滴翠亭、枕泉亭、接叶亭、待春亭、瑶波亭、泻练亭、天秀峰、碧峰洞、椎风洞、散珠崖等，加上汇流池、鉴影池和卧波桥。

这个池子是袁世凯最得意的杰作。五大三粗的袁宫保，在这里展示了他“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一面。袁静雪说：“池内还修有一座水（洗）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我父亲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他有的时候独自和我的生母三姨太太荡舟赏月。我母亲会弹七弦琴。这个时候，他对着皎洁的月光，听着悠扬的琴音，是十分高兴的。有的时候他俩一边下围棋，偶然一语不合，也会闹起气来。有一次我母亲竟气得把棋盘、棋子都扔到水里了。”

袁静雪接着说：“池里种植了一些荷、菱之类，养殖了很多鱼。我父亲喜欢吃的熏鱼，是二姨太太的拿手菜，她就常常养蟹，每个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自己所有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自己捕来自己吃。”

养寿堂后的景色



养寿园大门。这门上的“养寿”二字为袁世凯五十大寿时西太后所赐手书。西太后格外开恩特昭照亲王例赐寿。（清例大臣年至六十，始得有赐寿之典。）而“洗心亭”、“五柳草堂”、“乐静楼”等楼台亭榭的楹联匾额，均是袁克文亲笔书写，字体俊美。园内百花绽放，蜂蝶飞舞，香溢四射，入境耳濡目染，如入仙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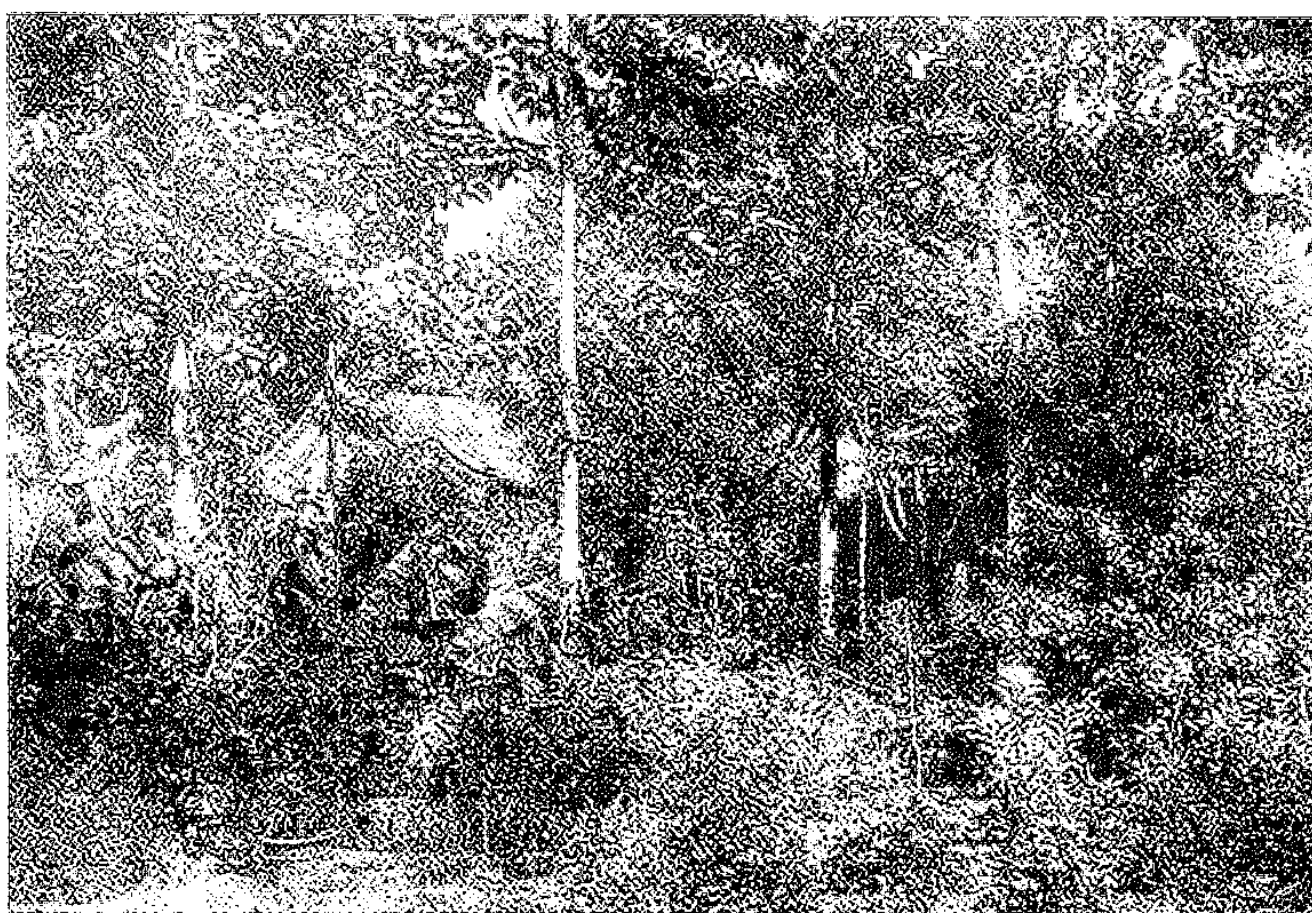
养寿堂 养寿堂位于养寿园的中央，是养寿园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周围有宽广的走廊，轩敞为全园之冠。养寿堂楹联为吴江费树蔚集龚自珍诗句：“君恩馥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由袁世凯属下绍县人沈祖宪所书。

养寿堂前 养寿堂前立有两块奇石，一状美人，一如伏虎，均得之于太行山中。养寿堂既是袁世凯的书房，又是袁世凯的客厅，袁世凯在彰德隐居时的主要政治活动，都是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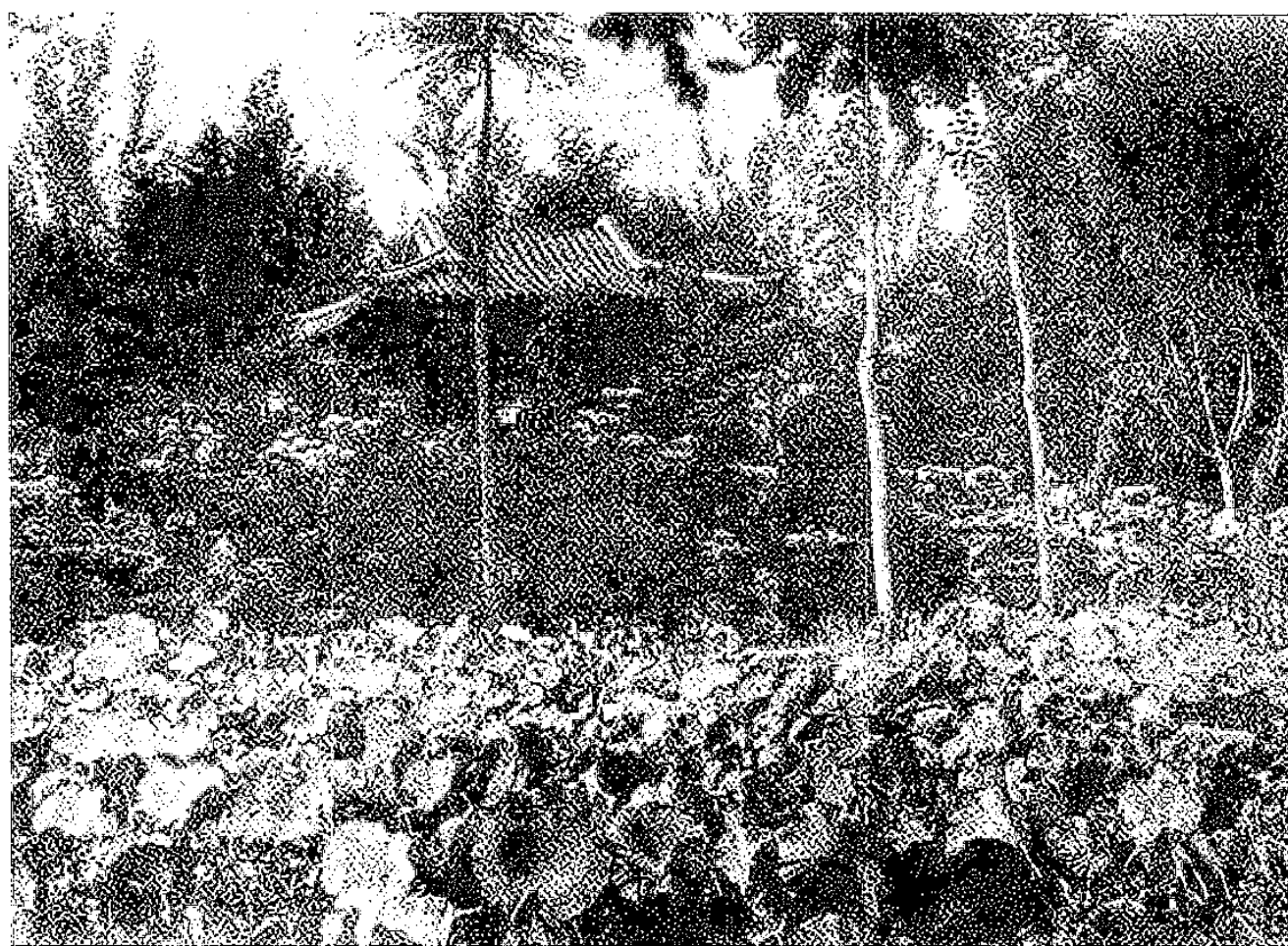
谦益堂 谦益堂在园的南面，面汇流池，倚碧峰嶂，明窗四照，远碧一泓，南园之胜，一枕收之。“谦益”二字是西太后于1902年初御书赐予袁世凯，袁世凯取之命之于堂。该堂楹联为：“**圣明酬答期儿童，风月婆娑让老夫。**”此为袁世凯亲拟。袁世凯还为谦益堂写了题记：“**光绪辛丑季冬，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勸臣至矣。园居成，以名堂，俾出人瞻仰，用自循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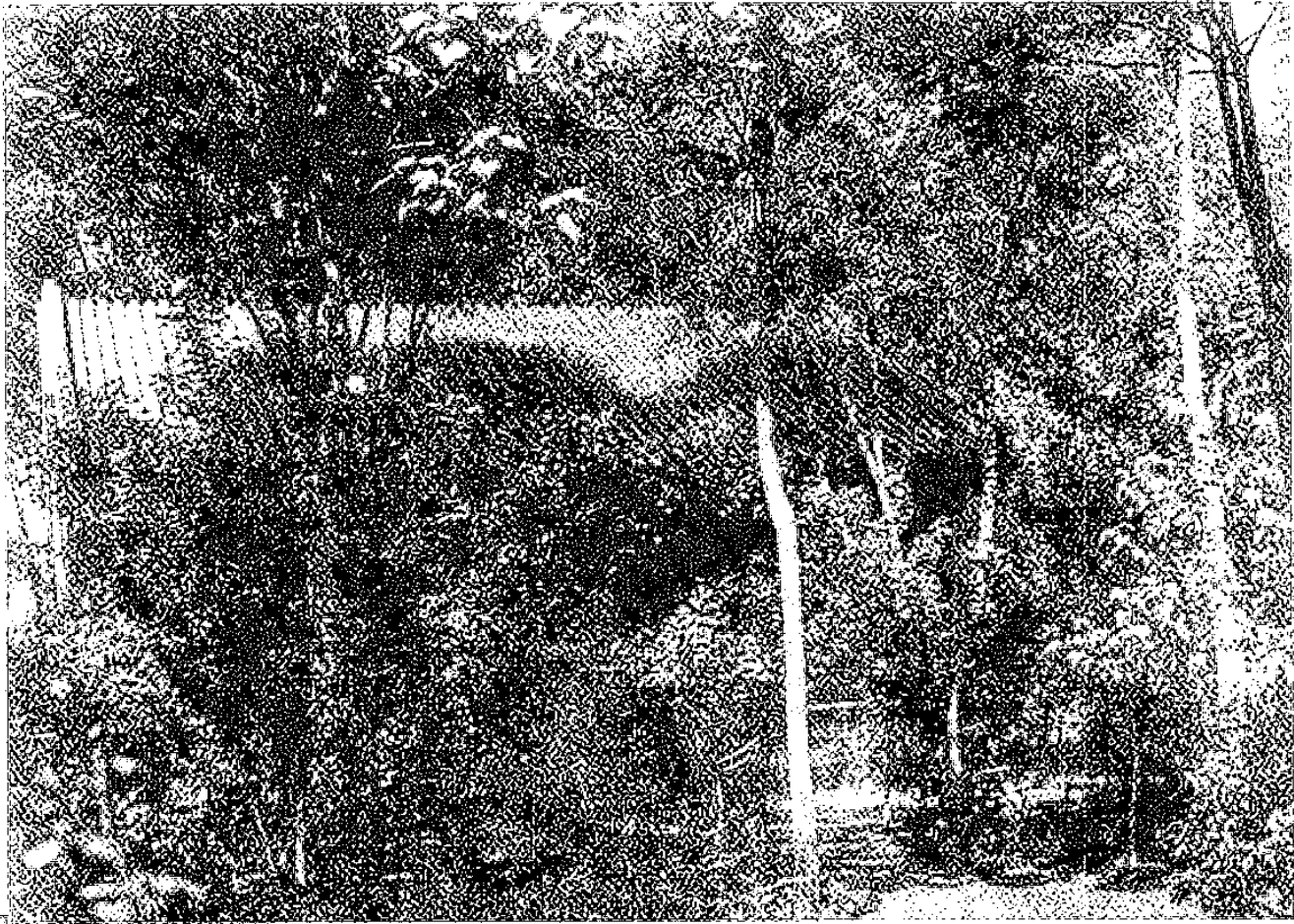
五柳草堂 五柳草堂居园西北，因堂前五棵柳树而得名，取陶渊明弃官隐居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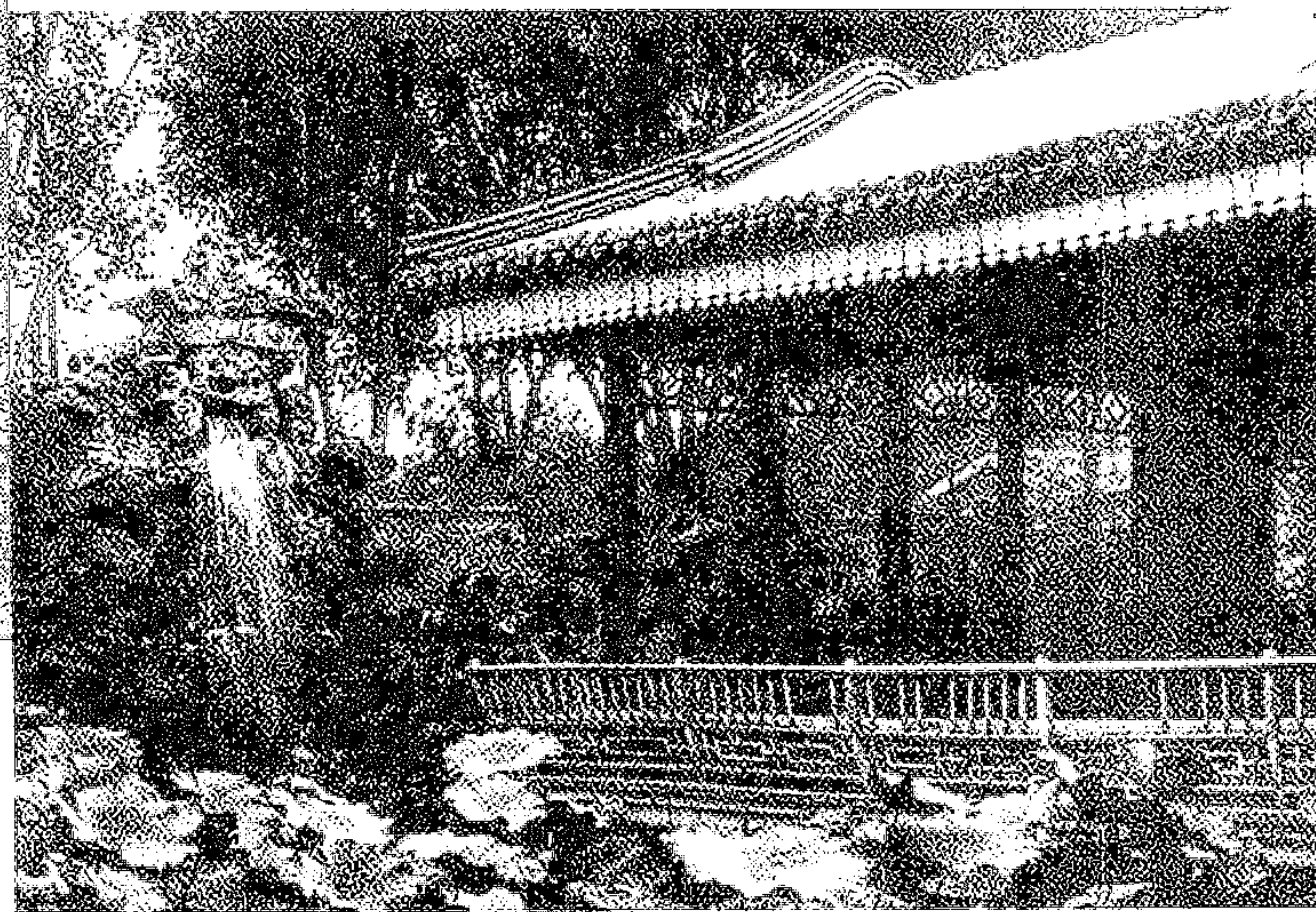
临洹台 临洹台在园的最南端，由山石堆积而成，“若岭若立。”攀登而上，洹水在其下，彰德城廓尽收眼底。其北则临汇流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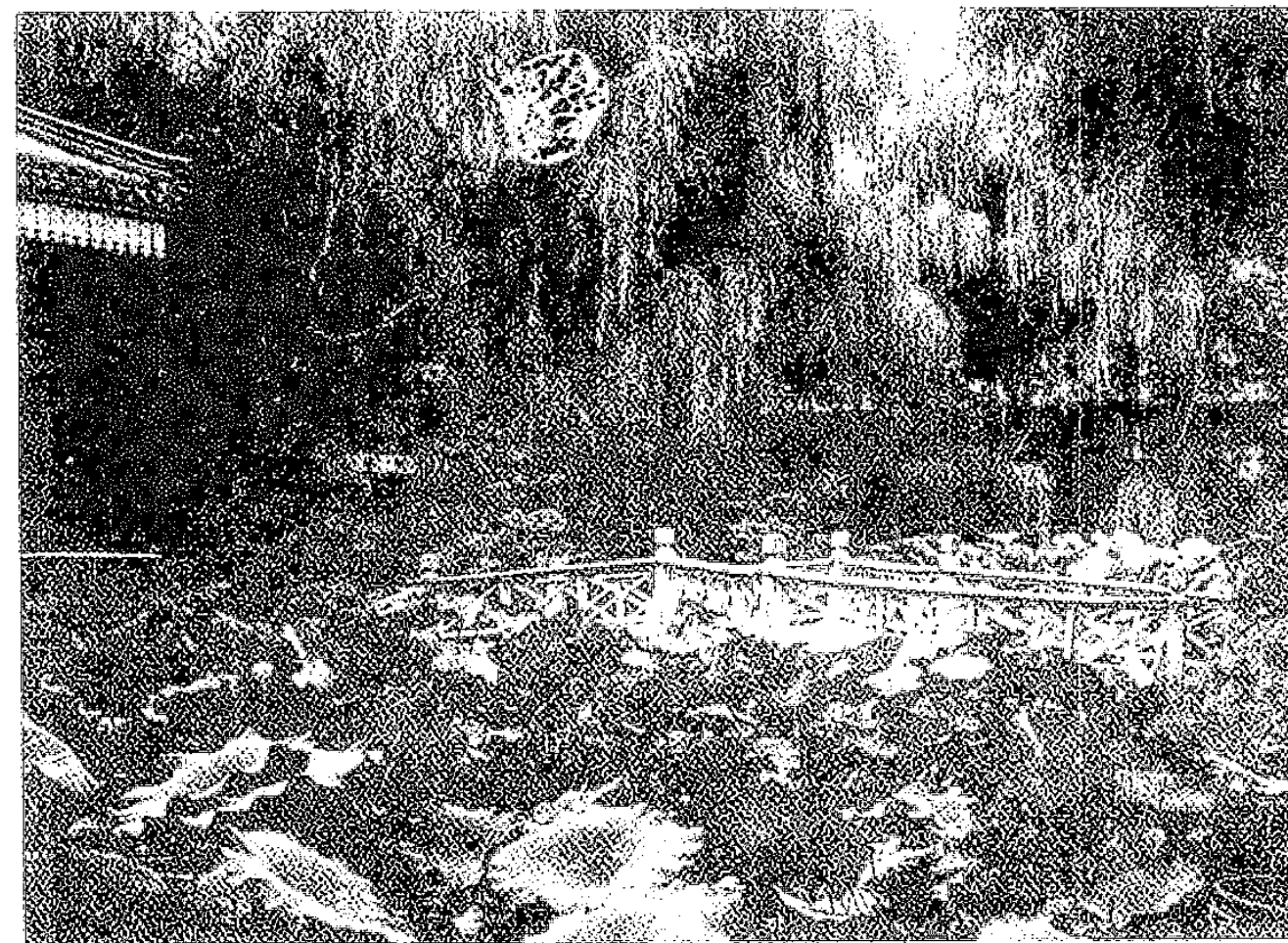
红叶馆



绝版袁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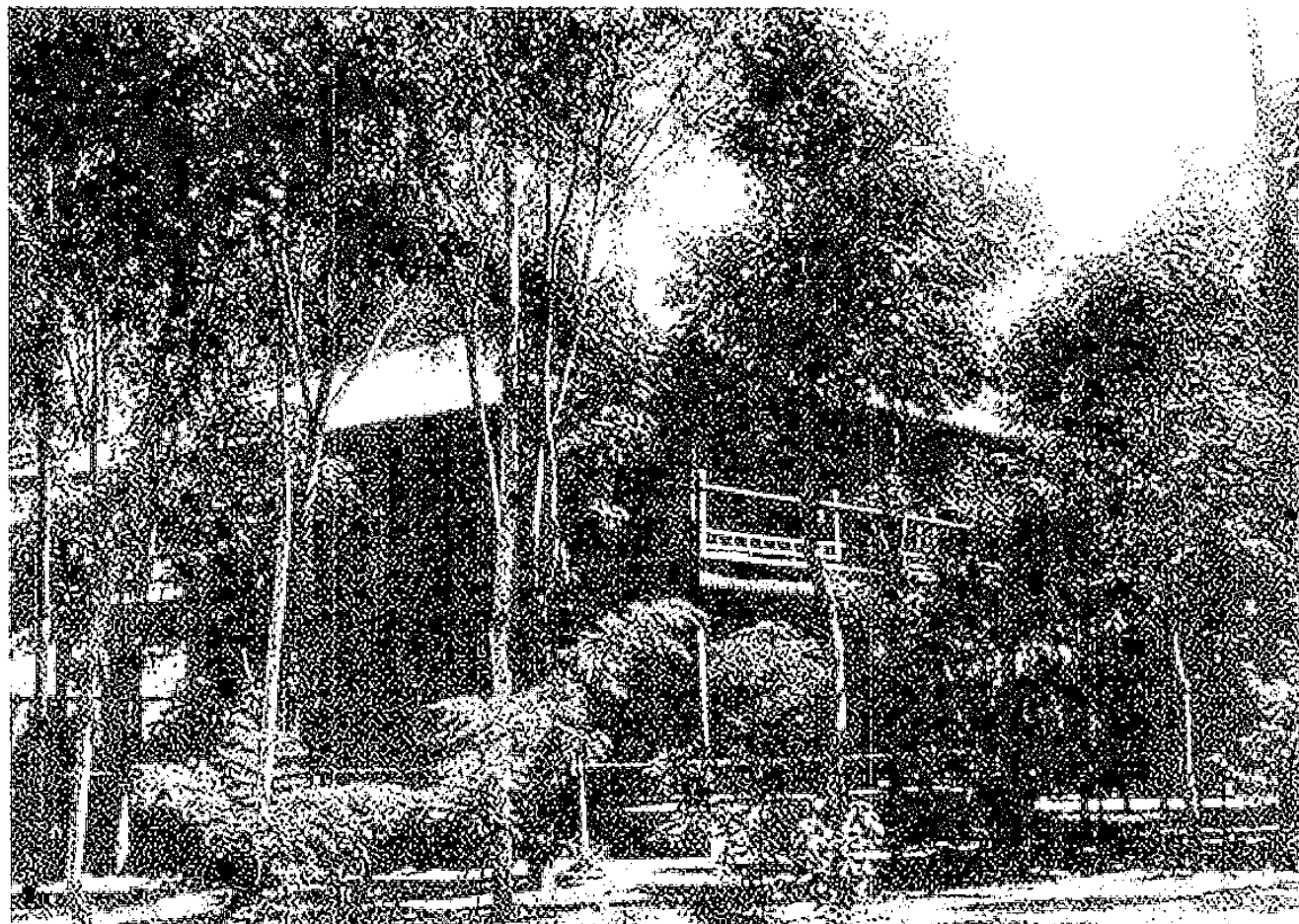


澄澹榭 澄澹榭面北，枕鉴影池，倚东垣下，西接叠障，左为碧峰洞，中悬一巨镜，恰将天秀峰景色纳于其中，“若幻境焉”。澄澹榭额书有“澄澹”二字，联曰：“芳沼拂席，垂檐带空”，为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所书。澄澹榭周围植有花竹；其侧有高石泻泉，潺缓弗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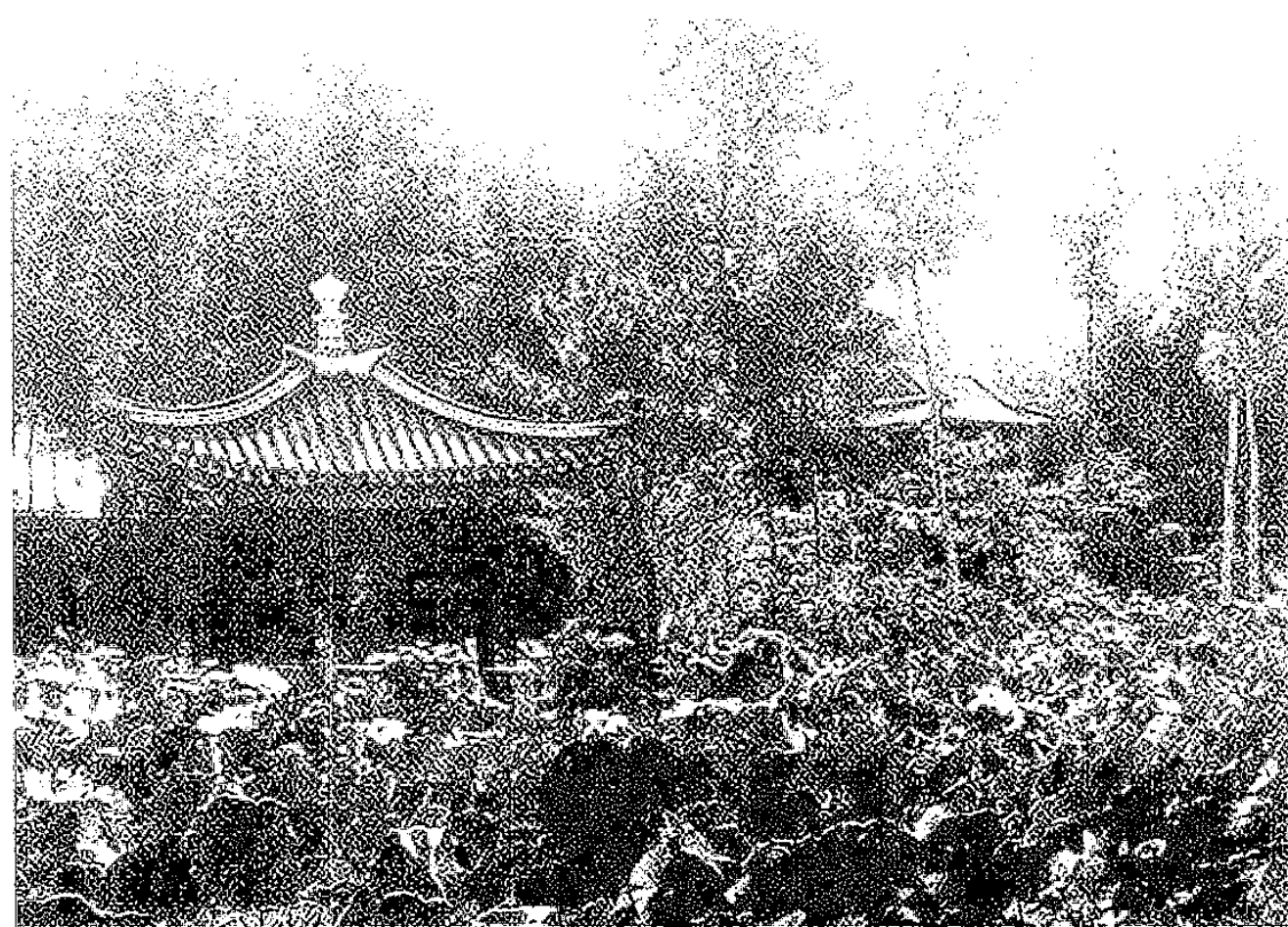


碧峰洞 碧峰洞即碧峰嶂，多为珊瑚奇石垒砌，山中多洞，且弯弯曲曲，从一洞进入，从另一洞口走出，使人有进入深山密林之感。碧峰洞绵亘鉴影池南。碧峰洞有四个洞口：北曰碧峰，通向鉴影池北；西曰屏移，进入竹林；东曰镜转，可达澄澹榭；南曰青藜，临谦益堂。四个洞口的题名，皆刊于诸石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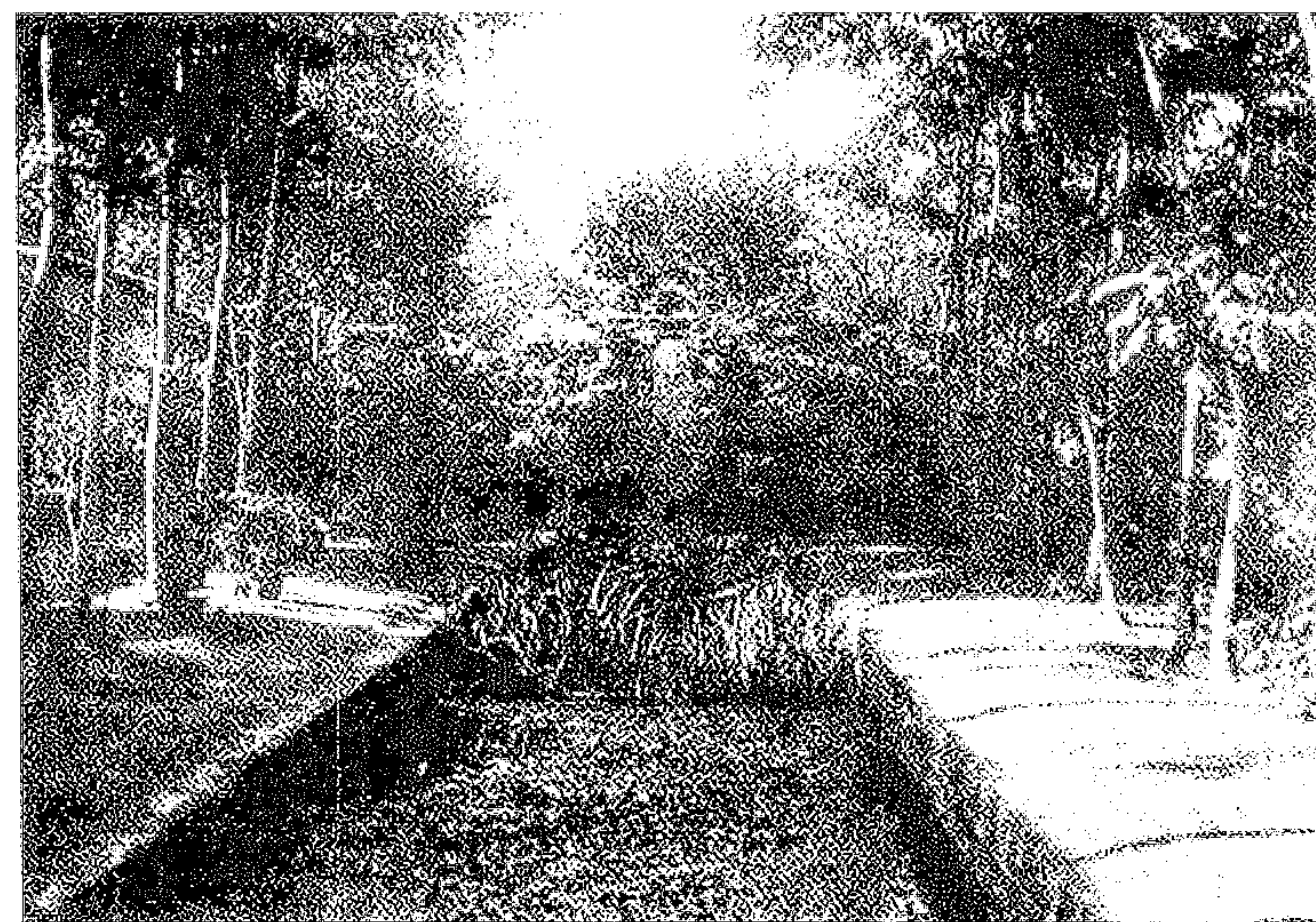
乐静楼 乐静楼在养寿园北面，此楼大概是洹上村除碉楼外最高的木建筑。该楼有何用？当年时常在楼下走过的杨景震说：“园北面建小楼一座，内供慈禧太后像和御赐玩物。有时袁犯肝气即向太后像痛哭。”



垂钓亭 垂钓亭在洗心亭的东面，亭由三根石柱支撑，犹如三足鼎立。垂钓亭顾名思义是袁世凯经常垂钓之处。袁世凯和三兄那张著名的垂钓图就是在这里拍的。



泻练泉



洹上村循环经济搞得好

袁世凯是颇有经济头脑的，他的动手和实干能力超过他老师李鸿章。而且他专干满清贵胥和朝廷清流不屑一顾的那些“雕虫小技”。比如，“彰德府秋操”时，为使受阅部队官兵吃上方便可口的食品，袁世凯想出了一种行军“方便饭”：大米淘净，以水浸泡50分钟，干湿相宜后再用蒸笼蒸熟后阴干。需要时用水泡20分钟后即可食用。

这个人除了军事以外，就数对经营管理兴趣不减。袁在做直隶总督时就说过：“官可以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现在他退下来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

当时经商被叫做“实业救国”。在洹上村，袁世凯“救国”的名册下有京师自来水公司、豆腐公司、银矿、钱庄、当铺，他还集股办洛潼铁路，入股彰德广益纱厂等。

入股彰德广益纱厂是袁世凯搬入洹上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彰德广益纱厂东面大约有800亩左右的地可供发展：住，可以建一片大宅子；行，贯通南北的大通道——平汉铁路就在门口；农，有肥沃的土地供耕作，而且可以引洹水灌溉之；工，西面就是彰德广益纱厂。所以袁世凯闻讯大喜，立马将其买下，当月中旬就开工建设洹上村。

从中可以看到，袁世凯投资很有一套，是一步一算计：开始买下儿女亲家、天津大盐商何炳莹的一座200多亩别墅，然后再二期三期地追加投资，最后将800亩的空地都收入名下。一部分投股纱厂，一部分用来出租。最后袁世凯在洹上村方圆百里内买了不少土地，“据估计他的土地约占全县（安阳）土地面积的60%。”（张润三、毕乃千《洹上别墅苦心经营》）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从“中央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了大地主。

袁世凯就是个大地主，这是真的。解放后的第一个麦收季节，洹上村隔江相对的郭家湾，驻上了邺县一个区人民政府派来的工作队，袁世凯家正式被划为大地主。这里还有一个小段子：袁家收租子的事一直归管家徐静人（字东海）管。1949年安阳解放，徐认不清革命形势的发展，竟然在人民当家作主后，还继续为袁家收租效劳。麦收前，“徐大人”还到郭家湾等村查看小麦长势，并对佃户刘恒山等说：“你们打了场，

早点给我送（租）粮食，不要让我再来催要！”驻村工作队郭家湾村的刘尧、田臭只等七八个民兵，到裴家巷去找“徐大人”，让他到郭家湾当众算清农业税和剥削账。“徐大人”跳后墙逃跑，摔伤了腿脚，不能动弹，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 40 多年的收租被划上了句号。

以上这些算是袁世凯开源生钱的一手。于小处，他还采取节流省钱的一手，力求做到农副产品自给自足。袁静雪回忆道：

我父亲早就在彰德置买了不少田地，因此粮食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园里又饲养了家畜、家禽、活鱼，因此副食也就供应无缺。园子里产的瓜果等，还可以卖到市上换回钱来。他甚至在南方请来了一些蚕娘和纺纱娘（这些人也都住在宅子外面的‘裙房’里），让她们养蚕和缫丝。缫出来的丝，就送到他在彰德所办的纺纱厂里织成绸缎出售。他时常带着家里人去看她们喂蚕、缫丝。同时，也让各房自己喂蚕，自己缫丝，所得的丝价就归各房自己支配。家里还用了一个姓葛的采买，每天总要进城采办一次，每隔两三个月，还要专程到天津、上海购买那些彰德买不到的吃、穿、用的东西。葛在去天津、上海之前，总是逐一向各房问明需要买些什么。这时，各房就开列清单，交他办理。

三姑娘的这段话无意间道出了袁世凯不回项城老家，来彰德府的原因之一：妻妾儿女要去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买东西方便。想想也是，其实退下来的老袁，没了红头文件要批，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二十多个女同志的胡搅蛮缠。

综合袁静雪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赚来的大钱用来应付 300 多口人的大开销，日常的小开支由鸡屁股和菜园子解决，实在不行，拿一些富余的自产物到自由市场去交换。瞧，“发展是硬道理”和“循环经济”这些眼下时髦的词，老袁 100 多年前就在身体力行了。

袁世凯用钱的秘密

其实洹上村用不了几个钱，袁世凯很大的一部分钱被他拿来维系“北洋体系”的政治投资。请看袁家的家教杨景震亲眼目睹的一幕：“某月日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到彰德督师行营，住车站旅馆，荫于晚上到洹上村见袁。……当荫见袁时，放声大哭，说：‘四哥，数年不见，您的腿竟如此不能行动！’以后二人谈吃谈穿，袁叫人拿来银丝猴皮袄一件，令荫看视；荫云生平未曾见过，袁即将此皮袄当面赠送彼。”

想想，荫昌何等人，正白旗贵族，奥地利军校毕业，在德国入军队做实习生时与德皇威廉二世（时为太子）同队，清末新军施行新官制后唯一的一位陆军正都统（相当于陆军上将），最重要的是他还任陆军大臣。这么个满世界跑的清贵，什么没见过？可是“荫云生平未曾见过”！掂量一下吧，这绝不是一件一般的皮袄！

关键时候袁世凯舍命陪君子，将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这件“旷世绝代”的银丝猴皮袄，潇洒地一送了之。五秒钟内老袁便送走了九房姨太太和15个女儿一年的梳妆费。

接待严修是袁世凯的另一种“舍得”：1910年2月，严修顺道经过彰德府，袁世



荫昌（1859—1934），满族。早年毕业于同文馆，派赴德国学习陆军，毕业后曾在奥地利学陆军实习，与瓦德西将军及时为太子的威廉二世相交甚笃。后辛丑条约谈判时，李鸿章特意带上了荫昌，他也以瓦德西旧识的身份奔走斡旋，合约即成，荫昌得优赏。回国后，任至武备学堂总办，后擢升至陆军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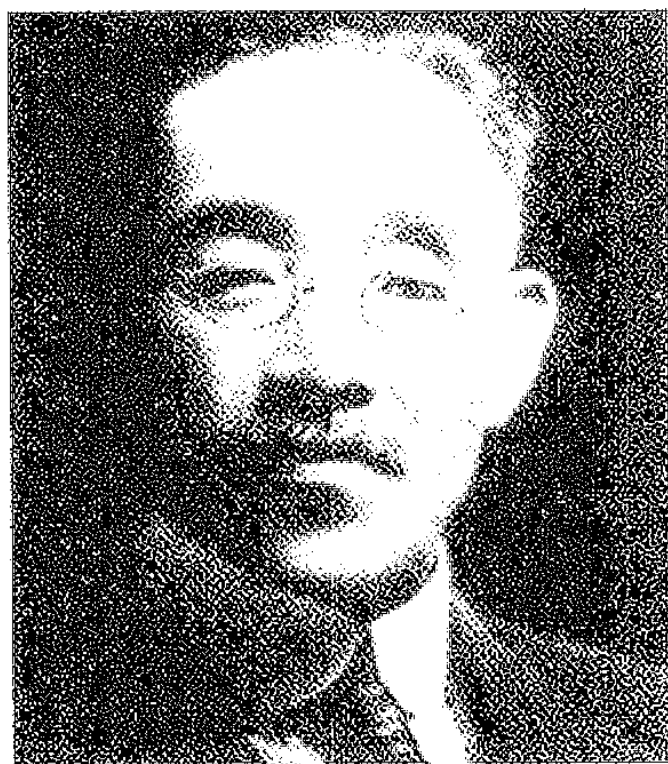
满汉通婚开禁之后，袁世凯七女袁复祯嫁给了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子荫铁阁。摄政王载沣上台后要杀袁世凯，荫昌曾经多次为袁求情，后才将袁放逐回籍，所以袁一直视荫昌为“恩上”，另眼看待。

武昌起义后，清廷急派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荫昌特意经彰德洹上村面见袁世凯，请教制敌之策。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荫昌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的身份代表中华民国，以对外国君主礼节向溥仪表示祝贺。鞠躬后突然下跪磕头，说刚才代表民国，现在却是“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1934年病逝，时年76岁。

严修（1860—1929），著名教育家、学者，1883年中进士，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协助直隶总督袁世凯，积极倡导新式教育。1919年创建南开大学。

严修与袁世凯一直关系亲密，并一度成为袁氏的家庭教师。1909年袁被迫以“足疾”开缺，他是唯一上疏保袁，后又到火车站为袁下野送行的人士之一。民国元年，袁当上了总统，多次邀他“入阁”，他都婉拒，并不断规劝袁认清形势，顺从民意。袁世凯对严修也始终毕恭毕敬，极尽“西席”礼遇，虽不为用，亦不以为忤。洪宪失败袁亡，严修亲自去吊丧，他与袁世凯可谓“君子之交”。



凯闻之，先是“派厨丁送来烹饪，小碟四、大盘八、大碗四，肴馔可口，淇鲫尤美”。饭后，袁“遣四车来接”严修一行到洹上村，“宫保出见，谈甚畅”。袁世凯亲自引导严修等人遍游养寿园内乐静楼、红叶馆、杏花村、五柳草堂等风景，“每至一处，辄坐憩茶话”。晚上袁世凯与袁克定亲自陪饭，饭后又与严修“畅谈不休”，十一点后方始“散归”。第二天严修去郑州，不仅袁克定早来送行，“候开车乃去”，袁本人则“派差官以柬来送，并送车票”。严修告之自己已经购票，差官受袁之命，执意定要严修等人退票，由袁方购买，“争让许久”，最后严修“不得已受之”。严修感叹：“项城之情意周至，不唯可感，亦可法也。”

查洹上村那三年的进进出出记录，朝廷一品大员，北洋顶尖人物，立宪派领袖，是个能上报纸头条的都来过这里。有心人统计至少在60位以上。其中有唐绍仪、端方、严修、周馥、袁树勋、何彦升、王士珍、倪嗣冲、言敦源、段芝贵等，这些人来，袁世凯都有“送”的记录。用袁世凯对冯国璋的话说：“咱们内部首先要团结！”

这团结是要代价的。这“公关费”一年要多少？

夜来人静，当管家徐静人将账本一笔笔念给他听的时候，袁世凯心里不能不算计。但第二天，他会一如既往、满面春风地接着送，一直到把他自己送进中南海。

1911年辛亥革命突起。大概被经济逼急了，袁世凯出山的时候，第一次在冠冕堂皇的大条件下开了个小条件：要求摄政王载沣落实老干部政策，补助他这些年受迫害的经济损失。载沣给了他60万两银子。唉，老袁缺钱到了这个份儿上，连老干部的高风亮节都不要了！

洹上村其实有点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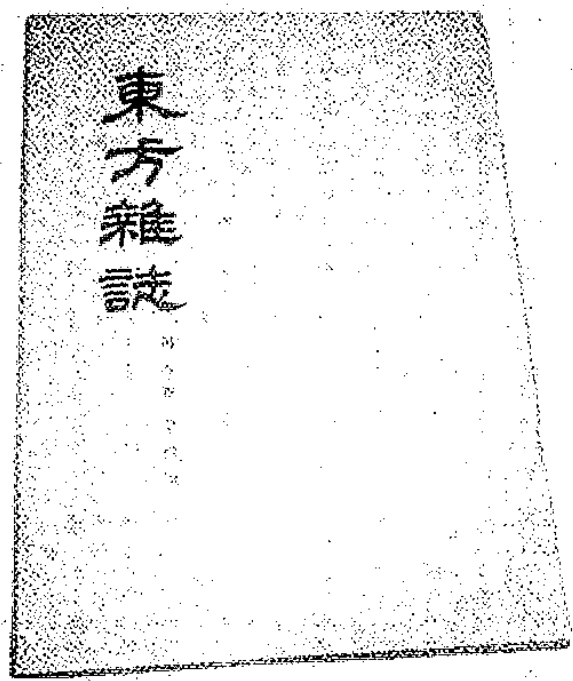
可是，经济效益上去了，洹上村却被弄得有点儿不伦不类：养寿园北面养着鸡鸭鹅等家禽，你可以说他袁世凯是王羲之观鹅，其实人家袁老想的是“清蒸鸭子”（袁基本上顿顿少不了鸭子）；园子西北辟有菜园、瓜园、果木园、桑园，你可以说他是仿效陶渊明“采菊东篱”，可袁宫保分明想的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浪漫的法国布洛克博士来到养寿园，看到园子里美丽的小鹿在自由地嬉闹，以为园主人有巴伐利亚贵族遗风，他哪里知道我们的总督大人为了的是那带血的骨质状鹿茸。袁世凯喜欢吃的是鱼，最爱开封黑岗口的黄河鲤鱼，主要用来做一道熘鱼焙面。想当年，“卫辉县令每日令人捞取，贮泉水于大木桶中，由火车运京”。

可是现在退隐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家里的池塘里养鱼、钓鱼，解决口舌之欲。于是我们便有了这张“袁尚书《蓑笠垂钓图》”。

《蓑笠垂钓图》之一 这张著名的《蓑笠垂钓图》是在汇流池里拍的。王碧岑老人回忆道：“袁世凯那幅传说有政治寓意的舟中蓑笠垂钓相，一看便知是在洹上村花园水池中拍摄的。当地老百姓也知道袁宅有个大鱼池。”



据说：袁世凯的摄影师是天津请来的。那些天，袁世凯“即穿蓝洋布裤褂，照渔、樵、耕、读四种相片。渔即袁在小船上持篙撑船状，他三哥披蓑衣守渔篓；樵耕即持农器工作式；读即读书式。登天津某报，人见之均羡慕其逍遥自在。”（杨景震语）



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四号封面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行。

《东方杂志》该期目录中有“插图：养疴中的袁尚书（四幅）”字样。很多书都提到《袁笠垂钓图》在杂志上刊登，一直苦于没看到，现在有了实证。这里发表的是袁世凯和他三哥袁世廉一起的那张，发表时间为1911年5月5日。



自己没墨水，孩子身上补回来

1909年到1911年，这三年对彰德府这个大地主来说，是个风调雨顺的年头。袁家虽拥有周边良田万亩，可是有老天爷帮忙，有管家徐静人具体操办，刚当上大地主的袁世凯没有什么大的农事烦心。这时候，苦闷袁世凯一辈子的“学历”情节便涌上心头。

袁世凯小时候“不肯好好念书，经常外出玩耍，喜欢打拳、骑马、下棋、赌博。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喜欢骑着马四处游玩。（袁静雪语）

别看他小时候不喜读书，耽误了八股一类的“圣贤书”，却因“少文”“干实事”阴错阳差地成就了他另一番事业。

可是在他的心底，这“读书”二字始终是块心病：给人写个条幅一口一个惭愧，惭愧！惭愧什么，字不行！你看到袁世凯正正经经写过一手好行草吗？今天小篆，明天隶书，后天又带点儿魏碑，他老变换字体，为什么，心虚，书法功力不够。

不过他给两宫的奏折，慈禧太后还是挺欣赏的。可是这些奏折，实际上是他让一个叫阮忠枢的小伙子全权代笔的。这个阮忠枢跟了他一辈子，写了无数个报告奏折，可以说袁世凯的军功章里，有人家一半的功劳。据说晚年，时兴民国新文体，阮忠枢才自叹弗如，渐渐地淡出袁的写作班子。可是袁记着小阮的功劳，他对外说：袁就是阮，阮就是袁。

肚子里墨水不多，终归是个遗憾。那些个清贵、八旗子弟和所谓的清流总爱私底下拿他这个“少文”开涮。袁世凯毕竟没有经过科举一途，心有点虚。三女儿回忆说：后来“害人的科举制度，也就由此而被废除。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这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恨什么？恨这个制度曾经羞辱了他。

长子袁克定早年和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嫔定亲，袁世凯曾经特别关照克定“须十分下工夫读书，方可见其岳翁，不至遗笑”。笑什么？怕人家博学鸿儒笑这家人家不学无术。这方面老袁特别敏感。

在洹上村的日子，袁世凯读书，练字，写诗，一样不比京城里的那些翰林们少。这还不够，吃够少文的苦头，他下决心要在儿女们的教育上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是袁世凯 1914 年中华民国大总统任上的自题。贵为大总统，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这里有自谦，也有自责和自卑。



清末，一些清朝贵族在家中开办学堂，以家族子女为学堂生员主体，一般规模不大。在私塾里，男童习字，而女童则手持针线学做女红，仍属“男女有别”的传统家庭教育方式。据了解，晚清时期，私学（私塾）仍然占据着重要和主流的教育地盘。



袁世凯和部分儿女合影（1904年左右）

杨景震那时候正年轻，卫辉退隐时袁世凯请他来教“理化科学”，后一直跟着老东家到中南海。民国四年（1916年）袁世凯还利用手上的公器授给杨景震一个少大夫，是年7月又给了杨一个四等嘉禾章。

袁世凯对有文化的人是敬重的。见面后，袁世凯“云彼有腿痛病，不能远送。每月初发薪，每年有寒暑假，每假一个月，届假期辞行前即将路费40元及礼物送来。有一次送白燕窝2匣，暑药数种”。袁给杨留下的印象是袁世凯主张教育要“师严道尊”。

杨景震和其他三位教师开始教袁的6个儿子。洹上村的家校就设在住宅院的二门东院。每天袁世凯一起床，就能听到东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白天袁一人逛花园，右手持手杖，左手扶听差，经过家校往往赴校看学生上课，观其意旨，颇尊师重教。”

袁世凯拿出小站练兵的绝招，亲自手书了《袁氏家塾训言》十一条，比如他不让孩子们看文学作品，因为“其小说诸书，易乱心曲”，如“烟酒等类，亦切忌入口，以重卫生”；又如：“不准出二门。”袁又定了学校自省室简章。其中规定入了室，吃饭大小便老师必须全程监督；禁闭期间，禁闭者必须在室内不断咏读格言和家规，出

来要写检查。洋洋洒洒数百字，老军头袁世凯没有一处建议动手打孩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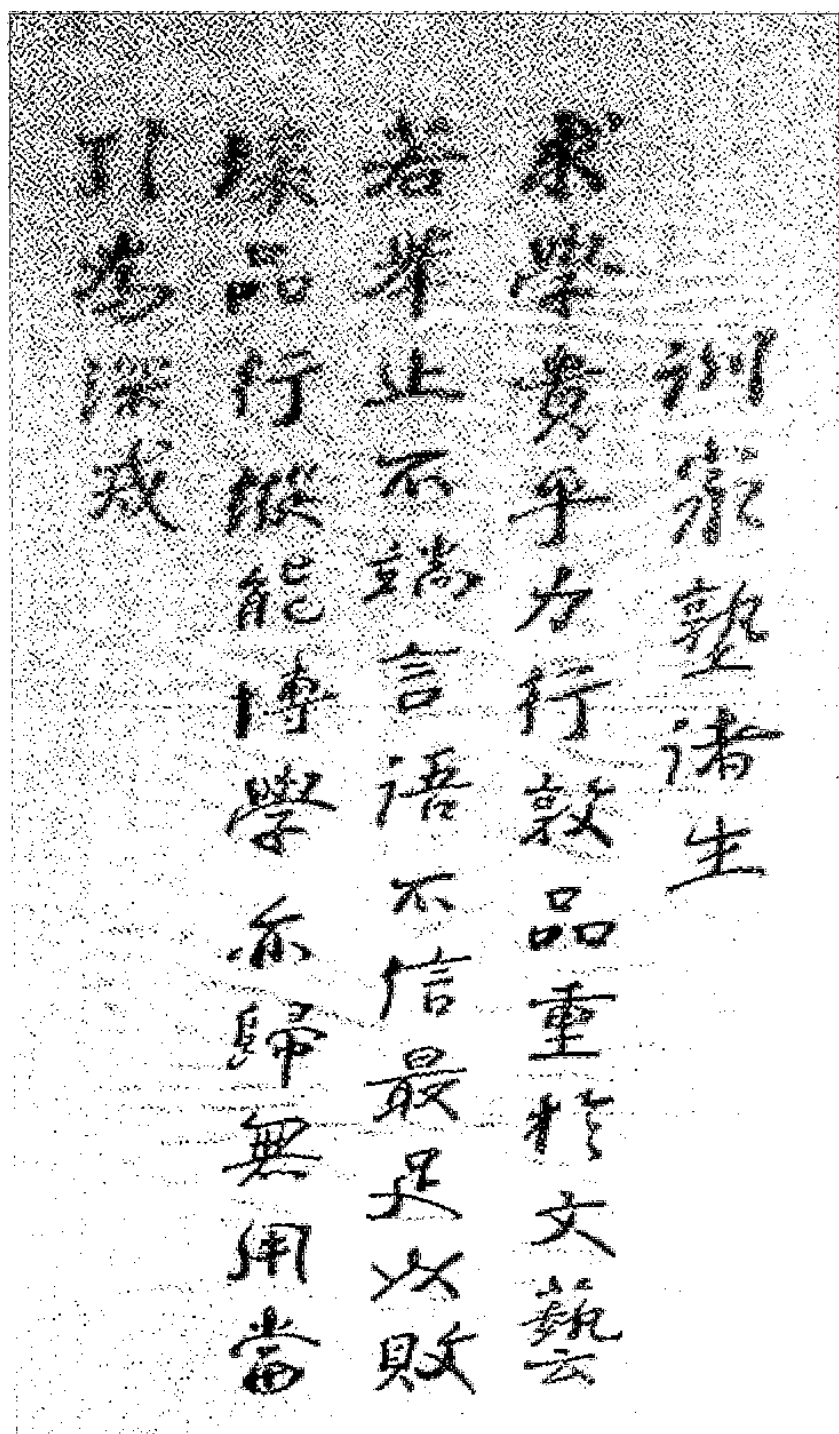
每到年终大考，所有的考卷都要给袁世凯亲自过目，考后按名次发给孩子们奖品。

重教育确实是袁世凯一贯提倡的，就是在他公务缠身的时候，家书中也会不厌其烦地对十岁的袁克文严格要求：“近闻你行事喜效名士，此非具有真才实学者……安得将所读之经史子集，尽记头脑，以充腹笥，惟有勤动笔多思一法。于读书时，将典故分门别类，摘录于日记簿，积久汇成大观。”他还给克文的学习支招，“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贪恋衾裯；习字：早餐后习字五百，行楷各半；读经：刚日读经，一书未完，勿易他书；读史：柔日读史，日以十页为限，见有典故及佳句，随手分类摘出，以资引用；作文：以五十为作文期，以史论

时务间命题，兼作诗词；静坐：每日须静坐一小时，于薄暮时行之，兼养日力；慎言：言多必败，慎言，即所以免祸；运动：早起临睡，须行柔软体操；省身：每日临睡时须自省，一日作事可有过失，有则勿惮改，无则加勉；写日记：逐日记载毋间断，将每日自早至夜，所见所闻所作之事，一一记出。”

洹上村的读书条件没有天津好，袁世凯就送四子克端、五子克权“进天津南开学校读书，说明愿意捐 3000 元给该校，并要求准许他的两个儿子携带‘戈什哈’（满语，即马弁）两名随护，校长张伯苓怕其在校中惹事，拒绝了。袁世凯就转送他们进入新学书院，也是以捐给该书院 3000 元为条件。因此新学书院特建一座‘袁宫保堂’表示纪念。”（家庭医生徐正伦语）

更有甚者，后来他的孩子还结伴儿去国外留学。这件事情《纽约时报》有报道：



《训家塾诸生》 袁世凯亲定的训家塾诸生部分内容。

袁世凯的儿子们将在这里学习

明德：12月20日。中国第二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四个儿子今天抵达这里，并成为了明德学院的学生。他们的年龄从12岁到17岁，他们会在这个国家呆上8年以完成他们的学业。

袁的大儿子袁克定就是一个“通英、法、日三国语文，汉文书读的亦不少，书法写碑很有功夫”的人（杨景震语）。杨景震对其子女也均有观察：“次子克文颇有才学，书法学问见重国内，花园内多所题词。三子克良犹在家校受课，……克良以下多无文管。”

杨景震教的是男馆，但是袁静雪另有说法：“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识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两个专馆。”

袁世凯的儿女教育花样不少，有些直接移植小站练兵的“成功经验”，比如提倡有奖有罚，以奖励为主；“每次考试的第一名是有奖励的。……在考试的前夕，我父亲总要问问我俩，这次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么东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并在考前说是要一架新式铜床的话，那么，名次一定，新式铜床便也抬到我屋里来了。”（袁静雪语）

不但是儿女，袁世凯还把姨太太们也赶上了学堂。他在家里平时直呼姨太太“老二”、“老三”、“老四”，在“太太学堂”里让老师们给她们起了新学名：“五姨太太叫做志学，六姨太太叫做勉学，八姨太太叫做潜学，九姨太太叫



袁克定（1878—1958），字云台，别号慧能居士，袁世凯长子，袁世凯元配于氏所生，幼年随袁世凯历任各地。清末，荫候补道员，后升任农工商部参议、右丞。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把腿摔坏，从此落下终身残疾，后积极运作帝制。袁世凯去世后，渐入贫困。1949年后，出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58年病逝。

袁世凯小儿子们 左起为十二子克度、十三子克相、十七子克友、十一子克安、十五子克和、十四子克捷。



做勤学。”可是名字换了，姨太太性质没变；“某姨太太忽然站起来说‘杨先生，我请一会儿假’，接着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头问‘总统吃的饺子预备好了没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别的问话，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听讲。”（袁静雪语）

这些都是花絮，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袁世凯在教育的投入上是相当大的。我看了袁静雪以下的这段话有点儿吃惊：“女馆的女老师们，也住在专馆里，也专有一个厨房供应她们的伙食，专用了一些女佣人来伺候她们。她们的月薪，大约是每人100元。”不说其他的福利，光这100元，袁世凯出的价已经可以请来鲁迅先生了！难怪袁静雪说：“这样一些物质待遇，在当时说来，算是很优厚的了。”相当优厚，从购买力说大约等于现在一万多！

老袁一般对孩子是“五讲四美”的，但是也有猴急的时候，这时候，他便露了军人本色。“对儿子们，有时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养寿园里的水池内捞鱼，正在捞得高兴的时候，猛然听得岸上‘哦’的一声，似乎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赶忙跑了上来，却是五哥在假装着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捞鱼，同样地又听见‘哦’的声音，他认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次却真是我父亲带着一些人来散步了。当时我父亲就叫丫头把四哥从水边拉了上来，不容分说，用棍子打了一顿。因为四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有时也要挨打。”（袁静雪语）

袁世凯在洹上村的日子怎么过

袁世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载沣一帮少壮派清贵刷了下来，这对一路顺风的他是多大的打击啊！多年来他一直苦心广结的人脉，这回看还是出现了结构性的缺陷：因为权重，因为和清贵中的元老派走得太近，被人家清贵少壮派锁定为“定点清除”对象。

轰轰烈烈的事业戛然而止，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凭良心说这日子没法儿过了。纵观古今中外，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被撵下台后不久客死他乡，伊朗的巴列维郁闷后得了癌症而死……

但是没法过，这日子也得过啊。

袁世凯退隐的三年，基本上剥了他三层皮。他的生活也有三种过法。这可以从五姨太的话里琢磨出：

回到河南彰德，大家都认为待不长，纳闷老爷为什么在洹河边上一气盖9个院落，又盖了压水亭和磨电房。园内洋槐垂柳，树阴蔽天，不可极望。老爷

到哪都不忘对子女的教育，请了3名教师，教授英文、汉文和理化功课。第一年老爷还有些神魂颠倒，有时跪在慈禧太后像前，捶胸痛哭。第二年便时时自得其乐，穿蓑衣于湖边垂钓，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还请天津照相馆来洹河拍照。第三年来者大增，大多是老部下。老爷的干儿子段芝贵经常来往，带来京津土产和一架电影机，放映一些洋人跳舞、体育比赛、京剧片子

段芝贵 字香岩，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后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新建陆军讲武堂教官。辛亥后随袁复起，出任武卫军总司令，第一军军长，署理湖北军务。后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兼奉天巡按使。上表劝进，洪宪成，封一等公。其后与族弟段祺瑞结皖系，任陆军总长，皖人呼之小段。



让老爷开心。一次老爷让我找出一件银丝猴皮袄，送给来访的陆军大臣荫昌。尤其武昌兵变以后，老爷一天比一天兴奋。

这些话都是袁世凯死了很多年后才说的，没有什么功利性的因素，而且是五姨太和自己的大儿子克桓以及克桓的同学闲聊时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读了这段才知道，原来袁世凯也不是神，并没有早就算好了会来场辛亥革命，也不是早有预谋地就把家安在离京较近的洹上村。那些后人所谓的传记，大多是为了证明某些先人之见，或迎合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

用常识看历史，你会发现，其实袁世凯当时并没后人说的那么聪明。出于本能，他首先想的就是保命。所以，在河南卫辉和彰德的第一年，他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担心的是生命危险。情绪低落得一个人都不想见，一封像样的信也没回过。自己一个人老在那里解脱不了：想，想不通，想不通就流泪。流了泪，还是想不通，越想越

袁世凯自比伊尹

被解职的袁世凯回到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表面上好像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实际上内心更多的是遗憾和无奈。袁曾写了名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的诗，其中的一首“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诗中袁世凯自比商朝时的伊尹，表明了袁此时的心迹。

据与袁世凯相从甚密的卫辉人士王锡彤回忆袁1908年10月初到卫辉时：“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近白，俨然六七十岁，惟二目炯炯，精光射人”，与一年以前的袁世凯相去甚远。图为1907年天津发行的明信片上的袁世凯像。



委屈，人到伤心处就对着老主子慈禧太后的画像嚎啕大哭。这和文革时的老干部很相似，自己明明是热爱主席的，红卫兵说你是反对毛主席，要砸烂你的狗头。那个心绞痛啊，一点不比老袁此刻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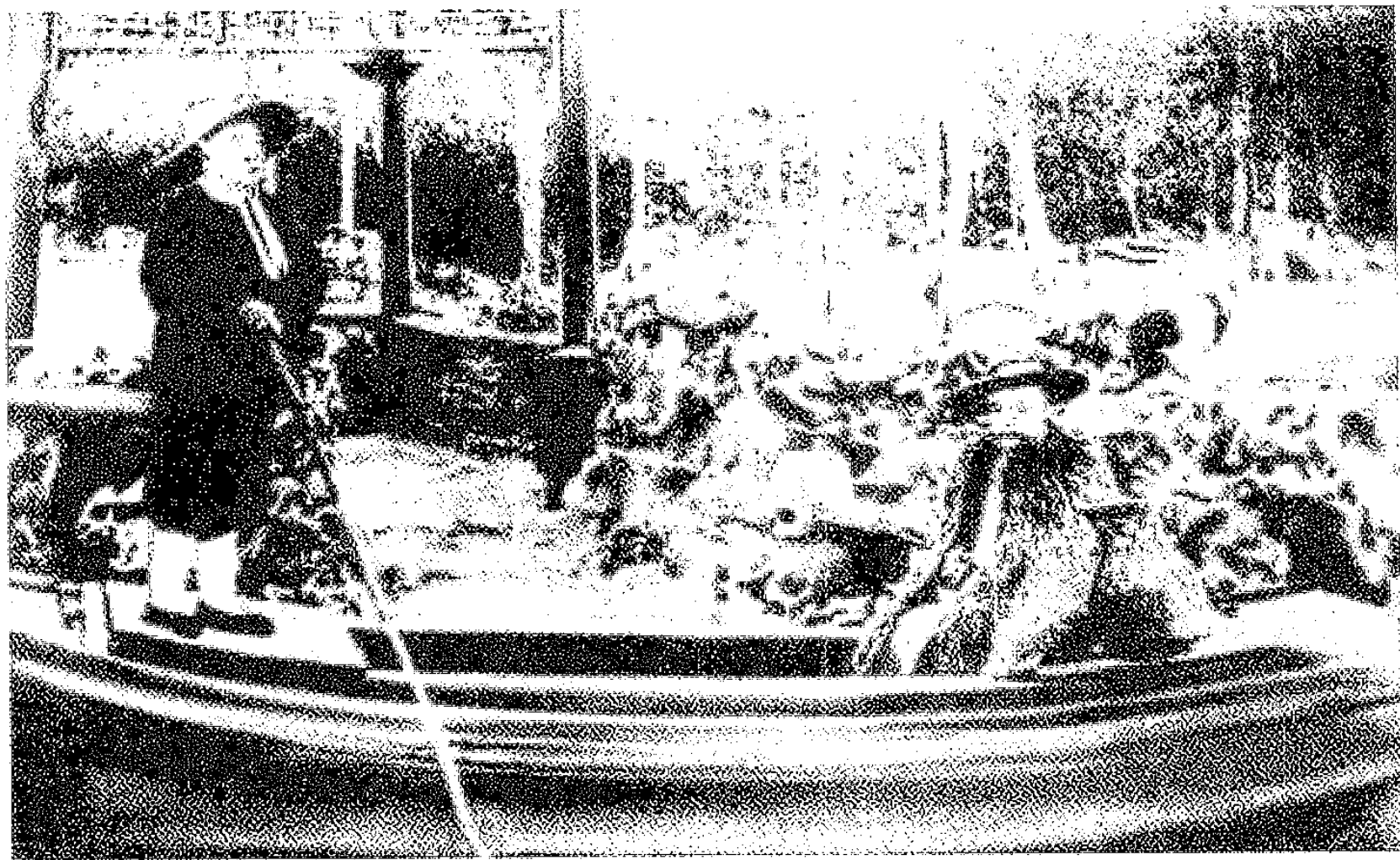
这些恰恰证明袁世凯当时并没有反骨，他还是无限热爱“大清国”的，最多有点儿清君侧的想法。同时也可看到老袁政治上很不成熟，不知道玩政治的残酷性。

因为感到委屈，感到恨，感到为他人受过（为谁？为庆亲王奕劻），于是那一时，那一刻，袁世凯真有如回家种红薯的颓废，所以他赌气也要在“洹河边上一气盖9个院落”。借此宣告：老子不跟你们玩了，我归隐了！

归隐就那么好归隐？

一旦没了权，集八大臣于一身的袁世凯就是“草民”一个。其实1909年，袁世凯连“草民”都不如，自己的命自己都说了不算，整天价人一见风就打哆嗦。

就算没生命之忧，昔日朝堂上下呼风唤雨，何等威风，突然什么事儿都没了，搁谁谁都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比更年期还难熬，比“双规”还要命。所以五姨太说：“第一年老爷还有些神魂颠倒”。这是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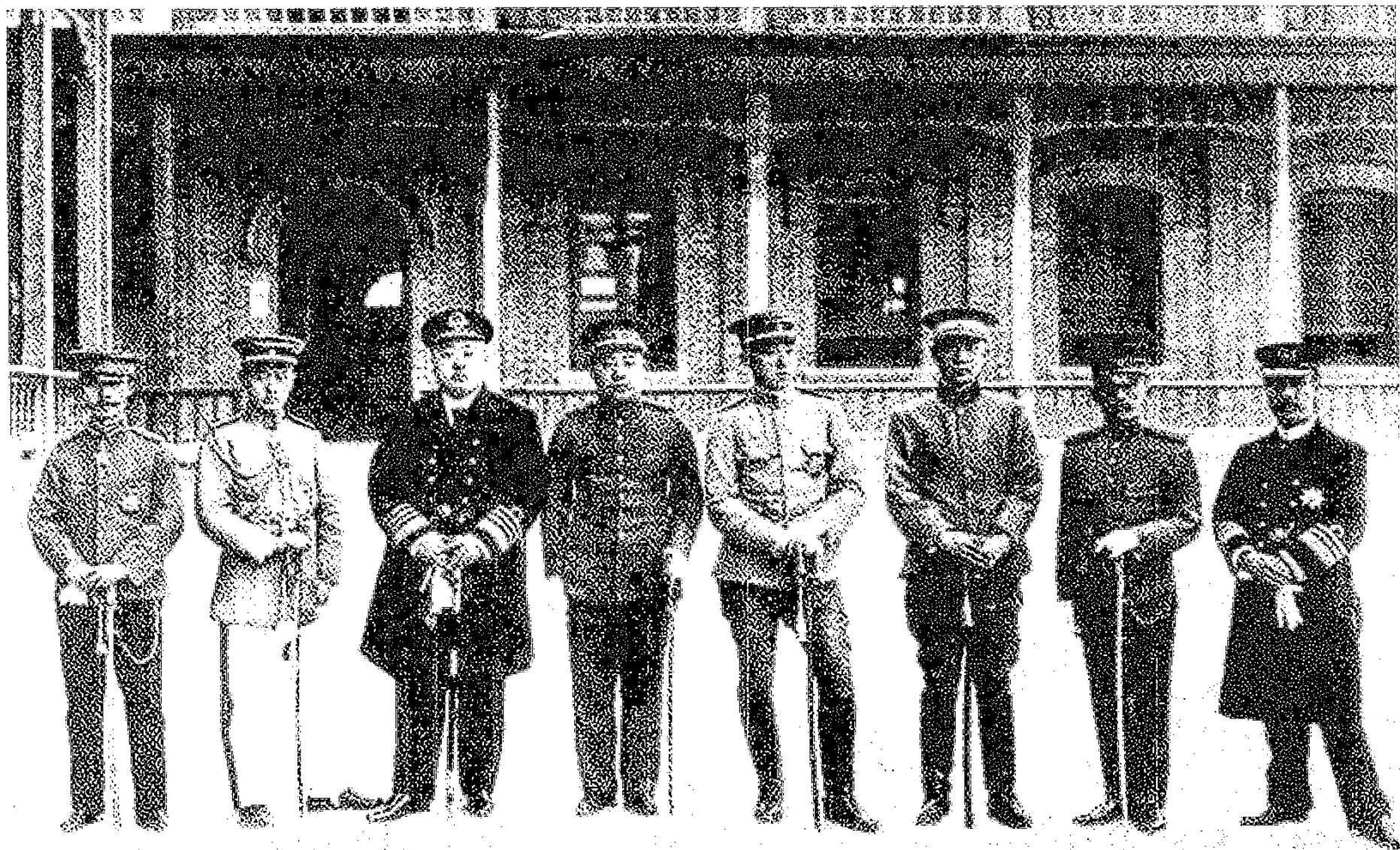


1911年，上海《东方杂志》刊登了袁世凯和三兄袁世廉垂钓照片。左立者袁世凯。

第二年，从各方反馈来的消息是：袁老尽管放心，至少您老生命无恙。听了这话，袁世凯一下子轻松了一半。再说此时，老袁在洹上村又结交了一批当地的新朋友，如何兰芬、王锡彤、李时灿等。加之退隐后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天伦之乐，兄弟相谐，父子共读，诸多以前不得不有割舍的乐趣慢慢地都释放出来了。

最后是人在乡间，对慢节奏闲情逸致的田园生活也渐渐地适应了。这时的他和最要好的三兄袁世廉相聚了：哥俩一杯浊酒喜相逢，天马行空地说着地道的中原雅音，亲切极了。去他娘的谨小慎微，这些年官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的话这会儿都和自己的三哥掏了心窝子。对袁世凯来说除了权和钱，这些年哪有这么淋漓痛快过。所以这时候的袁世凯在五姨太的眼里：“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而且是一只亢奋的野鹤。人这种动物大概还没进化完，一高兴就想炫耀。此时的袁世凯特别想炫给大家看看，所以他高薪请来了天津的大牌摄影师，一口气拍了“渔、樵、耕、读”四组

1911年初，载沣为了加强对新建陆军（北洋军）的控制，检阅新编练的军队，派大臣载洵等校阅陆军。图为校阅陆军大臣们的合影。左起荫昌、载洵、载涛、奕劻、载涛、麟光、帕勒塔、谭学衡。这里几乎都由满清皇家贵族子弟充当军队高层领导，除荫昌外，袁世凯的亲信被排斥在外。清贵少壮派以为如此这般，军权便牢牢地掌握在自家手里了。



照片。这四组照片是老袁的呐喊，是他的宣言，是他的“二月逆流”。

唉，人的秉性真是泰山也难移。您老当时怎么被人打回老家的？不就是得势不饶人，1906年到1908年那阵，您老飞扬跋扈，挤兑人家不说，还以立宪派领袖自居想成立责任内阁。什么责任内阁？在载沣等人看来就是狼子野心，“篡党夺权”。结果被人联合起来给做了。

做人还是应该低调点儿！

可袁世凯偏不低调，逢上过年或过生日，他还请来北京京剧界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晦芳、杨小朵等来唱堂会，好不热闹。

这种悠闲又嬉闹的生活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以至后来到中南海居仁堂里他仍保持着：“每日公余到晚间，袁率全家人口逛花园，进晚餐，与在洹上村时情形相同。”（徐正伦语）

到了第三年，那帮清贵少壮派组成的清廷，慢慢地显出能力低下的毛病。所以，慢慢地留在位子上的袁党老部下开始想老领导了，思念以前的“革命路线”了。开始一两个人偶然路过，参见参见，拜访拜访，后来大家成群结队地找上门来。老战友、老部下聚会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可想而知。

这中间当然有一个摄政王载沣默许的前提。载沣家的兄弟仨并不恨袁世凯本人，载涛还和袁世凯一同视察过新军训练，你想袁世凯会不利用这个机会，极力讨好载涛？他们恨的是重兵在握的袁世凯，飞扬跋扈的宪政派领袖袁世凯。现在袁世凯老实了，军权也没了，老乡一个。奉命前去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被袁世凯的糖衣炮弹拉下了水，不但没有实情报告中央，还替袁说好话，甚至还把北京的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漏给“同宗”的袁世凯。

警报解除了。这时候那些清贵似乎自己都在做反省，有点儿于心不忍，是不是当时对人家老袁太狠了。毛泽东后来重新启用“二月逆流”的老师，就有这个意思。历史往往是相通的，读不明白就拿自己亲生经历过的历史来想象。这叫用常识看历史。要知道我们和百年前的人在生物基因上几乎没有任何两样。将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长的。

这么一想首先就解决了最近史学界争论的洹上村电报房到底有没有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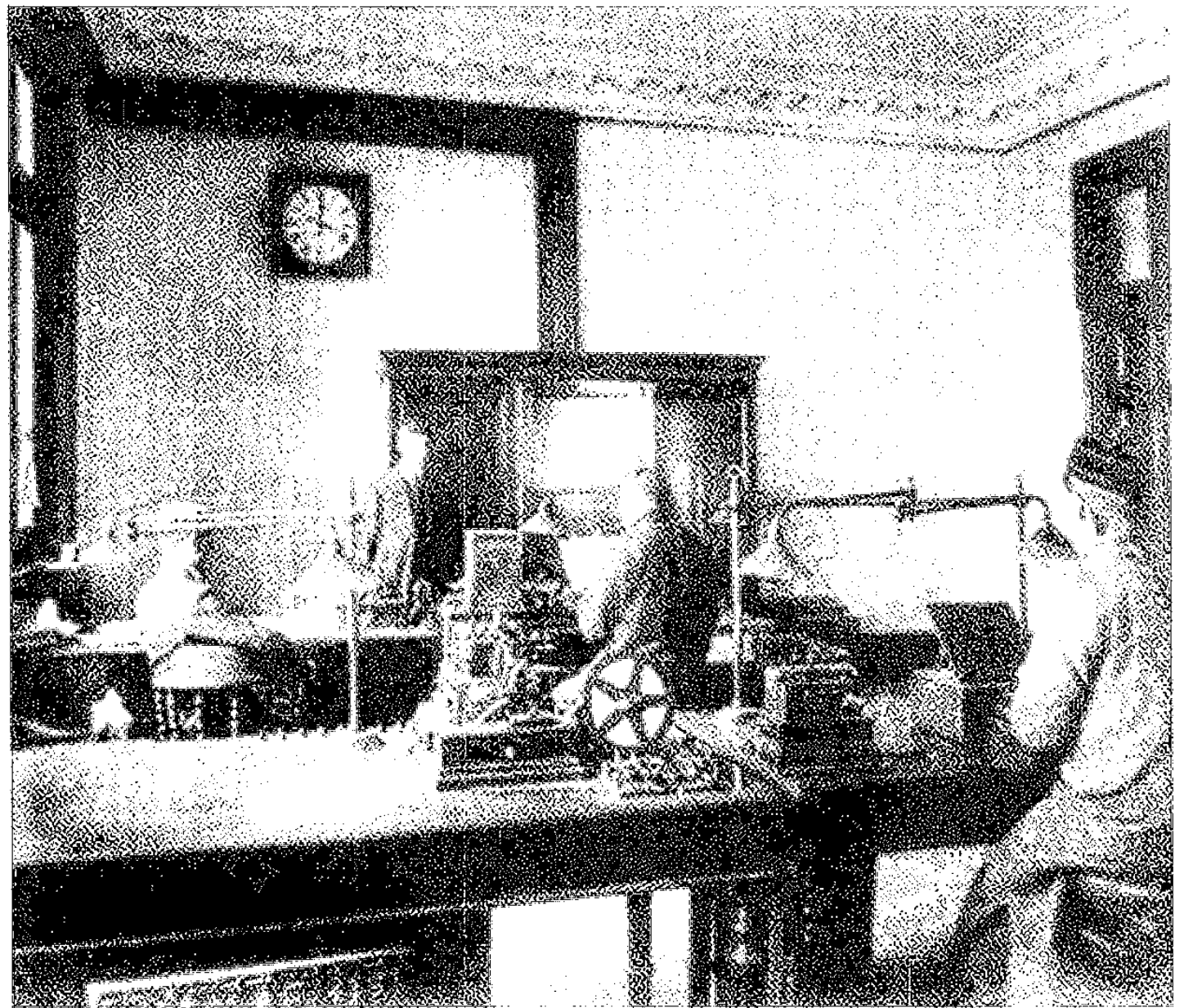
潜伏在涇上村里的“电报房”

以前都说袁世凯退而不休，私设电报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联络部下，待机谋反。广州的骆宝善先生以严谨的推理说：“No。”其理由，一是私设电报房，在那会儿不容易也不容许。二是袁克文说当时设一二人，只是去彰德商业电报房取电报纸的。可是，最近有人从1911年一些回忆录里证明确有私设电报房的事儿。

笔者以为，我们大家都忘记了主席的谆谆教导：事物是运动的，事物是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的。而袁世凯的涇上村那三年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第一年，袁世凯没有设电报房的必要，因为他自己还没缓过气来，顾不上这些锦上添花的事儿。偶然有事，应该是采取袁克文在其《辛丙秘苑》中记述的，养寿园并无电报房，只有管理文电的“司电报者”。这个时候设电报房，大大的犯忌，正好坐实了载沣他们的怀疑。袁世凯连这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就不配享用“窃国大盗”四个金光灿灿的大字。

1906年的一家商
用电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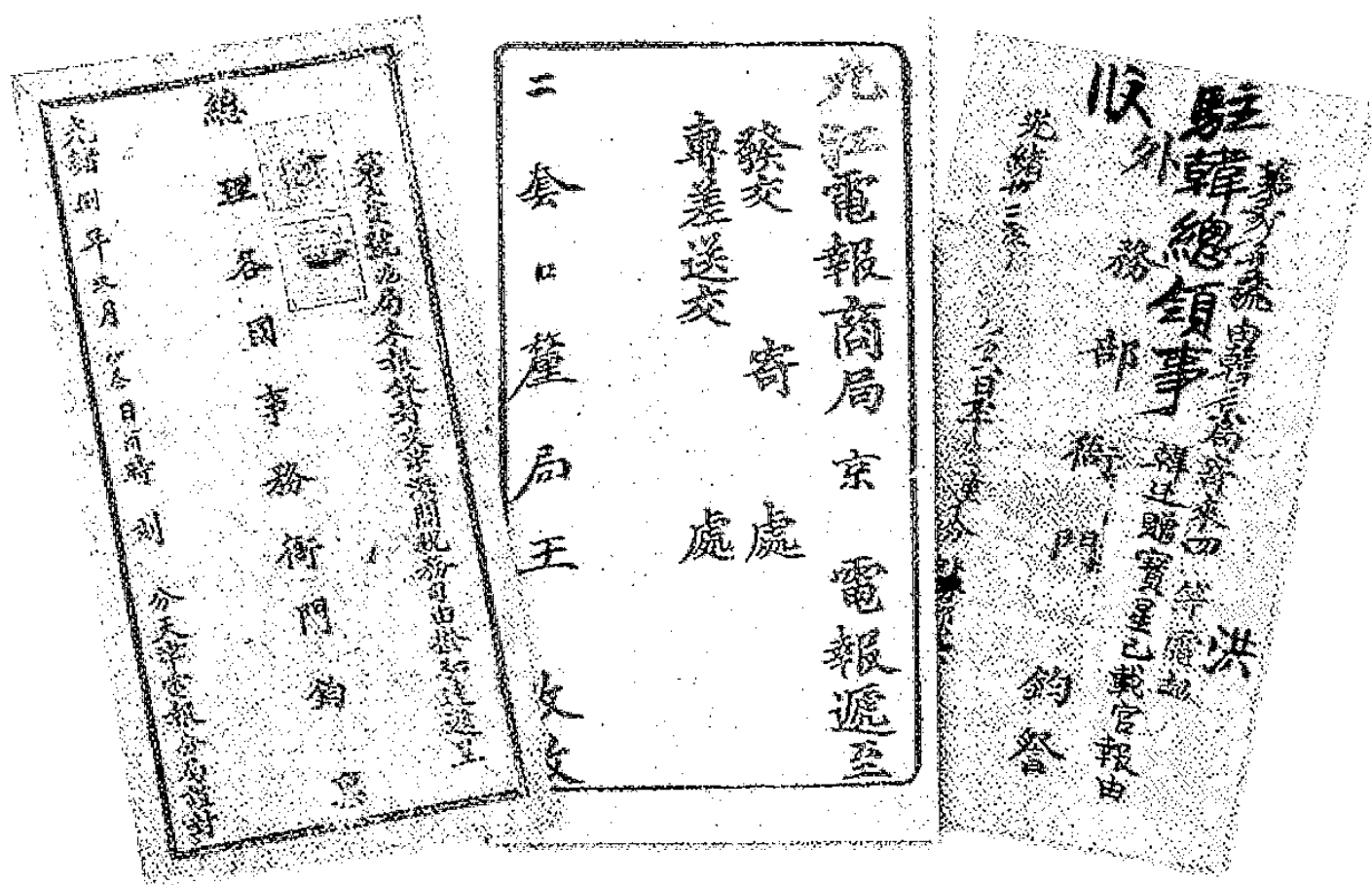
所以第一年，1909年，袁府对外联络的电报应该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透明”收发的。

第三年，1911年就难说了。

1911年的那个冬天，全中国期盼的眼光都聚焦在河南彰德府的洹上村。何止中国，应该说是全世界的人都对这个不足300亩的庄园投入了关注的目光。经过辛亥革命半个月的折腾，袁世凯的名字被所有的人搬到桌面上来议论了。革命党人、清廷、洋人、北京大街上的旗人，各色人等都在暗地里提到一个已被剥夺了所有权力的退隐老人的名字。各种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里，似乎都给这位洹上村逍遥自在的垂钓老翁留出了一个位置。可偏偏这时候老袁来劲了，他在那里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不给组织上一个准信儿。战场形势一日三变，这时的政府决策层、新闻界、列强，都有洹上村信息饥饿症。这时候就是袁不设电报房，估计摄政王载沣也要给他设一个（载沣连自己的位子都肯腾出来让袁世凯上，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这首先为的是政府方面方便，而且可以冠冕堂皇地对外说，为的是军事上咨询有过丰富斗争经验的袁将军，以便他发挥老干部的余热。

再说那会儿科技也是一日千里。查1911年，民间的电报业务在大清国已经很普

绝版袁世凯



晚清时期各类官商用电报纸

遍了，以至于该年四月上海电政局不得不移至清国首都北京，成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电政总局”。所以1911年为老袁装个电报，可能就跟1980年代普通家庭装个电话的难易程度差不多。再不行，于那样的形势下，袁世凯的部下也敢自作主张，从军队里调一台电报收发机给老领导用。如果上面问下来就说：对敌斗争的需要。

这么想就和陆军部秘书科长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旧历）随同陆军大臣荫昌南下征讨武昌兵变时，在涇上村看到的情景吻合了：“路过院中，见某室挂有电报处牌子，机声嗒嗒，聆之甚晰。”至于后面那句：“其时袁尚系罢斥在籍之人，而仍有此种不应有之设备，盖各方面电报消息，此三年中固无一日之隔阂也。”是这位秘书科长的推断，说明不了什么。至于军法处处长丁士源记载宪兵报告：“袁家有电报房。天津制台衙门电报生厉姓者，司电报之事。丁询曰：电线是否接通铁路京汉局电线。宪兵曰：然。丁即令秘书官恽宝惠注意。因京汉路有二线：一为直达北京；一为各站联络之普通线。故行营电报挂线时，必须两线均挂。致北京电，须用直线。恽曰：知之矣。”这更加说明，这个时候军部和有关单位已经和袁世凯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条便捷的沟通渠道。

所以说，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在变，载沣在变，老袁也在变。只能说老袁命好，终于让他借辛亥革命之机，等到了一个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

早期电报收发 1880年10月，清廷成立津沪电报总局，这是中国自办电信事业的开端。当时人工发报速度为每分钟20-25个汉字，按照路途远近制定收费标准，从上海发往苏州的电报每个字银元一角，这在当时相当于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的价钱。至1911年，由上海开通的有线电报线路达21条。



袁世凯也怕“拆迁钉子户”

后人对这段历史往往事后诸葛亮，说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在彰德府洹上村上的是“临时户口”。其实，他是做了“扎根”洹上村一辈子的打算的，为此他把下辈子的钱怎么挣都设计好了。

可以这么说，袁项城决定不回老家项城，在彰德府安家，一大半是因为经济原因。大概是老袁从前只顾政治上往上爬，忘了兼顾捞钱的事儿了。没想到，突发事件来得这么急，老袁一大家子退隐后的生活费还没有准备充足。所以经济问题是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

他曾说过：考虑彰德洹上村“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太）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

前面一句“爱其朗敞宏静”，是袁世凯的“假名士”做派。后面那句“土脉华滋，宜耕宜稼”，才是来洹上村的原因。我实地去过洹上村旧地，可以想象，100年前，那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之地。袁世凯做事情不爱硬来，他见到这里没住家，便认为会少了许多拆迁的麻烦。清代的钉子户一定不比咱们今天素质差。更有甚者，此时背运的袁宫保稍微出点事儿，北京的旗人在茶馆里是可以说上三天三夜的。所以非常时期，袁世凯就做了非常决断。你可以说他是不得已为之，也可以说他是老谋深算。

1911年10月11日，天上掉馅饼，辛亥革命爆发了。据说传到洹上村已经是第三天了。这天正是袁世凯52岁寿辰。宴席上的宾客都相顾失色，袁却捻着日耳曼军人的牛角胡子，神情释然。

袁知道，他袁世凯的新时代到来了！

洹上村里住了多少人

除袁世凯外，这个大院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洹上村家教杨景震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正太太1人，姨太太8人，男孩子15人，女孩子9人。凡孩子生下来即雇奶母保育，男孩六七岁即有男听差看管，各屋内均有丫头一二人。袁本人有上差四五人，院内有干净女仆2人侍候，外边各办公人有20余人，各办公人各有听差1人。厨房五六人，理发匠1人，管理电灯房2人，修理花及浇花四五人，尚有轿夫10余人，熬参茸汤者1人，管事听差者四五人。只此可计之人数即与部院大衙相类，其余附役小男孩则不知其数矣。”呜呼！粗算下来近200人！袁静雪也说“有几百人”。但是一位叫布洛克的法国博士去过洹上村，他在纽约时报1911年11月12日的报道中说有300人！两者之间的人数相差近一倍！

我想这可能是洹上村的两营马队被法国人算进了总数。杨景震没算是有道理的，一是这些军人都住在洹上村外一墙之隔的西营房，属于寨墙外的人；二是他们由官方派来参加这里的警卫工作，薪水不是老袁发的。

以前人说洹上村就这一家人，算不上个村，现在知道了吧，这一家人就等于毛时代的一个生产大队！

附录：

袁世凯的彰德府花园

《纽约时报》1911年11月12日：

巴黎，10月28日电。布洛克博士近日在前总督袁世凯家里拜访了他，并将此次拜访的所见所闻向笔者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他说：“我在六月的一个清晨，坐上京汉铁路的火车离开北京，到达彰德站时已是夜幕降临时分。袁世凯一辆精巧的中式马车由一头精壮漂亮的骡子拉着，载着我从车站来到前总督袁世凯阁下的府上。

我呈上随身带的一封信，是前总督的长子袁云台（袁克定，字云台。作者注）写给他父亲的。于是我马上受到了袁府的家庭医生和前总督的小儿子的接待。他们把我引至一间客房，这间房外形设计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而房

内陈设却又具有欧式风味。整个房子灯火通明。

第二天早上，前总督表达要见我的意思。他身穿白色丝质衣服，尽管留着白胡须，但看来他的身体仍十分健康，五十三岁的年纪在他身上只依稀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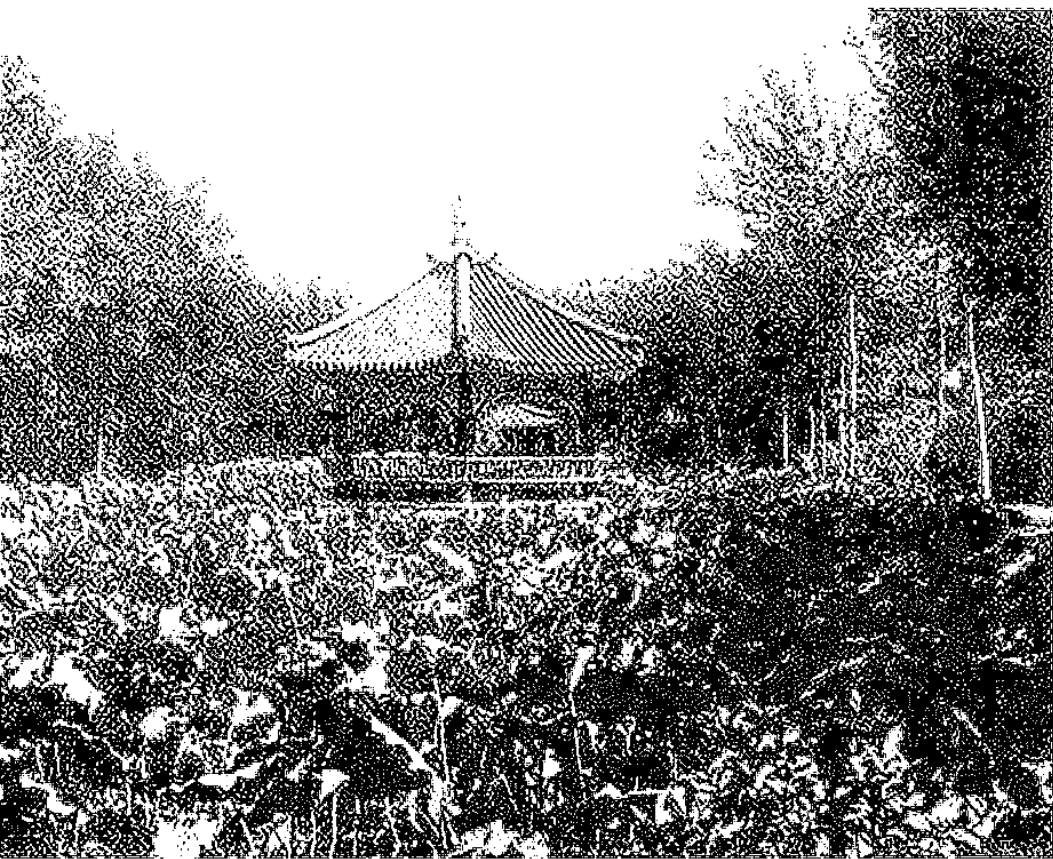
他落落大方地告诉我，他愿意接待我是给予了我很大的恩惠，因为，自1908年以来，他就一直过着一种隐居生活，生活在一种纯粹的宁静平和中，极少接见外人，除非是法国殖民军队的外科医生杰拉尔德·麦斯尼来访。他对麦斯尼医生非常尊敬。我们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医生在哈尔滨的逝世让他非常难过。

正是三年前，离开公众生活的显赫与忧虑的袁世凯总督大人（与他亲密的人一直这样称呼他）隐退到了距北京达五百公里之远的庄园，在这里与他的家人，他的妻妾和他的孩子们，以及他忠实的仆人们，安静地生活在一起。在这座庄园，大约有三百人生活在他身边。

他的花园赏心悦目，非常美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人工花园。（据说）在

彰德府西城门俯瞰城内街道 1909年5月美国地质学家张伯林拍摄，正好是袁世凯搬入洹上村的那个月。这样的小巷，与同时代中国其他城市比并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什么法国博士布洛克说彰德府的小巷“又窄又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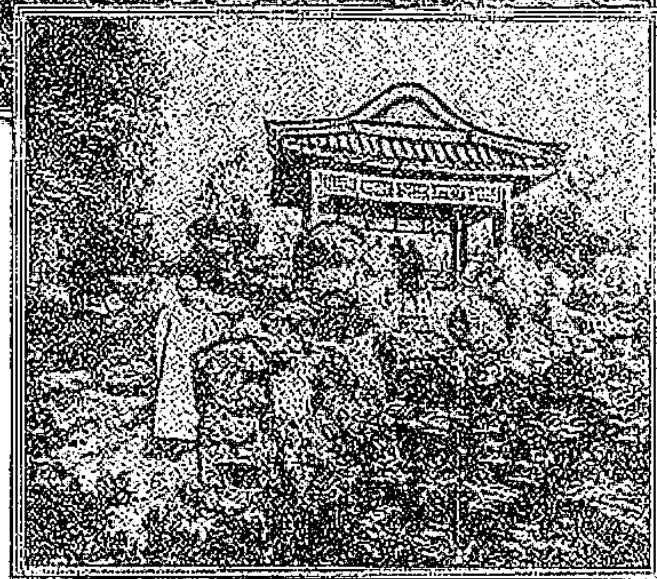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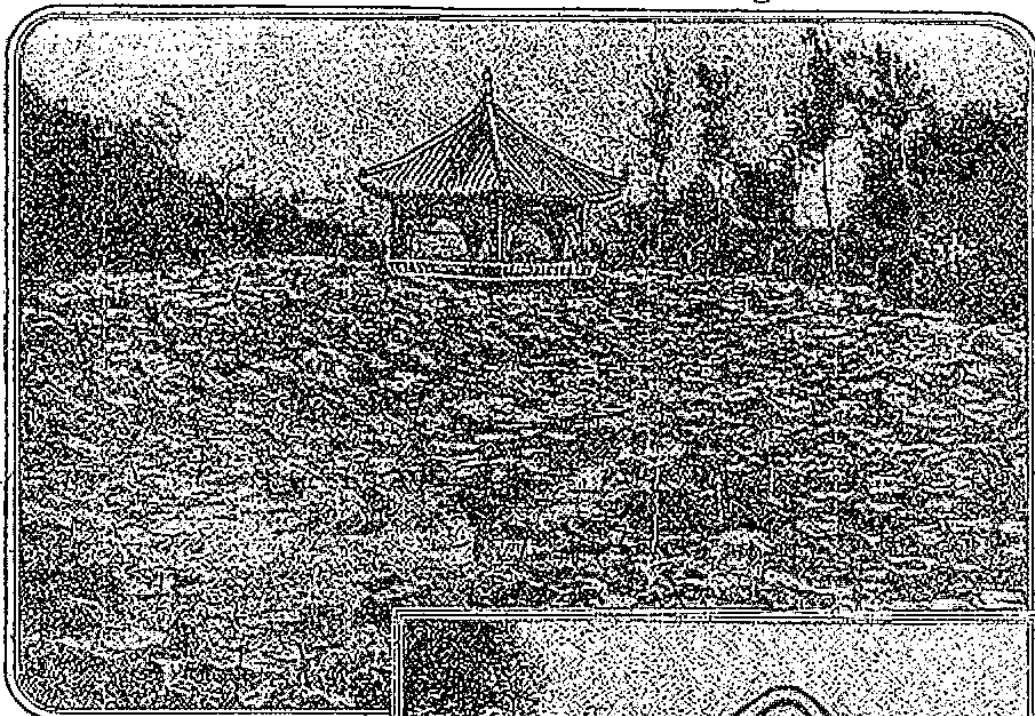
▲ 洗心亭 洗心亭在汇流池的中心，无路径可达，来往寄之于船。洗心亭是袁世凯在良辰佳期同妻妾观赏或宴乐之地。袁世凯晚年号为洗心亭主人，源于此亭。

▶ 《纽约时报》上的洗心亭 《纽约时报》1911年11月12日刊登整版文章《袁世凯的彰德府花园》，其中所配的照片是洗心亭。

▽ 1909年彰德府（安阳）文峰塔



Yuan Shi-Kai's Garden at Chang-to-Foo.



Special Correspondence The New York Times
 PARIS, Oct. 28.—Dr. Broquet contributes to L'Illustration a charming description of a visit he recently paid to Yuan Shi-Kai at the ex-Viceroy's home. He says:
 "Leaving Peking on a June morning, by the Peking-Hankow Railway, I arrived at nightfall at the Chang-to-Foo Station. A tiny Chinese cart drawn by a pretty mule carried me from the station to the yamen of his Excellency the ex-Viceroy Yuan Shi-Kai.

"I brought with me the letter of introduction which his eldest son, His Excellency Yuan Yuan-Tai, had given me for his father, and I was at once received by the Physician Extraordinary and the younger son of the ex-Viceroy, who conducted me to an apartment designed in Chinese style, furnished in European style, and lighted by electricity.

"On the following morning the ex-Viceroy expressed a desire to see me. He was dressed in white silk, and, in spite of his white moustache and beard, he seemed to me to be in perfect health, bearing lightly his fifty-three years.

"Very graciously he allowed me to understand that by receiving me he had accorded me a high favor, for, since 1911, he had lived isolated and amid the most profound tranquillity. He had, however, always made an exception in the case of Dr. Gerald Meany, the surgeon of the French colonial army, whom he held in high esteem, and whose heroic death at Harbin, still present in our memory, had deeply affected him.

"It is three years ago that, leaving the honors and the cares of public life, the Viceroy Yuan Shi-Kai (for his

down with his family, his wives, his children, and his faithful servants. About 300 persons surround him in this great yamen.

"The garden is delightful: it is the type of an artificial garden in the Chinese style. In a few weeks they had brought to it great trees, flowering plants and shrubs, and built pleasant pavilions of wood with harmonious roofs of colored tiles, inscribing eaves with large figures and garlanding others with gold-leaf, which shines bright amid the verdure. They excavated a large pool, where the rays of the sun played on the great green leaves of the lotus and on their blossoms of rose-color; and then they brought hither beautiful stags with their horns, and these fought for mastery amid the growing green things.

town. The ancient city of Chang-to-Foo, which goes back to the first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is a poverty-stricken capital, with narrow, dirty lanes, surrounded by a deep moat and a high wall, which is pierced by four great gates. At its corners are four tall watchtowers, from which one can discern the great monotonous plain through which the railway runs and the mountains which limit it on the west.

"The three tranquil years which Yuan Shi-Kai has just passed on this estate must have weighed heavily on this man of action. Long since he could have left his abode had he not wished to choose his own time to enter again the scene and if he had not preferred to await in his retreat the moment which has now come, when the

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人们在这个园子里栽满大树、开花的植物和灌木，还建了漂亮的木质凉亭，亭子顶的造型和谐自然，彩色的瓦片有的题着大字，有的饰了金叶，在一片翠色中闪闪发光。他们挖掘出一个大型的人工湖，湖中种荷植菱，丹碧成锦，花叶繁密。阳光在碧绿的荷叶上跳跃，在粉色的荷花中嬉戏。然后他们又把美丽的牡鹿连同他们的伴侣一块儿带到这个庄园。在这片欣欣向荣的绿意中，牡鹿们时常为争夺领导者的地位而争斗。

小小的新弯河水长流（‘新弯’是 Sin-Wan 的音译，作者注），水流轻快，河水清澈见底，流经庄园附近，然后到达花园，把袁府与小山分割开来。而事实上，这个小村都是建立在这座山上的。古城彰德府，自明朝初年就开始了她的历史。这是一个特困地区，小巷又窄又脏，深深的护城河与高高的城墙将小城围起来，城墙四面各开一个巨大城门。在小城的四角是四座极高的监视塔，从这塔上向远方眺望，人们可以看到广阔的平原。在这风景单调的平原上，铁路蜿蜒穿行。而平原的西边，则有崇山峻岭阻挡了它的延展。

在这个庄园度过的这平静的三年，对袁世凯这个实干家来说意义非凡。如果他没有选择在属于自己的正确时机再次进入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如果他没有选择隐退，静静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他早就离开了这片庄园。而现在，这一时刻到来了，这一刻，朝廷和摄政者都高声呼唤着他的大名，呼唤着他具有智慧的力量，呼唤着他的忠诚，呼唤他来拯救一个王朝，保护一个孩子，维护一个朝代至高无上的权利。”

《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是迄今为止笔者能找到的最早报道洹上村实际情况的国外公开出版物。从中可看出这么几点细节：

1. “养寿园”里采用自然放养的方式大量养鹿，这些鹿可能就是坊间所传的“章士钊亲眼目睹过袁将鹿茸当零食”中的鹿。
2. 整个洹上村居住者“大约有三百人”。
3. 间接证明了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驻京办主任”，对外联络的工作大多由袁克定完成。

亲历者揭秘袁家人生活起居

现在我们将眼光从涇上村的景色暂且移开，看看袁家人生活起居里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儿。

与百年来那些远距离的猜测和想当然的“真实故事”不同，一些近距离和袁家有接触的人给我们画下了一些近似白描的人物图。杨景震说：“袁家属人等衣服俭朴，衣以洋布为主，只袁本人衣多绸缎，冬天不穿皮袄，以貂绒作棉袄。至于他的饮食，除鱼、鸡肉外，每餐使姨太太做盘菜几个，以供口腹。办公诸人有菜数桌，亦是鱼、鸡肉丰盛异常。老师与众学生共餐，孩子多，每月有孩子生日，哪屋孩子生日哪屋送校中饺子若干；每餐的主食是米饭和馒头，每桌上吃下用一年无二样。”

关于袁的一妻九妾故事，最为后人津津乐道。

记得十多年前，我在纽约上课时，正赶上课上放映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一位平时话最多的老外男生，聚精会神地看着。一看便知，此时的他，显然让“妻妾成群”的故事给迷住了。看毕，他睁开红红的眼睛，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中国男人真幸福！”

其实那会儿，只要是个官，或者说有点儿钱的都是三妻四妾。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1912年12月，当时的北京政府还颁布了《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条例第十二条明确地承认了妾的存在。大理院也在解释妾的身份时说：“凡以永续同居，为家族一员之意思，与其家长发生夫妇类同之关系者，均可成立。法律不限何种方式。”

于是纳妾愈加自由。男子只要有钱，可随意纳妾，不受任何限制，以至很多人以蓄妾来炫耀财富。时人胡朴安记载说：“广东多妻制盛行，社会上咸以妻妾之多寡视其人财产之丰啬，故往往有纳妾以为虚撑门面者。闻某富豪家有胡椒树百零八株，每年收入极丰，而竟娶百零八妾。每妾各收一株之利益，以为饮食服饰之费。至于三妻四妾者，在在皆有，盖如此方足以维持其中等人家之体面也。”

那会儿的“三妻四妾”也是“成功人士”的标志。

袁世凯也不能免俗。当他的二儿媳妇、袁克文的正妻刘梅真为克文讨小老婆的

袁克文元配刘梅真老年时的照片 刘梅真，安徽贵池人。父亲刘尚文原是一位盐商，因经销长芦盐有方而大发，遂在天津花巨金捐班直隶候补道。逢年过节，刘尚文必备厚礼送直隶总督袁世凯，一来二往，关系益近，定下克文与梅真的秦晋之好，时刘梅真 18 岁。

除刘外克文还娶了 5 个姨太太，她们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没有名分的情妇据知情人讲有七八十个。



事儿大哭大闹时，公公袁世凯发话了：男人有本事才三妻四妾的，女人不可以妒忌。

“新派”的袁世凯在废太监、废宫女、禁鸦片等问题上态度积极，唯独纳妾他“不求进步”。与其道听途说“一妻九妾”的故事，我们还不如直接听听袁家上下是怎么说的。

原配于氏，认钱不认夫

袁世凯的轿夫班头冯培德 1960 年代学着当时干部的口吻说：“大太太姓于，是陈州人，作风正派。”这话得到家庭教师杨景震的证实：“正太太性极忠厚。”是啊，该有的她都有了：袁世凯将她当个“牌位”供着，她享受着元配正妻和“娘”的崇高地位，所以她也没什么好争好抢的（在袁家，“娘”只能于氏专用，“亲妈”为大姨太专用）。所以她心如止水，“隔个 3 天、5 天，他俩见面相敬如宾，我父亲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她也一定回答一句：‘大人（妻妾们一直称呼我父亲为大人，直到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你好！’接着，再随意谈上几句生活上的闲话，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一次会见。”（袁静雪语）

平淡无味，形同路人，这是女儿看到的表面文章。听听袁世凯自己的说法吧。他在给自己二姐的信里多次提到，这个于氏“性情甚劣”，“时常生事”。于氏曾去过朝鲜，袁世凯说她“糊涂，来此数月，弟徒添一桩闲事，殊无谓”。抗日援朝期间的袁世凯，当时最多是个处级干部，囊中羞涩。可是回到河南老家的于氏常常让二姐

袁世凯元配、正夫人于氏 克文说她“出身沈丘县，大袁世凯一岁。62岁过世”。没读书，不识字，是个老实的乡间女子。一次新年，袁世凯接见各国公使，第一夫人自然要陪同接见。忽有某国公使走到这位夫人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大为惊慌，“嗯”地一声，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弄得那位公使十分尴尬。



在信中向他索要钱物。袁世凯光火了：“此间自去年用度太大，至不能了。继母（袁克定小名继光，袁叫于氏为继母）本有钱，何必专向穷人打扰，可告以俟有钱时清算账债，一分亦不能少他（她）的，毋为念。此时实不可了，不可又来挤弟，亦须体亮（谅）其夫。天下岂有其夫富贵，其妻反贫贱者乎？弟非情外之人，可毋多心。”无理取闹，无知又爱财。这就是袁给发妻画的像。

于氏眼看拉不回老公的心，便来个眼不见为净。后来她很长一段时期都情愿留守在涇上村。这就害了她的亲生儿子袁克定，为了陪老妈，一次在涇上村逗留期间，克定不慎从马上摔下，跌成了个瘸子。

这个乡间女人真正的风光是在她死后，就在袁世凯死后四五年，正太太于氏也在涇上村过世了。这回她享受了和袁世凯同穴的待遇，再也不怕老公挤兑她了（袁葬东室，她葬西室）。出殡时，据当时从北京特地赶来为她办丧事的萧景泉老人说，丧事“用的还是‘皇杠’，64个杠夫”。这可比得上袁世凯葬礼的高规格了。

大姨太，是上海爱上的还是天津买来的？

大姨太太的故事最多。袁静雪说：袁世凯22岁前去上海，“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



袁寒云（克文）
先生及眉云夫人

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

这段故事有明清小说的真传，故电视剧编剧大多采这个说法。其实关于她的说法比较多。她的过继儿子克文说：她是江苏崇明人，农家女儿，靠姐姐度日，后来被拐卖到天津妓院。克文说她像烈女一样以饮毒明志，坚决不从。后来这件事情感动了老爸袁世凯，袁给她赎身，沈氏感动，自愿为妾。然后去朝鲜。

妹妹和哥哥的话对不上，其间可能说话的年代不同。妹妹的话是1960年代说的，她想和窃国大盗划清界限，有点作践自己的父亲。哥哥的话是1930年代前后说的，北洋的余晖还在，他要维护这块牌子。再说沈氏对他的宠爱是没说的，要铁，恨不能把锅给砸了。他感恩也会这么说。

沈氏一生无出，后来过继袁克文为儿。她享受着仅次于“娘”的“亲妈”称号。在当时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她同样是以“我父亲的‘太太’的身份出现”。（袁静雪语）前期兢兢业业地管教二、三、四、五4位姨太太们，袁世凯入中南海后，因其年岁已高，免“轮流值宿”，常住天津。

袁世凯的个人生活中还有“涉外婚姻”，他的二、三、四3位姨太太是朝鲜人。“二、三姨太太系朝鲜国送给的，性亦忠厚；四姨太太早逝。”（杨景震语）袁家医生徐正伦有这么一说：“二妾李氏，三妾金氏，四妾吴氏皆朝鲜人，系朝鲜閼妃所赠。原共4人，其中一人在袁回国时潜逃。”三姨太生的二子袁克文说：二姨太姓白、四姨太姓季，三女皆贵，但金氏“世有显贵”，而白、季二氏仅为“望族”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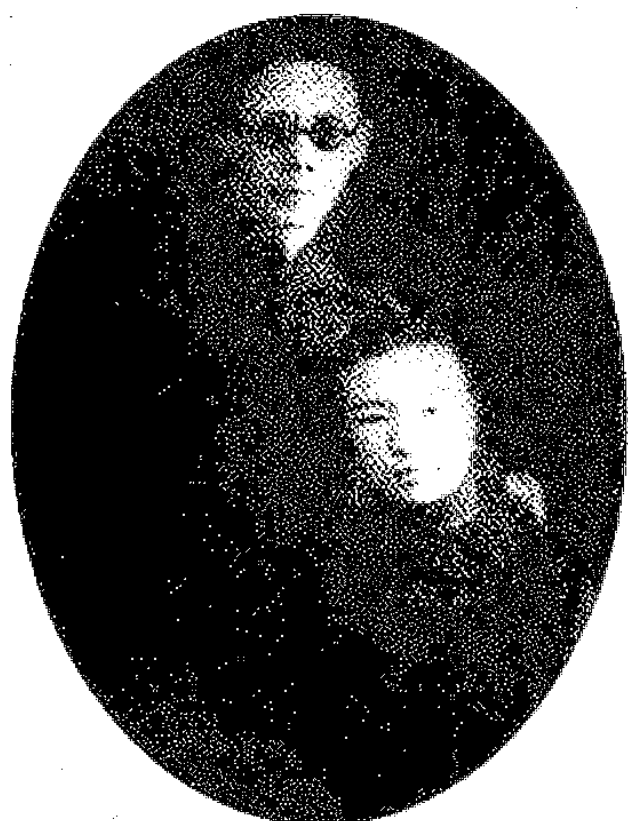
二姨太糊涂，被人宰

二姨太吴氏（一说李氏，克文说姓白），朝鲜人，生儿女六个。一生故事不多，从有限的资料看，她人缘不错，因为她随和不爱较真儿。克文说他和正夫人于氏关系处得不错。袁家医生徐正伦对这位二姨太下笔颇多，可对其性格略见一斑：“袁的家庭财务，以前由二妾吴氏保管，因袁克文从吴氏手内托词要走一个 10 万元的银行存折，袁世凯认为吴氏软弱无能，就改交五妾掌管。袁世凯死后，吴氏在津居住，每月电灯公司来收电费的时候，门房向吴氏把钱要到手里，暗地吞没，对收费人说：“欠一欠下次给。”下次还是如此。到第三次门房拿上 3 个月的欠费条一齐要，吴氏照样付给。此类事件很多。这么看，二姨太老来应该患了健忘症或者她是个烂好人。

二姨太生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之女为妻）、六女纂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二姨太吴氏和六女儿纂祯
(嫁与民国总理孙宝琦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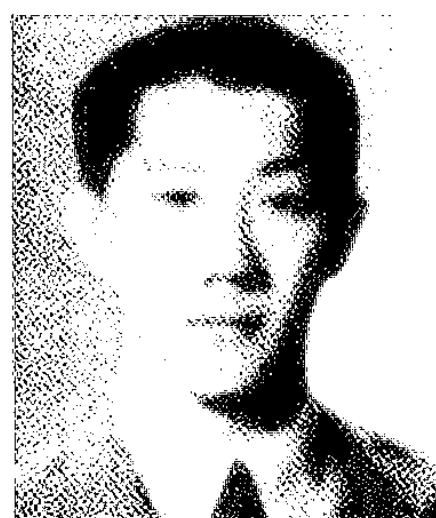




五子克权，二姨太所生。1913年和六弟克桓、七弟克齐同赴英国留学，1914年回国。一生不问政治，以墨自娱。1941去世，45岁，夫人为两江总督瑞方之女。（上图）



十子克坚，二姨太所生。袁死后，徐世昌女悔婚，后娶陕西督军陆建章之女陆毓秀。



十二子克度，二姨太所生。留学美国，攻化学，英语很好。他会制作法国香水，发明过一种奇特而简便的复印技术，1976年去世。

袁世凯奉子娶三姨太

三姨太金氏，是克文和袁静雪的生母。这两人给其生母画了两张脸。克文说她在袁世凯逝世当日，吞金殉夫。幸亏家人及时发现将她救下，但已损伤食道，留下了一个咯血的毛病，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她为袁世凯生了五个儿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楨、八女（早亡）、十女思楨。

三女儿袁静雪（袁叔楨）说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三姨太金氏时，最不吝惜笔墨：

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人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合闹起气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袁叔被（左，后改名为袁静雪）和十女袁思被（右） 袁静雪在1960年代写过《我的父亲袁世凯》，由于有大量近距离观察的第一手资料，本书从中受益匪浅。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到她屋里去，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的时候，我父亲说到高兴去处，她虽然也陪着一笑，但笑过之后，立刻把笑容敛住，于是她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出丝毫笑意。她在过年、过节和她自己生日的时候，总要暗暗地哭一场。她嫁到我家以后，从没有回过娘家，娘家的人也从来没有来看过她。……在中南海的时候，她并不是每天都到居仁堂去的。但是，我父亲见到有什么好吃的，或是她所喜欢吃的东西，总是时常叫佣人请她同吃。此外，我父亲对于她无论在礼貌词色间，或是物质待遇上，都比其他姨太太要特殊一些。这或许是我父亲于心有愧，才借此来弥补他的罪过吧！

她在死前的头一天里，对我二哥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太借对她教导和管束的名义，对她进行虐待。有一次，大姨太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由于她的左腿被打得过分厉害，受了内伤，以至于临死的时候还经常疼痛，并且还不能伸直。另一件是，她的父母原来也认为她是嫁给我父亲做‘正室’的，及至过门以后，才知道她不但是一个姨太太，并且还把她和两个陪嫁的姑娘排在一起，成了个三姨太太，自然已经十分痛心。后来，她又要随着父亲离开朝鲜，更是加倍的伤感。特别是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爱女迢迢千里地到一个陌生异地去，今后自然很少再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悲痛和思念的情感，就交织在这

个老人的心中。有一天，她母亲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仿佛也就投井自杀了。她父亲既痛心于女儿的遭遇，又看到老妻因为女儿的缘故竟至自寻短见，当时悲痛得吐了很多血，3天后也就身死了。她在说完第二个故事以后，又对我二哥说，她所以不愿意在这以前说起这件事，是为了免得暴露我父亲生前所做的错事，由这一点看来，她算得是用心亦良苦矣。

三姨太的事儿本来有儿女亲自著文介绍，已经不需补充什么了，但是袁世凯自己有话要说。袁在写给二姐的信中告诉了我们三姨太的另外一个故事版本：1890年4月3日，袁世凯说他的一个朝鲜女婢怀上了他的第三胎。因为前两次流产，本以为不会有孕，谁知“近形迹已大露，据医生与老妈云，的是有娠”，可能还是个男胎，大约6、7个月了。重男轻女的袁世凯接着感喟道：“十三年来，未立继丁，老亲时为

绝版袁世凯



二子袁克文，三姨太所生。袁克文是个天赋聪颖、风流倜傥的文人。人称“袁门子建”。他不仅填词作画好，书法也好。后经济拮据，他就以卖字弥补生活。克文还爱好收藏古玩、邮票等。只要是他所爱，不论价钱多少，都要收买，真是挥金如土。



袁克文戏装照（1920年）。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戏剧。尤其是昆曲、京剧，他能清唱，能彩唱，经常登台演出。袁克定竭力反对他登台演出，认为有辱家门。一次义演，克定叫来天津警察总监阻止。克文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就不再唱了”。结果还是照演，克定也奈何不得。

盼，今果生男，可又慰慈怀，乞代察。”

原来袁世凯娶金氏是奉子娶妾啊！从袁世凯的信里我们还知道，这位金氏女婢是几位女婢中的“小者”，而且她是有名有姓的，叫金云溪，袁世凯改其名为金月仙。金月仙果然在七月十六日给袁世凯生下一个男孩，袁给孩子起名袁克文。

四姨太吞金自戕，为夫殉情

四姨太吴氏（克文说姓季），生前故事不多，吴氏死后有两种说法。克文说她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生琪祯得了病，又误服了“夷药”而死。还有一说，1916年袁世凯去世，四姨太也吞金自戕，死后被葬在袁林正西约500米处。据长期工作在洹上村的张有明老人说：1963年8月，安阳连续8天暴雨，洹河多处决口，洪水就将道路冲了几条1米多深的壕沟，这才发现四姨太的墓棺。原来，1938年日本兵在袁坟之西修飞机场，要移坟。袁家后代趁夜深将棺抬到袁林照壁墙南埋葬，据说陪葬中有不少是黄金制品。现在四姨太吴氏仍在那里长眠。

四姨太生有一男三女。四子克瑞，三个女儿是仲祯、敬祯、复祯（琪祯）。

五姨太卷走不少袁家宝贝

关于五姨太杨氏，我们还是听听他儿子袁克桓口中的故事（克桓同学的后代转述）：五姨太“是天津杨柳青人，家里除有土地，还有一货栈，山东、北京、天津都有分号，主要经营瓷器、帽筒、掸瓶、鱼缸、餐具什么的。袁世凯做山东巡抚时，杨氏随父经营济南分店。杨氏的纤纤玉手，雅致的‘三寸金莲’，梦一般勾动了袁世凯的目光和心绪。杨氏听过法国传教士乡村传教，记忆好，嘴巧心细，既能周旋，又能果断，还精于账目，深得袁世凯欢心。袁将管家大权交给她，家中的日常生活，该吃什么该穿什么，都由杨氏一手经营”。

可能是得势遭人妒忌，也可能是精明过了头，容易得罪人。只要不是五姨太这房的大多没说她什么好话。袁家医生说：“五妾杨氏，天津宜兴埠人，系袁克定之妾马彩云为邀袁世凯的欢心买来献于袁的。”又说：“杨氏在袁的诸妾中，人最严厉，家

内上下人等无不畏惧。袁诸子分家时，据袁的老管事（现忘其名）说：‘五老太太（指杨氏）拿出来好东西还不到二分之一。’因此杨氏一股所得袁世凯的遗产最多。杨死后，她所生的4个儿子克桓、克轸、克玖、克安分居时，除房产、存款和珍贵物品外，仅最好的麻将牌一项，每人即分到72副。这是克齐之妻孙用熙对我说的。”袁克文在《诸庶母传》里几乎对每个“庶母”好话说尽，唯独给“五庶母”的好话既吝啬又尖刻：“颖敏得先公欢。”

袁静雪开门见山就是：“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我父亲不仅让她照管自己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家务，管理各房的女佣人和丫头，管理我们兄弟姐妹们，还管理六、八、九3个姨太太。由于我父亲很能听从她的意见，所以不论是谁，只要不服从她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告诉我父亲，由我父亲出面解决。因此，全家上下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而对抱她抱有畏惧的心理，就是我娘子氏也不例外。”瞧，五姨太让于氏这样的人产生了不安全感。

五姨太还有个毛病，用我们这一代的话说：“对人马克思主义，对己自由主义。”在袁家内部暗中为“立太子”事儿较劲时，五姨太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司马昭之



迁出中南海的五姨太与六子克桓（右）、八子克轸（左）在自家门前

心连袁世凯都看出来：“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袁静雪语）

五姨太毕竟是聪明人，知道别人不待见她，袁世凯一死，就另立门户。五姨太自己说，“老爷去逝后，我们离开中南海，遵老爷遗嘱，每个儿子15万元，一个姨娘一幢楼。我带着克桓、克轸、克玖、克安搬到天津地纬路大营门一溜两层德式洋楼第三幢。”

1916年6月6日晨，袁世凯死在居仁堂楼上。在全家忙于办理丧事时，五姨太趁乱让仆人将袁世凯房中的保险柜搬到自己居所，连墙上的大挂钟也不放过。袁的财产，按儿子们的人头份瓜分，五姨太有4个儿子，自然不吃亏。此外她还独揽了袁世凯的大部分贵重器物。

五姨太生六儿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玖、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禎、十五女（早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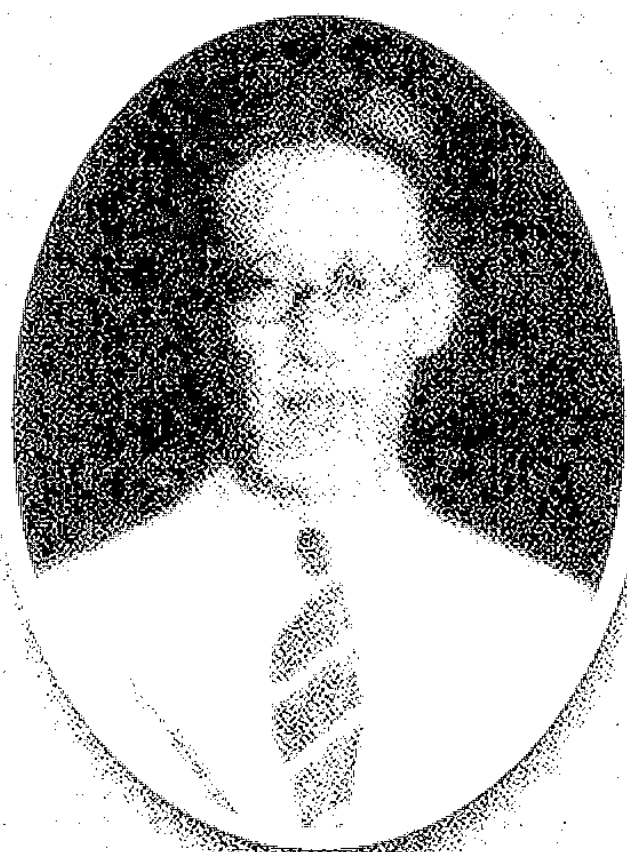
二女儿袁仲禎（左）和她的小姑（右）

左图为袁世凯的七女儿袁复禎（1931）



六子袁克桓（1898—1956），五姨太所生。袁去世时，克桓18岁。分家时，分得现款银元8万元，黄金40两，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耀华玻璃、盐业银行、华新纱厂、天津造胰公司等股票）总面值约7万余元，投向了实业。后娶监察御史陈启泰的女儿陈徽为妻。陈家颇殷富，陪妆奁了一火车。这对袁克桓的事业，无疑也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后克桓成北方闻名的实业家。人民政府曾经考虑他做天津市的副市长，58岁时过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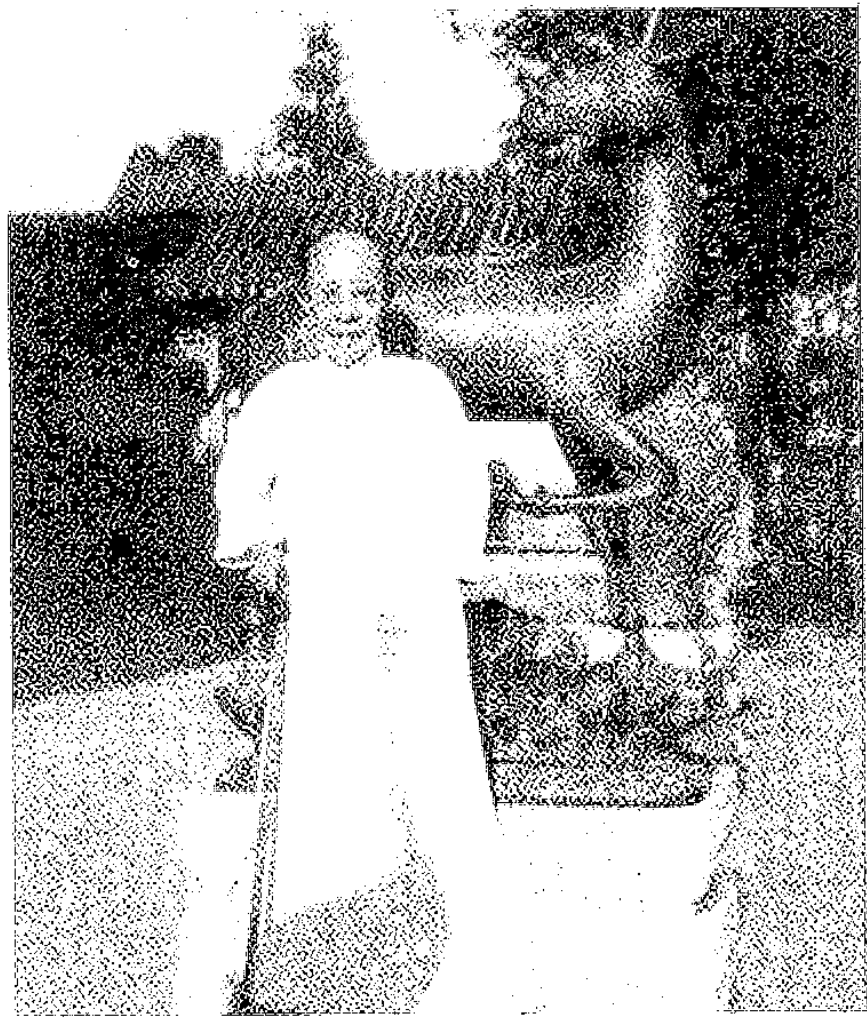
八子袁克轸（右站立者），五姨太所生。中间坐者为五姨太杨氏，左立者为袁克桓。后人曾这样点评袁世凯的儿子：“长子克定最有权；次子克文最有才；六子克桓最有钱。”



九子袁克玖，五姨太所生。“克玖自幼与黎元洪之二女黎绍芳订婚，绍芳患神经病。他留美回国，知绍芳有病，就暗暗地与舞女李熙订白首之盟。他的母亲杨氏主张先娶回黎绍芳，于是得到一份厚奁。婚后黎绍芳被弄到一个小院单住，随后送入疯人院。克玖此时就马上与李熙结婚。”（徐正伦语）但是据说他很爱国，当其听说袁家骊加入了美国籍，非常生气，气愤地说：“咋能那样啊？入了番邦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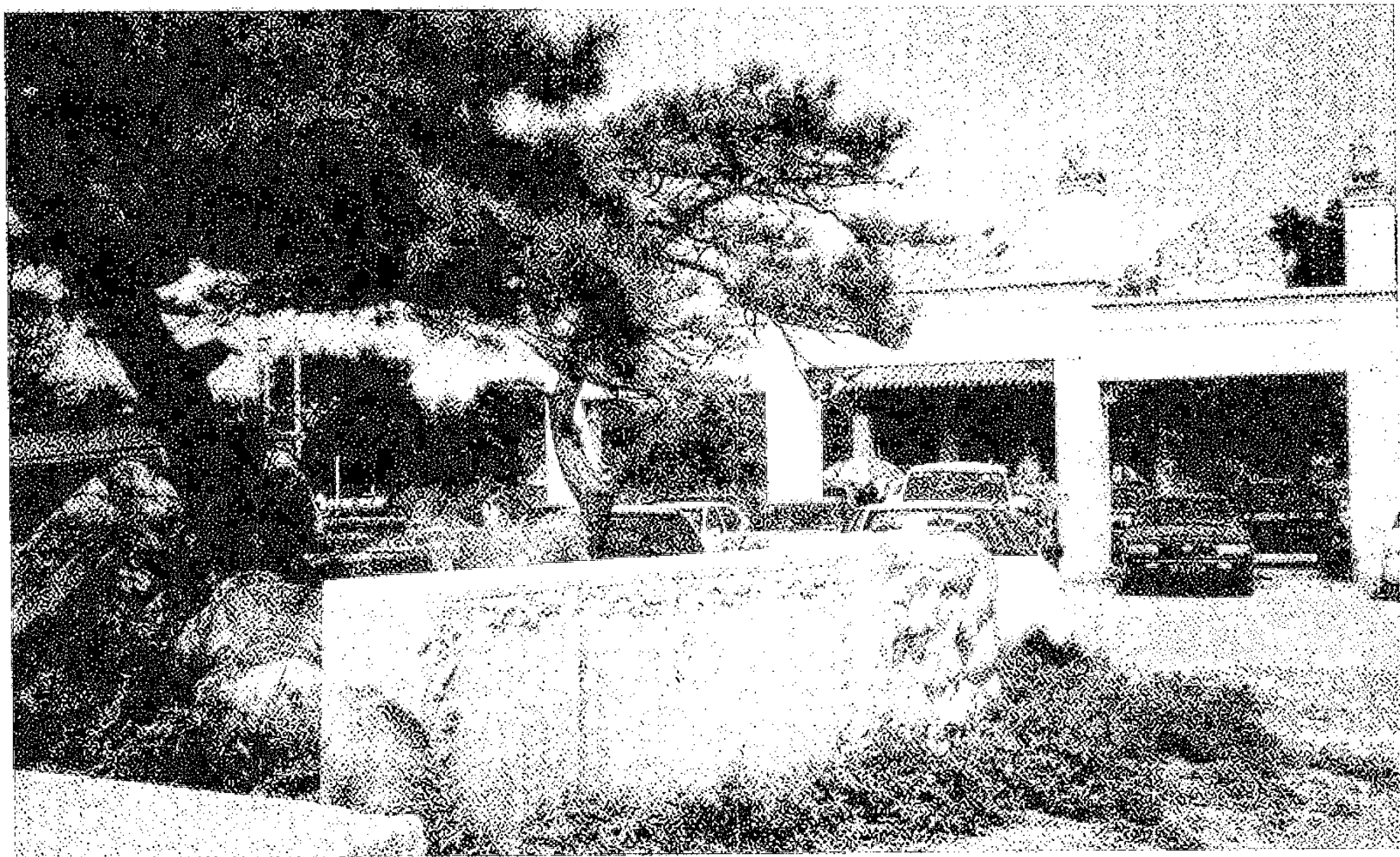


五姨太老年时的照片



五姨太墓地今天成了北京植物园一停车场。1937年，58岁的五姨太去世，墓地建在今北京植物园斜对面的香山路南侧。墓地当年十分宏大，有石雕牌坊、石柱、华表和石狮，墓道两侧排列着石人、石马、石羊等，这些都是从前清贵族的墓地上买来的。

1966年文革“破四旧”，生产队挖掘了该墓。棺材打开后，里边的衣服、被褥色泽鲜艳，尚未腐烂。有个老太太捡了一篮子衣物，提着刚走出几步，就变色破碎了。挖开的墓穴，曾作为养鱼池，三间门房，也曾作为生产队的仓库。现辟为停车场。昔日的石雕构件则堆放在停车场内的松树下。



袁死十多年，六姨太怀了个男胎

六姨太太叶氏，她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她原来是克文妓院里的相好，后阴差阳错嫁给了情人的老爸袁世凯。克文在报上写到“六庶母”时说她17岁嫁袁世凯，性格温柔，而且人聪明，在女馆里一年不到就会填词写东西了。行文走字间，看来克文还是很欣赏“六庶母”的。

袁家的医生徐正伦说：“民国元年春季，袁世凯眷属有一部分在天津居住，克文曾携妻刘梅真和六姨母叶氏在包厢听戏。由于叶氏改装为少女，引起克良的怀疑（克良自幼有精神病），后来到京向袁世凯夸大其词地揭发。这使袁世凯大为震怒，召克文至前叱令跪下，拿起棍子要打。那时克文的老保姆跪着趴在克文身上，刘梅真也抱着只有一周岁幼子家骥跪在一旁求情，袁世凯才喝令克文滚开。

接着徐医生又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六姨太的小秘密：“1929年春末，袁世凯死后10多年，他生前的宠妾叶氏，接我到小白楼住所诊病。叶氏满面愁容还带怒气。我诊查后，劝她据实说明病情。她说：今天才由姜爱兰医院出来，住院以前月经已经停止3个月，曾请梁宝鉴大夫医治，据说是长东西，须要住院动手术。梁宝鉴介绍住姜爱兰医院。到院后，梁又请来德籍女大夫一人，同姜爱兰会诊。动手术那天，3个大夫把叶氏的儿女叫到手术室内，取出一个成形的男胎。手术后的第三天，叶氏突然发高烧，经打针后仍不见愈，就主动出院，不再叫他们治了。我找到姜爱兰医院和梁宝鉴，问明上述经过属实，只手术费一项就700两银子。以后由我诊治两个多月，共去了75次，每次出诊费为8元5角。”

最近看到一个贺兰县政协的文史资料，发人深省。口述者曾任宁夏京星乡领导，名字叫高钧。高钧告诉我们：六姨太姓叶名蓁，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家境较好。瓜子脸型，浓眉大眼，高窕身材，三寸金莲，知书达理，美貌聪慧。

袁死后，六姨太子女分得银元26.4万元（大约相当于眼下人民币4千万左右），黄金20条，房屋100间。叶认为这些钱一世都用不完，于是到处投资，连白粉的生意都做，结果都失败。又不会理财，还大手大脚地花，到抗战胜利时已将财产全部花光。解放初期，全家靠在北京街头卖冰糖葫芦维持生活。

1955年，北京因城市无业人员过多需要向外移民，当时说“天下黄河富宁夏”，

去了就分配住房，可以过好日子。叶一听宣传，脑子发热，报了名，戴了大红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去大西北做社会主义新移民。

1955年5月24日，叶氏一家移民到了贺兰县京星乡三村。移民蜜月期当口，当地政府给她家分了两间房，每月供应块煤180斤、煤油4两（16两秤，等于现在2两半），每人每月供应口粮35斤（粗细粮按比例搭配）、香油2.5两，另外每人每月发给菜金1.44元。除此外，叶氏一家还有次女奇祯每月由天津寄来的二三十元现金，生活水平在京星乡所有北京移民中属上等。

叶蓁嫁给袁世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了京星后，她仍然保持了足不出户的习惯，不与外界接触，除非邻居来到家中才敷衍几句，一般不与外人闲谈，对其身世从不向外吐露。潜伏得够可以了。尽管这样，还是有好事者传言出去，常引得人们去看这个“皇帝娘娘”长得怎么样。当时她年过六旬，小脚，走路不稳，家务活都由儿子干，她只是为儿孙做一些针线活，缝补衣物和做鞋，闲暇时看一些书报。她最大的嗜好是吸纸烟，且烟瘾很大，每月吸烟在30筒以上。50支装耕牛牌纸烟，当时一筒0.12元。

两年后，叶氏一家人的安定日子被一场政治运动搅乱了。1957年反右时，因移民中，上至袁世凯的姨太太、儿子，下至日伪少将，国民党军、警、宪、特，还有资本家小业主等，文化程度高，讲怪话提意见的人多，故县上将这里作为运动的重点，分配了相当高比例的“地富反坏右”指标。运动以后，移民有被杀的，有被关押劳改的。仅被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帽子的就有四十余人。那时，叶家虽未戴什么帽子，但因家庭出身，被列入内部掌握的监管对象。

1956年后，移民的供应标准逐月降低，至1958年秋供应完全被取消了，移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大锅饭”制度，大人小孩都要到公共食堂分组就餐，谁都不能例外。这对叶蓁来讲尤感不便。平时她连门都不愿出，这时要她每天三次到食堂去吃饭，她只好扶着墙，扭动着三寸金莲，一步三摇，走向食堂。年已67岁的叶蓁，那金枝玉叶的身躯经历着如此折磨，她也只好忍耐。也只有这个时候，京星乡的老少才能一睹“娘娘”的“芳容”。

儿子死后，叶蓁从此就病倒了。一天，队长徐勤发现叶蓁三天没到食堂吃饭。进门一看，她家的窗玻璃全被打碎了，炕也塌了一半，老太太就睡在尚好的半边。

炕上铺着稻草，身上盖着露出烂棉花的破被，大小便就在那塌陷的炕里，屋里又冷又臭。徐勤看了很难过，以组织名义暂时改善了一下她的生活。

1958年12月31日夜，叶蓁走完了她67年的人生旅程。叶的尸体用一张苇席卷上，埋在了她儿子袁巨勋的坟旁。

叶蓁死后一个月左右，县银行来人拿着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信找来。信的大意是说：经查你单位叶蓁在民国期间（约在袁世凯死后不久）存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6000元银元（这数字在当时的上海可以买个小洋楼）。因她女儿袁奇祯要求继承，北京分行不同意，此款应由叶蓁本人领取，请查找本人。乡里实情相告，叶蓁刚刚去世，儿子也死了，只有两个孙子，生活非常困难，能否由孙子领取。来说本人不在了，如何处理我们不好答复，只能由北京分行决定。那时乡里出具证明并提出此要求，但没有回音，不知这笔存款做何处理了。

叶蓁死后半年左右，1959年夏初，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来的公函上说，经查原在南京某半条街的房屋，在1937年前是叶蓁私产，不知何时所置。日本占领南京后，被日军机关占用了。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军队按敌伪遗产接收，没查出房子主人是谁，就用作军营。1950年代南京政府落实私产政策，查证房屋的主人是叶蓁。经与北京联系得知叶蓁移居宁夏，便发函通知叶蓁接收。乡里提出与上次同样的要求，结果仍无回复。

看后，我一声叹息：唉！六姨太啊！我说你啥好！

倒放叶氏的一生镜头：少女的六姨太是个爱笑爱玩的阳光女孩，青年的六姨太是个不谙世故的情种！否则“家庭富裕”的她为何自上青楼？少妇的六姨太玩心不减，做了人妻还装扮少女和老相好偷着外出看戏就是一证。中年的六姨太是个感情丰富的寡妇，袁死十多年，爱火不熄，冲锋不止。我的感觉，这是一个情商颇高的江南奇女子，可是世间往往有点儿吊诡：情场得意，商场就失意。她玩得疯了，便把投资也当儿戏，亿贯家财也让这个感情丰富的女子给败了。

她一生与三个大数字擦肩而过，到头来却一席芦苇裹身，丢弃在风沙雪地里，尸体最后大多是喂了西北野狼。（1950年代西北野狼多，儿时就有闻。我的邻居一家那会儿因历史问题，“被下放”到甘肃，十多年后回来，老二没了，家人说老二当时出了火车站去空地撒泡尿，就被站外的野狼吃了。）

26.4 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听我老母说 1930 年上海大世界旁的一座小楼叫价 8000 元，26 万可以买 30 座“一环”以内的小洋楼！现在时价一座最少 1 千万，就是 3 个亿啊！别说还有黄金 20 条，房屋 100 间，娘家在南京还有半条街的不动产，光一万一平米的拆迁费，你想想是多少！除此外银行里还有 6000 元的现金，1959 年的 6000 元！那会儿上海普通人家一个人全部生活费每月 10 元，（现在要 1500 元到 2000 元），替叶老太太算算吧！加在一起，叶氏可以上 2009 年胡润排行榜前十的啊！可是这些钱都让她败了，忘了。

赵本山的小品怎么说来着：人生最可悲的事是到死时发现钱没用完和没到死时钱就用完了。两样都让叶老太太摊上了。

反过来想：玩过，爱过，得过，败过，错过。人生得一过便算精彩，叶氏呢？

六姨太太生五子女：十四子克捷（袁巨勋）、十七子克有、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死后才转正

七姨太张氏，河南人，无出，因病早死。克文对“七庶母”的介绍是姓邵，字惕，山东人。遇灾走他乡，卖为官宦人家女婢，后转入袁家做大姨太的女婢。因工作认真，深得顶头上司大姨太的欢心，待她如己出。命自己的继儿克文教她识文断字。虽然她不是绝顶聪明，然学习刻苦，后也能看个信写点字什么的。袁世凯看了很欣赏，让她做了候补姨太太。后跟随袁退隐到卫辉，二十岁的她便早早过世。袁世凯认为她贤惠，给了她一个“享受”姨太太级的待遇，葬在安阳南城外。另一说来自徐正伦：“七妾姓氏不详。据袁家人说，袁退居河南洹上村时，七妾与花园工人谈话，为袁所见而逼令服毒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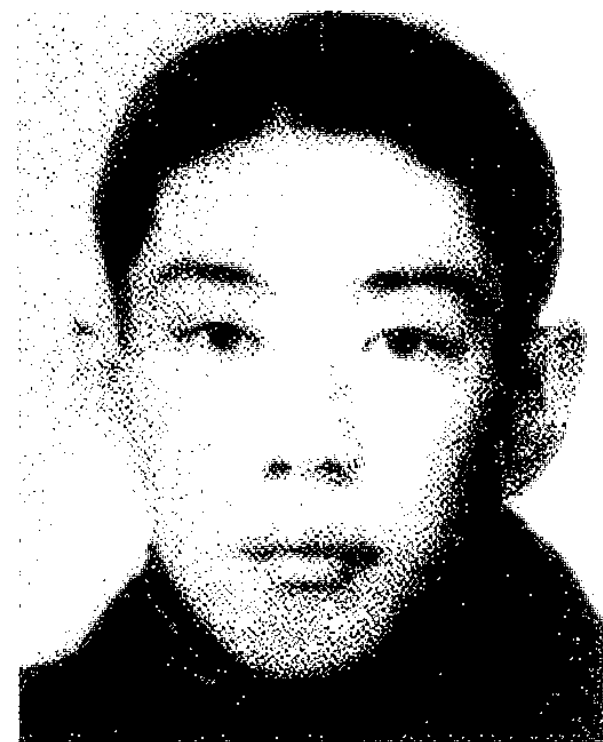
袁克文的“八姨太烈女传”

八姨太郭氏。袁克文在《洹上私乘》“诸庶母传”中浓墨重彩地写了一段：“八庶母”浙江归安县人也。母亲为南浔某富室妾，后被人炒了鱿鱼。带着小女儿八姨太到天津入了风尘。八姨太长大也操此业，改名叫“宝仙”。但是八姨太不喜青楼之事，应酬客人心不情愿，后来她母亲死，八姨太伤心至极，也想“身殉”，被人救下。其先进事迹在天津精英阶层广为传颂……克文游天津，从相好的妓女蟾香处听到此事，回洹上村后和大姨太说及。巧了，正好大姨妈看袁世凯退下来后心情郁闷，立刻派人带着钱去“赎庶母归”。更加巧的是，天津那里，八姨太为葬母借了2000元巨款，还有个弟弟相依为命。八姨太放出话来：谁出万元，就嫁给他。有多位富商前来一试，“八庶母”不喜做商人妇，全“拒之”。听到退休老干部袁世凯来聘，欣然说：这才是“妾终身所也”，“我哪能要这么多钱”。最后只拿下2000元还债，1000元给弟弟，跟着差人来了洹上村。袁世凯一见，非常高兴，立为“偏室”，还让她弟弟上学校读书。八姨太感激袁世凯知遇之恩，行事温顺恭敬，一点儿也不像青楼里出来的人。这就是克文笔下“八庶母”的烈女故事。

她生三子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祜祯。



老年的八姨太郭氏照



十五子克和



十三子袁克相、十五子袁克和
1934年，十三子袁克相、
十五子袁克和毕业于天津工商
大学时合影。



十四女袁祜祯，为八姨太所生 后嫁给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婚后，感情尚佳，但不久，曹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脾性便暴露无遗。祜祯自恃金枝玉叶不肯俯就，俩人感情出现了裂痕。1938年2月22日，二人又因一点小事争吵，互不相让，祜祯拿起电话想向家里搬救兵，曹情急之下掏出手枪就打了她一枪，正中袁祜祯右臂。袁祜祯住院后，袁家随即向租界当局提起控诉，曹当即被拘捕。曹锟急忙派人四下活动，以求袁家谅解。

当时袁府当家的是“大太子”袁克定，他与曹锟本来就相交甚笃，今见曹锟对此事痛心疾首，便有意和平解决。无奈八姨太坚持要与曹对簿公堂。最后还是祜祯出来解围，说不忍因夫妻琐事闹上法庭，辱及两家门楣。最后双方协议离婚，曹家赔偿医疗费、赡养费、妆奁费共计63,000元，结婚时的陪嫁钱物也全部退还。祜祯后来去了美国。



袁世凯九姨太的住宅（王鸣铎摄）此宅位于安阳市内。这是一套三进院落、九门相照布局的房子，院内有四棵高大的古木，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其中南面两棵已经枯死，北面两棵也已奄奄一息，用两根木棍硬撑着。房屋濒临倒塌，院内杂草丛生。不过目前正在修复。

九姨太睡在外面

九姨太刘氏。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克文说，当她听到袁世凯死讯后也要身殉，因为有孕，被众人劝下。九姨太据说信佛吃素。袁世凯在城里给她造了一套三进院落、九门相照布局的房子，此房位于安阳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区域，我去时正在翻新整修。我纳闷了，问，为什么丈夫要给自己年轻老婆在远离自己的地方造个“绣楼”。看大门的老汉说：这房子，这事儿都有待专家给个说法。王碧岑说是为了找个干净素净的地方吃素念佛。

九姨太生一子一女，十六子克藩（早亡），十三女仪祯。

袁世凯一死，二分之一吸起了鸦片

从有限的资料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些姨太太们都是人精，袁世凯在的时候，姨太太们和众子女大多中规中矩，作淑女乖孩子状。袁世凯的轿夫班头冯培德说：“全家有30多口，他们都严守封建礼教，家法很严，每当逢年过节或袁世凯生日都要隆重庆贺，全家人按辈分长幼顺序行礼。袁的妻妾子女生日，也分不同规格庆贺一番。每当此举，都给男女仆人一些赏赐。袁世凯的夫妻生活为定时轮流使妾，妾到袁房时都要带去自己的老妈子、佣人，以便侍候一切。”

袁世凯病危时，除袁克定外，曾单给每个儿子 15 万元。当时五姨太杨氏、六姨太叶氏和八姨太郭氏、九姨太刘氏都已怀孕，因为不知是男是女，就另留出 60 万元交克定保管，如生男就照前例付给，生女则留作公费，以备日后补助各房。后来除六姨太叶氏生遗腹子克有、九姨太刘氏生遗腹子克藩外，五姨太、八姨太 2 人都生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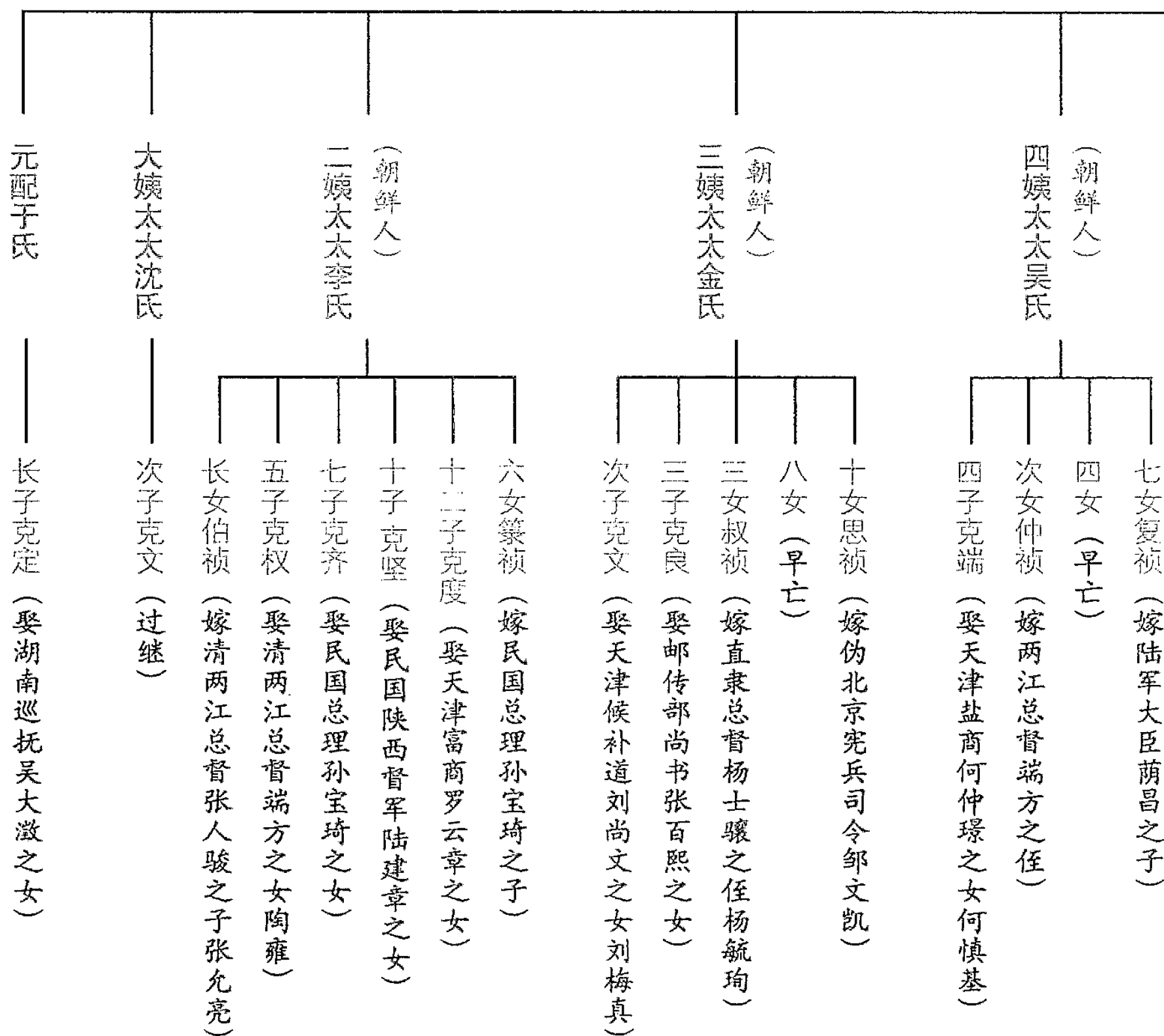
等到袁世凯一死，大家作鸟兽散。我们听到的故事又是一个版本：“袁世凯的姨太太及子女，吸鸦片烟的人占二分之一。厨房灶火日夜不熄。下午 3 点钟以后哪位起来，就哪时开饭，陆续不断，这项费用厨房管事另外开账，不在规定的伙食费之内。下午 4 点钟以后，西餐馆的茶役推车带着各式各样的点心、小吃和荤素菜肴到袁公馆，还有一批好生意。每日三餐，虽然照例准时开饭，这些人却大多不吃，男女仆人尽可食用。太太、少爷、小姐们饭后，有吸鸦片烟的，有打麻将的。晚上 9 点左右，就又分别去妓院、戏院、舞场等处玩乐，夜里 12 点钟还经常在法租界的北安利、显记、紫竹林等南方饭店吃夜宵，至两三点钟才纷纷回家睡觉。每天出门回家，衣服、鞋袜、帽子都是男女仆人给穿给脱给摘戴，他们只是抬抬胳膊，伸伸腿脚，向来不自己动手。少爷、小姐的化妆品，每人各有一个五屉柜装着，里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香水，香水的瓶子有伞式的、人形的、兽形的、虫形的和飞禽形的，千奇百怪，以法国的居多。”（徐正伦语）

徐正伦还说了五子袁克权的故事。“克权娶端方三女陶雍为妻，嫁奁丰厚，婚后一对夫妇都吸鸦片。他长期患着心脏病。他的岳母跟着女儿住在袁家，鸦片烟瘾更大，终年不出屋。她带到女儿家的财产有很多名贵古玩，我看到过一件宫装披肩，上边满镶着珠钻。她手上带的一个翡翠戒指，后来卖了 5 万元。还有一个长 2 尺、宽 1 尺半、高约 3 尺的小铜桌，绿锈斑斓，上有篆字。端方的妻子曾对我说：‘这是一件古物，是大人（指端方）自陕西长安买来，生前最喜爱的。’民国 13 年，袁家把它出售给外国人，得价 12 万元。”

这就是中国当年富二代的德性。那个年代个个一杆枪，把自己早早地抽到阴间地府去了。袁克定不管怎么说，活得比他的弟妹们像个人！

这还是袁府的上人，至于那些下人更加触目惊心：“代他（袁克定）经办财务的仆从，对他多方欺骗，他也无从察觉，就他家购买日用物品而言，号房、管事人等暗中都有 30% 的回扣。我给他家看病，二节结算诊费，付款的时候，门房也要 30% 的回扣。”（徐正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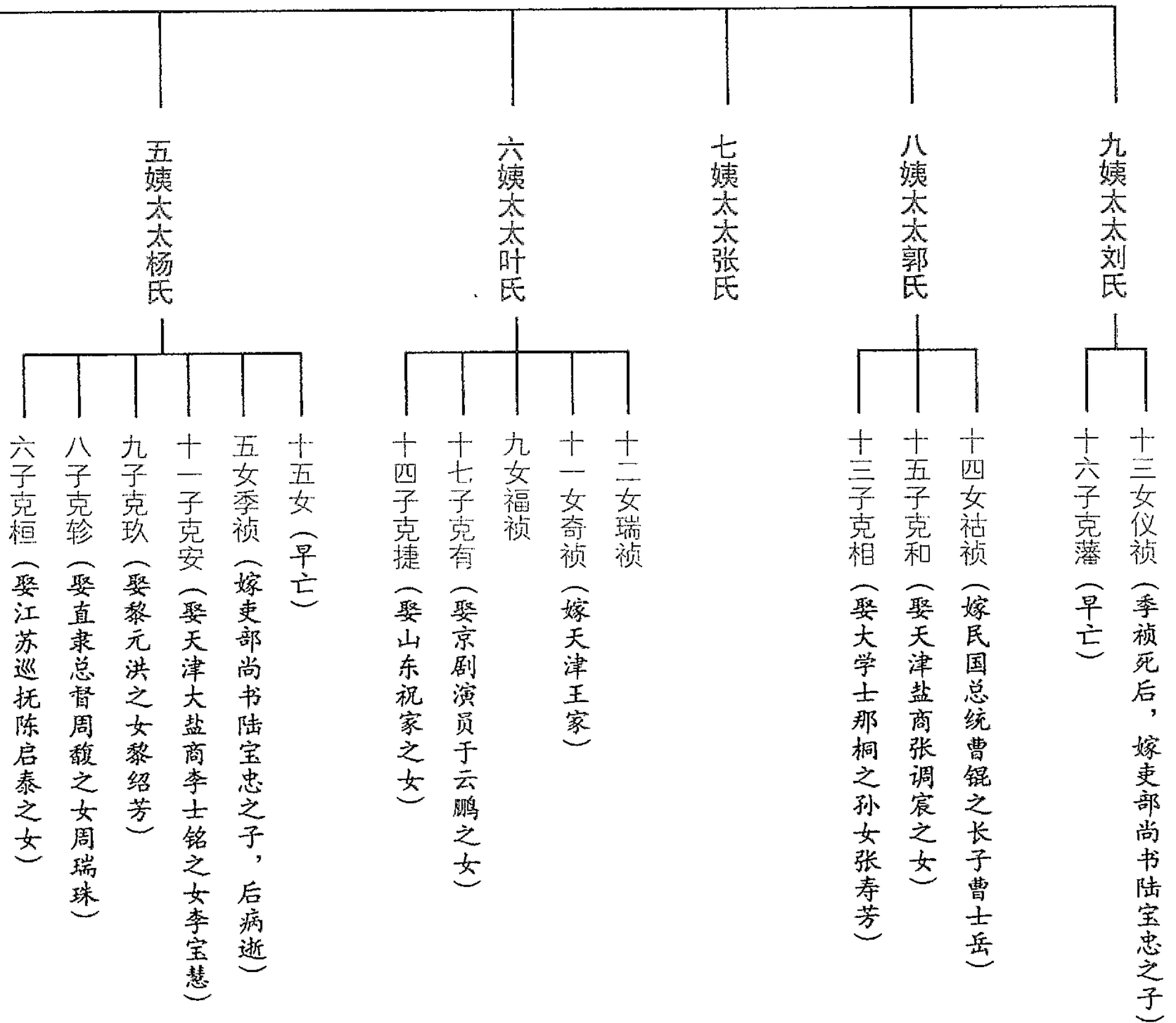
袁世凯家庭



袁世凯子女的配偶，大多出自豪门、名门。三女袁静雪说，父亲往往一两句闲话间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有时很明显是从政治利益出发，像决定袁克权娶端方之女的同时，将二女儿许配端方的儿子，尽管女儿很不称心。袁还险些把袁静雪许给逊帝溥仪。

绝版袁世凯

谱系图



这种门当户对的指婚一直延续到袁世凯身后, 影响到第三代人。袁克定的长子袁家融, 留美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 袁克定的二女袁家第嫁的是苏州三大文人之一费树蔚的公子费巩; 袁克文的长子袁家嘏娶的是扬州才子方地山的女儿方初观; 袁世凯生前还将侄儿袁家骥与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联在一起。随着袁家的失势, 也有过对方悔婚的情况, 譬如徐世昌就没肯把女儿嫁给袁克坚。

袁世凯的重孙辈大多与平民联姻。

袁世凯出山



千呼万唤始出来，袁世凯出山了！

这一次，袁世凯证明了一句名言：威名之下其实难副。

袁世凯大事记（1911~1912）

1911年

10月11日，洹上村张灯结彩，大宴宾客，袁世凯在养寿园里高调为自己办生日庆宴，这天是他的五十二岁寿辰。

当日的晚宴是在祥和随意的气氛中进行的，宾主边吃边看《龙凤呈祥》。

突然，电报房人送来惊天消息：武昌新军闹事了。“客座相顾失色”，袁世凯也颇感晦气，立刻下令“剧宴皆止”。

12日，他经过冷静思考，意识到“此乱非洪杨可比”，期待已久的出山时机已经到来。

清廷启用袁世凯过程回放：

14日，御史史履晋奏请启用在家赋闲的袁世凯，载沣虽极不情愿，但也别无他法。当日，清廷即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同日，袁世凯前幕僚阮忠枢持奕劻亲笔函由北京前来，劝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

同日，杨度也由北京抵达，劝他不要应命。期间王锡彤问袁世凯：“公之出山为救国也，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鄂祸，国能救乎？”

袁：“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然则公何以受命？”

袁：“托孤受命，鞠躬尽瘁。”

王：“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例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

袁勃然变色，大声说：“余不能作革命党，余且不愿子孙作革命党。”

15日，荫昌过彰德，晤袁世凯。同日袁以“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为辞复奏，表示不能应命。

18日，清廷促袁世凯力疾就道。

19日，清廷命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袁世凯大事记（1911~1912）

20日，徐世昌奉奕劻之命，自北京微服到彰德晤袁世凯。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向清廷提出六项要求：1. 开国会，2. 组织责任内阁，3. 宽容武昌事变人员，4. 解除党禁，5. 总揽兵权，6. 宽予军费。

21日，清廷从袁世凯奏，令招募壮丁12,500人，作为湖北巡防军，命度支部拨款400万两。

22日，湖南独立。

23日，陕西独立。

24日，清廷又从袁世凯奏，命拨江宁新军管带快炮36尊及全数子弹解赴信阳。

26日，清廷命奉天、直隶协拨袁世凯快枪13,000杆，炮54尊。

27日，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29日，太原新军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任都督。

30日，云南独立。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赴任。

31日，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全省独立。

11月1日，上海光复。袁世凯抵达湖北萧家港。奕劻内阁辞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赶快进京，组织责任内阁，前线军队仍然归袁指挥调遣。

4日，贵州、浙江独立。

5日，江苏独立。

6日，广西独立。

7日，革命党人、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暗杀于河北石家庄，华北新军起义计划遭破坏。

袁世凯大事记（1911~1912）

- 8日，安徽独立。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 9日，广东、福建独立。
- 13日，袁世凯到北京。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告独立。24日，孙取消独立。
- 16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
- 17日，宁夏会党起义。
- 21日，宁夏军政府成立。
- 22日，重庆独立。
- 27日，清军占领汉阳。四川独立。
- 12月1日，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签订停战协议。
- 3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推为临时大总统。
- 6日，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
- 18日，南北议和开始，南北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举行首次会议。
- 28日，袁世凯觐见隆裕太后等皇室成员，谈清室优待条件的谈判细节。
- 30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
- 1912年
- 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告退位，清朝268年统治结束。
- 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为临时大总统。
- 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 2月25日，袁任民国临时大总统。
-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 13日，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 8月，袁邀请孙中山、黄兴来京，并与孙会谈13次。

袁世凯出山

历来史书说到袁世凯出山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说他阳奉阴违，实施“拖”字诀。查上表不尽然。

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打响，朝廷开始并没有重视，到14日才正式向袁世凯发函征召。袁第二天回信婉拒。

观袁世凯一生，这“婉拒”是他从中国士大夫文化学来的臭毛病，好事坏事都要“谦虚”一回。每到关键时候，他都要如此这般一番。实在为笔者蔑视。

从上表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军人袁世凯还是有职业道德的。这期间他一边熟悉情况，一边根据经验已经在给中央打报告，支招。

20日，袁世凯提出了“袁六条”。细看这六条，发现袁似乎在为天下所有“被压迫者”说话。

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是为当时势力最大，也最为我等后人忽略的各地“咨议局”和立宪派说话。

各地大大小小的“咨议局”，其实就是各地大小“乡绅”的大本营。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特别看重这拨人，认为中国历来文官体系里最闪光的地方就是官僚体系到县一级为止，下面的事情交给宗族和乡绅“免费代理”管理。他老先生认为谁赢得这群人的拥护谁就得天下。

太平天国从南到北一路得罪了多少“乡绅”，最后被乡绅出身的曾国藩、李鸿章率领的团练给消灭了。

宽容武昌事变人员和解除党禁是为激进派立言。袁世凯在当时算是老体系中人，但是他也知道“统一战线”是一大法宝。他将自已定位为中间偏左人士，团结左派和极左派，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

最后的总揽兵权和宽予军费才是老袁利之所在。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所以老袁将这两条放到最后，给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感。

这回清廷特爽快，第二天便默认了“袁六条”。于是老袁不停地上奏，不停地支招，清廷不停地“从袁之奏”。其实袁已经渐渐地参与指挥了。时间最早可以推到清

廷正式要求其出山的第二天。

《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 10 月 27 日从北京发给伦敦的电报如下：

军队将领和国防大臣禁止参与任何相关决议，军队一切事务都由袁世凯一人调配，在与起义军交涉过程中他拥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在朝廷执政期间类似的事件只发生在曾国藩时期，当时慈禧太后授予曾国藩绝对权力以平定太平天国叛乱。

朝廷至少开始吐出它所囤积的财产。有一道诏书的内容表明隆裕太后从她私人的金库中调拨了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湖北境内的紧急需要。

第二天！这还算慢吗？

清廷正式征召的第 12 天，袁世凯变间接指挥为直接指挥，出发上前线了。袁的轿夫班头冯培德说：

他于九月初九由安阳动身，当天到郑州，第二天驻信阳，第三天到孝感，第四天到达目的地。袁世凯先到医院慰问伤员，分赏给伤员每人一些银子，还叮咛医方好生医护，搞好生活。随袁同往的姨太太还向伤员赠送果品，深表慰问。袁的此举，士兵颇受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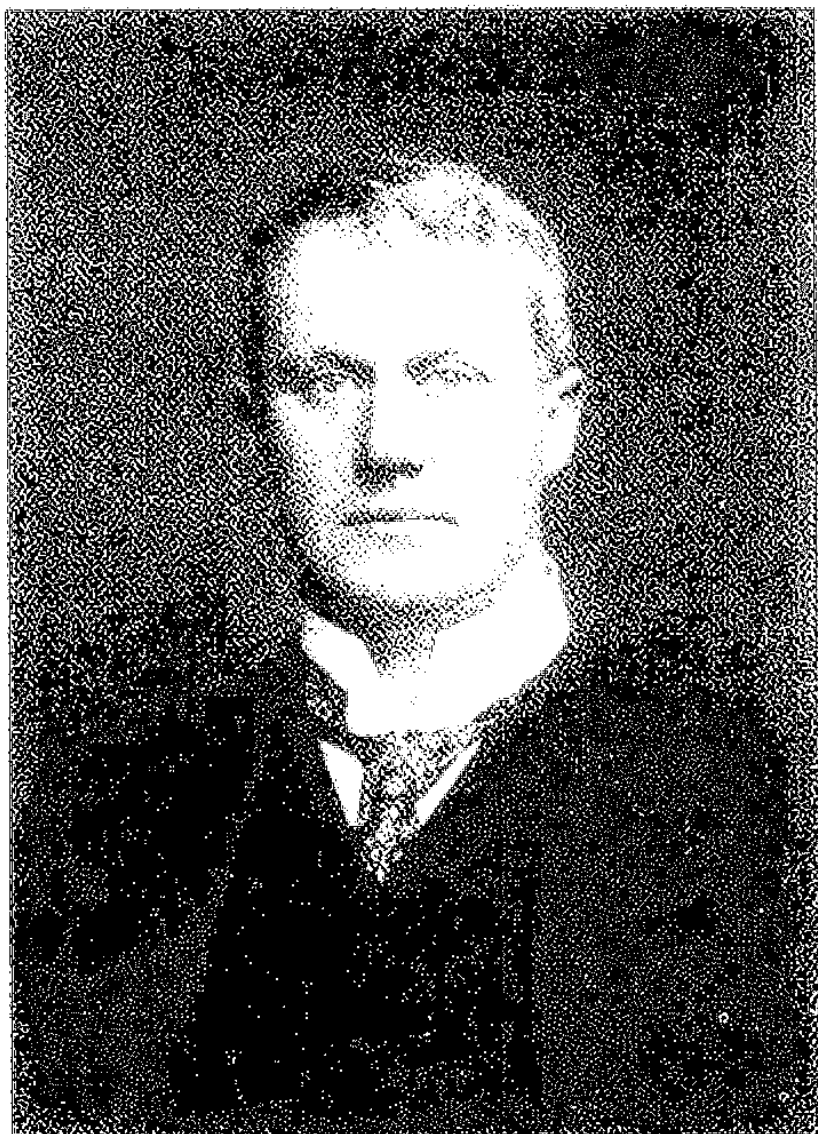
一个第二天，一个第十二天，何来个“慢”字？这对一个离休已经三年，完全脱离军队体系的“老干部”来说不容易了，说明老袁做到了政治及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无可指摘！

不久，袁世凯阔别三年后又回到北京，莫

摄政王载沣、皇太后隆裕和幼帝溥仪

莫理循 澳大利亚人。1897年，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由于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报道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当之无愧的权威。出于对袁世凯本人政治才能的欣赏，莫理循曾拍电安慰因“足疾”下野的袁，使袁深受感动。

1912年，莫理循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他本人也极力辅佐袁世凯，四处游说，为袁世凯辩护，称赞袁世凯的领导才能，襄助袁世凯及其政府尽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然而当袁世凯称帝前后，莫理循公开对袁表现出失望和厌恶。袁世凯死后，莫理循仍在为黎元洪、徐世昌等领导的中央政府效力。



理循在给伦敦的新闻中这样描写北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场面：

北京，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皇位的觊觎者，抵达了三年前自己被罢官的北京。今天他由2000名士兵护卫，并被政府热情地接待。为了欢迎他的到来，政府发布了公告称京城附近的军队都由其掌控。

……有一群安静并且秩序井然的人从火车站到他的居所夹道欢迎他的到来。

袁世凯看上去很强壮，最近有报道称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也成了他一再推迟应满清政府之邀到北京的借口。

政府继续在北京集合满族的军队，但是很快就无法再支出军饷。人们不认为中国人能够在北京地区集合到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来抵抗进攻，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因为政府无力从各个省得到收入，因此北京迟早会被攻占。

摄政王载沣是12月6日才辞职的。从《纽约时报》当天的报道可以读到一些细节：

北京，12月6日——皇太后今天发布了一份宣布年幼的皇帝的父亲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的布告，签字者为内阁的成员。指出目前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并且一个立宪的政府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

布告也解释了由于复杂的局势，人民很伤心，国家也陷入混乱中。布告中说摄政王觉得他的遗憾来得太晚了，并感觉如果他继续在此职位上，他的命令很快就没人会听从。

布告继续说：他哭求辞去摄政王一职，同时也表达了他最真诚的放弃政治的愿望。“我，皇太后，居住在皇宫中，是不知道国家的事务的，但是我知道存在反叛，争斗也在继续，这引起了灾难，而我们的商业也受到了恶劣的影响。”虽然摄政王有自己的雄心，但是他是诚实的。由于被误导，他危害到了人民。因此他的辞职被接受。

退休的摄政王每年将从皇室得到一笔总数为 50,000 两（大约 30,000 美元）的补贴。

载沣对政治没有兴趣，做摄政王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而毫无乐趣的负担。

载沣要生在百姓家就是骆驼祥子：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留饭照例是淡漠敷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亲戚本族的婚丧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

他不是崇祯帝，当摄政王当到国破，他还一脸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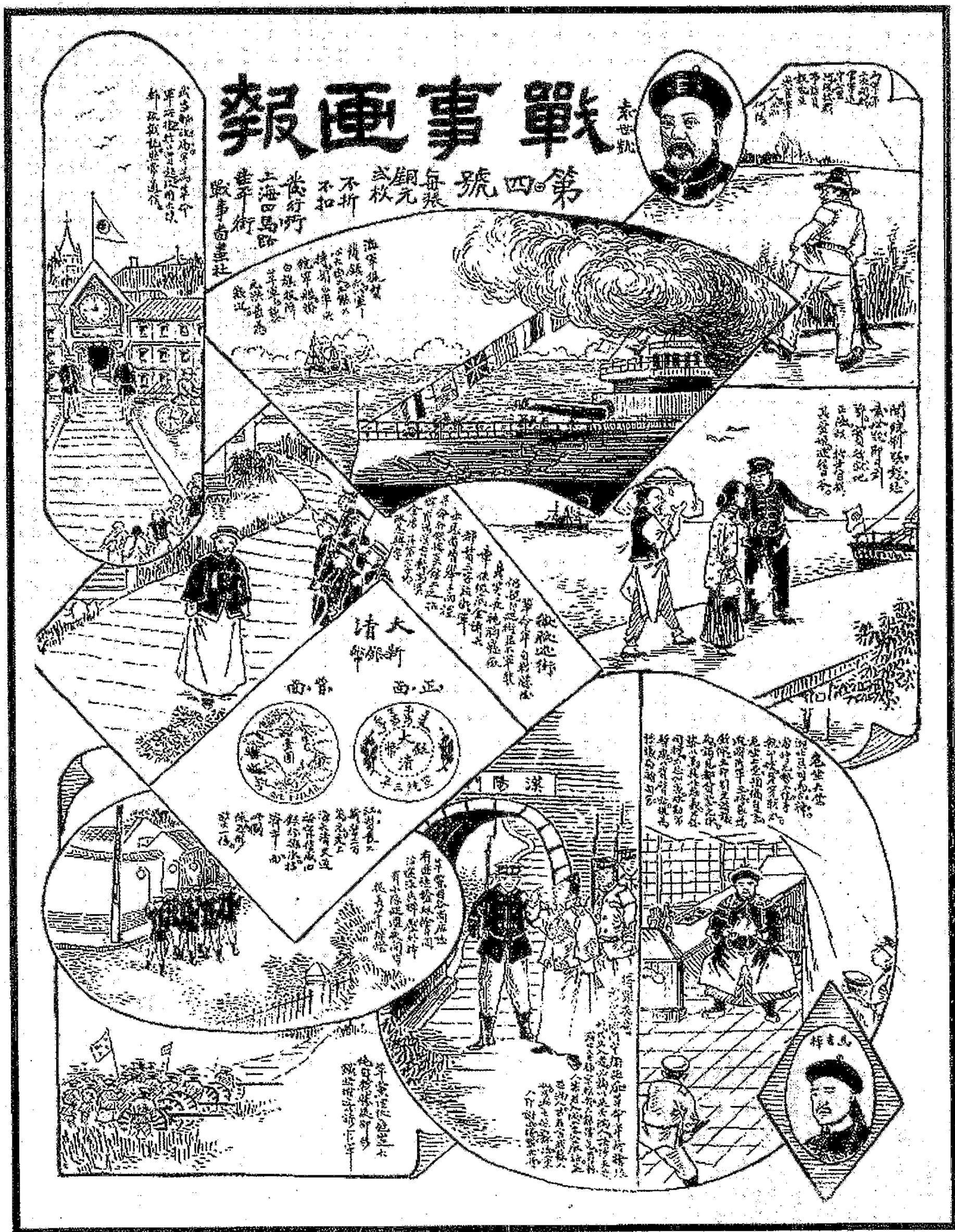
慈禧真是看走眼了，偏让这么个单薄身子的骆驼祥子，拉这么重的帝国老破车。大清能不亡吗？

好在他死于 1952 年，看到了一个“新中国站起来了”。

丑媳妇怕见公婆，袁世凯是 1911 年 12 月 28 日才觐见皇室，谈清室优待条件的谈判细节。

《每日电讯报》驻北平记者第二天报道说：

根据新闻，昨天袁世凯、太后和亲王们会谈。在皇宫中出现了戏剧性辛酸场景。一些王公大臣哭道：臣罪该万死，隆裕太后再次昏迷，整个皇宫中充满悲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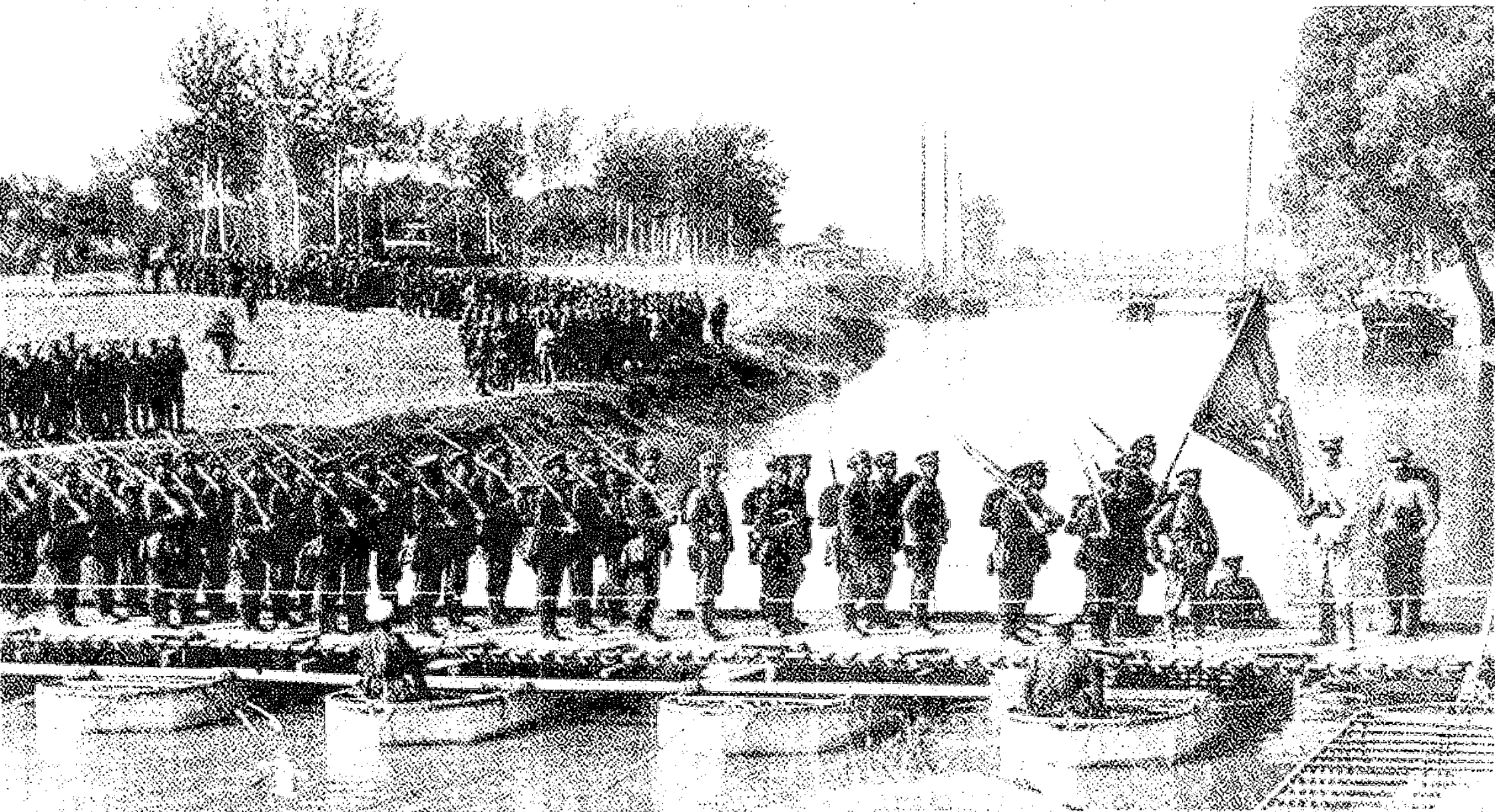
1911年上海发行的一份专门报道武昌起义的《战事画报》。图中有“闻统制张彪恐袁世凯即日到鄂，实行就地正法，于28日携其爱姬逃往日本”。“海军提督萨镇冰之军心大变，不能持久。闻已率所统军舰，挂白旗投降革命。黎元洪甚为欢迎”。“武昌邮政局早为革命军所据，于24日起改用大汉邮记，照常通信。”从所记事件看，发表时间当为1911年11月11日左右，时袁世凯正在汉口，画报右上方为袁世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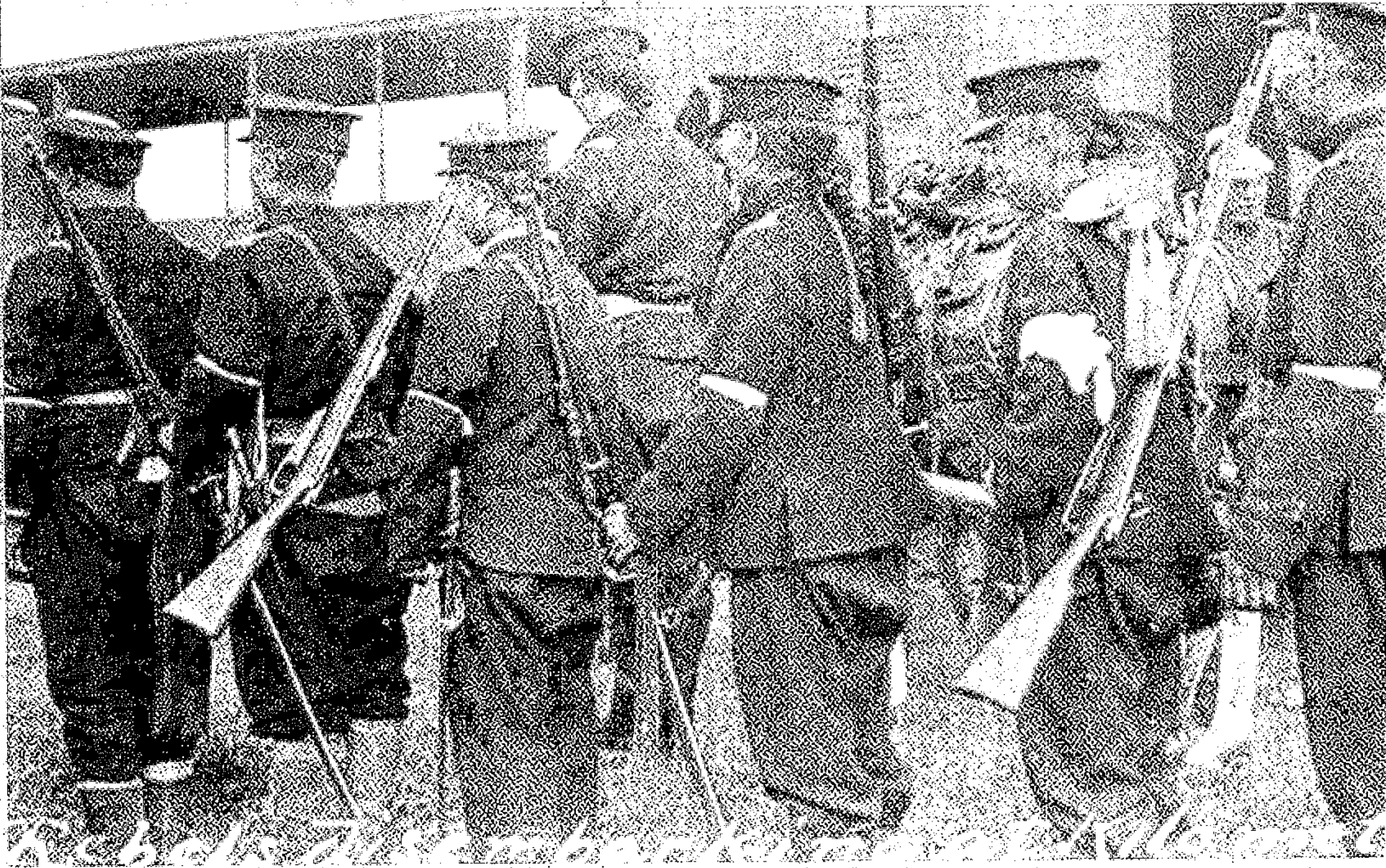


绝版袁世凯

在汉口身披大氅的革命军士兵，平添三分威风。

孝感，正在通过浮桥的清军步兵队伍。





革命军准备出发。可见其左臂缠的用于识别的白毛巾，同时，部队中人员颇有没剪辫子的，较真实地反映了起义之后的历史情境。

汉口，战斗间隙的清军士兵。



大总统没有安全感

淮河边，捻军马蹄下长大的袁世凯，一辈子没有安全感。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双胶鞋。
(《纽约时报》语)

还在直隶总督位子上时，他就为“君臣之险”担心，曾写信给哥哥袁世勋，说了心中的怕：弟这次做直隶总督，全仰赖太后的眷宠。但太后已老，一旦生病，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到那时弟也就难保了。太后一死，弟只能辞官归隐。古有明训，弟已经烂熟于胸！

后来果然让摄政王罢了官。好容易出山做事儿，全家又听说革命党要对其下手。女儿袁静雪说：

在他出发以后，有一天，我们家里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要派人杀害我们全家。这时候，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我们小姐妹更被吓得手足无措。二姐曾天真地对我说：“要是真来杀我们，我们就顶着花盆藏到花园的池子里去，他们自然就找不到我们了。”

这虽然是虚惊一场，袁世凯却考虑到，今后全家如果还住在彰德，未必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就让大家分批搬到天津。当时全家在天津是分别住在几个地方的：



吴禄贞

我娘和大哥住在德租界，大姨太太和二哥住在意租界，其余的二、三、五、六、八、九6个姨太太和我们小兄弟姐妹们都住在英租界小白楼“矿物局”。住下不久，全家又按我父亲的指示，分批搬到北京，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民国时期改名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为外交部街）内。（袁静雪语）

可是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还是不安全，因为是清廷的首相，革命党中的极端派将之列为暗杀的头号对象。

《纽约时报》报道了光天化日之下的一次血淋淋的刺袁行动：

北京，（1912年）1月16日。——今天早晨，当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前往皇宫的路上，有人向袁世凯的马车扔了炸弹，当即两人毙命，并且伤及十七人。

其中被炸弹金属外壳碎片击中的有八到十人，这些人有可能死亡。属于护

莫理循记者公馆大门 1912年1月16日，大门前发生了一起刺杀袁世凯的爆炸案。



卫队的多匹马，以及袁的马，都已死亡。

袁的马车开着窗户，由骑兵护卫队跟随，沿途五码远有士兵和警察。

当袁世凯的马车到达莫理循记者公馆对面时，攻击者已经在公馆角落观察了很久，一枚炸弹猛投出去，来不及等着看他们行为的结果，刺客便奔向附近一间茶室。摩肩接踵的士兵和警察将其拘捕，疑犯也被拘捕。

总理大臣的攻击者是三位穿戴讲究的汉人，据说是著名的革命者。当马车距离出事地点大约30码时，他们站立，其中一位朝马车方向扔出一枚炸弹。但是，它没有命中目标，投射物在距离马车20码的地方爆炸了。马车咯吱作响且摇晃，但是袁世凯未受伤地逃离了。很快，马车附近的警察、士兵和两匹马受打击而死。爆炸力如此之大，数百码远的很多房屋从上到下整个都被震动了。

当天，各方包括公使馆传来的道贺声，一齐涌向袁世凯。攻击总理大臣显然已经消除了满族人思想上关于袁世凯忠诚度的疑虑。



位于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的袁世凯总统府大门（摄于2010年3月20日）

对于这段报道，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袁静雪的文字补充某些细节：

忽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的楼上扔下3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爆炸，除了我父亲的顶马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马，都被炸成了重伤。

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就死去了。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

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紧紧地勒缰绳，也勒它们不住，只得任着这两匹伤马飞快地跑，一直到它们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这两匹马因为受伤过重，终于死去了。

我父亲侥幸，当场既没有受伤，又平平安安地回到官邸。因此，他在见我们之后，只简单地说了下当时的情况，接着便哈哈地笑了起来。

据跟随我父亲出去的男佣人事后谈起，“当时那两匹马都被炸伤了肚子，伤势很重，如果立时都死在‘东兴楼’门前，宫保的性命是会发生危险的。”

第二天，又有人在外务部的门口扔了一颗炸弹，当场并没有炸伤什么人，只是我父亲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受爆炸声浪的冲击，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纹。

他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此后就听从家里人的劝告，搬到地窖子里办公去了。

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大臣，被几颗炸弹炸回到“穴居时代”，也是前所未闻，说明老袁还是缺乏安全感。

自此，袁世凯再没上过朝，做了大总统后，他是活着进了中南海，自死都没有走出新华门。为甚？大总统没有安全感！

这里说的是肉身安全，还有精神上的安全呢。

前清时，袁世凯最大的欲望就是当一个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那种在皇帝的诏书上有附署权的内阁总理大臣。争取了十多年的责任内阁制，是不是有袁世凯的个人考量？他的换帖兄弟徐世昌说有：

项城自小站练兵，即树立北洋根基。戊戌政变后，以至入直军机，其广布

势力，无非争取政治地位，充其量不过欲为一权臣而已。在君主专制下，稍萌异志，辄有杀身之祸。以项城之精明稳练，宁肯出此！

是啊，伴君如伴虎，历来帝王之术就是在群臣中搞恐怖平衡，慈禧喜怒无常更是历朝之最。袁位极人臣时，慈禧每天都能收到御史的一箩筐奏本，每一项参奏都可以让袁死十次。想想都汗啊！

在其大总统任上，府院之争，府会之斗，新老冲突，南北争斗，日俄的虎视眈眈，在袁看来都是乱象，全是不安定因素。想到伤心处，袁世凯都想远走高飞，做寓公去。《纽约时报》1915年12月12日有篇报道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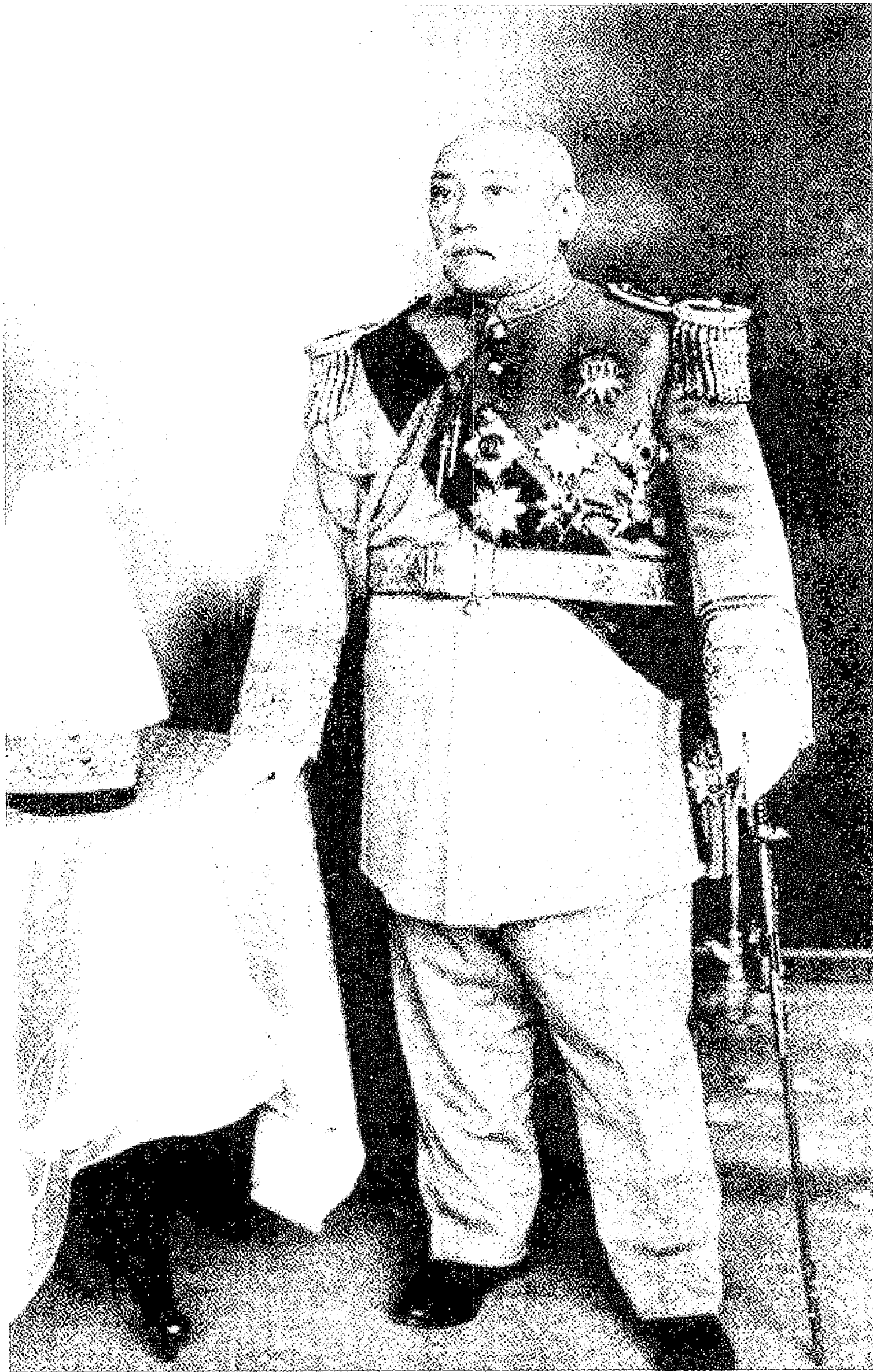
自从他当选为总统后，因为很多人试图夺取他的性命，他几乎完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据几个月前的报导，他在英格兰买下了大片的庄园以防他哪天被迫从皇帝的位上退下来时做他自己、他的众多妻子们和他三十一个孩子的避难所。

七子袁克齐也告诉我们一个《二百万法郎》的故事：

我父亲做总统后，看到中国政局变幻不安，考虑退路，曾在法国银行存过二百万法郎，准备做旅居法国的经费。当时约定：他生前支取，除本人签字外，须有徐世昌、孙宝琦副署；死后由我大哥袁克定签字支领。父亲死后，我兄弟们问到这笔钱，大哥说不知道；问徐世昌、孙宝琦，他们也支吾其辞。结果这笔钱，始终没有领回，被法帝吞没了。

打倒法帝国主义！

不过且慢，为什么当事人都支支吾吾？好吧，就当老袁交了安全保险费。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乱象横生，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也没有安全感，他曾让人在英格兰买下大片庄园，在法国银行存过二百万法郎，给自己预做退路。

想当年“窃国大盗”是“救世主”

又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后，“窃国大盗”袁世凯那么受欢迎？

1909 年到 1912 年，袁世凯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与日俱增。辛亥革命前，袁世凯还在洹上村时，便有人观察到袁开始渐成香饽饽：“是时，袁公去位已将二载，天下之仰望之者愈众。旧日僚属亦明目张胆复来趋附，不似从前之藏头露尾矣。”

所以费正清说：“他一度于 1909 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

总结一下，大约有六种人对其有好感。

第一种人当然是以北洋军人为主的军方。请看 1912 年 2 月 2 日《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

昨天袁世凯的军队散发了传单，威胁说如果袁世凯少了一根头发，士兵们会杀掉所有应该负责的人。

瞧瞧，这时的清廷还未宣布退位，袁世凯的军队已经公开打出“只认袁世凯”的旗号，让宗社党人心寒。

第二种人，清廷中的改革派，也就是立宪派。袁世凯就是他们的代言人。立宪派的首领是张謇，成员大多为封疆大吏和各地的“咨议局”议员。

第三种人是汉人。1909 年袁世凯开缺回老家彰德府后，汉人把这看成是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袁出不出山，被很多汉人看成是满清“落实民族政策”的一项指标。“当时我们认为汉族人做官，再有权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就对自己的前途也有些担心。”（唐在礼语）

第四种人是革命党人。他们将袁看成是革命的同路人。这可以从孙中山 1911 年写给伦敦金融家，要求英国“风险资金”投资革命时的一段话看出：

北京周围的七个师是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创立的。因为他新近被北京政府降级，所以，这些部队对北京政府的忠诚度被大大打了折扣。虽然在他们与我们

之间并未达成任何约定，但我们坚信他们不会为满清政府卖命。……实际上也将保持中立。

看到了吗，袁世凯还被孙中山作为投资筹码开给了老外。

第五种人是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京城里的百姓。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

北京的旗人怕革命党来革他们的命，大伙儿日日盼着袁世凯来操这个和局的盘。当清退位诏书发布后，唐在礼是这样形容京城百姓的高兴劲儿的：



隆裕太后画像

第二天，北京城各家报纸就把诏书的全文发表出来。老百姓欢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换了朝代了，这是共和的天下了，这样就用不着打仗了！”

瞧，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像铁良等宗社党死硬分子们这样“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的，毕竟是少数。

第六种是外国势力。经过一百多年的打打闹闹，各大国在华都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民主”、“平等”这些词敌不过各国实实在在的在华利益。

庚子事变证明，袁世凯是保护洋人利益的最恰当人选。英国公使朱尔典声称：“没有人比他更适于充当汉人与满清皇室之间的调停人角色了，他是汉人中最受人信任的代表人物。”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说：“还没有比袁世凯更强的人出现。”“未来的所有希望都集中于袁世凯一人。”

法国也将袁世凯看成是“能使中国避免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唯一力量”。

德国驻华大使认为：“如果人们置袁世凯政府命运于不顾，让可以引导到一个混乱局面上去的一些未成熟的或超出这个目标的政治企图自由发展，则其危险将会更

大。”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告诉上海的共和领袖们，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列强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他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外国信任。革命党的领导人向莫保证，他们一定拥戴袁为首届总统。

实际上连当家的隆裕太后也少不了袁世凯，甚至将袁开缺回籍的摄政王载沣这回也眼巴巴地盼着袁世凯来收拾残局。

张国淦在《洪宪遗闻》中记载了袁世凯把兄弟徐世昌亲闻的一段话：

辛亥武昌起义，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复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此皆余之所亲闻者。

那桐的话代表了清贵的心声。

那桐(1856—1925)，满族叶赫那拉氏。举人出身，颇有才学，擅诗文歌赋，好金石书画，而且思想和行为既新潮又时尚，与满清那些顽固派绝然不同，与荣庆、端方并称为“京城三才子”。

袁世凯有心结交这些思想开明的晚清贵族，便让十三子袁克相娶了那桐大孙女张寿芳，和那桐结成儿女亲家与政治同盟。载沣企图杀袁之时，他也是铁杆“保袁派”，并与庆亲王一起以辞官为要挟迫使载沣让步。其在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重要职务，对晚清政局影响不小。



从全国范围来说，这时候袁世凯的执政基础可说是空前的广泛。真可谓万千宠爱集一身。

为什么？

因为举目远望，袁世凯浑身确实有诸多好条件：

1. 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于革命有功）
2. 带过一支最好的军队（稳定因素的保证）
3. 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派（各省咨议局议员喜欢）
4. 和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贵指着他得到退位优厚待遇）
5. 列强的不二人选（能保护人家在华利益）
6. 能干（工作经验丰富）
7. 受过不公正对待（为汉人受过）
8. 人缘好（为他说好话的人多）
9. 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最大公约数）

《大公报》创办人之一胡政之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历来不团结的中国人，那会儿要求袁世凯出山的呼声，可以说是百年难见的意见统一。

这种情况我只在 1979 年见过，那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后，举国一致要求把经济搞上去的焦急心情。

历史有时是简单的重复。

不了解这个基本事实，会真相信孙中山傻，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老袁。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媒体恶炒袁世凯

晚清的报纸平时风花雪月，武侠小说居多，但是受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刺激，普遍开始议论时政。

对1894年11月至1895年11月的上海主要的中文报纸论说进行统计：这一年中，《申报》有256篇论说与时政有关，……《新闻报》有185篇论说与时政有关，……《字林沪报》的议政热情也同样高涨，有207篇论说与时政有关。（《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

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后，报纸又是一波政治时评热，说的话比现在网上的论坛还开放。《新闻报》以骂官场、骂官员为能事。比如，1903年的一篇时论说：朝廷“何以割一次不图自强，又割一次仍不图自强，且各国愈割中国愈客气，一割再割，三割四割，以至于割之不已”。这样辛辣的时评只在现在骂中国足协的报纸上可以见到，读来比琉璃厂的鼻烟壶还提气。

《时报》以精辟的“时评”代替冗长沉闷的长篇大论，居然把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胡适给吸引过来。胡适后来回忆：

我现在回想我们当时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的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

那时候办报不要什么刊号，几个文人找一个有外国背景的，或者干脆办到租界里去便“胆大妄为”了。租界没有新闻检查，办报纸几乎不存在任何门槛。《大公报》就办在天津租界，《大江报》办在汉口的租界。然后出口转内销，再流入京城。

王公贵族上班看“红头文件”，下班后都好这口。连孙中山的《民报》也能深入北京的深宫内院。

大总统袁世凯在中南海里就爱看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说：这报能说点儿真话。

辛亥革命前后，媒体像打了鸡血一样，又兴奋了一回，这回大家恶炒了次“袁世凯出山”的新闻。南北报章大造“收拾大局非袁莫属”，《大陆报》说：“除非清朝政府再次召用袁世凯参与国事，没有任何行动能使清朝取得国内外的信任。”

“据对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报道的统计，三年多时间，关于袁世凯各种活动的消息有106条，其中涉及‘出山’的有64条之多……”

新闻媒体的消息还反映了一个趋向：袁世凯出山的呼声愈来愈高，给的官职也越来越大，对袁的倚重也越来越迫切。最初，还是各方亲袁枢臣为袁缓颊，请清廷给袁一个效忠的机会，而到1911年春夏以后，已逐渐改变为“劝驾”、“劝令出山”、“亲赴卫辉极力劝驾”，也就是乞求他重出。据说：载沅亦恳请隆裕太后准予起用他。外务部尚书邹嘉来晋见时请起用袁，载沅明白表示：“本监国已拟起用”，“将来另有位置”。总之，到辛亥革命前夕，从朝野到皇室，从亲信到政敌，都在营造着一个袁世凯复出的氛围。（刘路生著《袁世凯隐居彰德韬光养晦》）

人可能是没进化好，就喜欢“随大流”，上海叫这是“哄大卵”，有点北京人“抽风”和“瞎起哄”的意思。

只要媒体天天说，就有人信，然后出现了一种叫“舆论”的东西，皇帝见了都怕。此事古来有之，至少打老袁出山开始，中国人就被实实在在地“舆论”了一回。结果，大伙儿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老袁出来。

北京的茶馆是另一种媒体：三两二锅头，一盘花生米下肚，旗人的嘴就是“报刊早读”，今天宫保如此如此，明天袁大帅这般这般，既显摆了自己消息灵通，和宫保有一腿，又免费为“宫保”做了活广告。

呵！旗人的那张嘴啊，您是知道的，老妈子都能被他说成是黄花闺女。

袁世凯还是那个袁世凯。可怜昨天离京时三两人应景相送，还有旗人打老远追上来朝他“呸”！

如今人还在彰德府，大伙儿已经准备万人空巷，要“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了。

半新半旧最受欢迎

历史有时就是简单的重复。

袁世凯(1859年生)就是个清末的50后,和孙中山(1866年生)这个“美籍华人”60后不同,袁世凯接受了全套的儒家应试教育。

清末50后见证了甲午战败、庚子之乱和日俄战争,有求变求新、要求立宪的一面。但是对共和的支持一直是不完全的,他们习惯了的领导方式是独断专行、个人至上。

辛亥革命后,清末50后正处在风华正茂期,不似70后的强调专业精神,80后的海归革命党,袁世凯的“旧瓶装新酒”,或曰“新瓶装旧酒”特别适合当时的大众口味。

说到底,袁是一个“亦新亦旧,半新半旧,可新可旧”的人物。

对于突变时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芸芸众生来说,没有比找一个熟悉的人当这个乱世的“家”,更让大伙儿睡得香了。

政治也是一种买卖,是买卖就得服从做买卖的规律。一个好的商品只有在正确时间、正确地点、正确场合推出才会得到消费者认可。

袁世凯就是在正确时间、正确地点、正确场合重返历史舞台的“好商品”,而且是既陌生又熟悉,让人有点儿小别赛新婚的刺激。

对这位袁同志,您说他新,人家的确是清廷这个“傻瓜二代”里改良升级过的新产品。您说他旧,他也是个旧,说话办事让老同志都能明白。

然而,他最具杀手锏的是,市场适应性强,“可新可旧”。

袁开始发誓说:“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

这时的他顽固地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坚持大清帝国的领导,坚持大清帝国领导下的君主立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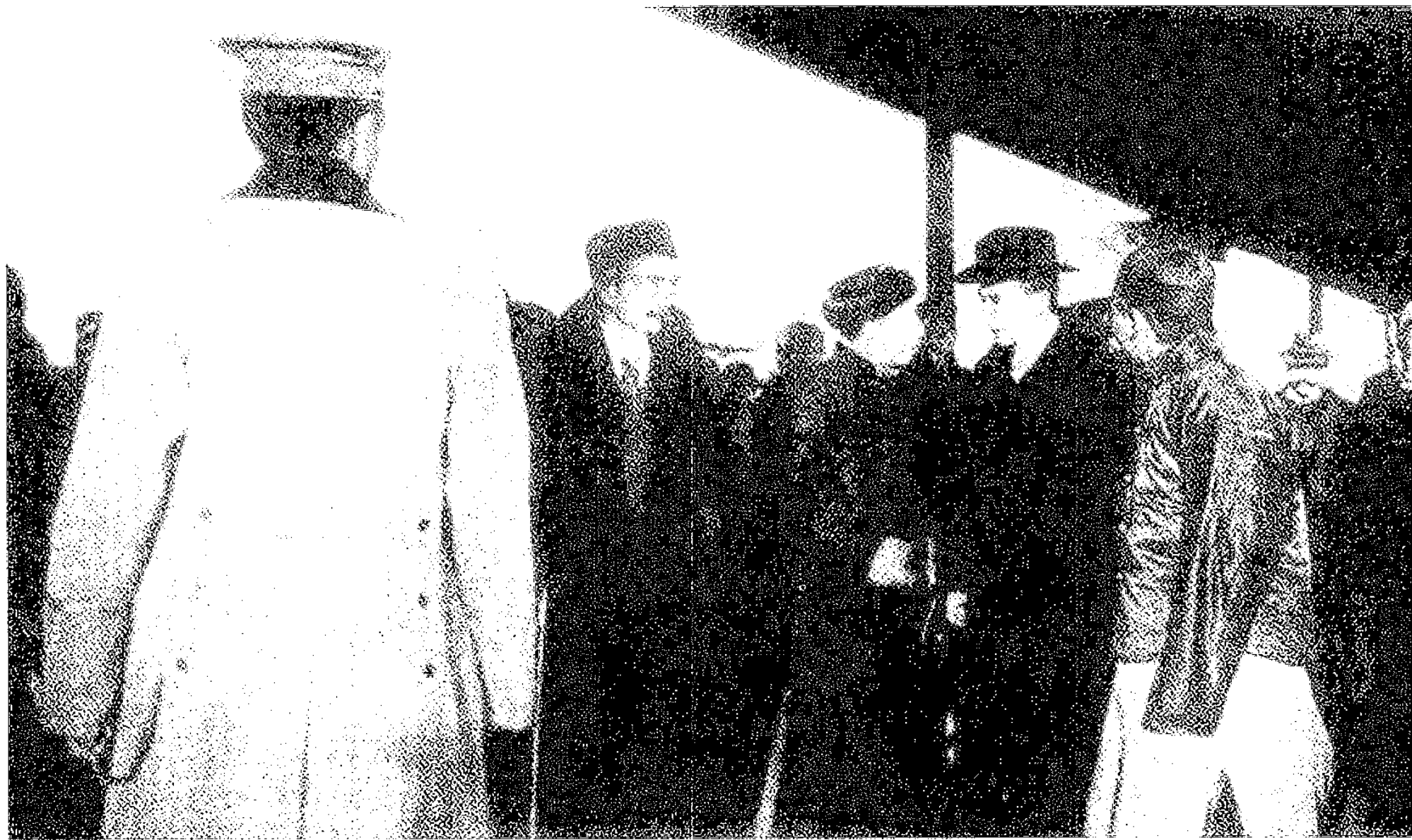
武昌起义一月后,袁世凯亲笔手书往见黎元洪,宣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但是形势比人强,南方数省相继独立,革命形势呈燎原之势。“变色龙”袁世凯闻到了,他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思路,改变了说法:“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

视。”（王锡彤《辛亥记事》）又开始了“言抚进而言和”。（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武夫冯国璋不能深刻领会领导的新思路。一个月后，袁世凯派识大体并了解他心意的段祺瑞接任第一军统领。段到了武昌，“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黎副总统历史》）

最后，袁世凯正式委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上海，与民军先后五次谈判，最终也达成了“定以共和政体为鹄的”，但“南方须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协议。（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



1911年12月，南北议和代表唐绍仪（左二）、伍廷芳（左四）在上海会见。

1881年，唐绍仪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作为朝鲜海关帮办、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派往朝鲜。1884年甲申政变中，袁世凯前往穆府探望朝鲜受伤高官，正好22岁的唐绍仪持枪意气凛然守立门口，给25岁的袁世凯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二人结为知交。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密谋刺杀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双枪双刀双马，连夜护送袁到英国军舰上。袁回国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期间，唐入北洋，直至袁当大总统后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但因唐主张民主共和，试图制约总统权力，与袁渐生矛盾，最后被迫离职。袁称帝之前，唐绍仪发电要求袁辞职以谢天下，袁世凯捧读后竟“气呃不语者多时”。

短短半年不到，从与革命党人势不两立到引为同志，这个弯子，北洋一大批青壮年下属都转不过来，一口一个“老夫”的老首长转得既爽气又利索。

这就是“可新可旧”的袁世凯。难怪袁的同乡、天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王锡彤曾指出：袁世凯“一生得力处在乘机以立功”。

袁世凯还是一个“亦新亦旧”的人物。

说他新亦新：办洋学，唱洋歌，抽洋雪茄，让妻妾学洋文，让儿子去洋夷首善之地的伦敦求洋学，自己编练洋式军队，厌恶太监制度，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实业，废除士兵见上级要下跪的陋习；就连基督教，袁世凯都曾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有很大的兴趣；死后还要求墓穴采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濒河庐墓形制修成。

说他旧亦旧：认为妻妾多少是男人有无本领的标志，喜欢女子裹小脚，想当皇帝，骨子里不喜共和，“仇视农民起义”，“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纽约时报》语）最能证明他“旧”的是在他生命走向终点时所演的三场“老戏”。

顾维钧对袁的结论是：“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袁的新旧是这样说的：

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袁大总统演的三场“老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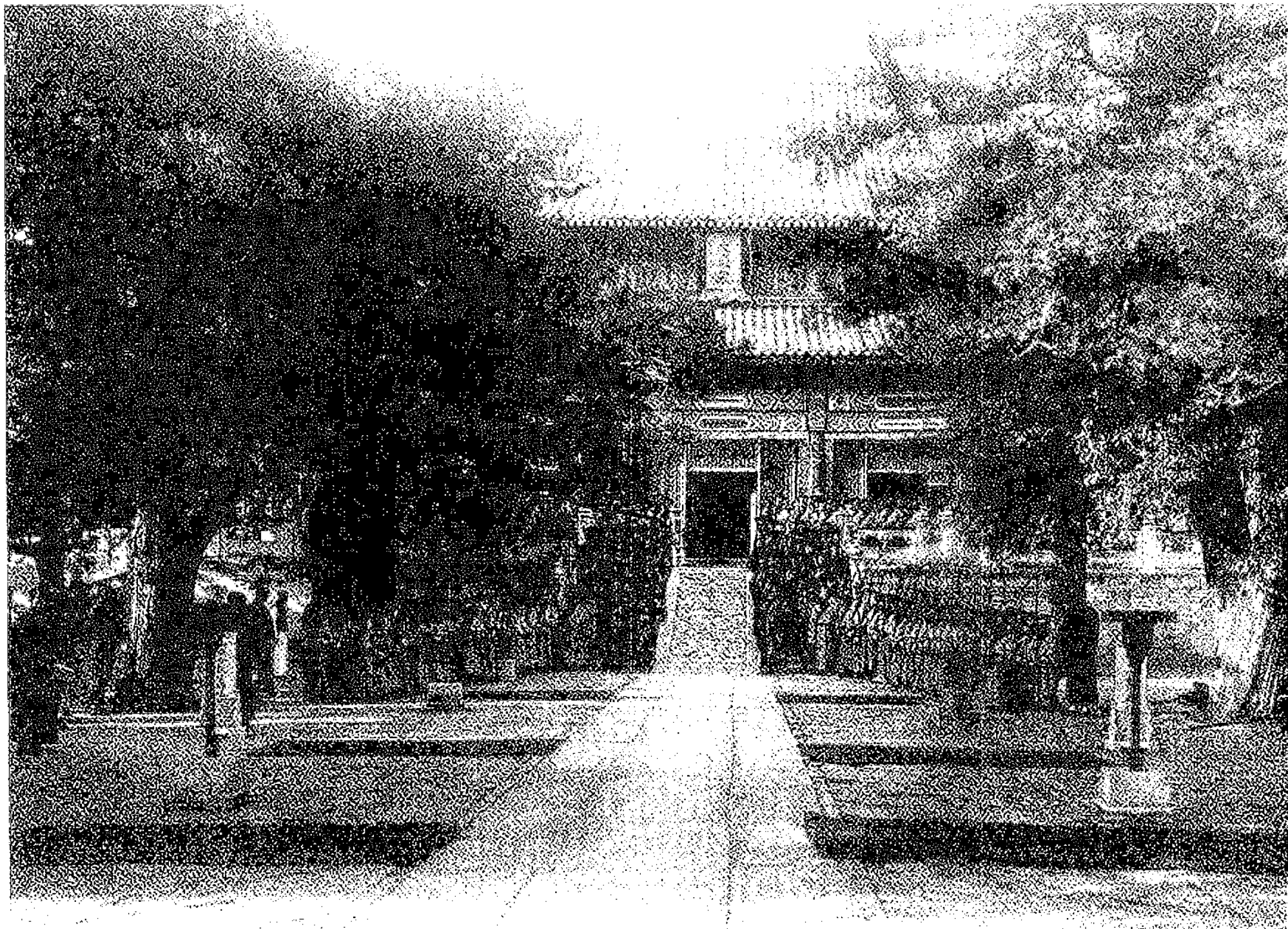
第一场：1913年，他动过念头，弃共和而行君主立宪制。为此他想推出孔子的后代，孔子七十六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1872—1919）。《纽约时报》写道：

他深知这位孔子的后裔可以使中国的各个政党团结起来并使世界接受，这些政党以前相互争斗致使立法等根本无法进行。……

袁世凯把孔令贻推上皇位后，打算辞去总统一职并结束他的独裁统治，成为首相兼皇帝的助理，成为政权的领导者和建议者。总之，他就是皇帝背后的皇帝。（《纽约时报》1913年9月7日）

第二场戏：袁大总统提出的祭天尊孔议案。《纽约时报》报道了袁世凯天坛祭天的活动：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文武百官到孔庙祭孔。



北京，12月23日——袁世凯大总统今天在日出时出现在了天坛，并恢复了在冬至日进行祭天的活动，这一传统自从1911年清朝灭亡后就被忽略了。

昨天的祭天是对这一提案的执行。大总统接受了关于这些宗教场合相关知识的指导，其中之一是穿着公元前1022年周朝时的袍子。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的仪式被恢复了，同时儒教也成为了国家的宗教。

对袁世凯的这种仿古行为，《每日电讯》记者说：

恢复所有的旧礼教、立孔教为国教、使历史的钟摆回到1911年之前的状态等等做法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最令人惊异的一点是，人们在这次争论中严肃地引用了许多在三四千年前占统治地位的典章，相形之下，最古老的欧洲文明也恍如刚刚诞生于昨日。

第三场戏就是登基做皇帝。

什么时候新什么时候旧，哪个场合新哪个场合旧，袁世凯拿捏得很好。

这就是袁世凯，一路像泥鳅一样滑过来的官场老手，终于走到了他的辉煌。

倒是袁世凯磨磨蹭蹭

大家要他挑头的呼声很高，倒是袁世凯磨磨蹭蹭的，特别不爽快。

以前慈禧太后在的时候，老袁开口一句袁家“世受隆恩”，闭口一个“肝脑涂地”。现在要他把不称职的董事长换了，这个弯老袁一下子转不过来，就是转过来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说到底老袁还是没有陈伯达说得那么无可救药。唐德刚分析说：

古人说无毒不丈夫，搞流血政变，把寡妇孤儿和满朝亲贵一举而诛之，干这种事的人，要心狠手辣。将人比人，袁氏那时就显得婆婆妈妈，心不够狠，

手不够辣。他多少还有点妇人之仁，对寡妇孤儿不忍下手。他多少还有点东方儒、佛两家的恕道。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己因此也丢掉了金牌。

什么金牌？

金牌就是让革命党人在南京不打招呼地先期成立了中华民国，让当时那位刚从美国丹佛打工回来的孙中山当上了大总统。关于这件事，唐德刚说：

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 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指卢瑞连，此人是不是孙原配卢夫人的娘家亲戚？作者注）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

老袁，你也别不服气，谁叫你磨磨蹭蹭，婆婆妈妈的。“首任大总统”没你的份也是你自讨的。南方那里和你暗恋多时了，就等着你干脆利落地离婚再婚，你却一再要求给点时间，给点时间……

徐世昌说：

袁本想在清帝退位后，自为总统，故清帝退位诏中有“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语。不料南京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之总统且由中山推荐，此非项城之所逆料也。

说来说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慢了半拍。

徐世昌说袁世凯

1911年，袁世凯心里到底怎么想，后人无从得知。但是老辣的袁世凯将这台1912年的好戏演成了“也是没法子”的被动挨打戏。

谁说的，最好的导演就是看上去没导。“袁世凯在1912”就没有袁大导演导过的痕迹。

暗地里，袁世凯的导演脚本写得可细呢。徐世昌这个“水晶狐狸”，袁世凯叫他大哥，其对袁世凯的老底最了解。可是袁世凯活着，他一句不说，过了些年，到底憋不住了，借“以正视听”为名，授权袁世凯身边的大红人、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说了出来。

却原来“辛亥革命时，清廷起用项城，督师武汉，未几，擢为内阁总理，其权势之重，一时无与抗衡者。当时，其左右亲昵之人，即有劝袁利用机会取清廷而代之之议”。

是啊，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多人的进言，袁世凯，袁项城就不想？想！但是袁世凯不敢。

内阁总理大臣，而且是责任内阁。大权独揽，他还怕什么？

徐世昌给出的道理应该是最权威的，“然而项城之所以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民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义等，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

徐世昌的分析，由于是内线消息，所以刀刀见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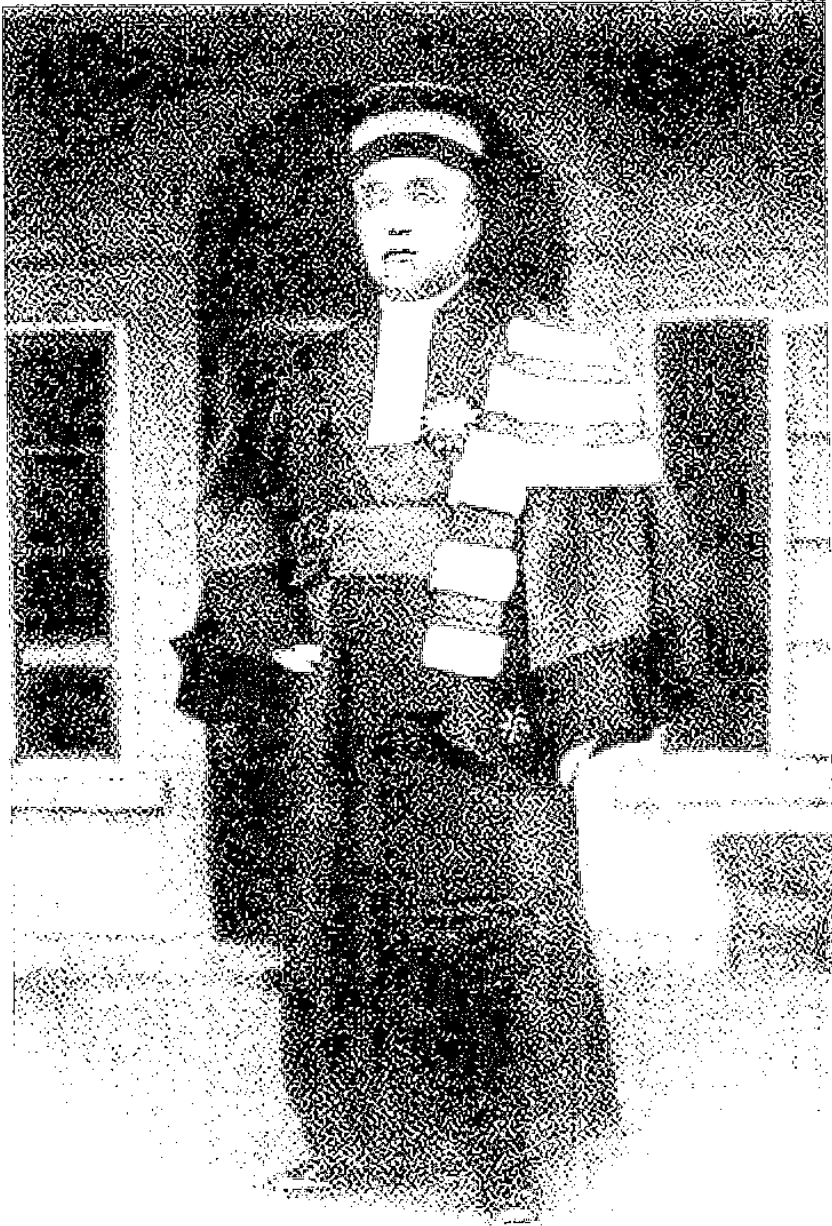
这些人是地方大员，封疆大吏，手上有点军队。

不过老袁过虑了，这些人几个月后大多走的走散的散。赵尔巽、李经义这两位后来还被袁世凯拉进“嵩山四友”。

什么是“嵩山四友”？想想吧，那封号比亲王还封得少，只有四位。见到我们的洪宪大帝可不称臣，不跪拜。也就是说书里的“千岁爷”。

可是徐世昌得了“嵩山四友”，却苦笑说：“所谓嵩山四友，即永不叙用之意。”

这个“水晶狐狸”和袁世凯拜了把子，说话做事从不死心塌地，总是若即若离，



徐世昌身着洪宪帝制特种朝服 袁世凯称帝后，大肆册封，发表嵩山四友申令，免其称臣跪拜，赏穿特种朝服。“嵩山四友”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义、张謇。徐世昌虽被封为“嵩山四友”之一，却拒绝领衔劝进，早早即称病辞官。

徐世昌自从跟对了人，就一直官运亨通。庚子赔款后，清朝实行新政，在袁世凯的保举下，徐世昌先后任巡警部尚书、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即使在两宫去世，袁世凯出局的情况下，徐世昌仍得以保全，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图为任东三省总督兼署奉天巡抚的徐世昌（前排中）与同僚梁如浩（前排右二）、张锡銓（前排左二）、朱启铃（第二排右二）等人合影。



立场暧昧，永远让人摸不透。

“嵩山四友”的待遇是：每人每年两万元年金；赏乘朝舆，穿特种朝服；临朝时，得设矮几以坐。

此外袁还有“故人勿称臣”之命，“故人”共七人：黎元洪、奕劻（庆亲王）、世续（前军机大臣）、载沣（醇亲王、前摄政王）、那桐（前军机大臣）、锡良（前东三省总督）、周馥（前两广总督）。

袁世凯剪辫子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袁世凯大总统在外务部大楼剪了辫子。

脑后一条大辫子是大清国臣民的招牌形象。据说阿根廷小孩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画中国人时都有条大辫子，说明流毒有多深。

这个用了200多年的招牌，一下子去了，很多遗老遗少着实有点舍不得。但是美国大使芮恩施在他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说袁世凯没觉得有什么舍不得：

清朝的重臣袁世凯要就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了。他问他的海军将军蔡廷干：当他进入一个新时代之际，是否需要在外表上也表示一下，把头上的辫子剪掉。蔡廷干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于是袁氏叫人拿来了一把大剪刀，对他说：这是你的主张，你来实行这个主张吧。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看起来，袁世凯对跟了自己50多年的这根“父精母血”并不留恋，弃之如废物。且慢，袁世凯剪辫子不只有美国大使一种版本。据莫理循说：

蔡刚才来看我谈关于我在今天下午五点钟去见袁世凯的事。他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两天之后，蔡终于说服了袁，十六日他写信告诉莫理循说：“他们同意让我去剪掉总理（大总统）的辫子，而不是叫理发师，

因为他感到相当难为情。”

莫理循的话有点儿像袁世凯了。他一口一个“世受隆恩”，在剪辫子这个当口，怎么着也要做出三思而后行的样子。再说老官僚袁世凯的审美观一定是“前清的”，没辫子的确有点儿“难为情”。

袁大总统剪去辫子，这应该是报纸的头条。应该不止两个版本，果然还有第三个，那便是袁的军事秘书唐在礼的版本：

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大楼里剪了发辫。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袁的这种情况很难见到，后来也未曾见到过。当晚在袁周围的人也很兴奋。“袁宫保剪辫子”这件事，很快地就轰动了整个北



Le Petit 杂志封面画“袁世凯剪掉了辫子”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干为袁世凯剪去了辫子。当时在场的有他的儿子（可能是袁克定）和副官唐在礼。这一场景带有象征意义，受到世界媒体的瞩目。法国画师据此绘制的油画成为法国 Le Petit 杂志 1912年3月刊的封面图片。

京城的军政上层，不少人也剪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的人迟迟不剪。有科举功名的，尤其是翰林公们剪辫子的比较少，像江朝宗、陈宝琛、华世奎等简直不理这件事。

第二天的天津《大公报》报道，袁世凯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

袁世凯剪辫当天《纽约时报》就有话要说：

北京，2月16日——袁世凯今天剪掉了他的辫子，这也意味着他扔掉了自己作为清朝臣民的标志，而即使是在他安排清帝退位时，也一直戴着这个标志。

都说当时北方比南方保守，可是你可曾想到，在辛亥革命前1904年起，新军官兵、警察剪辫子的越来越多。因为实在难以阻挡，所以进入1910年，军咨大臣载涛干脆决定不再禁止禁卫军剪辫，准其自由。

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新军脑后没有辫子的真实留影。更早几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居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武员，都是有功名的。

北方的辫子是自觉自愿剪的，南方革命党人的地盘上，剪辫子就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临时政府在南京市里下令强迫剪发。剪辫子的平头百姓觉悟当然没有我们大总统高，所以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发生：一路上，只见剪发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尤其是乘船上岸的人，上一个，剪一个，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也有摸着头顶长叹的，或者大笑的，面对辫子的消失表现各不相同。下至街上一路望去，已尽是光头。

和革命党人短暂的“爱情”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那点“爱情”是在政府军和民军武昌的枪林弹雨中，上海的唇枪舌剑南北和谈中建立的。

黄兴曾指挥过汉阳保卫战，和冯国璋等北洋军队打过仗。他认为革命军没有一举击败北洋军的实力，主张：“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忌的；否则，他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

和黄兴一同带兵打仗的李书城仔细地算了笔账：“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战斗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市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虽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从汉口、汉阳失败的经验看来，想仰仗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

打不了就和吧！

南北议和时，伍廷芳与唐绍仪的公开谈判只是走形式，真正的政治交易，是经张謇居中安排，由唐绍仪和黄兴等在老官僚赵凤昌上海寓所“惜阴堂”中进行的。

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他为民国大总统。交易既成，张謇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

袁世凯不是革命党人，也不是民军的一个山头老大，甚至都不是革命党的同路人，这次却和革命党人玩起了老鼠和猫的“爱情”。

如同今天“网恋”一般，袁世凯和孙中山没见面时，书信已经来往了一大堆。同盟会第二号人物、民军总司令黄兴致信袁世凯说：“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时报》，1911年12月18日）。

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



张謇

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纽约时报》援引袁的话：“袁世凯说他非常钦佩孙中山先生，因为孙先生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两方好话说了一大堆，却各打自己的算盘。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职后，曾对胡汉民、廖仲恺等人说：“袁世凯诚然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 260 余年的满族贵族专制则强于用兵十万。纵使袁世凯继行专制体制，其基础也远不如清朝，推翻他要容易得多。今日可首先推翻清朝，成一圆满之段落。”

袁世凯搞定民国总统职位后说：“他们来（指孙中山进京），我们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们这个圈儿里。”

1912 年 8 月 24 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先后在京受到了袁世凯的隆重招待。

待人接物、礼数和出手，是袁世凯的强项。在会面时袁世凯称他们为“革命元勋”。在欢迎宴会上，袁世凯甚至站起来高呼“孙中山万岁”。很多细节我们可以从袁世凯的亲信、具体接待人唐在礼的回忆中体会到：

孙中山和夫人卢慕贞到达北京之日，政府迎接的人很多。袁世凯在事先命令对孙中山的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完全与大总统同等待遇。馆舍选择在石大人胡同原来的总统府，那里建筑既宽敞轩朗，铺陈亦富丽堂皇，而且便于警卫。

袁世凯为接孙中山来京，筹划甚久，用心很深。他故意把原总统府腾让出来，加以修缮让给孙中山住，自己却搬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去办公。

孙中山到京后，按“行客拜坐客”的老规矩，先拜访了袁世凯。袁世凯也恭敬如仪地作了回拜。一时石大人胡同车水马龙，前往谒见孙中山的人很多，有新旧政客，有广东同乡，有日本人，还有不少新闻记者。袁世凯为了表示竭诚招待，指派我和大礼官黄开文在石大人胡同孙中山的行邸照料。我们并派有侍从多人听从孙中山等支派使唤。孙中山如公出，即为安排车马，预洽休憩餐膳之所，否则即在行邸备膳陪座。

黄兴后孙中山半个月到了北京，陈其美也陪黄兴同来。总统府举行了欢迎

孙中山、黄兴的公宴，袁世凯亲自到场主持。

袁世凯、孙中山之间，两位夫人之间，都表现得很亲热。宴会场中最活跃的要算徐世昌、段芝贵、梁士诒和我夫妇了。孙中山等在京逗留前后约两三个星期，其后即由孔祥熙陪同，往山西去和阎锡山会面。

1912年8月24至9月16日孙文与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十三次。

9月25日，《政府公报》第149号公布了这些会谈的主要成果之一：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

见面后，孙中山对老袁的感觉还不错：“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

到京后的第四天，1912年8月28日《亚细亚日报》记者问孙中山：“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

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第五天，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

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

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黄兴见了袁世凯亦相谈甚欢。话一投机，黄兴和孙中山还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后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表示：加入政党诚然不错，然“今则非其时也”。事后他对别人说：

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主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四海之内，皆吾兄弟，三人同行，厥有吾师。俟将来政党真正稳固，或不能终守不党主义。

瞧，老袁一套一套的，谁说他城府深，不轻易表态？

政治就是政治，好话后面就归利益了。

《洪宪遗闻》中张国淦转述徐世昌的一段话：

犹记民国初元，项城常与余谈及中山坦白，克强憨直，颇思与国民党提携，乃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国会评论员如张耀曾、谷钟秀等亦事事挟持政府，项城终觉国民党不能合作，于是改变态度，与国民党为敌，而有赣宁之役。

袁世凯和孙、黄的友谊是短暂的，与黎元洪的交情虽然不甜蜜却断断续续维持到袁死也没相互撕破脸。

与人不争一时一地之利的“黎（泥）菩萨”黎元洪是民军中的稳健派，无论从意识形态和为人，他一定不吝啬说袁的好话：

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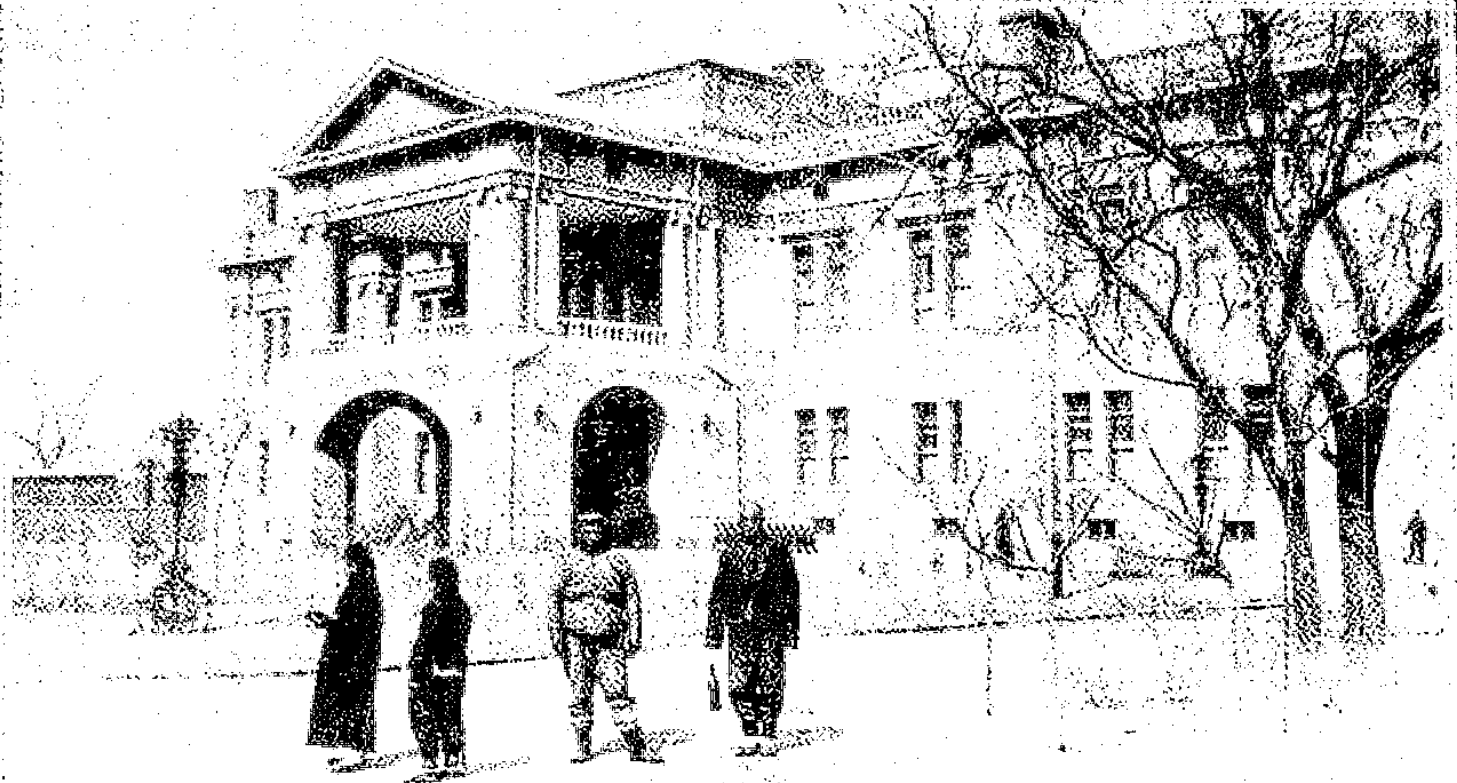
黎元洪是个有名的“不沾锅”，与谁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产生美，所以他和谁都能客客气气，唯独容不下辛亥革命首功者张振武。张说话大大咧咧，瞧不起黎元洪。黎用计调张去北京为官，然后黎自武昌给袁世凯一封密电：

张振武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Vol. 11, No. 100

CHINA, THE REPUBLIC: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IDENTIAL HOME

By the Hon. Mr. G. H. B. ...



THE PRESIDENTIAL HOME IN PEKING, CHINA. THE NEW MEXICO ...
 ... THE PRESIDENTIAL HOME IN PEKING, CHINA. THE NEW MEXICO ...
 ... THE PRESIDENTIAL HOME IN PEKING, CHINA. THE NEW MEXICO ...

《伦敦新闻画报》1912年4月20日发表的大总统袁世凯与大总统府影像 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就职后，此处改为临时大总统府。

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当晚，袁世凯收到黎密电时，当时不知密电内容关于何事，即亲取保险柜锁匙找密电码本。取到密电码本，自行译校。校毕神色紧张，立命梁士诒通知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三人来府，秘密商量对黎电如何处理？对张振武是否下手？梁士诒主张再去一电询黎，是否确属黎本人意思。隔天得武昌复电，称前日电确属黎本人主意，于是袁世凯才决定逮捕张、方两人，立予正法。

张振武被杀事件，使湖北旅京人士大为激愤，大家同赴总统府质问。袁世凯亲自出见，他说：这件事我很抱歉，但经过情形诸君当已明了，我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明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救他的命。袁的语气把这事完全推到黎身上，孙武等也知道这是黎的主意，所以只好愤愤退出总统府。

经此一事，黎元洪矮了半截，不得不跟袁世凯走近点儿。

黎元洪确实值得袁世凯争取。他是武昌首义的元老，但又并非孙文、黄兴一伙。对于剿灭南方的二次革命也没有发什么杂音。

宋教仁被刺一案，使孙袁过早地结束了“蜜月期”。忍了很久的黄兴撰写的一副挽宋联说得最明白：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于是，孙中山号召“二次革命”。

宋教仁其人

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

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

——唐德刚

1913年1月宋教仁到南方各省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宋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当时任参议院议长的国民党人张继晚年回忆说：“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偕程仲渔（克）访赵治安（秉钧）。王奇裁（治馨）亦在。王云：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反对人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

宋有两次被人扇耳光。第一次是1912年。一天，有人提议，黄兴带兵北上，消灭北洋军。宋不赞成。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大骂宋是在给袁作说客，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第二次系“巾幗英雄”唐群英所为。宋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唐不能接受，冲上主席台，揪住宋，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一记耳光。

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一个以同盟会为核心吸收了四个小党的新党国民党成立了。新生的国民党显然是个妥协的产物，它的政策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中山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纲领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主张，“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被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一个革命性质的党经过宋的改头换面，变成了代表广泛社会舆论的议会党。这在很多同盟会老革命看来是退步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



宋教仁北上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曾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

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单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时党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最后的袁世凯



最后的袁世凯知道自己输在哪里。而袁的死也让所有的人松了口气。蔡锷说，“项城退，万难都解”。莫理循说，“袁世凯的死最理想地解决了他的引退难题”。只有五姨太杨氏有点恨：“都怨大爷（袁克定），他把老爷害苦了。”

袁世凯大事记（1913~1916）

1913年	54岁	<p>7月至9月，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军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10月6日，任正式大总统。</p> <p>11月4日，袁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p>
1914年	55岁	<p>1月10日，下令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2月，又下令解散各级地方自治会和各省省会。5月，下令废除《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成立参议院，设立政事堂。</p>
1915年	56岁	<p>1月，袁接受“二十一条”。12月12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13日，接受百官朝贺，15日，封爵加官。31日，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p> <p>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p>
1916年	57岁	<p>3月22日，袁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5月下旬忧愤成疾。</p> <p>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病死。</p> <p>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p>

袁世凯和日本

日本人从来不相信袁世凯，甚至有点儿憎恶。

袁世凯是有名的亲英美派，加上西方各国竞相拥袁，日本认为袁一旦得志，日本在中国将无立足之地，于是乃有“二十一条”的提出。

日本当时正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无奈老祖宗留给它的战略空间不大。朝西看，亚洲大陆最大最好的一块土地是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大清国。

要命的是，日本当时还不是数一数二的头等国，而那些头等国大多已经和清政府建立了稳定持久的关系，在华列强之间也已经形成了势力范围和利益平衡。

日本在等机会，日本只能等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等到了。1914年开始，一战爆发，整个欧洲大打出手，各方几乎是倾巢而出。远东的大清国成了真空地带。

1914年8月，日本元老井上馨向大隈内阁提出一份《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指出，大战“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保”，主张趁此机会“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日本和中国政府须“用一切方法订立包含秘密条款的防御同盟”。日本总理大臣听进去了，于是乘机提出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有一个直接相关的背景，即此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英国、法国和德国完全置身于欧洲战事，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来关心亚洲的事。由于协约国在欧洲吃紧，英国日渐感觉到，它需要日本的援助，因而默许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俄国也正策划自己对中国的渗透，因此对日本的行动也不加反对。只有尚未卷入欧战的美国，对中国表示了些许同情。然而，就连美国也不愿因为中国问题而同日本发生对立，它关心的首要事情仍然是欧战。结果，北洋政府无法期望得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帮助。这是日本人手中的一张很有力量的“国际牌”。

相对于蓄势待发的日本，此时的中国政局动荡，国力贫弱。

在1914年春天的几个月里，“没有一省能免于匪患、未遂的叛乱、游兵散勇的骚扰和地方性的暴动。湖北、河南两省由于白朗匪帮的活动，情况最为严重”，国内革命党人的活动更是袁世凯的心腹大患。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量举借外债，更增加了对列强的依附性。而对与日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革命党人的支持与否，

成为日本对袁世凯进行威胁利诱的一张“国内牌”。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是无力和日本进行一场必胜的战争的，通过战争来拒绝“二十一条”是不可行的。北洋政府的外交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况。

话说，这个“二十一条”是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见袁世凯时提出的，这种方式于外交场合极不寻常。据老袁身边的张国淦说：

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愤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我要做皇帝，也不做日本的皇帝。”

过后，袁将条约文本留下细读，感到兹事体大。

“翌晨，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汝霖）四人到府面谕。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意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曹汝霖语）

“二十一条”到了袁大总统手上后的第二天，曹汝霖说：“袁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现只能记其大意，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滿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曹说的第一项指“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作者注。）

袁世凯同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曾叔度说：

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
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曹笔下的袁朱批还有：“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协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

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没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至第五项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等语。”

这就是曹汝霖笔下的袁朱批。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存有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

对于“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意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袁世凯批道：漫无限制，各国援引，尤不可行。

关于日本提出的“合办警察”、整顿福建海口等事，袁世凯也加了重笔，不予认可。

关于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道：“办不到。”

在“二十一条”最后，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袁世凯还另文批示说：“欧战相持不下，法比各有失地，将来大会支配，殊难预计，胶澳能否由强人让交，此时尚无十分把握，订此预约，尤足招强人之恶，他西人亦未必同意，殊属吾谓纵能预交日人交还青岛，亦是空人情。”

从以后的实质谈判中可以感觉到，袁的朱批，日本人一无所知，这似乎间接地证明，参与人员中无“日谍”。

进入实质谈判很艰苦。对袁来说，这无异于一次凌迟。

这不是一次同等级别的较量：军事上打不过人家，金钱上还要仰仗人家的贷款，同时对方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同盟军遍布中国。

第五節 譯漢文

- 一、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
- 二、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 三、向來日中西國處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糾纏之事不少，因以須將心要地方之警察，為日中合辦，或在共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入，以資一面籌畫改良中國警察。

“二十一条”第三條

第三款 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煙台、
由我自建以借新債第一條實行
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隨可先借日本商債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諾為外國人居住買
現事財政困難經營支儲庫存

袁世凱對“二十一条”所簽結

君不見各路反袁大军里或多或少的都有日本的影子。卖给一二个国家，拉虎皮做大旗。这是我们近百年来政治斗争的一种常态。

袁世凯唯一期盼的是西线无战事，英美能腾出手来“拉兄弟我一把”。为了这个子虚乌有的“可能”，老袁和日本玩起了他惯用的那一套，曰“拖”。

想拖就要王顾左右而言他。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老实，第一次和日本大使谈判就进入实质内容，逐一“指摘，加以评论”。

笔记呈总统，袁大总统阅后大不以为然：“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征得陆子兴（时陆任政府高等顾问）同意，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务处督办。”（《曹汝霖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

据此，老袁的雷厉风行可见一斑。

老袁找对了人了，陆徵祥这人，一辈子就没有干脆过，性格使然。他将老袁的

拖字诀发挥到极致。

当日方提出每周开谈五次时，陆说：“每周五次，我身体素弱，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改为每周三次如何？”

日使即表同意。

顾维钧是亲历者，他有个段子写老陆的“拖功”，比较绝：

每次会议都在下午三时至五时召开，但陆总长使用了一些手法来拖延。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客套话会长达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钟。然后侍者清理桌面，摆上茶点，又需中断三十到四十五分钟。尔后在讨论中，一切必须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及由中文翻译成日文。陆总长习惯于讲究讲究辞藻，出言文雅，轻言慢语，译员施履本有时听不清陆总长言语，又需请他复述一遍。遇有困难时，陆总长即向日方提出：“我将就此报告大总统，下次会议时给贵方答复。”

最令日本人气愤的是秘密会谈的细节，美、英报界都有公开的披露。实际上，这里会议结束，那里就有袁世凯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和专办秘密外交的蔡廷干用英语直接告之英美人士。顾维钧回忆：

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当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电询政府二十一条的详情，尤其是第五号时，东京开始焦急不安，显然东京并未将二十一条的性质及谈判进展等详情通报其驻外使馆。

谈判在最关键的第五条上陷入了僵局。让日本人进入自己的领导层，这就等于卧榻之侧，容一他人鼾睡。

袁世凯坚决不答应，但是又怕引起战争。这时候老奸巨猾的袁走了一次后门。

这时候，有贺长雄正在做袁的顾问，此人在日本不但作为学者地位很高，而且和日本高层人士交往密切。袁请他回国向日本“有关人士”疏通，有贺长雄居然答应了。

不久有贺长雄见到了松方正义侯爵。这松方正义是革命老前辈，占据日本财政中枢长达22年之久。去世时日本政府为他举行国葬。

不久，有贺返回北京，向来接他的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曾叔度说：“这件事真相已明。我见了松方侯爵，哪里知道，侯爵实不知其内容。如此大事，并未经过御前会议，松方只知道大隈要与中国解决悬案，不知其他。我乃将二十一条内容告之松方，并言日本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国际间通行礼貌。”

松方说：“大隈重信言大而夸，你快回华告诉袁世凯，满洲系我帝国臣民以血肉性命从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应当予帝国以发展的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得都支持他的要求。”

曾叔度将松方的话回报项城，项城大喜：“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就是满洲，俄国所抢去的，他日本都拿去了，他还想要发展，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现场。左起：（中国）外交次长曹汝霖、外交总长陆徵祥、秘书施履本，（日本）参赞小幡酉吉、驻华公使日置益、书记官参赞高尾亨。



你发展了，我却瘪了。”

情急之下，加藤外相对华下了最后通牒。百般胁迫的同时，又将第五条在最后通牒里“暂时脱离，容后再议”，对袁世凯来说这就等于日方自行撤回了第五条。

据曹汝霖描述，袁世凯在签约前的内阁会议上有一番说明：

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

……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袁世凯知道史家不会放过他，于是让人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袁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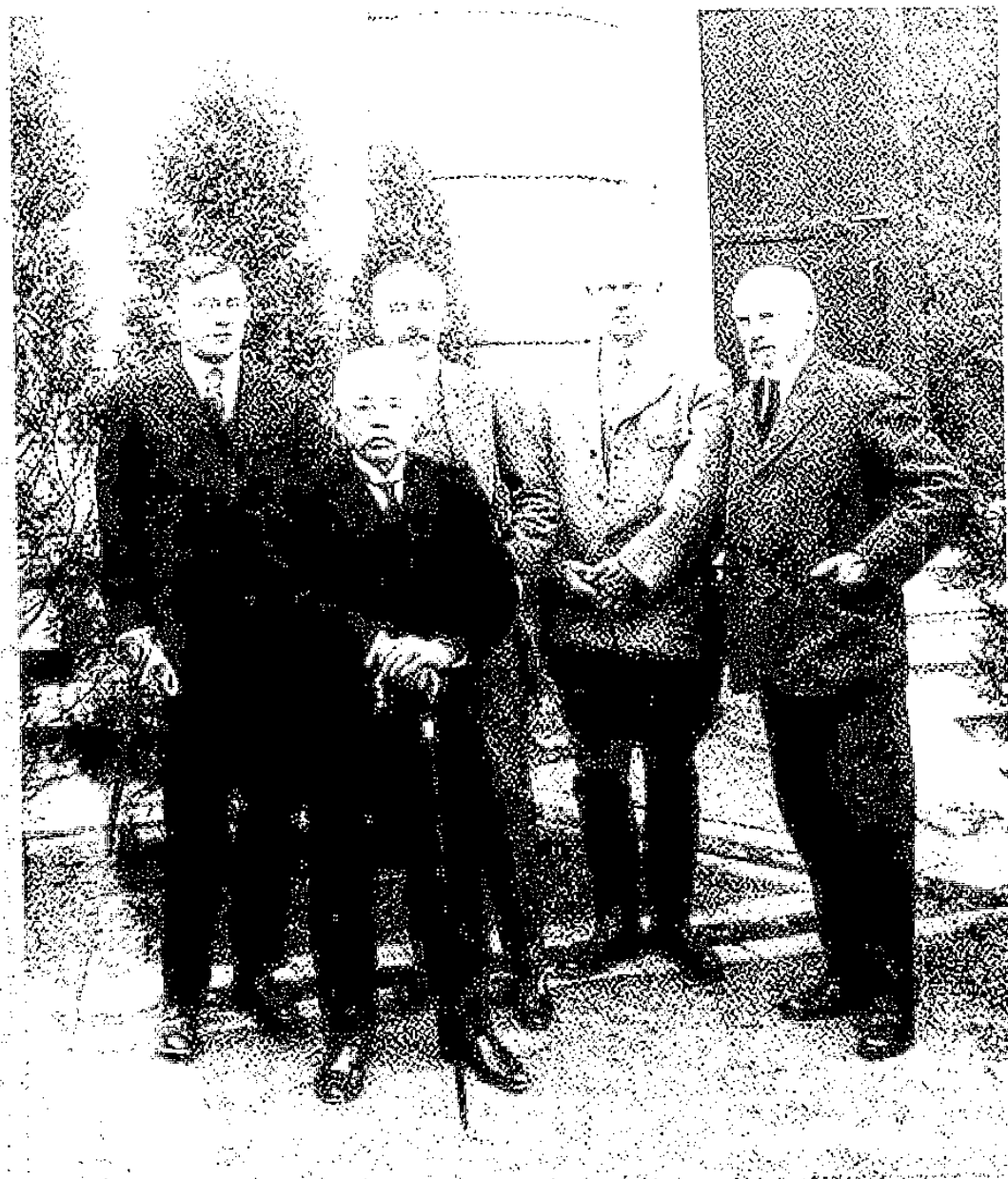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大隈重信



绝版袁世凯



日置益 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日本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蛮横地提出：“本国政府此次要求，极为正当，必欲达到目的而后可。”后以全权代表身份参与“二十一条”的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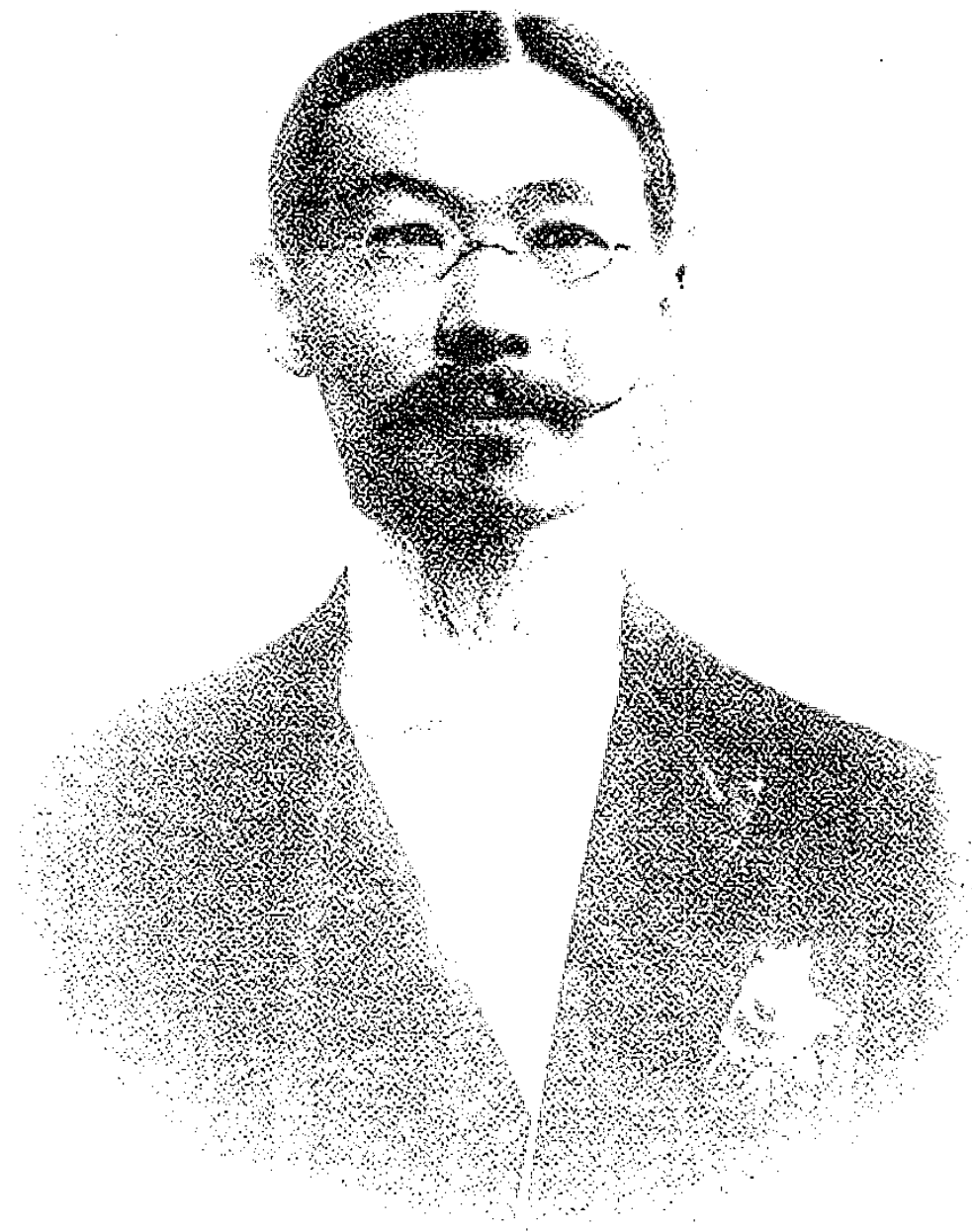
有贺长雄（前）与莫理循（右二）等外国顾问合影

1913年3月，由于国民党议员的反对，袁世凯交议的《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在参议院审议时变成废案，心有不甘的袁氏聘请日本人有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为总统的宪法及法制顾问。

有贺长雄能担当此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作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教授，即将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占有席位的议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他以前的学生。有贺长雄名义上是中国国家元首聘请的宪法顾问，实际上却扮演了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政治家”角色。民初参与反袁斗争的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王葆真愤怒地谴责说：“外国顾问中，日人有贺长雄最为奸狡毒辣。”因为他能够刻意迎合袁世凯的意图，深得袁的信任。同时，他又扮演着日本间谍的角色。有贺长雄的助手，有的是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高级间谍，如青柳笃恒。他们利用能够接近中国政府核心人物的机会，不断刺探中国的政情、军情，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

陆徵祥 在谈判中，陆容颜和气，时常发些模棱两可的意见对某些条款作出妥协，但在某些方面，仍态度坚决，不肯让步。如此反复，这样，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自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前后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从谈判时间之长，我们即可看出交涉之艰辛。

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采访陆徵祥，陆曾对未来国情提出简短而著名之警句：“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曹汝霖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一蟹不如一蟹

清朝和民国哪个好？章太炎说“一蟹不如一蟹”。

大众本以为革命了，共和了，驱除了鞑虏，学来了富国强民的真经，日子会好。

没想到乱象横生，社会动荡不安。原来大家就有九斤老太的心态，一看如此，更是怨声载道。有骂袁世凯当国不当的，有骂社会堕落的，还有骂国民党捣乱的。那是一个任谁都可以扯开嗓子骂人的时代，骂人惹了祸还可以躲进租界。

李宗仁晚年曾经告诉人们：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

严复抱怨：“（袁世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不幸又值欧战发生，工商交困，百货蓍腾，而国用日烦，一切赋税有加无减，社会侈糜成风，人怀怨望。”

美国公使芮恩施说：“中央政府收到各省上缴来的税款总数估计没有超过1912年前清政府预算的十分之一。”

孙中山感到委屈：“你不承认十二年的祸乱是革命党造成的么？民意大多数都承认是这样的。”

俄国的列宁也出来批判中国的袁世凯：

他是愈来愈摆出一副独裁者架势的中国立宪民主党人。

袁世凯的行径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模一样，昨天他是一个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成了一个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当复辟后的君主制国家的首脑，也就是打算出卖共和制。（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1913年）

对于这些批判，袁世凯感到委屈。当美国记者采访他时，袁告诉美国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期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袁自己似乎并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女儿说：

他做大总统的时候，经常是晚间九时上楼，到了这个时候，却深夜还在办

公和会客，以致我俩姐妹虽和他同住一个楼上，可是常常很晚了还不见他上来。因此，他那逗我们说笑玩耍的事情，就成为很少有的了。

《每日电讯报》驻北京的通讯记者描述袁世凯已经几天没刮胡子也没有睡觉了。对于忙，袁世凯给记者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的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新中国。我知道我的任务并不简单，有时在我虚弱的时刻，我感觉到昏厥感并试图告诉我自己我干得够多了。但是每次这样的不平衡的想法都使我感到羞愧，我捶打我的胸和脸，我知道这有点傻；所有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爱向我涌来，于是我继续更加努力地工作。

虽然话说得有点儿肉麻，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野心被大大地煽起来了，在前清缩手缩脚 20 多年之后，如今有这么一个做事比较爽的空间，任何人都会亢奋。

民国任过总理的颜惠庆，当时任外交部次长，他常去袁的办公地，他形容袁很忙，早上七点就召集人去办公室，邀请人一起边吃早餐一边办公，桌上堆满米粥、咸菜、大馒头，边吃边谈各种问题。



中南海里的袁世凯

搬进中南海，他选择了临湖的欧洲风格的海晏堂为办公地点，并改名为居仁堂。

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袁静雪语）

袁世凯的吃喝拉撒几乎都在居仁堂里：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的东头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子氏是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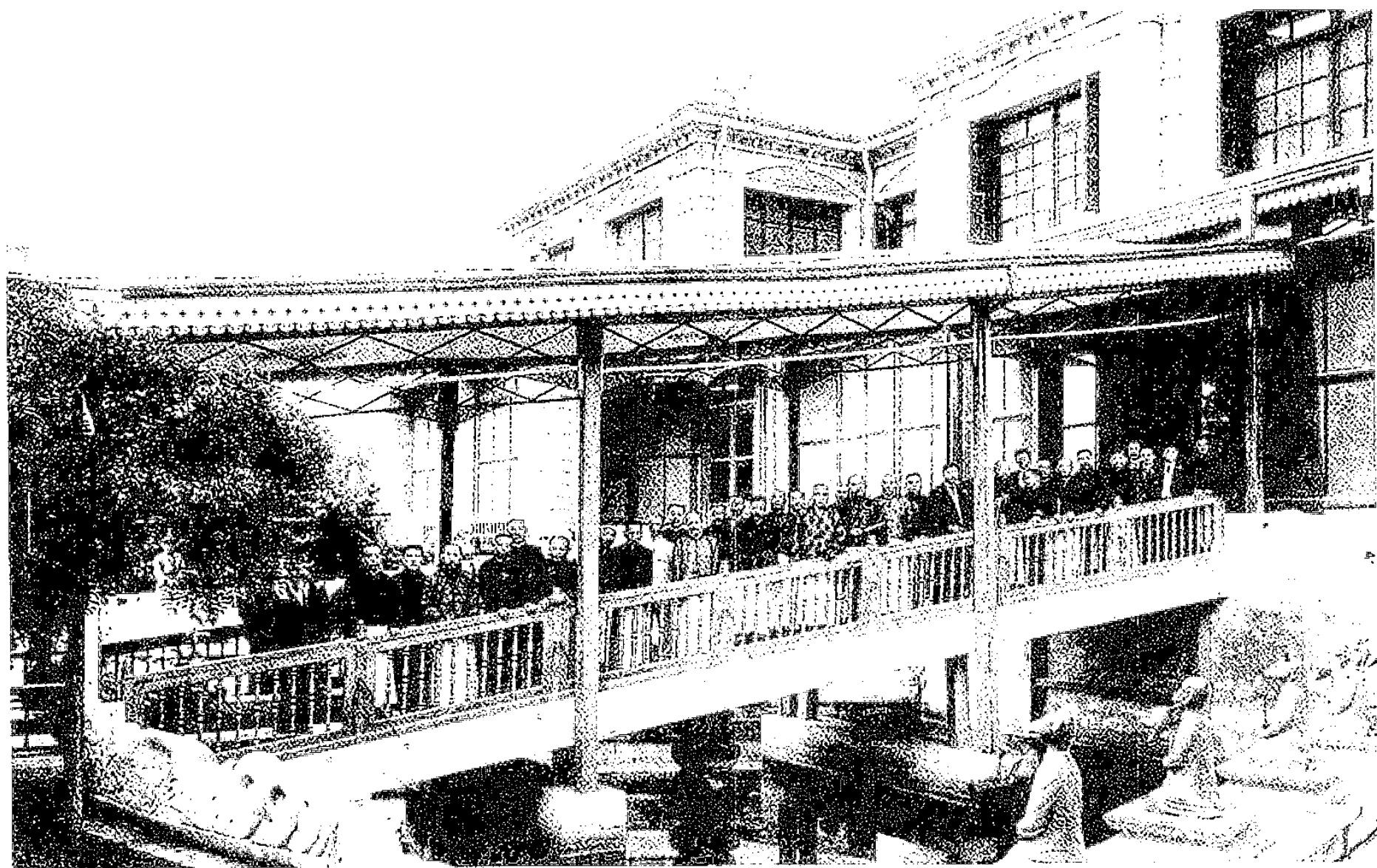
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弟们，住在字廊后边的4个院子里；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们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袁静雪语）

居仁堂里古玩多，但是“袁世凯不好古玩，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古玩有什么稀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袁克齐语）居仁堂1949年后只短暂地做了会儿中央军委的办公室，1960年代还是让拆了。

袁世凯是个大胃王，而且吃饭很香。曹汝霖一次被留下：

同进晚膳，见他有兼人之量，碗大的馒头，吃了两个，还佐以肉类，我只能吃四分之一。他说你不惯面食吧，叫侍者拿米饭来。我说不是不惯面食，实在已饱了，不能再吃饭了。

南海居仁堂（左页图、下图）前身是慈禧下令仿照圆明园海晏堂修建的西苑海晏堂，都有十二生肖铜首装饰，不过圆明园的兽首是喷泉，西苑海晏堂的十二生肖则手捧电灯。下图为1918年徐世昌就任总统典礼结束后与其他官员在居仁堂的合影。



听说他早餐可以吃十几个水煮蛋，食量是常人的三倍！

这个好胃口遗传给了他的十七子袁克有，克有“每餐饭后必有一道小菜，就是让十五嫂炒 16 个鸡蛋，就像餐后的茶点一样必不可少”。

袁世凯的食谱里，不是鸭子就是肉，他还特别爱吃鸭肫、鸭肝之类的动物内脏。还有人说他爱吃滋补品，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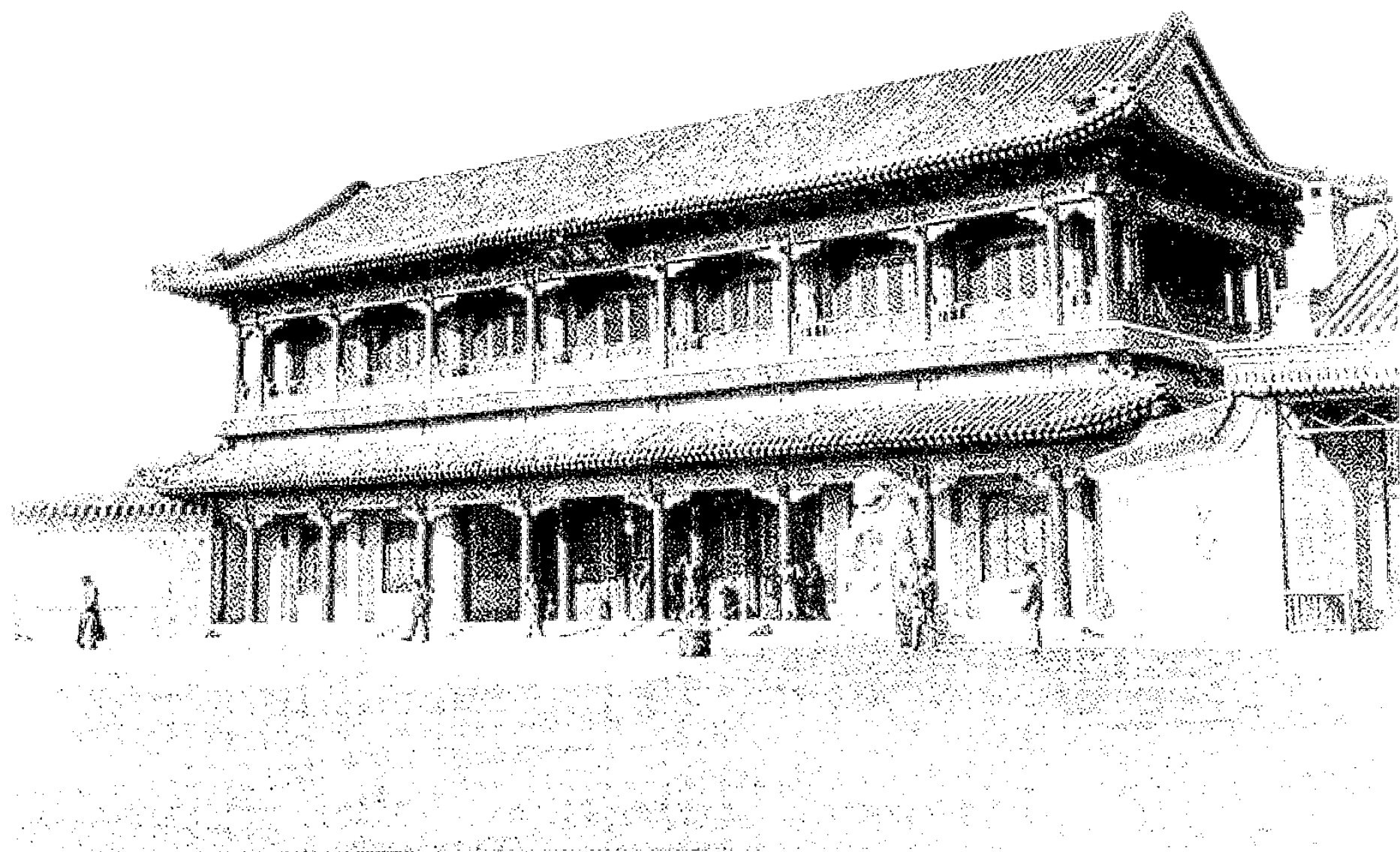
他的早死，别人以为是家族遗传，在我看来是蛋白质、胆固醇摄入量超标。袁的体重严重超标，生活习惯又不好，加上后期精神忧郁，俨然就是“三高”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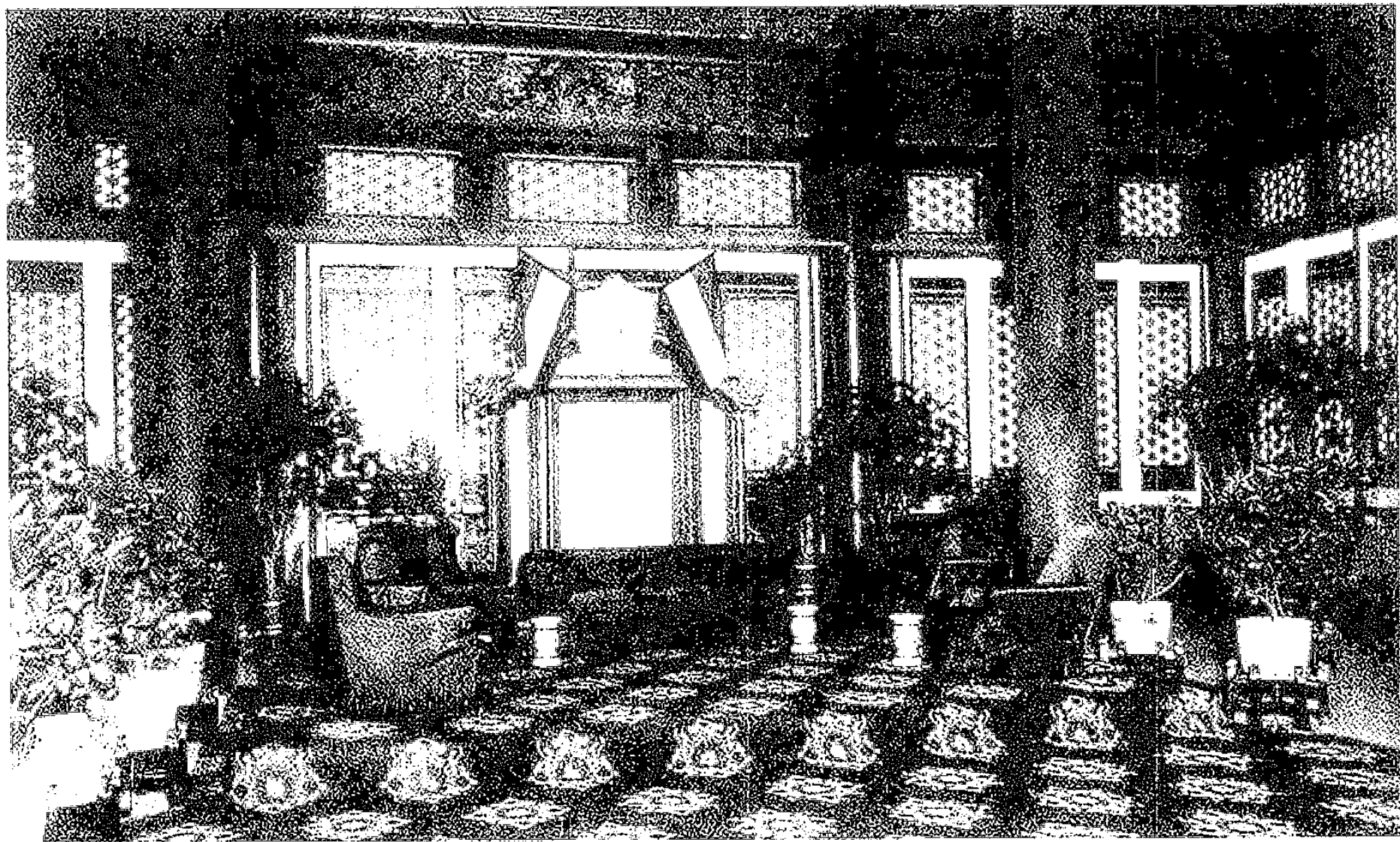
每日公余到晚间，袁率全家人口逛花园，进晚餐，与在洹上村时情形相同。总统府花园设于中海西岸演武厅前。（杨景震语）

后来袁世凯在南面开了个口子，将孤零零的宝月楼改为面对长安街的新华门。

袁世凯在这里住了五年多，他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袁静雪语）

1930 年代的新华门





1916年新年伊始，袁世凯为实现帝制，改元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图为新华宫袁世凯接见外宾处。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把中南海辟为大总统府，于1913年把宝月楼改建为总统府的正门，取名新华门。上图为新华门改建后外国明信片上的写真画。可见当时新华门外尚有欧式风格的栅栏围墙。

终究想当皇帝

死后被抬出新华门，说的是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的事。

人们常常渲染这样一个情节，说袁世凯称帝失败，临死前大叫“我被人骗了”。

这种帝王犯错就“清君侧”，将所有的错全赖到周围的所谓乱臣贼子的思维模式，在咱们中国人身上真正是根深蒂固。

谁骗得了他这么个精怪老辣的大总统？我看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他一向认为，只要把决定国体、公众选举自己做皇帝的事筹办得严密妥善，使刚刚离开帝制不远的军、政、官、绅们一体赞成恢复帝制，前途一帆风顺就很有条件，并且安排就绪得愈早条件就愈好。他认为老百姓是没有问题的，还是盼望真命天子出现的占多数，立意要造反的并没几个。只要执法从严，什么乱子都可以压得下去。军队方面，他肯定更没问题，北洋士兵哪一个不给袁世凯烧香磕头。况且他一直认为如果真能实行前清昭示已久而未能实现的君主立宪制将是个大得人心的举动。（唐在礼语）

举国一致的拥护，那是他让段芝贵拍电报给催逼出来的假拥戴；各国所谓的赞成，那是外交部传递的假消息（老外评价说：如果民初有什么成绩值得夸耀，那就是外交部的非凡工作）；1914年海市蜃楼式的财政收支平衡，那是因为袁世凯减缩了开支，停掉了几乎所有的建设项目。

称帝完全是袁世凯自己主导的。他1916年前后说：“这事儿想了几年。”

还说：“中国老百姓不开化，不懂什么民主自由，非帝制不能加以统治。”

在他身边做事的唐在礼早已经看出了一个称帝的先兆：

袁世凯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所有奏折和重要公事几乎完全出于阮忠枢的手笔。……到民国成立以后，公文程式为之一变，新辞、时议皆非阮忠枢之所长，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很快地坐了冷板凳，几乎什么事袁世凯都不请他参加。直到把总统府秘书厅改为内史厅，袁世凯才调阮忠枢出来任内史监。

那时袁世凯筹备做皇帝的苗头已为我们所共知，我们很能看出袁世凯这一着是有所准备的。因为他一旦做了皇帝，就要重新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一套笔墨，当然这就非阮忠枢莫属了。

瞧，马脚已经露出来了。

至于我们见到的拖拖拉拉、陈腐冗长的称帝过程，那是袁世凯这个经验老道的官场老辣惯用的馭术。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不打无准备之仗”。

开始是权衡，这大约起于1913年后，因为这之前他这个总统根基是不牢靠的。按实力，他的铁杆省份只有直隶省、河南省和山东省。半铁杆的最多加上东三省和西北诸省，长江以南根本不是他的势力范围。

论军事，他也只有北洋10万之众可指挥调用。其他的军队，他只是名义上的司令，比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关系还远。这些势力虽然在地理上、政治上是分散的，合在一起却至少是他的三倍。

这就是我们看到在“二次革命”前，他极能善待社会上的各种人，和革命党人称兄道弟，把黎元洪捧到天上的原因。结果呢？

袁政府初期，中央财政收入被地方截留，库空如洗，几乎完全依靠外债，地方财政为庞大的军费所累，普遍入不敷出。以出卖国家主权得到的大量外国借款，几乎全部用于填补纯消耗的军政开支。资产阶级渴望的建设投资、整顿币制和裁撤厘金等均未能进行。（《剑桥中华民国史》）

屁股决定脑袋。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看到这种县截留省的钱，省截留中央的钱的状况，能不痛心吗？当然痛心。

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剑桥中华民国史》）

这种情况不独袁世凯一人碰到。连“中山号称是独立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但没

有一个省给他一分钱。连政府的开张费用，都是那个当了状元不做官的张謇借来的”。（唐德刚语）只是他没做几天总统，少受了不少罪。

中国政治，从来没有协商的余地。妥协在历史书上就是投降、“卖国”的代名词。另外就是协商了，定了规矩，大多也没有按契约精神去遵守的习惯。唯有用武力说话最灵。

袁世凯、蒋介石，开局不好，就是因为他俩办的这个民国公司，是通过谈判协商和合并小公司开起来的。后来怎么样？十多年几十年都在解决早期的“合并后遗症”。1949年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袁世凯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乘各地割据势力沉浸在小富即安的美梦中时，便早早地布局，偷偷地布线。

袁这个人行事如猫科动物，接近，接近，再接近，不到猎物惊跑，绝不主动出击。民国初的这一年半，表面看他一事无成，其实他都在准备。他用的招是大家熟悉的“统一战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当时的中国只要摆平三个地方就能赢得天下。这就是北京、武汉、南京，因为国内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大多集中在这三地，北京的北洋最强，其他两地次之。

袁世凯首先和黎元洪拉关系，帮他杀了眼中钉张振武、方维。然后于1913年4月初，袁利用便利的江汉铁路，秘密接受黎的邀请，从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他们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洋军人数达到了一万以上。至此袁三分得其二。

打仗打的是粮草。袁本指望民国后能做到全国财政统一，但是自从清灭了以后，各地谁都不想受此约束。袁知道不靠武力就收不到钱，要动武就得花钱。钱呢？此时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胆大的袁世凯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签订了“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这是袁借的印子钱啊！是拿中国的盐税做抵押的！袁世凯不顾，一切只为赢！

一切准备妥当时，宋教仁案发生了，虽然后来史料显示此事非袁直接所为。吊诡的是袁就是不多做解释，任其发酵。他暗暗地等着孙大炮主动开炮。

两个月后，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失败了。

这是一次典型的“袁氏战”实例：不惜一切代价借款，然后用现金支付一切：收买叛变的国民党国会议员，收买自治军队的指挥官，为自己的参战部队发足额，使士气大增。唐在礼揭露：

有时密谋分化对方的军力，一经与对方中下级军官接洽妥贴，把他们收买过来之后，就要从优供给他们调度费和开拔费。例如在收买二次革命的民军时，运动取消安徽、江西各省和广州、南京各地的独立，就花了大洋几百万元。

更绝的是，袁的十年外交储备也成了“袁氏战”的一部分。他的20年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要求英国作出特别违反常理的安排，直接向在上海的海军军舰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袁。汇款是如此的及时，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海军火库的进攻，即被上海海军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北洋军人的团结比照国民党人的涣散，英美的支持比照孙中山的日本朋友的三心二意。（此时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未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其最大的帮助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落败的领导人到达安全地点，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

“二次革命”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袁的一边，3年后袁称帝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二次革命”后，袁才真正地做了总统。人事任命权和财权相对地集中到了他的手里。

闲不住的胜利者开始想着下一步的棋子。

当袁世凯总统通盘考虑独裁统治的成果时，他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还缺少什么呢？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拍手而老百姓不雀跃；他召唤而老百姓不集合？当初设想的随着中央集权制而来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依然这么衰弱？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年和1915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同时，外国人已插手

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月，袁在日本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盲目地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剑桥中华民国史》）

袁是如何判断民意的？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有一段引自于梁士诒笔录的“袁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谈话”，这里摘取其中袁的部分言论：

朱尔典：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子一定不远啦！

袁世凯：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还有文武各官，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到了今天，全国都赞成，我只有顺从民意。

我现在是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门将在一起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各部应担八十分。

我考虑帝制的事情，不过就在这几年，只是与我的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到头来没有不弱之理，这也是可忧虑的。

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今天主张立宪君主，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谁说猜不出，时人说到洪宪的好处时早就总结了三点：“洪宪新国究不是前清王朝的复制，有三点不同于清朝，一立宪，一永废跪拜礼，一永不用阉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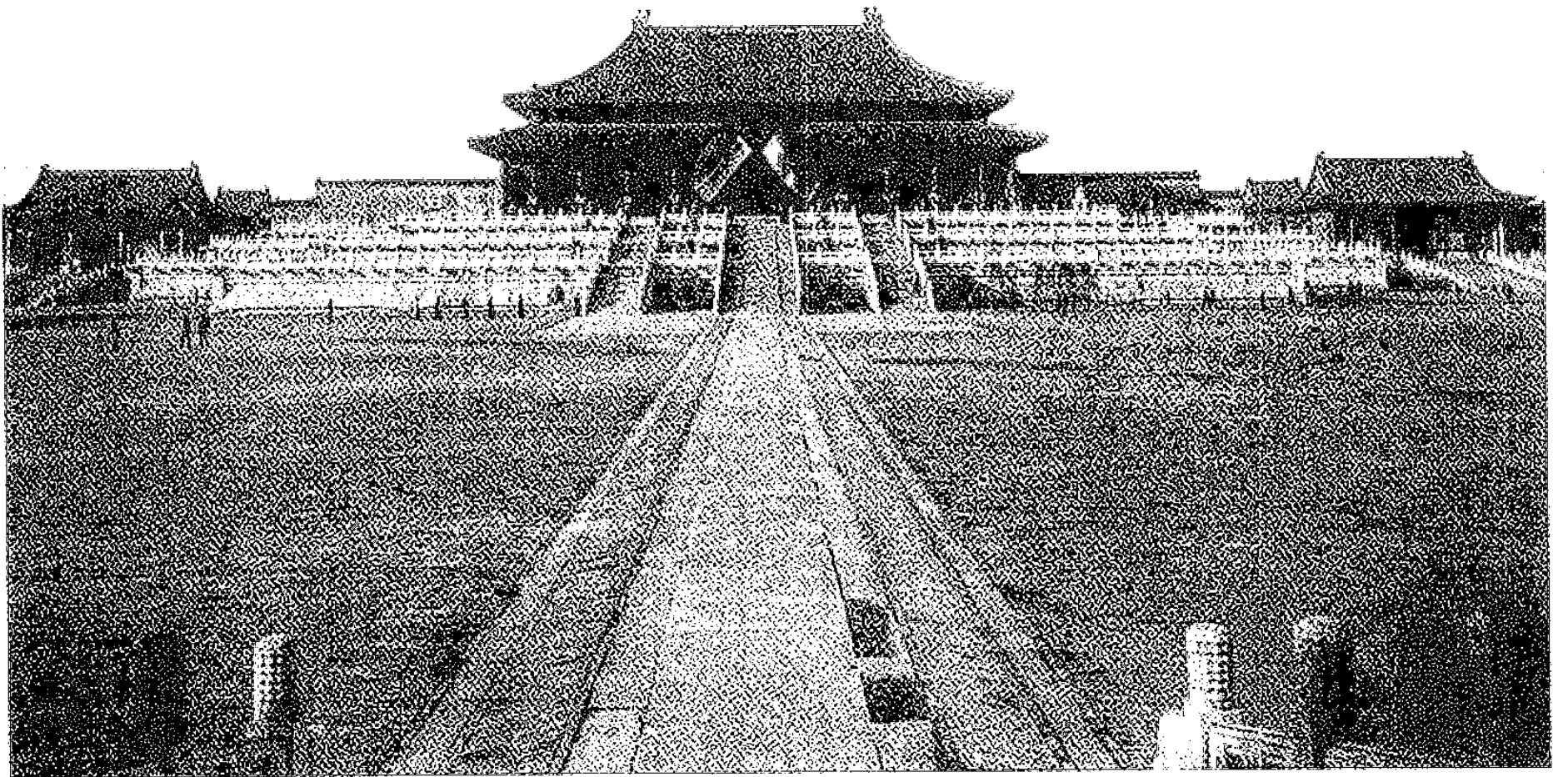
对民意的判断，袁世凯得出一个结论“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脑中”。这个判断不能说不，甚至可以说相当准确。不信请看如下的言论：

我们有时到乡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国决不



大典筹备处主要成员

大典筹备处将太和殿更名为承运殿（取奉天承运之意）袁世凯打算在这个曾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地方再次就任中华帝国皇帝。



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合起来分析一下，一定复辟的人占三万万九千万多。”

这是谁的话？孙中山！这是他1923年8月15日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中透露出来的信息。为此孙中山后来还不无伤心地说：

我们革命党推翻满清，把人民由奴隶的地位超度到了主人的地位；现在做了主人，不但不来感激，因为暂受目前的痛苦，反要来漫骂。常有人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自革命之后，国乱民穷，要有真命天子出世，或者清朝复辟才好，民国真是没有用呵！”（见1923年12月30日《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孙中山毕竟是伟人，还敢于说真话！

你想，真要是四万万人民一片叫骂声，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会傻到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这个权力还不一定有他这个大总统大的皇帝。

在袁世凯的眼里，革命党的那些个议会选举，根本不代表民意。这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宋教仁是在这样的选举规则下获胜的：年满21岁的男子（女子排除在外），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标准纳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选举是间接的，即投票人选代表，这些代表在晚些时候通过开会选出真正的议员。

据此，最后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

中国历代以士大夫乡绅代表最下层85%的人立言，所以袁世凯眼里的民意其实就是上百位封疆大吏的态度，最多考虑些读书人的感受（京官他已经搞定了）。除此之外，他非常在意的是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外国民意，特别是日本。

但是，这一次的称帝，他失败了。

败在没做好新老干部交替

历史上的强人从来就没有解决好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袁世凯也是在这个坎儿上绊了一跤。

话说时间到了 1913 年后，袁大帅的北洋系统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 20 岁老狗。系统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原来在小站能叫出名的人后面又出现了很多新面孔。

人到中老年的北洋老班头，早期的军旅生活已经让给儿侄辈去劳苦，自己成了方面大员：个个妻妾成群，腰缠万贯，理想都到了理想国，眼里的天下只有“权钱”二字。

为此袁世凯见人就大发牢骚：“你看看，我们北洋的人都成了什么样子！芝泉（段祺瑞的字）不到部里去办公，华甫（冯国璋的字）身为地方大员，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这像什么样子！”唐德刚先生说得好：

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

袁世凯遇到的这个病是古今天下“能人”、“强人”、“伟人”的通病。袁世凯看到了系统的毛病，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躯体似乎在慢慢的衰老。他急了，想做点什么，安排“百年大事”。

这时候他血液里的那些个小农思想占了上风。他首先想到的是家族荣耀的延续，而这一切让其共患难的哥儿们看出来来了。

袁的死期不远了。

中国官场中人的政治敏感何来？谓闻气味。袁世凯从没说过传位长子袁克定，但是大家都认准了第二梯队非袁克定莫属，哗啦一下子，一大拨人，像段芝贵、袁乃宽等排队去买袁克定这个原始股，使得段股、冯股、徐股等北洋老股跌破了 3000 点。

为给“太子”开路，也是给自己解套，袁世凯进行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动，这些变动我们暂且叫它改革吧。



1914年冬至，袁世凯在天坛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为他策划中的登基称帝做了一次彩排。这组照片是一个叫 John D. Zumbum 的美国摄影师拍摄的，他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御用摄影师。图为杨度（左）和朱启钤（右）参加祭天仪式着祭服的留影。

黎明，身穿制服的袁世凯乘坐总统专车，在骑兵护送下来到圜丘围墙的大门外，然后被八抬大轿送到墙内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而非皇帝的更衣殿，在那儿换上了长袍。仪式持续了一个小时。





击鼓奏乐，接着祭祀官念颂祷文，乐声中有人翩翩起舞，袁世凯则举酒敬天。



祭天时的袁世凯穿着圆领祭服衮袍，前衣身有3个十二纹章。

每篇祷文读完袁世凯就朝祭坛磕四个头，文武百官也跟着一起磕头。



什么废督，什么虚省设道，什么文官政治，甚至包括设立将帅团，统统都是冲地方的大小军阀去的。然而，这种与虎谋皮的举措，具体实行起来，不用说是障碍重重，推行得好是艰难。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当年在大清国的情景，皇帝的权威之重，即使像他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人物，想要拿掉，一纸诏书也就搞定。（唐德刚语）

关于成立混成模范团，倒要为老袁说两句公道话。我们不能只看团长、团附以下的军官都是与袁克定有关系的人，就认为这事儿百分之百是针对北洋老军人的。

其实袁世凯后期的很多军事改革除了要打造“太子军”外，主要还是为了改善当时军备落后的状况。别看北洋军队中国第一，其实到了1913年后，它老化了，落后了，特别是从日本学来的那一套显得陈旧了。

这时候有个中国军事史上的奇才，从日德留学归来的蒋百里很受袁世凯的器重。

袁世凯与北洋军军官



蒋百里主张改变小站练兵的老办法，实行革新，扩大军官学校，创办中国士官学校。他主张不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完全采用德国方式。袁世凯对此表示赞成。……那时袁克定崇拜德国的思想是很突出的，对蒋的一套非常欣赏。（唐在礼语）

打败共同敌人后，面对权和钱，袁世凯想改变业已形成的“大家拿”为“一家拿”。这样做首先踢到的铁板就是他紧密依靠的那千人规模的北洋精英团。

二次革命后，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都不太听招呼了。二次革命后，看起来大获全胜的袁世凯，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五代十国的局面，连昔日言听计从的北洋诸将，此时都成骄兵悍将，不仅不听政令，甚至连上解款也日益含糊起来。（唐德刚语）

首先是段祺瑞。

段很傲很偏，有时脾气上来，老袁也怕他三分。但是他有值得傲的筹码。这么说吧，除了不会做人，他哪样都不输给老袁。

袁世凯最依赖段祺瑞，几乎将自己视为生命的军队都交给他经营和调度。恰恰就在这“视为生命”四字上，两人都一个德性，慢慢地就有了意见和隔阂。

“水晶狐狸”徐世昌看得最清，他貌似公平地说：

项城思以军政大权操之于己，于是在总统府设海陆军统率办事处，以移陆军部之权，已为段所不快。起因是袁世凯要总揽军队的人事大权。段请旅长以上由大总统主持，团长以下交陆军部办理，其用心可以想见。（徐世昌语）

袁世凯组模范团，挑选各师旅之优秀将校为主干。这在段看来全是因为袁克定指挥不动北洋老军官，袁世凯为其“培植新势力，此更予段以最深之刺激”。

徐世昌透露：袁克定“最忌段，段又毫不敷衍，即项城左右其他诸人，段亦皆盛气凌之”。这样一个比茅坑石还硬的老倔头，项城一直在找机会让其离得远远的。正好段最亲近的徐树铮被人参了一本。袁找到了机会，对段说：“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段于是请假赴西山，托辞养病，愤愤不平。

此三恨，多为袁克定而起，段祺瑞肯为袁世凯称帝振臂一呼吗？他巴不得袁克定倒霉，因为他心里的气还没地方出呢。徐说：“段管军事教育，又握军政多年，亦有其普遍之潜势力，然慑于项城之威势，亦无可如何。”

据唐在礼说，还有一事让老段和老袁结下了怨恨：“购买军火的事，向来是陆军部段和小徐（徐树铮）经手的。袁在设立军需处时，要把这件事抓过来自己办，也

属一宗要务。无奈段、徐始终不肯放手，我们又没有内行人，所以事实上无如之何。”

抢预算，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今天也会让两个朋友反目为仇，何况“万恶的旧社会”。

1916年，老袁倒霉的时候，由段组阁。段准备任命自己的心腹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袁世凯以“徐是军人，秘书长不宜再是军人”的理由加以反对，事后段祺瑞十分生气，他把烟斗狠狠地攢在桌上，厉声道：“到今日还是如此！”

这话您听出来了吗？“原来我一直让着你，你现在倒霉了，还想做我的主。”就这“到今日还是如此！”已经让风烛残年的老袁为之一寒。

其实老段素质没这么差，会为那点儿鸡毛蒜皮的私事和老袁闹？

他认为自己是民国人，吃共和的饭就要为共和谋。

他对局势早已洞察清晰，深知帝制不得人心。他曾经对徐树铮、曾毓雋说：“我当年曾发采取共和之电，如今又拥项城登基，国人其谓我何？且恐二十四史中亦再找不出此等人物！”

在这里，由段祺瑞亲口告诉我们他反袁称帝的过程和心路：

我知道有人制造复辟帝制的舆论后，于会见项城时，曾以试探的口气询问，而项城矢口否认，谓你不要听信这些无稽的谣言。后来风声渐紧，我又进言详陈一切，袁虽仍然否认，可是态度神情已可看到其内心。我第三次约定时间往谒，不顾一切痛陈利害，言明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及袁世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态度始而紧张，继而恼羞成怒，厉声地告诉我说，这是克定与杨度等讨论的问题，你何必大惊小怪地重视呢？我亦起立大声地说，因为我是受总统数十年知遇，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可挽救，稍即逝，悔之晚矣。袁不答，我遂辞出。后两次请见，袁竟以身体不适拒绝，而无法挽救。我苦思几日夜，我受袁氏几十年知遇，如潜出声罪致讨，衡之旧道德，我不能这样做。

旧式军官的段祺瑞毕竟要受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束缚。当他见到反对无效，便决然退回家中以沉默方式作消极抗议。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匆匆进行“登极”仪式，接受百官朝贺，段祺瑞并未参加。袁在文武百官的册封名单里也没有段祺瑞的名字。

冯国璋是个财迷，他没有主义，更没有信仰，自认为袁的位子应该传给他。他曾气愤地对亲信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

自 1913 年底到江苏做都督，他颇为顺利，俨然一个江南袁世凯。他在南京和南方的国民党势力眉来眼去，从袁的“征远大将军”成了“两派中间人”。徐世昌说：“冯久驻南京，俨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据《洪宪遗闻》转述）

袁世凯是什么人，早就看出这些蛛丝马迹。老袁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冯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

举行改变国体投票，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托病不去。后经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后冯国璋被任命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

军头冯国璋这个人完全把袁逼宫清廷的那一套学到了家，他学着袁的口气对梁启超和蔡锷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指反帝制）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

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双方的调解人和对袁施压者。

蔡锷反袁后，袁世凯对冯特别有恨：“云南贵州反，远在边地，还没什么要紧。浙江广东之变，我也能控制住。冯乃我手下最有力量的人，他竟公然宣布叛言，才使各省动摇跟进，事情越来越棘手，令我进退两难。”

冯的续弦夫人周砥原是袁家的女教师。周嫁冯后，将冯的一举一动均通过婢女密报袁世凯。袁死前曾感慨道：“予豢养左右数十年，高官厚禄，一手提拔，事到今日，无一人不负予！不意一妇人，对我始终报恩，北方文武旧人，当愧死矣！”从中看到袁世凯是多么地怨恨冯国璋啊！

一个独裁者在权利移交期间，往往是最容易出意外的。偏偏“太子”袁克定不是李世民，起到的作用没有加分反而减分。难怪伟大的物理学家、袁克文的儿子袁

家骝教授后来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

总结以上的话，还是那句：新老干部的交接没做好。最后在段、冯等老师的杯葛下，梁启超檄文的召唤下，一个远在边陲带兵不过万员的蔡锷把北洋这个神话，这张已经四面漏雨的窗户纸给捅破了，以至于袁世凯想打无人跑腿，想和拉不下脸来。

四年前清廷的一幕又出现了，只不过这次是段和冯他们几个代替了袁当年的角色。有人说这是报应，一点没错。

帝制输在临门一脚的日本人

这些年来，人们装着忘记日本在反袁中的“伟大”作用。

袁世凯称帝除了内部不满外，还有一个外部的力量给他作梗，这就是日本。帝制输在临门一脚的日本人。

日本的对华策略正如“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说：日本不想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想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想要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国家”。（《中华民国史》）

英国和日本当时是盟国，但是在中国却暗斗得厉害。英国手中有袁世凯，日本手中有革命党和反袁势力。

袁世凯屈辱地签下“二十一条”就是为了日人手上的这张王牌。“二十一条”签订后，英日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围绕着袁世凯展开了。

话说1915年秋冬之交，英国公使朱尔典借巡视各地英领事馆之名，去了上海。在上海对唐绍仪说：“中日最后修改条约前，袁还将一些秘密告我。签字后，袁和日本人在东京还订有密件。”

“自此袁便锐意办帝制，我乃不得参与秘密，不知密件里写了些什么？想来一定是写些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

“据我观察袁的行动，似乎袁依照密件行事。我们不得密件，不能做出决策。但是密件内容，不仅仅袁一口否认，就是问我们表面上的盟国，驻华日使，他也极力否认。……如得其真本，则证明日本挟此件以独霸中国权利，自然无以对大家，更

无以对英日同盟，大可为你们反对帝制助力。”

唐是反对帝制的，又是个出了名的亲英派，听了后跃跃欲试。

朱见了加温道：“如果你们爱国，能尽力获得此项密件签字真本就好了。至于说到财力嘛，英国亦愿相助。”

唐是文人，间谍一类的活儿不是其专长，便说：“容我想想办法，一二日内，必告诉你。”朱尔典临走时意味深长地说：“如有所获，则袁氏帝制危也，这不是你们中国的福气吗！”



山县有朋

该着袁世凯倒霉，恰恰这个时候，他的大内管家袁乃宽之子袁不同来上海见唐。这个愤青对袁氏帝制，最为愤慨，对唐说：“我家与袁世凯同宗，袁世凯以我的父亲为侄辈，总管新华宫内事，我反对帝制，故改名为‘不同’，唐总理有何驱使，当竭力奉行，唐总理也和我父是老友也。”

唐乃观察其能力，向他打听新华宫的事儿。袁不同说：“新华宫我最熟习，熟知所有的路径。”唐乃询问袁世凯藏密件的地方，袁不同说：“重要书函，藏公事台斗内，重要外国条约，则另藏一个大铁箱中，钥匙从不离袁身。内卫长句克明，负责司签押房之事。”

唐问句为何人，袁不同说：“这个句克明为袁世凯与女仆所生子，和我关系最好。”唐恍然大悟：“我怎么没想到，克明的‘克’不就是克定的‘克’吗。”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唐便将想窃密件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袁不同。袁不同血气方刚，一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朱尔典来唐府开出一百万的价，让唐主持办理此事，临走时说：“如果有求助于使馆，我们会尽量帮忙。”

唐乃先交袁不同三十万说：“能将密件偷出，交英使馆看一看，再当场交现款七十万，然后你再将原件带回。”

袁不同回京，与句克明、沈祖宪商量办法。沈祖宪原为唐一手提拔，后随袁去过彰德洹上村，时任新华宫重要秘书。唐事先已经致函祖宪，让他助袁不同。

句为内卫队长，公事房、内书房各重要处，均由句严密守卫。他能随时出入各处巡逻，他知道密件被秘密地存放在铁箱中。当时苦于没有钥匙，于是到大街上尽搜外形相似的钥匙，一一套过后发现都打不开铁箱的锁。英公使馆知道后秘密派去各处代为寻求，最后找到了一把相似的钥匙。

这夜，句趁袁世凯熟睡时，偷偷的套开此柜。一翻，果然有一份厚厚的中日交涉全案。句高兴得手都发抖了，一得意，不想文件袋掉在了椅子上。

袁惊醒后问：“怎么啦？”

句答：“老爷的书掉地上了。”

连日来的帝制准备工作过于劳累，袁翻了个身又睡了。

句得了文件，飞快和袁不同上马车外出，在城里转了好大一圈，最后进了英国公使馆。

朱尔典打开一看，哈哈，卷宗首件即为密件，朱叫使馆中的情报主任选了当中最重要的，照成相片。然后打开皮箱，付款七十万，叫送客。

两人见钱款全部兑现，高兴异常。要知道那时候的百万元，根据莫理循买房的价，可以买三四套整条王府井的房子。

两人快步回府，将原件仍全数锁回柜中。回头一看，天才刚刚发白。

第二天，朱尔典一面电唐，一面带照片去见日本公使小幡。

英使问：“中日有密件吗？”

日使：“没这回事儿。”

英使：“没有什么瞒我们的？”

日使：“至少我没见到过。”

朱尔典乃拿出密件照片：“这就是证据。”

日使红着脸说：“有的话，也是在东京换文，未经我们公使馆。我急电本国内阁，问明原委，再答复贵使。”

为此日本内阁召开密会商议：顾全国家体面，决定一边坚决否认，一边反对袁世凯帝制。并密电有贺长雄转告袁氏，说如此重要秘密文件，竟让英国公使偷拍相片，

朱尔典 (1852—1925)，即 John Newell Jordan，约翰·纽厄尔·朱尔典爵士。朱尔典与袁世凯相识于朝鲜，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人密谋暗杀袁世凯。唐绍仪知道后，遂通过税务司柏卓安向朱尔典求助。朱尔典准备了英国兵舰，并将袁世凯送回天津。此后，袁世凯对朱尔典心存感激，两人一直关系密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朱尔典还亲自出马，多次拜访清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呼吁清廷重新重用袁世凯。

特别是朱尔典在华任公使时期，极力帮助袁世凯，为袁谋取最高权力做了许多工作；袁世凯对朱尔典也是极其信赖。他也因此而成为袁世凯少有的几个密友之一，成为袁世凯尊贵的座上客，甚至成为左右袁世凯政策乃至左右中国政局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



英使从何处得来这个原件，致使日本政府，对同盟国丧失体面。为此日本政府再不能履行密件之诺言。一面急电中国外交部，不接待周自齐访日，表示反对帝制。

北京这里，袁世凯全然不知，当日本表示反对帝制时，袁还得意地对大家说：“此为表面文章，我早有把握了。”所谓早有把握，指的就是密件。

等袁世凯闻知整个事情经过后，震怒。

他命令严厉拷问新华宫上下人等，乃将涉有嫌疑者如袁不同、句克明、沈祖宪等十多人，用柴车捆载，交九门提督江朝宗严刑审讯。

江朝宗不敢接受，又移送军政执法处雷震春执行。震春大怒，捆江朝宗两大耳光说：“这些人，我敢办吗！你想移祸于我，我要打死你。”

后来，此案也就这么不了了之，只枪毙了程家桢、饶智元以搪塞。可怜这两人与本案没什么重大关系，却做了替死鬼。

据说反帝制成功后，唐绍仪指着袁不同说：这人就是恢复民国的有功之人。袁不

同眉飞色舞，于是大侃特侃配钥匙的艰难，偷件还箱的迅速。

这故事虽然说得有根有据，说者还告诉我们他亲眼见到一千人等被捆在柴车上途经西单。但是将日本说成为此等突发事件翻脸，似乎小看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长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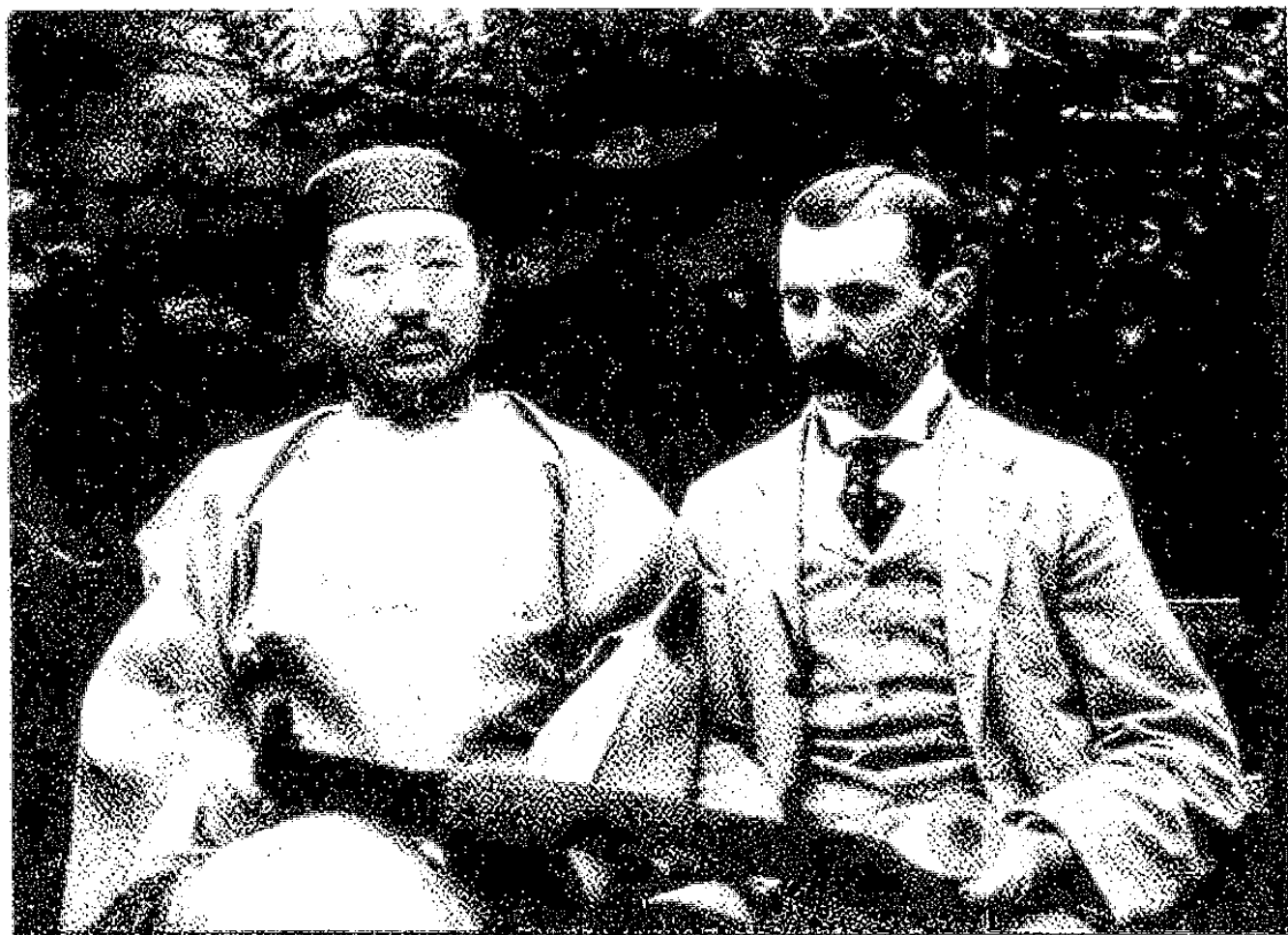
与英国这些在华有既得利益的国家的求稳心态不同，日本这个后进者要的是一个“乱”字。它并不以支持袁世凯为中心，而是多方下手，制造中国内部的混乱，乘机渔利。

当袁称帝消息传出，接着我们看到：日本说他们希望袁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它将认云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并宣告袁妨害东亚和平，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

与此同时，“日本极力鼓动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反袁，无论中华革命党，还是西南护国军，甚至以复辟清朝统治为宗旨的宗社党，都或多或少得到过它的暗中支持”。（《中华民国史》）

1916年3月后，我们看到：

先后与中国各派反袁势力达成借款协议的有大仓喜八郎、竹内维彦和久原房之助等人。大仓贷与前清肃亲王、宗社党头目善耆一百万元；久原接济孙中山六十万元，黄兴、陈其美各十万元；而竹内则与云南军政府代表岑春煊、张耀曾签定了一百萬元的借款契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周自齐（1871—1923），字子虞，山东单县人。晚清时期出使海外，回国后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民国初历任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等要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11天。

此外，日本还不断派专员对各派反袁势力进行具体协助。在西南，它加派崛之和太田分任驻滇、驻肇庆领事，嘉悦大佐和今井嘉幸分任护国军军事、法律顾问。在山东，它派董野长知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并以驻鲁日军为其后盾。在东北，它派土井市之进为总指挥，策应川岛浪速和宗社党人的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总之，日本除未直接出兵外，其他倒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徐世昌事后分析道：

日人素畏袁，袁即使如何迁就，终难厌其欲望，故忽而赞成（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谈话，有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为同一之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世凯氏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等语，见日本某报），忽而反对（日本曾单独或联同英、法、俄、意各国，对于袁变更国体事一再警告）。袁虽挟英为后援，而欧战未了，英无力顾及东方，终不可恃。帝制失败，就国际方面论，不可谓非日本之作祟也。

周自齐与袁世凯

1915年，袁世凯拟委派周自齐任总统特使秘密去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周自齐探知消息后无计可施，无奈之下便称病闭门于上海外滩周公馆。当美国记者端纳去探望他时，他巧妙地通过暗示的方法，将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出去。第二天，袁政府意欲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便不胫而走，激起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同时引起全世界的重视和英美俄法等国的干涉，使得日本这一灭亡中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但周自齐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曾被委任为“大典筹备处”委员。袁死后，周自齐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被黎元洪通缉。但因消息走漏，周幸运地亡命日本。1918年2月，冯国璋代理总统时，取消了对周自齐等人的通缉令，周才结束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国。

袁世凯最后的日子

进入1916年3月，随着局势的恶化，袁世凯身边的周自齐发现：

大总统已经丧失了迅速作出决定的果断力，他在面临困难的抉择时简直不知所措。以前他对我提出的建议都立即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可现在呢，他反复思考，犹豫不决，多次改变决定。（据芮恩施转述）

想数月前，古德诺的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倾倒多少文人政客。

百日前帝制劝进者还在高呼“挽救人心不古的世风，挽救国家内忧外患的危险局面”。

还记得各省代表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向参议院请愿的铿锵步伐。

不曾忘记，在京的杨士琦、钱能训、陆徵祥、朱启钤、章宗祥、梁士诒、周自齐、梁敦彦、贡桑诺尔布、阮忠枢、唐在礼、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张士钰、傅良佐及京兆尹沈金鉴等文武官员纷纷上密呈给他袁世凯，恳请实行君主制。

好不热闹啊，当时连日本这个最难搞定的角色，也拿到了自己一份丰盛礼物，为帝制大开绿灯。

袁世凯不知道这是假象，或者知道了也装着不知道。4年前他的这套把戏不是成功地瞒过了所有的人。

这的确是假象。为了帝制的顺利进行，那个“公府秘书厅梁士诒每天起身很早，上午八时前已开始办公，中午在公府包吃，与张仲仁形影不离，很晚才回家，办事很紧张。”（唐在礼语）

与此同时，同一个梁士诒已经和劝进最积极的周自齐在嘀咕：“袁氏一念之私，帝制自为，承诺帝位，改元洪宪，吾辈亦牵入猛火地狱中，内外乱象已成，尚不自悟。”

一系列的打击来自于自己最信任的亲信，而一年前这些人都信誓旦旦地发誓支持他称帝。袁世凯愤愤地说“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

于是我们看到熟悉的一幕，当形势逆转时，所有的人都将重新站队。

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

为新华宫。

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

27日，贵州都督刘显世宣告独立。

3月10日，冯国璋等5人联合发电给袁世凯，迫其退位，取消帝制。

15日，广西宣告独立，并通电加入反袁行列。

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

4月初，龙济光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宣告广东独立。

12日，浙江宣告独立。

中旬，袁世凯决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由段组织新内阁。

5月8日，段祺瑞逼袁世凯交权。段、袁矛盾加深。

25日，陈宦宣布四川独立。

29日，湖南将军汤芑铭宣布独立，湖南成为脱离袁世凯的第八个省。

这段时间，袁世凯内心有何想法，五姨太杨氏有一段回忆：

我清楚得记得那是民国五年（1916年）3月19日，老爷步履缓慢地进了我的房，那一天该是六姨娘。老爷坐下后说口渴，一连喝了两杯。我站过去扶着他肩膀。他回头用下巴蹭蹭我的手，说“完了，完了，龙、虎、狗都反了（指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琪瑞、冯国璋联合五省督军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一事）。”

“昨天晚上，我在南海玉栏亭上观天，看见有一颗巨星从天上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文忠公（指李鸿章）死了，那颗星比这个小，这次大概轮到我了！”接着又自言自语：“真的癞蛤蟆难过端午节了。”（民间传说袁世凯是癞蛤蟆托生）我见他十分沮丧，尽量让他放松，老爷嘴里一股氨味，我又怀上静秀（袁十四女），便离他远了些。

到了5月下旬，袁世凯已经不能吃也不能尿，尿毒已在全身蔓延开来。

袁世凯最后的日子坊间版本很多，这里引用的是亲历者唐在礼的回忆：

到了袁世凯事败的那几天，过去围在身旁的人日益稀少，甚至进去看他的人也不多。只有徐世昌、段祺瑞对他关心些。

袁世凯病后，除“御医”刘绍业、肖龙友为他用中药滋补营养外，为他诊疗的还有一个他信任多年的法国医生贝熙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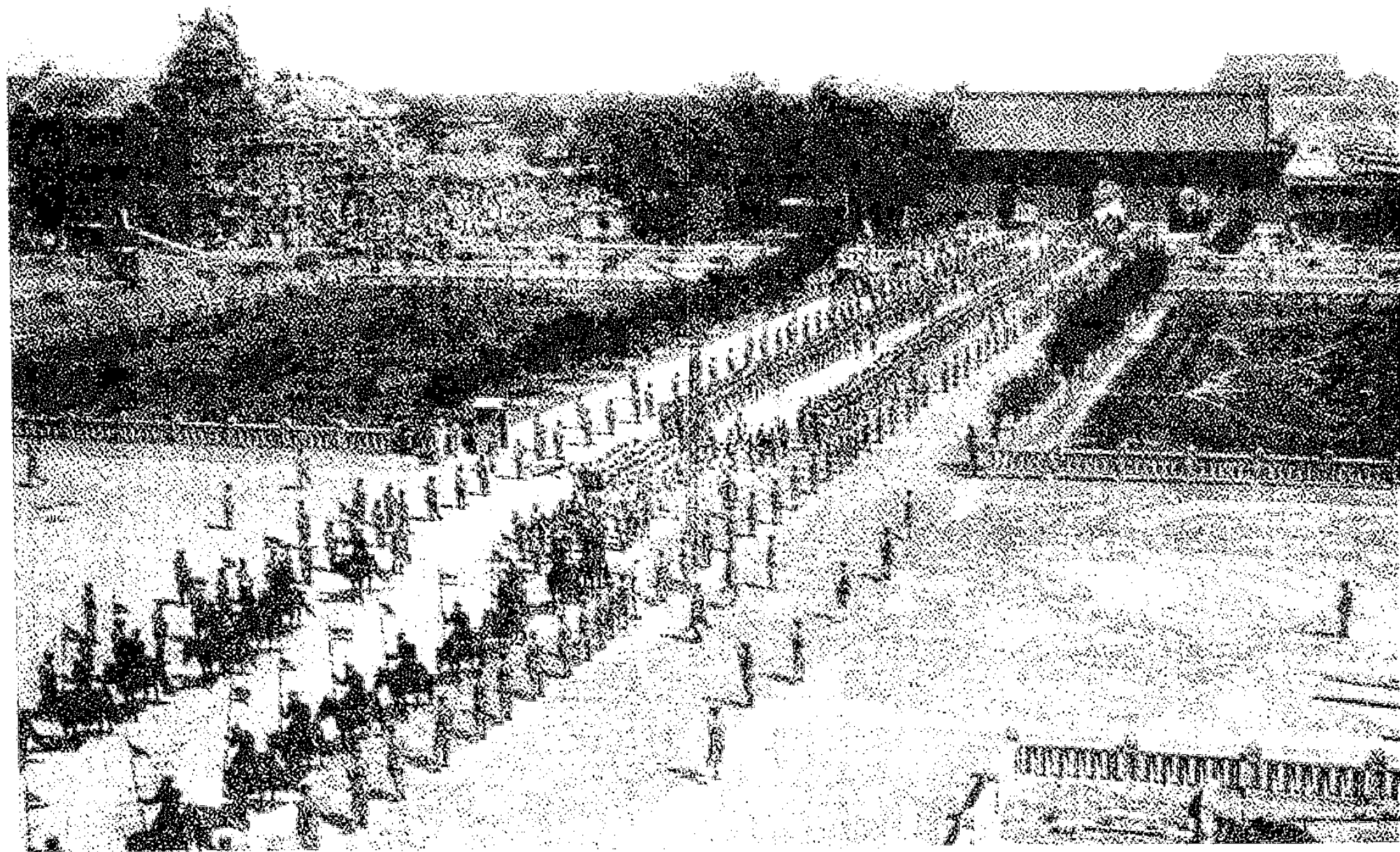
袁世凯最后患腰子病，就由贝熙叶替他局部麻醉，动手术，打针、抽水、抽血。袁世凯始终还是信任贝熙叶的，但抽过之后，身体马上垮下来。

在抽水、抽血以后的几天，我去见袁世凯，他精神已很不好。他死的前一天，我又去看他，那时已奄奄一息，但还是勉强要坐起来，想睁眼却睁不开。我当时看出他将不久于人世，第二天他就死了。

袁世凯死以前，有好多天都由他最喜欢的两个姨太太服侍，抽水、抽血也就由她们先作主张，经袁世凯自己作出决定的。

袁世凯临死前留言：“扶柩回籍，葬我洹上。”

按照袁世凯的遗嘱，1916年6月28日，袁世凯的灵柩从北京起运到河南彰德。图为庞大的殡仪队伍在去北京火车站的路上。



袁世凯死了，历史记住这一刻是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40分。

袁世凯去世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四人立即打开金匱石屋，找到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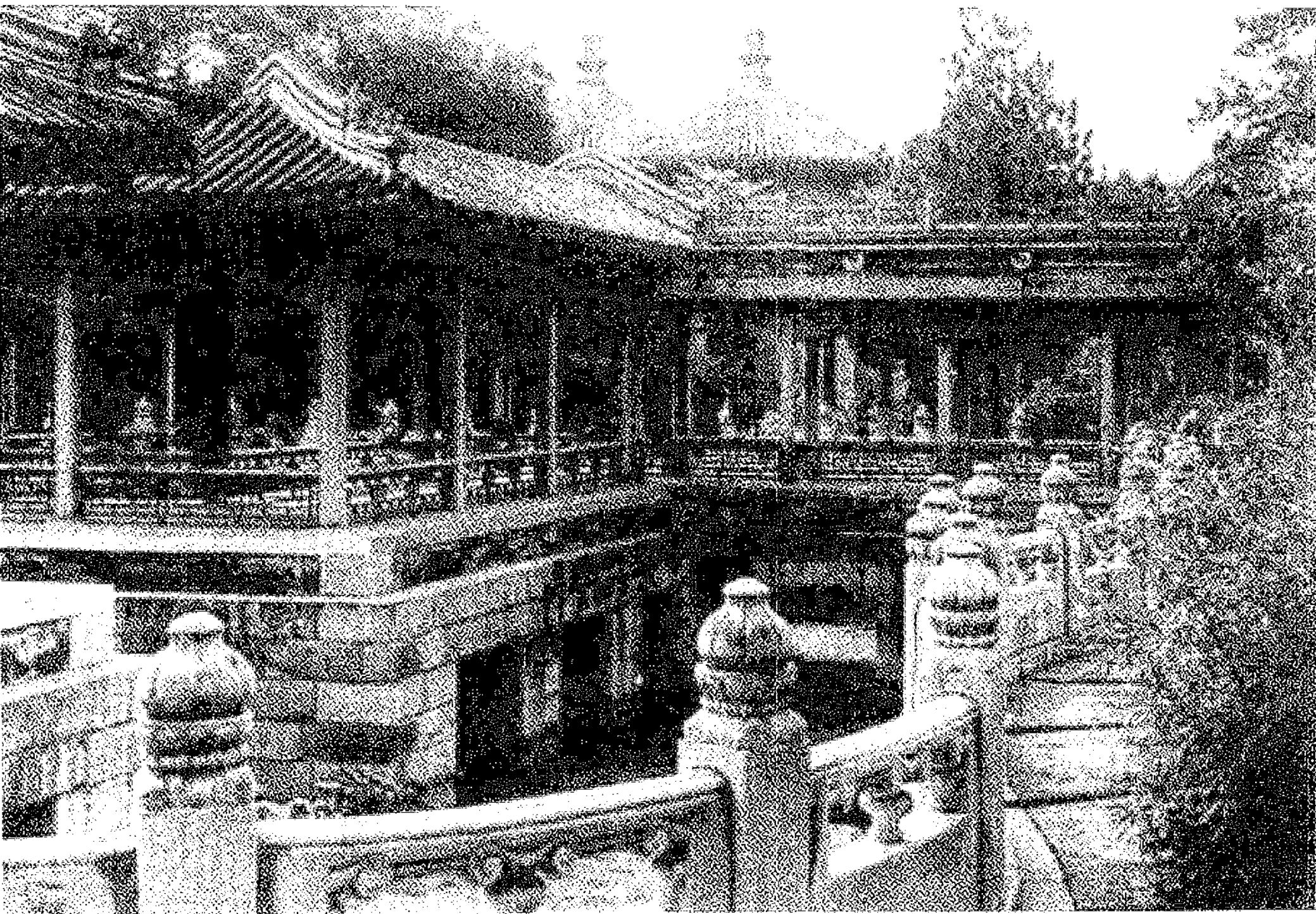
袁世凯的死讯被登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

6月7日——袁世凯总统的临终遗言表示自己后悔所进行的君主制行动。他说，这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并且加速了他的统治走向结束。袁世凯把前国务卿徐世昌叫到他的床前，低声地说：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我没有立志当皇帝。那些在我身边的人说人民渴望一个君主并且让我担当君主。我相信了，这才被误导了。”

然后袁世凯请求徐世昌保护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陷入昏迷之前，总统表示希望黎元洪，也就是副总统，应该按照宪法来继承他的位置。他命令移交行政权。今天，黎元洪宣誓就职总统。

金匱石屋 位于中海西岸，袁世凯执政时期建，坐北朝南，汉白玉石砌成，朱门金钉，内置建储函册金匱，匱中封袁世凯所写3位总统候选人姓名。



国旗降半旗致哀，北京的报业今天套丧。他们颂扬袁世凯是中国最伟大的人之一。即使是反对他的报刊也称赞他在从事君主制行动之前的生涯。

袁的死让所有的人松了口气。

蔡锷说，“项城退，万难都解。”

莫理循说，“袁世凯的死最理想地解决了他的引退难题。”

只有五姨太杨氏有点恨，她说：“都怨大爷（袁克定），他把老爷害苦了。”

归去来兮 袁赫

这一次中国的权力场似乎真的进步了，新当政者按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为袁世凯治丧，替代了历朝历代的挖祖坟、鞭尸。

报纸暂停了对袁的批评，对手放下了手中的枪，一个让梁启超呼吁了20年的近代文明这一刻似乎出现了。

人死为大，从这一刻起，活着的人都乐意让死去的袁世凯享受帝王级待遇。

袁生前一直和其保持距离的黎元洪大总统发布大总统令：除拨发五十万元治丧费用外，还通令全国文武机关下半旗二十七天，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止七天，文武官吏及驻京军队一律佩带黑纱服丧，并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在怀仁堂附近设立“恭办丧礼处”。

袁的灵柩当时在彰德，于是北京方面急电彰德，命令立即送灵柩进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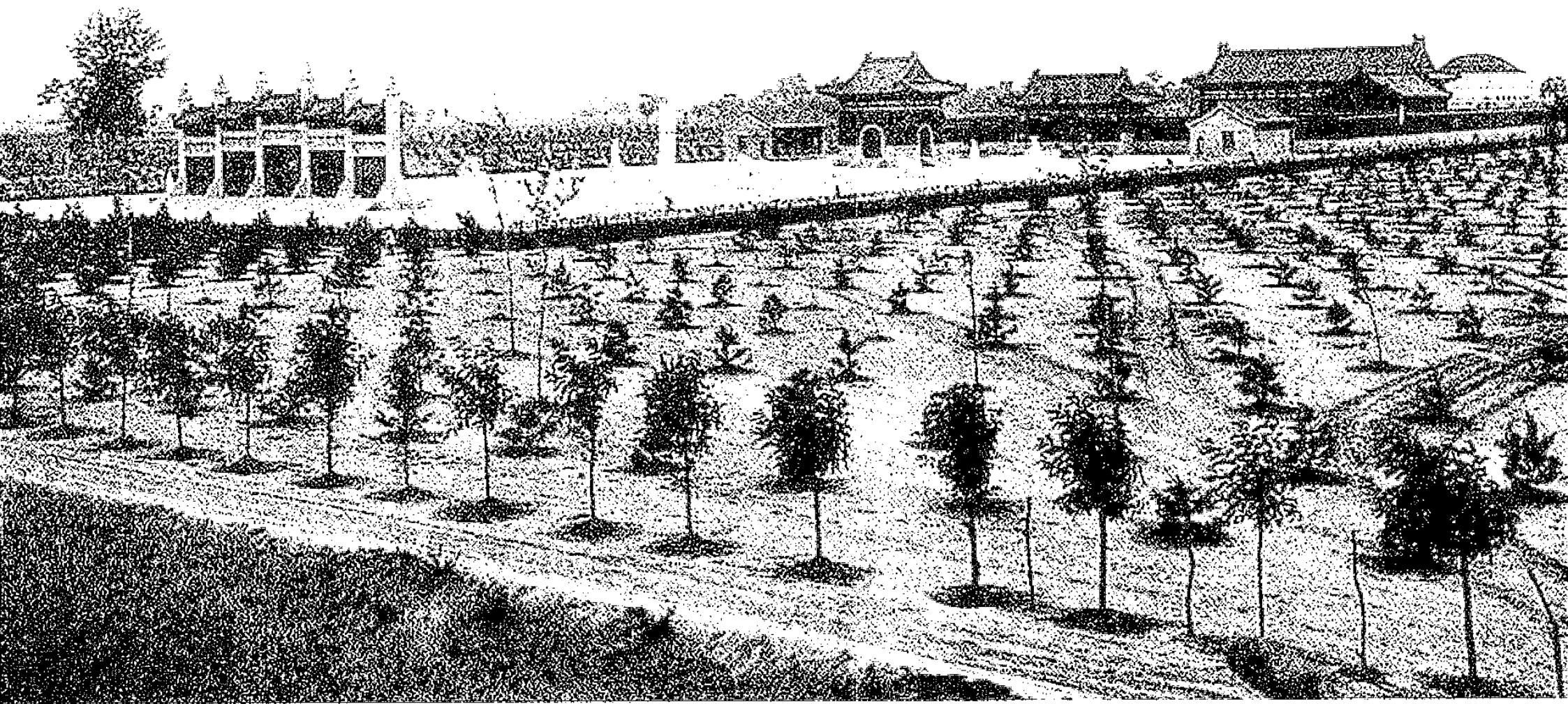
人殓时，人们看到袁世凯黄袍加身。

那件龙袍是紫红色的，上绣有九条平金线金龙。龙眼上各嵌大珍珠一颗，龙头各部镶有小珍珠，龙鳞处缀有珊瑚断片。这是怎么回事儿？

据七子袁克齐回忆：

他死后，身体浮肿起来，家中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了。有人建议，衣库中还存有龙袍一领，非常肥大，何不令人取出穿上。大哥说：“且慢，等和黎元洪、





袁林全景

袁世凯墓 位于洹水北岸，修建时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当年的袁坟四周逐排栽种有杨树、柏树、槐树，周围还有大片的祭田。袁林的设计者是德国的工程师，它的建筑“仿明陵而略小”，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糙石桥、清白石桥、牌楼门、望柱、石像生、碑亭、东西值房、堂院大门、大丹陛、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



徐世昌、段祺瑞商量一下再说。”后经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同意，就把那领龙袍给我父亲穿上了。

据袁克齐说，龙袍是在杭州定制的。除袁世凯的一身龙袍外，妻妾各有一身凤袍，十个儿子还各有一身小龙袍。这些龙凤袍，袁死后，在紫光阁前统统烧了。

袁世凯生前早为自己找好了归宿。墓地位于彰德府洹上村东北2里路左右的地方。1911年6月他说：我“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取一段，志气颓靡，此可概见，不足再言功名事业……”

袁这里一过世，彰德府那里便开始营造墓地。

营造帝王级的墓地是要花大钱的。据说当时民国政府库银匮乏，袁世凯的遗产也不多，所以安葬袁世凯之时，经费很成问题。于是，袁世凯旧属们纷纷解囊，多者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张作霖、曹汝霖等，都是现币1万元，少者也没低于两三千元的。

袁林占地139亩，其特点是“中西合璧”。

施工中时由洹上村火车站修了一条通往茆地的临时铁路，将建材运到工地，历时两年竣工，耗银75万元。

1918年6月建成后，时任总统的徐世昌亲临察看。察看中，他突发一念，指示在京汉铁路洹上村车站左边，添建道碑一座，供官员景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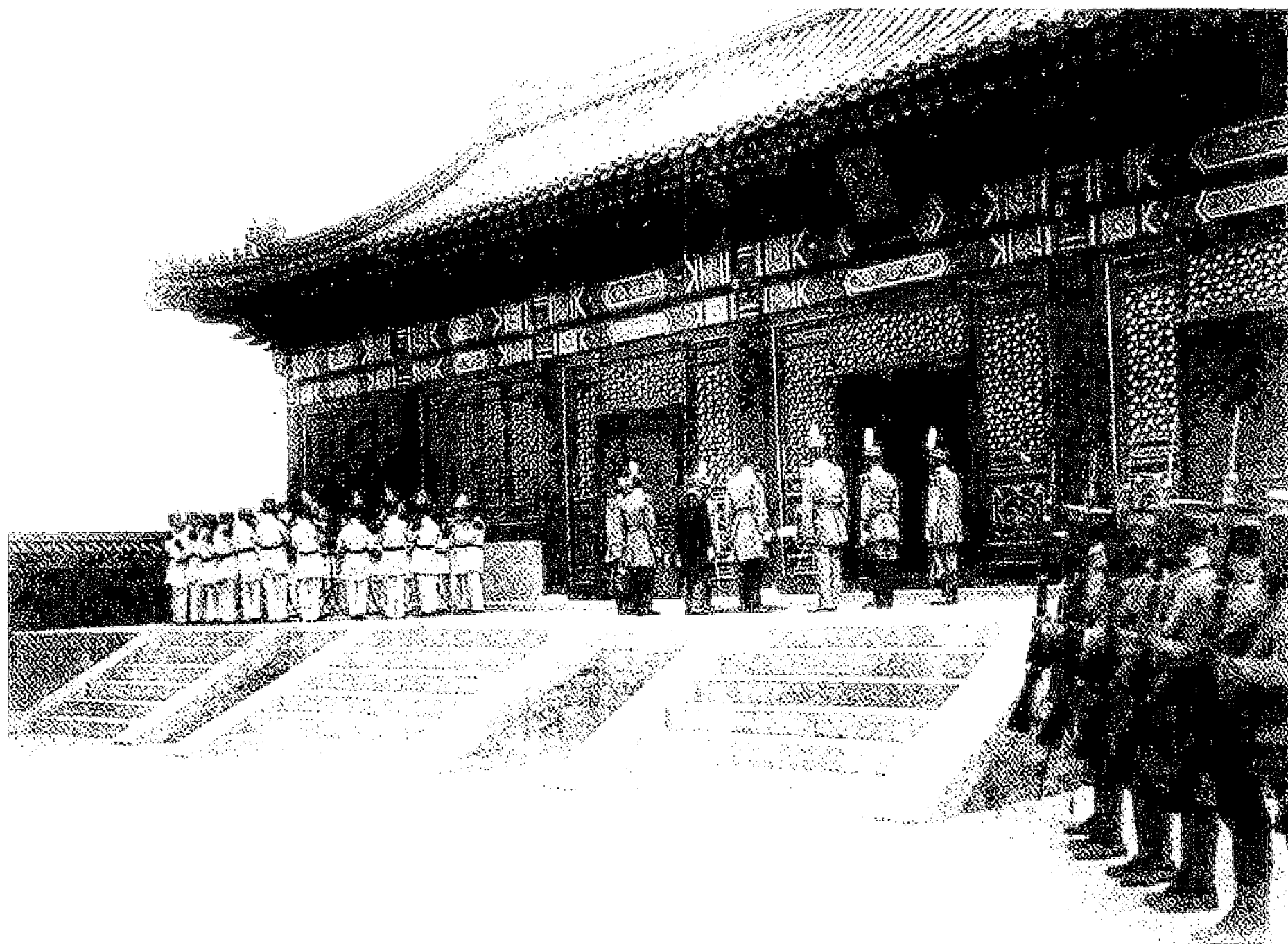
葬礼是旧式的。1916年6月28日，灵柩由怀仁堂南出新华门出殡，往东，过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出正阳门（前门）到京汉路车站（即西车站，后称前门车站），有2里多路。动用了80人为袁世凯抬棺。同时，北京城内各庙宇都被要求撞钟101下。袁的灵柩经过之处，路上事前铺上黄土，并泼清水净街。

这些送葬的人加上送葬的官兵共有三五千。因此，前头的队伍已到西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门口……

灵车是京汉路局先前改装的隆裕太后的灵车，还有花车一节，作为灵堂。

运载袁世凯灵柩的专车沿京汉铁路南下，一路上专车不断停车受祭。6月29日，专车到达彰德站。最后送入袁林的石屋，闭上石门。整个葬礼算完成了。

转眼到了1952年，“一个旧貌换新颜的时代”，毛泽东来到袁陵，据记载，他边



1918年，河南安阳袁林，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麟前往景仁堂祭奠袁世凯。

吃水果边说了如下的话：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善于耍两面派手法，投靠到清政府大官僚荣禄的门下，掌握了北洋军队的大权，由于出卖戊戌变法，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但他还不满足，又想当皇帝，只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就死去了……

报道接着说：

大家认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卖国贼，暗地告密，镇压康有为等维新派，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签订21条不平等条约等，应当把陵墓扒掉。主席说：“不要扒嘛，还要维护好，反面教材留下教育后代，有用。”

于是，袁林保住了。

去夏，我到安阳的袁林转了转，发现整个园区基本保存完好，没遭受什么大破坏。由此在现场深深感叹领袖谆谆教导的伟大。

园区导游反驳我说：墓地保存得好，是因为当时用了日本的高等级水泥和外国的钢筋，文革时 200 多红卫兵的大铁锤硬是砸不开墓室。然后小将们说累了，歇歇再来。这一歇就没再来过。

后 记

2010年2月25日下午1点10分,本书正文的最后一个字敲下。我吐了口恶气说:收工!

十分钟后,接三哥来电,94岁的老母“安静地睡过去了”。

我呆看了会儿天空……想哭,却悲伤不起来。

这些年亲眼见证了一个忙里忙外的鲜活生命体“被脑梗”了,然后分5个时段,一段段地,一寸寸地将姆妈折磨到最后衰竭而去。

“安静地睡过去了”,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

而且是94岁高龄,无痛苦地“睡过去”,我以后会有这等福分吗?

呆坐在椅子上想:

这个给了我一百六十多斤肉身的女性,其实也给了我这本八两多重的书,给了我《绝版晚清系列》。

我本不爱历史,合肥乡下出生的母亲就爱和我们“淘古”。

什么李鸿章的大哥,其女儿嫁给了我爷爷的爷爷的老四。“四太爷大字不识一个,还装模作样地看圣人书,经常拿倒了也不知。”母亲说,“人家李家发了,但是小时候定的娃娃亲是不能反悔的。”

什么袁世凯手下的段芝贵的军需官是“我姨奶奶的丈夫”，“回老家时，其财产装了18只大船！”……“你外公就在他家做管家。”

外公这一做，做出了一个富农来，而且是不吃不喝苦到1946年才买了几十亩土地的那一种。还没等缓过气来，“解放了”。害得我文革中小提琴拉得再好，就是过不了部队文工团的“政审关”。

姆妈的李鸿章段子有十几段，她反复讲了三十几遍。

姆妈的袁世凯和段芝贵（姆妈叫他段香岩）也有十几个段子，她老讲了五十几遍。

儿子我讨厌听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段子，只是因为看了《读者文摘》的一篇短文，知道和老人沟通一次少一次，才硬着头皮听的。

没想到，听着听着，李鸿章，袁世凯……这些糟老头子便大喇喇地闯入了我的生活。

原来上帝漫不经心地给了你一位姆妈，也是精心策划过的。

梳理下姆妈的事儿，近14年历历在目：

89岁时，她还天天烧饭买菜，有闲心关心刘备诸葛亮。

87岁时，她痛苦地放下老花镜说：我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书上的字了。

85岁时，这位小时候生下一小时后，差点儿被其父扔到水里淹死的“弃儿”，和我每天从1楼爬楼梯到14楼，不服老。

83岁时，我从大洋彼岸回来，十年未见，我发现她激动得脸都飞起来了。那一刻，我发誓要听她讲历史让她高兴，每个字尽我所能地经过下大脑。

70岁时，大跃进时扫盲过三个月的姆妈宣布：去买历史书来，我要自己读。于是《上下五千年》她读了20遍，《三国演义》读了30遍。

姆妈读书，地名人名大多有错。可那是因为我。

我懒，母亲问我字，我“秀才认字认半边”应付一下了事。姆妈到老说的那些历史段子里，还有大量我早期的“误导”。

这能怪我吗？老祖宗将中国字8万多留给我们，不采取少字生词的巧办法，却采取了世界上最笨的无限制扩大字量的办法。

一个 30 人的小村子有时也自不量力地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文字库里的一个专用字。

此生最恨那位山西的外来妹武则天，她怕我们功课少，生生地造了 17 个怪字让我们受累。

其结果是，人过五十的我，还有数万字不认识。

后来，我想通了，与其花时间在这一生只打一次照面的冷僻字上，还不如望文生“字”。没什么大不了的，知识和思想不是一码事儿。

《绝版袁世凯》一书的出版少不了袁世凯家族的后代、项城袁晓林先生的功劳，书中一些家族方面的照片大多是由他提供的。

另外项城博物馆提供了项城袁寨的原始照片。

袁林里的安阳博物馆的各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意见。

上海的王鸣铎先生为本书的策划提供了有分量的帮助并亲临项城和安阳取景拍照。

北京大学的林先生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Jacky Zhang 先生为本书的外文资料翻译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支持。

上海金融学院的张传启先生为本书历史照片的数字化处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安阳超越集团的孙清海先生为我写作袁世凯在安阳的部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支持。

张社生 于北京朗琴园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晚清民初，梁启超提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以为坚持这条就能救中国。这百年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只问上层建筑不问基层「群体」是最大的书呆子气。

大清国和别的主要大国比，不在经济的高低，人口的多少。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体」没有「被近代」过。整个国家不是人家所说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清国就像一个大村子。皇家是村中的大东家。皇上是大东家掌柜的？围绕着这家大户，有一批称之为「一品、二品……跑腿的和帮闲的，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家都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小散户。

所以咱们这个大清国，和历代王朝一样，历来是「东家的事儿归东家管」，「百姓的事儿百姓管」，是个比较极端的「二元社会」。

因此别指望，有什么事儿老百姓会拿命来捍卫。「群体」没有「国家」概念，不会和你同生死共患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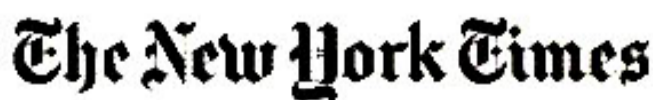
用眼下，句文约约的话说叫「没有公民意识」。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排他性，让每个个体都将防卫的底线画到自家门口。

可是政客不管这些，人家都喜欢自上而下入手，关起门来定几项制度，容易而且政绩看得见。好样儿的如光绪皇帝，数千年的旧制度，人家103天里发了数十条手谕就想改变。后来一个上午就让人给废了。事后发现除了康有为们愤怒外，国人大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不要相信罗马是可以一天建造出来的。

也不要相信民初的悲剧是有一个特别「好」

本书部分图片、文字资料来自于100年前英、美、法等国以下报刊



ISBN 978-7-80741-887-0



9 787807 418870 >

定价：39.80元